



《孙治方全集补遗》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张卓远

主 任

冒天启

副主任

李 昭 旷建伟 薛小和

主 编

唐岳良 沈树正

编 委

陆 阳 张建清 宋子雄



《孙冶方全集》

补 遗

(征求意见稿)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
无锡市玉祁孙冶方纪念馆



孙冶方



目 录

谜样的日本	(1)
日本不是欧洲	(1)
地理述略	(10)
日本的自然界美丽吗?	(15)
国际一月间	(22)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	
——两种相互排斥的经济原则	(33)
帝国主义铁蹄下的阿比西尼亚	(44)
译者序	(44)
序	(50)
第一章：全国形势鸟瞰	(57)
(一)、阿比西尼亚的地理形势	(57)
(二)、阿比西尼亚的富源——农村经济	(59)
第二章：帝国主义侵入阿比西尼亚的历史	(66)
(一)、帝国主义时代以前夺取阿比西尼亚的斗争	(66)
(二)、帝国主义时代瓜分阿比西尼亚之开始	(67)
(三)、阿比西尼亚国家之形成 意大利之对阿侵略和阿比西尼亚之反意斗争	(70)



(四)、英法争夺尼罗河水源的斗争	(72)
(五)、协约国的成立	(77)
(六)、大战后争夺阿比西尼亚的斗争	(78)
第三章：阿比西尼亚各个社会集团及其相互斗争	(88)
(一)、前资本主义关系	(90)
(二)、帝国主义在阿比西尼亚的统治中枢	(97)
(三)、阿比西尼亚的国家制度	(108)
(四)、阿比西尼亚的社会斗争和1930年的骚动
	(112)
(五)、世界经济危机和阿比西尼亚	(119)
附录一：	(128)
(一)、阿比西尼亚的风俗文化	(128)
附录二：	(134)
(二)、进出口货物统计表	(134)
一九三六年度的苏俄文学出版计划	(137)
拥护不可分割的和平	(143)
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中的土地立法	(152)
苏联历史科学阵线上的几个重要文献	(167)
一、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党中央的指示和决议	(168)
二、对于苏联史课本提纲的指示	(171)
三、对于新历史课本提纲的提示	(174)
苏联的经济建设	(177)
一、导言	(177)
二、苏联的社会经济机构的特征	(181)
三、苏联经济建设的几个主要阶段	(189)



四、苏联经济建设的现状和前途	(205)
撤销领事裁判权和救亡运动	(214)
全民抗战的理论基础	(222)
一、前 言	(222)
二、全面抗战的条件	(223)
三、全民抗战的意义	(231)
四、结 论	(237)
中国当前的民族问题	(246)
(一)、什么是民族?	(246)
(二)、帝国主义和民族问题	(248)
(三)、民族解放和“世界大同”	(250)
(四)、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	(253)
(五)、对外的民族问题和国内的民族问题	(254)
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	(256)
一、一般现状	(257)
二、这幼稚的工业还不全是民族资本的	(264)
三、外资工业和民族工业的不同的意义	(268)
四、发展民族工业的障碍	(271)
五、结 论	(277)
战时的农民运动	(280)
一、抗战中动员农民的特殊任务	(280)
二、农民运动中政治动员的重要性	(282)
三、抗战中改进农业生产的必要和内容	(284)
四、怎样着手做抗战中的乡村工作	(287)
附：非常时期乡村工作大纲草案	(290)



十月革命的教训	(293)
因苏联经济建设的成功想到我们当前的任务	(299)
反战反法西斯主义	(301)
接受西班牙事变的教训	(304)
勿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311)
从李维诺夫辞职谈到苏联的外交	(314)
认明环境看清任务	(324)
造成上海紧张局面的基本原因	(324)
“药到病除”	(326)
“冤有头债有主”	(327)
还有更重大的事业要做	(329)
从纶昌工潮中应得的教训	(331)
关于“吴满有方向”问题的报告	(339)
对《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一文的批判者的答复	(356)
编辑后记	(380)



谜样的日本*

日本不是欧洲

当着清朗的春天的太阳开始向地平线下降的时候，我的同伴，在日本住过了 20 年的德国教授很自信地指着前面，带了很不安的口气喊道：

——你看，那就是日出之国的日本了！

在地平线上，隐隐约约地可以看出断续参差的，群山的海岸来。在这个深蓝色的，风平浪静的海中，在那由大洋中突然抬出头来的，遥远的陆地上，和在那船舷外的浪花的高处，好像有什么神奇魔怪的东西在呢。这位德国教授的音调和神气亦好像有种奇特的样子。但是，我对于这些事物都是很少了解。我回转头来问我的同伴道：

——你好像有些心中不安似的？

——心中不安吗？当然是有一些的！——教授带着一种捉摸不定的，战慄的口音回答我。——我在日本过了我的最好的半生，我跑遍了日本各地，并且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欧洲人中，

* 俄国泰根（Taigen）著，勉之译，原载《读书月刊》2卷，1931，秋。



很少有像我这样熟悉日本情形。它（日本）好似完全在我手掌中一样……但是我总还不敢相信自己的智识。日本是一个特殊的，深奥的，不可思议的国家，它是薰染过西方文化的人们所永久不能了解的一个国家。当我在欧洲居留了几个月以后，再重新返到日本海岸的时候，我的这种感觉更形明切了。因于明白地知道：我是在与一个尚未揭开的神秘的谜语，相周旋着，所以我的心中就感觉到十二分的不安。

然而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我不自觉地喊道——难道具有自己的工厂，汽车及军舰的日本不与欧洲相同吗？

完全不同——教授热烈地反对我的意见——日本不是欧洲，它完全与欧洲不同，日本只是日本。如果你不想懂得这一点基本的道理，那么你对于日本就什么都不能了解。

我莫明其妙地注视着我的对方，但是他还是精神百倍地继续着讲下去：

——你要知道实际的例子吗？那是你要多少我就可以说多少……譬如以 200 万人口的日本工业中心——大坂市来说吧，这是一个宏大的，热闹的都市，这里有数百个冒着烟的大烟囱，有许多商店及写字间的高大洋房，有很宽大的沥青马路。这似乎完全是与欧洲相同了。但是倘使你更注意些去观察这许多很宽大的沥青马路，那么你可以看到：一方面在这马路上非常迅速地驶行着最优等的新式汽车，而另一方面，同在这些马路上有许多充作两足牛马的黄包车夫正在匆匆忙忙地奔走着，这是最普通的，中世纪式的车夫呀，他们是出了满身大汗，还在拉着那些肥胖蠢重的美国人。可以说这是现代日本的征象啊！新式的汽车与“人畜”的结合。



这种情形差不多到处皆是。

你若是跑到东京城的中心，你可以看到宽大华丽的街道，高大的，美国式的钢铁水泥洋房。灿烂夺目的大商店，流水般的汽车、电车、机器脚踏车等等。似乎完全与欧洲相仿佛了。但是倘使你跑到偏僻的，纯粹日本式的街道中去，那么你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一幅景象：狭窄曲折的街道，差不多只好容纳两辆脚踏车的来往；矮小的，用木板纸张造成的住房真是与鸡腿差不多高低；数百间沿街的小店铺内，陈列满了无数莫名其妙的食品；密层层的，五花八门的行路人拖了木屐在污秽不堪的街道上逡巡着。于是你马上就可以感觉到：这不是欧洲而是亚洲。

或则你在夜晚时，从高处去瞭望这一个东京市，你可以看到一片灯火的海洋，一片忽明忽暗的电灯光的海洋。从这里你望着日本帝国的首都，你会恍然大悟地领会到：为什么日本在世界电气事业中要占到第二个位置。这又好像是一个欧洲式的国家了。但是你们知道吗，与这景况相伴行的是：200万人口的，灯光照耀的东京城到今日还没有新式的阴沟的建筑。当夏季时，有几个区域布满了使人作呕的臭气。这又是亚洲的风味了，并且这还是非常落后的亚洲风味。

——然则到底日本的工业、技术、银行等——我只开始说了半句话。

——就是这些东西不能把日本变为欧洲。——我的同伴很激烈地把我的话头打断了——你是说工业吗？当然，这是不能否认的，在这方面，日本在最近数十年中，得到了伟大的成绩。但是，就是在这里亦存有一种使人警奇的，现代与中世纪地汇合！



下面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实例。在市中你可以找到好几十家规模极大的纺织厂，内部的设备完全按照最新的技术装置的。到处都是英国或美国的，最新的机器！最新式的生产方法。不论是在朗加夏（Longshire）亦好，或德意志亦好，你总不能再找到比这些更完善的机器。这里又有什么不与欧洲相同呢？但是你如果走进那些纺织工厂的任何车间中去，你可以见到一个特点，在这些厂里做工的全是12岁至20岁的青年女工，成年的女工差不多是没有的。为什么这样呢？事情很简单，原来日本的纺织女工完全是近代式的奴隶。她们中间大多数是农家的女儿。她们的父母同厂方订了一种合同，把自己的女儿于二三年中之间整个卖给了厂方，受厂方的完全支配。年轻的女子脱离了她们的家庭，跨进城市中去服侍那些纺纱和织布的机器。她们就在工房中居住，在工厂食堂中饮食，必须的用品亦就在工厂的贩卖处购买。她们绝对不准跑出工厂的大门。父母们同样亦没有权利可以去访问他们的女儿。一切书信的来往都要受账房的检阅，工资差不多是沾不到女工们的手指的：因为工资的一部分直接由厂方经手寄给女工的父母去了，而另一部分则抵销了女工们在贩卖处及食堂等赊欠的账目，其余一些则存入女工的“储蓄金”中，以为出嫁时的嫁妆费。因为大多数女工跑进工厂去做工，为的是帮助家庭及积蓄些“私房”以备出嫁时的用度。这些女子在工厂做了二三年的工以后，就跑回乡村去配择丈夫，然后又重新变为农妇。但是她们是经过了临时的卖身，经过了奴隶的生活才得到这点“幸福”的呀。事情甚至于到了这样田地，近几年来，在纺织工厂中曾发生了女工的罢工，罢工的要求中有“跑出厂门之准许”，“生病时可



接见父母”及“自由出嫁”等条件。再要怎样呢？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欧洲，而是亚洲，并且是中世纪式的亚洲。

然而银行呢？交易所呢？保险行呢？难道这些不是资本主义的企业吗？这种公司商号在东京、长崎、神户、京都、横滨等大都会不知有几千百个，它们的房屋、账户、招牌、广告、布告等可使你看得眼睛发花。伦敦、柏林、纽约等地亦不过如此吧！但是（又是一个“但是”）……各交易所的经理每年总要跑到庙宇里去，并且诚心地祷告……你想他们的祷告些什么？！他们要想“上帝”告诉他们这十二个月之内的货价的涨落！你能在欧洲找到诸如此类的情形吗？……

譬如说家庭吧？毫无疑问，日本是世界上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无论在何处，资本主义总是建筑在个人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原则上面的。但是日本社会中的社会单位至今还不是个人，而是家庭，而且是最广义的家庭（包含父母、孙儿、孙女、堂兄弟、堂姊妹等等）老实说，这不是家庭，而是氏族，每个家庭由家庭议事会管理而家庭中每个人的首要的，最神圣的义务就是正确的执行家庭议事会的一切决议。家庭议事会讨论人间的一切问题，它讨论：本家庭内谁个男子应当娶谁家的女儿，谁个女子应当嫁给谁家的儿子，谁与谁应该离婚，谁应当研究某种职业，谁应当从事某种设计事业等。两年前我曾在东京购买一块地皮，我在6个月之中未曾能够订好契约，只因为出卖地皮给我的那个商号的家庭议事会的一个会员出门去了，可是没有了他，家庭议事会就失去了开会的法定人数。如像三菱、三井等最大的资本主义的企业，一直到今日还是受该公司的家庭议事会



所管理的。倘使在一个无产者的家庭中有两个或三个人在外做工，那么加入职工会的只有一个父亲。认为如此已经足够了：倘使家长已经加入了某个团体，那么这一家的其他工作人员也就算该团体的会员了。诚然个人主义之在日本，一直到今天还是为“家庭苛政”所拘束止的。这又是一种欧洲与亚洲，20世纪与15世纪的奇怪的混合。

或者以海陆军为例吧。日本海陆军的革新是比任何部分都要早些，为了它的发展和改革从未吝啬过财力。而实际上，在组织及技术的意义上，日本的武力确实可以与最“先进”的国家相比拟。陆军是按照德意志——普鲁士的方式编制的，海军是按照大不列颠的方式编制的。它们都经历过伟大的战争。并且自己证明了：它们的确可以算做20世纪的武装。但是（又是“但是”）日俄战争的英雄，诺甘（译音）将军为欲追随日皇于九泉之下，于1912年破腹自杀，实行殉葬。接着，诺甘将军的妻子亦就学了他而破腹自杀。这还不算，在诺甘将军自杀以后，他就被尊为天神，在东京且建筑他的庙宇，且有很多人去烧香礼拜。至于日俄战争的另一位英雄——海军上将台谷——更其出色了。诺甘将军总算是在他死了以后才成仙的。而这位台谷将军则在现今还没有死以前，人家就不以“凡人”的礼仪去对待他了，在日皇的庄严的宴会上，他总是独自坐在一张特殊的小桌上，他只比天皇低一级，这是什么呢？是欧洲呢，还是亚洲呢？是20世纪呢，还是15世纪呢？倘使有一天忽然宣布福煦或兴登堡将军为神仙的时候，大家岂不要好笑死吗？

最后，还有一个实例！去年我在日本中部曾建筑一所新的德



国小学校，我请的建筑师是日本有名的人物，专门大学的教授，极有才能的专科著作家中村，他曾经在欧美各国留学过，精通好几国语言，因善于建筑防御地震的坚固房屋知名于世。中村是日本知识界中最博学的代表人物，是该国中 20 世纪的活的结晶品。可是这一位中村在打好了学校房屋的图样，签订完了合同以后，忽然发给我一个突如其来的问题：“请问你，在贵国开工建筑房屋时，存在何种风俗？”我弄得莫明其妙地回答道：“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就举行奠基礼，邀请名人演讲等等。”中村做出非感觉兴趣的样子，听完了我的解释后，就带着一副使人迷醉的，日本式的殷勤的态度，（此种口头的殷勤最不可靠）来称赞欧洲风俗的开通和便当。但是根据建筑师的态度，根据他说话的口气及一切举动，都使我感觉到似乎中村有什么话还没有说完。我果然没有弄错。过了几分钟以后，中村带着满面笑容，轻轻地吸了一大口气（这是日本人对于客人最尊敬的态度）很小心的开口了：“在敝国存在另外一种风俗，在动工建筑房屋之前，必须先要把魔鬼从建立房屋的地基上驱逐开……”我莫明其妙地看着我的客人，心里想道：“他是在说笑话，或者同我寻开心吧。”不对，中村的态度是非常慎重的，不过他的眼睛的瞳孔已失去了光泽，好像是看到数世纪以外去了。我恐怕自己是听错了，所以又重复问了他一遍。但是我并没有听错。中村讲的正是关于“驱鬼”的问题，他说：凡是一切没有建筑房屋的空地上，都是满住着鬼怪的。要“驱鬼”时必需邀请和尚，请和尚是要花钱的，请来后他们就照做一切应做的功课，如像吹打、洒圣水、发符咒等等。中村已经自告奋勇的把这些事情办理好了……我简直有些不想信自



己的眼睛，更确实些说，有些不想信自己的耳朵。但是事实总是事实：一个著名的日本知识分子是在慎重地同我谈论着关于在我所购买的土地上“驱鬼”的问题。这是什么，欧洲呢还是亚洲呢？这是哪个时代，20世纪还是15世纪？……

不，日本不是欧洲。无论如何不是的。日本就是日本。日本是一个奇特的，且往往是神秘的混合物，是亚洲与欧洲，过去与现在，野蛮的中世纪与文明的现代，原始的耕犁与电车及汽车的混合物。

——但是日本的生活为什么如此的混乱复杂呢？——我禁不住打断了这位教授的话头问道。——日本接受欧洲的文明岂不是已经有六十余年了吗？难道在这种较长的时期中，这个国家还没有来得及从头至尾的改造和革新吗？

这位教授答复道：

——凡是在几百年甚至于几千年间所形成的事物，不是几十年间所能消灭的。日本的旧习惯还具有极深的根基，不经过争斗是不会退让的。同样的不要忘记了，欧洲文明是一棵从别家园地中移植到日本去的美花。在半世纪中，西方文化的各种原素——技术、军事、政体、科学、艺术——大批的搬进旧的日本社会。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呢？得到了一个新与旧的混合物，此中一部分已经成了坚固的化学结合的形式，而另一部分好比是茶杯中的水与油的不相溶合一样，还不过是两种异质原子的机械结合而已。从此就产生了一种矛盾的现象，很生硬地刺入每个考察日本生活的欧洲人的眼帘。日本虽则已达到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无论如何它还是处在发展的过渡时代。它总还没有脱离学生时



代。——我把它与大学校的高级生相比拟——怪不得在文化、科学、艺术、文学等各界中，日本还没有出过世界知名的人物来。

并且还有一点。日本人是一种有才能的、耐劳而有毅力的民族。但是他们是模仿者而不是创作者，当他们模仿人家时是很聪明的，但是他们要成为独立思想的代表人物时，他们简直是不值批评。我并不在断定他们的前途，但是至少他们在过去 12 世纪中是这样的表示了自身。在 1868 年明治维新以后，他们用了十二分的精力去模仿欧美的文明，并且达到了很显著的成绩。但是他们在明治维新以前千余年间，他们有系统地受了中国文化的栽培。如果随便把维新以前的日本观察一番，那你就会发怔，——在古代日本的民族生活中的最好的，最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发源于中国的。农作的形式，治国的原则，宗教、哲学、文字、建筑术、科学、诗词、文艺等，——凡此种种都是从中国抄袭来的。真是奇怪，中国对于日本的影响竟有如此之伟大：在世界史中，一民族在文化上浸染另一民族的先例从没有到此种程度的！当然，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去学习另一个比较先进的国家的实例是常有的，但是经过相当时期以后，通常做学生的总能自立门户，去创造自己的文化，有时甚至于超过了他的先生的文化。但是日本并不如此。在过去及现在从未有过日本自己的文化。在明治维新前数千年间，日本只是简简单单地把中国文化翻译成了自己的文字，而现在它是在翻译资本主义的西方的文化。这种软弱的创作精神有非常重大的好意义。它（这精神）使得日本不能迅速地领会新的文明及成为真正的欧洲式的国家。

轮船已经减弱了速率，并且小心地驶进狭长的港湾，四面环



绕着满生灌木的山峰，淡绿色的山谷，以及岸边倒悬着的石壁。白浪之间隐约着千百艘小帆船及汽油船。从几只航行海洋的大轮船的烟囱中冒出的黑烟遮满了天空。远远地映出一片港口房屋的黑影来，在这房屋的那边就是四通八达的，弯曲的，狭小的街道，以及鸡笼般的矮屋子。我们已经进城了。德国教授很高兴地呼了一口带有埠头上的，混杂味道的空气，在握手作别时，他说：

——请你原谅我的一番厌长无味的牢骚。但是，我希望，我刚才所说的一番话能够帮助你在新环境中的行动。

这位教授并没有说错。在以后我总是时常喜欢回想到这位教授。当我想到他的中肯的批评及绝妙的结论时，我是如何的佩服他呀！毫无疑义，这位教授的确是洞悉日本的国情的了。

地理述略

……此后就产生了许多神仙，他们的数量一天一天地多起来了。但是因为世界还是在混沌之中，所以诸神仙一无公事可办，于是各位仙长举行了一次会议，当场决定派 Esanagi 及 Esanami 二仙长下降凡尘，去创造坚固的陆地。当分别时众仙长吩咐道：“我辈赠你俩一件无价之宝，用此可以指挥所创造之下界。”于是诸仙长以锋利无比的 Amar-nor-nobok 宝剑一口赠此二仙，剑上嵌有无价之宝……

二位神仙跑到了仙凡交界的浮桥上，纵目往下界看去，不觉失声叫奇。原来世界尚未创成，只见有浓雾一团，上下飘荡，放出一股芳香……Esanagi 把宝剑往下一搅，他感觉到好像触着了什



么东西似的，他慌忙把宝剑取还，只见在剑锋上溜下数滴浓浆，流到下界，立刻变成一处海岛。此即 ONokoro 岛是也^①。二位仙长不觉大喜，于是离开浮桥，跑到彼等所特创之海岛上，该岛就成了他们的家室。

不久 Esanagi 及 Esanami 二位仙长想欲正式成婚，于是他们在海岛中心竖起一座高高的石柱，称为天尊柱，在石柱四周筑起大厦一所，称为八度宫。然后男仙沿石柱向左绕去，女仙沿石柱向右绕去。当二位仙长相遇时，女仙开口道：“我是何等光荣，能见到如此美丽的少年。”男仙答道：“我何等光荣，得爱上如此美丽的少女……”

在预定的期限中，女仙为丈夫生了一个儿子，但是这个孩子好似水蛭一般软弱无力，且全身无半根骨头。二位仙长非常懊恼，他们把生下的小孩放在芦柴编成的小船里，任他随着水流漂开了。但是他们生的第二个儿子并不见得比第一个完善，于是二位神仙惊惶地跑回仙界，向诸仙询问他们两个得祸的原因。众仙长说道：“这是女仙的罪过。当他在天尊柱旁遇见男仙的时候，她不该首先招呼，以至造下这个孽障。不论何时，女人总不应该抢在男人的前面。”

二位仙长明白了自己的错误，于是就决定想法改正它。当他们重回下界以后，他们又再一次的绕着天尊柱走去。但是在这一次男仙先喊道：“我何等荣幸，得能见到如此美丽的少女。”然后女仙答道：“我何等荣幸，得能遇见如此美丽的少年。”这次见礼比较是准确且合乎自然间的定律。

① Onokoro 是日本神话中所传说的岛名。



此后，二位神仙所生的小孩是最好没有的了，第一个儿子是四坂岛，第二个四国岛，第三个是九州岛，第四个是对马岛，而再后一个日本最主要的本州岛……此后又生了许多小岛，它们满布在大岛的周围”。^①

这是关于创造日本的古代传说。

自从 Esanagi 及 Esanami 以后，在日本国的地理上大该没有发生任何大变动，但是神仙的地理智识总是不大完善的，所以我必须以近代科学的眼光来修正及补充上述的神话。因为我们知道，往往欧洲各国的大学毕业生对于日本的自然界及地理亦总带有一种幻想的。

日本是什么呢？

它是 2870 个岛屿合成的帝国。各岛屿如下式分列：

日本本国	519
殖民地（高丽、台湾、南库页岛、琉球群岛）	1615
保管地及驻军地（关东区）	746
	2870

可怜的神仙！他们大约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这许多数量的后裔。但是如果我们将许多小岛屿不算在内，那么在日本帝国版图内，只有六个大岛，其名称如下：

本洲岛	230000 平方公里
北海道本岛	88000 平方公里
九洲岛	44000 平方公里
南库页岛	36000 平方公里

① 见 Saichiro Isobe—“The Story of Ancient Japan” Tokyo 1929



台湾	26000 平方公里
四国岛	19000 平方公里
453000 平方公里	

若是再把殖民地——南库页岛及台湾——除外，那么只剩了四个大岛即：本洲岛，北海道本岛，九洲岛，四国岛。

此外的岛屿都是很小的，虽则有的亦具有极重要的战术上的意义，然而不论是在全民族的经济，政治或文化生活中都不起什么重要的作用。

日本有多大呢？

日本本国（殖民地及保管地除外）的疆土占有 38.8 万平方公里。这即是说，日本国的总面积只等于波兰或芬兰的疆土。但是所重要的是在于：在这么大的日本疆域内竟有 6300 万人民，与波兰之 3000 万及芬兰之 3500 万相对比，如果把殖民地及保管地都算在里面，那么日本帝国共占有 67.5 万平方公里，即等于法兰西或捷克斯拉夫之疆土，而同时全帝国的人口亦共有 9000 万之数。

若是更具体些说来，这些数目字有何种意义呢？我且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要想从北至南——从北海道本岛之雅内海港起程，至九州岛岛之鹿儿岛港止——走遍日本本国，那么你需要乘坐三天半的快车，越过两个海峡。但是如果从西至东而行，那么就是在最大的本洲岛的宽广处，只需要 12 个钟头。因为日出之国的日本，大该由于神仙的意志或是自然的偏心，成了沿亚洲东岸的一堆像皮带般狭长的群岛。

一般人的意见总以为日本的气候非常之好，所以使它成了一



个诱人入胜的多花之国。这句话是对又不对。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因为花——美而不香的花——成了日本生活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在春季有美丽的樱花，在秋季有 Nikkor 地方的美丽的枫树。但是这句话在另一种意义上是不对的，因为日本国大部分地方的气候是非常难受且极累人的——这至少对于欧洲人是如此。

北部的森林区——北海道本岛——的气候很爽快，与俄罗斯的乌拉山区域相仿佛。这里的夏季亦与俄罗斯的夏季相像，而冬天则遍地罩满了洁净的白雪。居民则以滑雪及跑冰为戏。在岛的中部平原上，在正月间的温度常降至零下 20 度至 25 度。日本的军队刚在这时候举行冬季演习，以训练兵士于冰雪的环境中作战。……准备和谁打仗呢？这是很明白的：与日本为邻的只有一个国家是常处在冰天雪地的严冬中的。

然而愈是往南，气候愈是使人难受。难受的原因并不是在于酷热。干燥的热天还是欧洲人所比较容易熬受的，这里气候的使人难受，是在于严酷的热天再加以同等严酷的湿气，潮湿的热天是常时使人不容易熬受的。或者以东京，大坂或神户为例吧，在冬天，这几个城市的气候差不多还可以。不下雪，温度亦从不降到冰点以下。照耀着清朗的太阳。开着各种美丽的花朵。在正月中妇女们可以穿单衫在街上跑走。只是偶然地吹到一些潮湿的海风，带着些浓雾或细雨来。但是一到夏季，在六月中就开始黄霉时节了——五个星期不断的大雨。好像连天都要倾覆下来的样子。一切河流或湖里面的水都涨过了堤岸。一切小溪都变成了可怕的大水。空气中充满了水分。在大雨停止以后的一个短促的时



期中，靠近赤道的太阳晒着潮湿的地面，于是蒸出一股腐败恶浊的气味，布满了空中。在这几个星期中，草木以及田里的稻亦很快的长大了。黄霉时节完结后，接着就是长期的，酷热且潮湿的夏天，在这时期，可怕的，南方的太阳燃烧着地面上的一切，寒暑表有时升到 40 度至 45 度，空气中使人入睡的静寂。没有丝毫的微风和声息。潮气把一切都浸湿了，都屈服了。你好像是终日生活在浴室中一个样子。热汗像雨一般从人身上落下来。刚穿上身的衬衫只要经过一点钟以后，就像一块从水里捞起来的烂布一样，怪难过地胶在你的身上。拿到手里的纸张立刻就会柔烂起来，使得墨水写在上面就得化开。人们的身体变了异常软弱，而思想也顿时就懒洋洋起来了。晚上放在床下的皮鞋，一到明天早晨都长上一层绿色的霉菌。冬天穿的衣服，如果不在春天就折好了安放在铁箱中，那么一条条的线缝就会脱开来。这样一直要度过了十月才算终止。这种情况就是在夜间亦不会多少好一些的。

欧洲人在这样的气候中是否容易过活呢？当然是不容易的。差不多没有一个欧洲人是能真正的适应这种气候，而不感觉到丝毫困苦的。所可认为唯一的幸福的，就是日本还没有热带的疟疾病。然而就是没有此种疾病，那么日本的气候亦可算是一种艰难的阅历。在这阅历中欧洲人或美洲人是很少得到胜利的。

日本的自然界美丽吗？

啊，是的，日本的自然界是非常美丽！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值得全世界的称许的。

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所得到的印象，这是在美丽的一天，从



马关市到东京去的快车中。从车窗中我可以看到本洲岛的南部。我像是着了迷似的，不愿意把眼睛离开那转瞬即逝，而其神话般的美丽是不变的风景……

平和的山凹，在万座青山的毗连处，都为淡薄的烟雾所笼罩着，这许多山并不伟大惊人，只是因它们的娇艳迷人的颜色以及华丽的轮廓而把游客诱惑止了。静寂的山谷下，奔流着喧声振天的溪河。从火红色的石壁间泻出万丈的瀑布。在沉静透明的湖水中反映出峭立的山峰以及弯曲的岸边的土山来。春日的樱桃树上堆满了粉红色的，棉絮般的花朵。戴了大笠帽的农夫曲着背立在灌满了水的秧田中工作着。在各个参差不齐的村庄中，总是数十间用纸张和木板造成的，玩具般的矮屋子，矮屋的墙壁是可以移动的，而室内的地席却是意想不到的清洁。热闹的城市及其弯曲的街道，鲜明的招牌，汽笛的怒吼，电车的铃声、烟灰、污泥、汽车、人力车，以及巍大的白石房子等等。此外还有：光芒夺目的南方的太阳，到夜晚时沉落在美丽的云霞中；深蓝色的天空；千百处图书般美丽的大小岛屿及其碧绿的树林，洁白的小屋子以及高大的庙宇都连续不断的排列在内海^①沿岸的一带；最后就是太平洋的怒浪，它用了伟大的力量把岸旁的石壁振荡得呼呼作响……

从马关到东京的 24 小时路程中，不断的可以见到这些风景。这好比是美的惊人的汇集，它把我迷醉了，蛊惑止了，几乎使我对于有生以来的其他一切印象失去了知觉。我到过阿尔卑斯山、高加索、法国底利维拉以及贝加尔湖。但是我从未见到在如此有

① 内海是本洲岛及四国岛之间的一个海峡的名称，是日本名胜之一。



限的空间，竟集中了如此许多的美景。一路上，在我的喉咽间梗着一个疑惑不定的问题：难道这是真的吗？难道这是现实的国家而不是舞台上的布景吗？……

此后我曾游历了日本的许多名胜。我到过本洲岛的北部，我跑遍了北海岛，我见过四国岛，我游历过全三府区（大坂、神户、京都等地属之）我亦到琵琶湖及日本海海岸，——我到处所见到的与我到日出之国的第一天所见到且使我感觉到惊奇的完全相同：这种丰富的，非人间的，美的集合，在全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地方来。

在我的印象中常映出各种忘不掉的景象来……

这就是 Hakoni。在岩石及峭壁间的，狭窄曲折的道路上，汽车倾斜着，弯弯曲曲地向着山巅走上去。在起初还稀少且透明的树林到后来便渐地浓密且神秘起来了。禽鸟的歌声愈少了，晒着树干的阳光也愈少了。稀少的村落，单个的小屋远远的掉在我们后面去了。山巅、树林、岩石……岩石、树林、山巅……骤然间，好像完全是偶然而且未曾预料到似的，汽车停在山巅上了。树林立刻就分离开了，而太阳亦又重新行使它的威权。更一转瞬间，就看到在你前面是一个像梦中一般奇特，像水晶一般透明的山湖。这个湖很奇特的生在水平线以上 2000 英尺高度的，石壁地罅隙中。湖的面积有 10 公里长，2 公里宽，其形状好像是狭长的刀身。在湖的周围，很热闹的环绕了许多密层层的树林，绿色的山谷，沉默而蔚蓝的山峰，远远地隐约着渔船上的白帆。四下里没有丝毫动作或声息。只有一片静寂，只在明镜一般的湖水中，反映出日本最有威风，最美丽，最有名的山峰——富士山的



雪巅来。看着这一种风景，马上就感觉到好像是在活龙活现地过那古神话中的生涯，好像是骤然间把你送进了 Esanagi 及 Esanami 二神仙怪异地生产自己的美丽的岛屿的那种时代。……

这就是 Onokoro 严酷的北海岛至今还常时要喷发烟火柱的 Komagataki 火山。它的岩石组成的锐利的山峰高高地插入深蓝色的天空中。它的侧面分裂成深深的罅隙。它是阴暗且严酷……而在这个火山的山脚下，在它的高峰的黑影下，幽静地流动着美丽的 Onooma 湖底波浪。湖水清而且深。湖心中散满了小的岛屿。在有些岛屿上，尽可宽畅地举行大队旅客的野外游戏，而在有些岛上，只能勉强地容纳两棵新长成的白桦树。到处都是跨在岛屿之间的轻便的弯曲的桥梁。悠扬着的 Simigen 琴的声音。水上酒馆的纸招牌高高地飘扬着，上面写着奇特的象形文字，以便把游客招进纸板的小屋来。在各岛屿之间慢慢地流荡着许多船只。空气中充满了醉人的温和以及深远的稳静。一到晚上，各处的小馆子都上了火，而在每只船的前部亦点着一盏小灯，像是千百个大萤火虫在目光已经辨不出的湖面上流动着，景致更是神奇了，好像又是处在不可思议的古神话的生涯中了……

这就是 Hiyesan 了。这是在京都市效外的一座高山，上面都长满了树木。小小的，完全像玩具般的空中电车载着我们从日本旧都的平地上慢慢地，轻飘飘地向高处升上去。我们不断的向高处上升。一切岩石、溪流、村落，房舍等飞一般的从我们旁边过去，我们的眼界一刻刻刻的扩大起来，京都的庙宇及其他建筑物更遥远，而且更低了，好像是更迅速地，更猛烈地离开了地面而飞翔着，且更迫近天空了。骤然间，发生了一次特如其来的振



荡，电车停了。路程已经终结。乘客们心急慌忙地从那狭小的车厢中跳上了月台。但是这还不是山巅。此后极长的，蜿蜒曲折的上山路，只好步行了。可是并不如此：谁愿意步行就步行，而谁愿意……乘坐两只脚的人畜，亦尽可自便。有二个瘦小的日本人跑到我的面前。他们的肩上有一个长的竿子，在竿子上系着一只浅而宽的篮子，篮底里放着花花绿绿的垫褥。用着他们的不三不四的英语热烈地邀请我坐到他们的篮子里去，并且叫我任意的去探试他们的经过锻炼的两腿及臂膀，我绝对地回绝了他们。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此“勇敢”。两个肥胖的日本女人极定心地，像孵小鸡式的坐进了他们殷勤地收拾好了的篮子，并且在脚夫的肩上开始摆动起来了。一个满口臭气的，高大肥胖的美国人也爬进了这种奇怪的竹篮。这个篮子只勉强容纳了他的身体，而可怜的日本人被他魁梧的体重压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另外一个德国人想得更特色了：他自己在前面走着，而叫两个矮小的日本人在两旁推着他的背……

不断地上升着。道路忽然曲曲折折地环绕着山的侧面，忽然又弯进了石壁的空隙及紧密的树林。跑到了第一片石子场，旅客们在那里多少休息了一会。跑到第二片石子场时，在面前就展开了一幅异样美丽的绿色的山景。再经过了一番努力！向上经过了几极倾斜的曲折！……骤然间，大家立定了，一时竟找不出几句话来形容所见的风景。

——啊，这就是山巅了！多么神奇，多么广大呀！多么威势，多么惊人的风景呀！……深远的京都的平原好像完全在手掌中的一样。在薄云的下面横卧着一座美丽的城市。隐隐约约地望



见庙宇及宫殿的楼阁。四面全是山峰，山谷，湖沼，一切这些全在正午的阳光的怀抱中。在它们的那一边，又是山峰、山谷、湖沼等。再远一些，还是山峰、峭立的绝巅，石壁以及山壑等。再远一些，还是山，还是参差不一的，颜色渐渐浅淡的青峰。这样一直到眼睛看不见为止。

在另一边却是绝大的空虚，在明绿的堤岸围抱中的，是日本各神话中的真珠——“神圣的”琵琶湖。冰冷透明的湖水完全静寂无声，像一面神奇的大镜子一样，没有丝毫的皱纹，平稳合度地奔流到数十公里以外的远方去。在远地里闪烁着渔船上的布帆，隐隐约约可以看出一只不大的轮船的船身。又是平坦的湖面，又是它（湖）的平心静气的仰望着天空……

而在明镜般的湖水的那一面，全是碧绿色的秧田，有的地方竟侵入了山脚下的树林区域。在这后边绵沿着另一片，更远的，更柔顺的田亩，以至于一直与烟雾茫茫的地平线相毗连……

在 Hiyasan 的高顶看着这一幅图不禁又想道：难道这是真的吗？难道这是真实的日本，20 世纪的日本吗？这种景象在世界创立的第一日才能见到呢……

Hakone，Onooma，Hiyesan……只是这一些吗？印象中不断地一幅幅幅的展开来……这是到 Nikkov 去的一条小道，它的阴沉庄严像到死亡的道路一个样。这是内海中，充满了阳光的，快乐幸福的四坂岛，这就是传说中所指为 Esanagi 及 Esanami 二神仙所生育的第一位康健的儿子。这是山林环绕中的小小的淡绿色的敦贺港，从这儿日本经常地与海参崴发生邮件的来往。这是北海岛的硫黄质的温泉，它位于高大的峭壁间的黑暗罅隙间，上面飞翔着



滚热的蒸汽，从水里更散出一股剧烈的气味——这真像是但丁的地狱中的景象啦……

不差，日本的风景是美丽的，但是在它的美中，单调的地方太多了，并且在它的美中，没有惊人的伟大及威势存在。在这里都是异常的美丽，但是太柔顺，太细腻了，并且不是由于人工而是为自然的本身所形成的。它不是高加索或阿尔卑斯山，而是克里姆。它是美丽的，但是这种单调的，太柔顺的美是像过份甜的食品一样容易使人吃厌的。

20世纪的日本是挣扎于资本主义与封建制度二重生活之中的，所以称为“谜样的日本”确是很对的。这篇东西原名为《日本的黑影》，是一个俄国人的一篇游记，但是这篇游记不像其他普通日本游记一样，他深刻地描画出了日本的内在的生活，我们看了这篇东西，更可认识了日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国家。至于文字的富有诗趣，记事的生动活泼，也是这篇文章的特点。本篇译自1930年在莫斯科出版的《新世界月刊》第二期。



国际一月间*

自从在本刊三卷一期发表了第一篇“国际一月间”以后，本栏已有五六个月未与读者见面了。五六个月的时期亦不好算不长，在这期间，国内外曾发生了许多大小事变，但把这些事变总括起来仍逃不出我们上次在本栏中所下的结论，即：世界经济危机的加深和扩大，帝国主义自身矛盾（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以及各国内部劳资间的阶级矛盾）的锐利化。这好像是老生常谈，读者或许听着要讨厌了，然而社会的发展确是如此，编者不好杜撰些事实起来凑新鲜。编者的责任是在于把新的事实来充实这两句“老生常谈。”现在让我一桩桩说起。这里首先就要讲到那个1929年开始的

世界经济危机的加深。在这大半年间，世界各国的工商企业和金融机关仍接连一二地倒闭着，卖不出的农工业产品堆满了栈房货食，失业工人仍有增无减。今年1月至4月间，各主要国的对外贸易均有猛烈减缩，比诸去年（1931年，即危机后的第三年）同期间，进口货之货值，英国减12%，美国减30%，法国减35%，德国减36%。以出口货的货值计，英国减7%，法国减

* 本文署名勉之，原载《读书月刊》3卷4期，1932，6，14。



38%，美、德各减36%。因商业停顿而引起之生产减缩，失业工人之增加及他们的生活之恶化自是必然现象。为不愿尽把干燥无味的数字来讨读者的厌，仅抄两个路透社的电报在这里，也就算让我偷个懒，卸了个责任。

(一)

(纽约路透通讯) 特娄万先生，原是一个厨司，觉得疲惫、饥饿、无家可归。他呆立在一家店门前，等到警察走近的时候，便拾起一块石子，向橱窗掷去，警察捉住了他，带到法官面前，他解释道：“因为我的肚皮饿，所以这样干。我是一个厨司，如果送我到习艺所里去，我是很有用的。”

法官就问他情愿在习艺所里拘禁几天，他答道：“30天大概可以了，”但是法官以为30天太多，对他说，“10天”。他快快地走进囚车，口里埋怨法官的不公平。(见5月31日大晚报)

(二)

(马德里路透通讯) 马德里附近的卡拉彭谦尔地方，有一位匈牙利人，他穷无聊赖，竟发现了一种骗饭吃的新方法。

怎样呢？他自己跑到当地的卫戍衙门里，泰然地自首，说是他暗杀了一个女人，他就被拘禁起来，一方便稟命副官，副官听了，立即发命到各方，去调查这件事情。

但是，经过一番调查，得不到一点有人被暗杀的消息。到了最后，这人才承认，他并没有犯什么罪，不过来到拘留所里骗一顿饭吃罢了。(见6月2日大晚报)



上面这个电报可以帮我说许多话，我们籍此可以推想到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工人所过的生活。

因于危机之延宕，给了各国政府之财政收入以严重打击。各国财政总长或财政大臣天天在过着大除夕的日子。为使预算平衡就不得不颁布新税率，发行新公债，裁减公务人员以节省政费。这情形普遍于全世界各国，虽以黄金之国自命的北美合众国和法兰西亦不能例外。据法国前总理加劳氏的估计，1932 年法国政府的收支不敷之数将达 70 亿法郎之数。同时据本月 8 日巴黎的电报，法新政府又将发行国库券 29 亿法郎，如此将使法国短期借款增到 60 亿法郎，这不啻完全推翻了前总理普恩芬所苦心经营的转变政策。此外，据华盛顿路透电的消息，美国在现届财政年度终结时，收支相差当为 25 亿元美金（查上年度不足之数为 9 亿零 300 万元）。因此胡佛总统要求缩减政费 3.6 亿元，但即便能达到总统的要求，而 1933 年度的预算案之支出仍须 40 亿元，假如 1933 年之收入仍能维持本年度 20 亿元之数，再另加补充税案所得之 11 亿 1 千 9 百元则收入总额还不到 31.2 亿元，与支出相较仍短少 8.8 亿元。可是颁布新税则将使处于危机压迫下的人民更加一重负担，发行公债亦只能济一时之急，不能像我们贵国政府一样作为唯一的收入来源。至于裁减公务人员节省政费亦只能是扩张了失业后备军的声势，自己（政府）消费了政治基础（这几日发生了数万退伍军人的索饷大风潮当给了胡佛总统一个相当的教训）而所得是有限的。

这就是世界经济危机的现状概述。至于它的前途如何呢？我们这儿借用英国著名文人吉伯林对此问题在 5 月 23 日伦敦“晨



邮报”所发表的二句诗（见5月23日伦敦路透电）：“夜色正茫茫，黎明尚有待。”

因危机的继续发展必然将引起帝国主义间的相互冲突之加紧，这在最近月来进行的

军缩会议和洛桑会议中可以看出。我们对于军缩会议早就有过确定的估计，说它是各国相互勾结，保持自己军备裁减敌国武装的会议。各国代表勾心斗角，费尽了口舌，无非是想证明本国所重视的军备为“严格防备”的武器，而别国所需要的却完全是侵略工具。法国为防止德国复仇，维持欧大陆及地中海的霸权所以要保存大规模的陆军及地中海舰队。德国为脱离凡尔塞和约的束缚，所以要求以平等待遇为原则实行军缩。至于法西斯帝主义统治下的意大利，在财政上早已陷于枯渴的境地，不能与“黄金满溢”的法国作军备的竞争，所以它亦要求军缩以与法国针锋相对。那个称雄远东的日本帝国，为要握得亚洲及太平洋的霸权，想与美国和英国争取海军平等，因此它拉拢法国抵抗英美且藉以换得法国对于日本在华侵略之默认，有时甚至联络英国单独对付美国。英国一方面为抑止法国在欧大陆的势力之扩张，并防止德国之破坏凡尔塞条约，所以总站在法、意，或法、德之间，做一个中间人，以维持欧大陆上法、意、德三国的均势，不使法国过分地压倒了意、德；另一方面为维持世界一等海军国的地位又极力防止美国势力之发展。至于美国，则藉着金元地实力，以减轻战债为交换条件而要求欧洲各国减缩军备。因此各国出席军缩会议的代表及军事专家讨论了三数星期的结果，大家只有对于一点是完全同意的，这就是：各国代表对于军缩的问题尚不能取得一



致的态度，但各国对军缩的态度是永远不会一致的。因此军缩会议亦永久不过是穷兵黩武的帝国主义者在军缩掩护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做的一番准备工作而已。

至于洛桑会议的内容，若总括一句说，亦将如军缩会议一样无法结果而结果。因这两种会议的议事日程虽完全不同，但两项会议确有密切的政治关系，都将反映着各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会议中应讨论的主要问题为赔款和战债。自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以后，德国所受的打击最大，到 1931 年时，财政已陷于破产地位，那个久为德国国民经济的致命伤的赔款实在已经无法支付了。于是就发生了胡佛总统的赔款战债停付一年的提议。经过了许多会议和商谈之后，这提议大体被各国所接受了。当时曾有人把胡佛总统提案看作世界经济复兴的开端。到了现在，这提议是否曾阻止了危机的发展呢，这问题自有这一年的事实来答复，不用我来饶舌。但我们不能不否认这提议确是把赔款问题的决裂延宕了一年。但这一年很快地过去了，赔款战债之延付快将满期（6 月 30 日），因此赔款战债问题又严重地摆在各国政府当局的面前，要求他们的解决。可是目前德国的情形比了一年前更形恶化，前德总理白鲁宁曾在数月以前就有德国无力负担赔款的宣言。这宣言引起了法国当局的极端恐慌。在法国看来，停付一年已是极大牺牲，若德国再有进一步的要求（即取消赔款）岂不是完全取消了凡尔塞和约所给与战胜国的大部份权利，所以法国极力反对德国对于赔款问题的进一步的要求，最近巴黎报纸甚至更放出重占鲁尔区的空气以威胁德国。但另一方面，德国在目前确实无法偿付赔款，这亦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便有洛桑会议之



召集，想在没办法中求得一办法，以打破赔款问题的僵局（此会议原定 1 月 18 日举行，后来因为对于讨论范围未能一致，又因法德二国大选关系改于 6 月举行）。在这会议上除德国外，都站在债权国地位，不过因利害关系的深浅不同，又因各国互相间的冲突，所以对赔款问题的态度亦并不完全一致。英国在欧大陆的政策，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即是它始终是处于调人的地位。它一方面固然不愿法国的势力过份扩大，不愿法国的过度剥削完全毁坏了德国经济，另一方面自然更不愿德国完全脱离凡尔塞和约的束缚而复兴。因此便想在德国之完全取消赔款与法国之不肯再作让步之间取得一个新的折衷办法。这就是英国首相麦唐纳在洛桑会议之前到巴黎去和法总理作密谈的任务之一；正如路透电所说的：“众信双方（英法）皆以为德国缓付赔款时期之展长乃不可免之事，但此举须于避免德国片面声明取消债务之情形中行之。”其实，目下德国之不能继续偿付赔款的事实就是法国也不至否认，所以迟早要迫着法国作让步的。因此英国的这个折衷办法，实际不过是战胜国在事前力谋一致以压迫德国抛弃取消赔款的决心的一种办法而已。但此外，英法当局在洛桑会议前的密谈更有另一个任务，这就是力谋取得对美政策之一致。美国是赔款的最后接受者，要使协约国能对赔款问题作继续让步，必须先取得美国对于战债问题的首先让步。所以美国的态度对于问题之解决确有重大意义。但美国始终宣言赔款问题与对美战债问题之间并无何种连带关系，且此次又拒绝参加洛桑会议，自己另外却又发起世界经济会议。这表示美国始终想保持自己的行动自由，不受欧洲各国之牵制。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压迫之下，美国也已经感觉到



缩减或勾销战债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但它非但不愿在别国牵制之下采取这步骤，而且想籍此取得欧洲国家对军缩问题的让步，并取得或种欧洲的经济权利。这就迫着欧洲国家（尤其是英、法）急于要建立联合战线以对付这问题。总之，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冲突，尤其在这危机的年代是没法减轻的。世界经济危机引起的第二个结果就是

世界各国的政治不安定。革命运动到处发展着，就中以最近智利革命政府的成立最惹人注目。我们在没有得到较有系统的材料时，不敢妄加批评；但一般的我们可以说，如果革命政府不去尽力组织革命群众以作自己的后援，不去动摇统治阶级及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经济基础，没收银行，信用机关和大的工业机关，那么它不久就将惨败或自身变为统治者镇压革命势力的工具。中国的大众热望智利的革命政府不要在历史上成了这么一个角色。

政治的不安定，我们更可以在各个内阁的不断改组中看出。在最近一个月内世界各国发生倒阁风潮的有（除智利新政府的成立不计以外）；德、日、法，（由于国会改选政府党失败之结果），奥、比、希腊（接连两次），此外还有好些国家的阁潮正在酝酿着。这些国家的内阁更迭完全是经济危机和财政破产的结果（希腊内阁的更迭且直接由于财政破产及全国罢工风潮的影响）。在这些新内阁中，法国的赫礼欧内阁算是代表“左派”势力的，但在内政方面赫礼欧向以欺骗工人，镇压殖民地革命运动为任务的社会党所提出的改良政纲都不愿接受，在外交方面，赫礼欧亦一再声明，法国外交政策不因政府更迭而有任何变动，这即是说赫礼欧亦将如泰狄欧一样对赔款问题不肯丝毫放松，对中日纠纷仍



取帮凶态度，在反苏联集团中仍起盟主的作用。如此我们不禁要问一声，赫礼欧在“左派”内阁，“左”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贵国政府听了赫礼欧内阁成立后却连忙派代表去朝见，我们觉得这与总理老友犬义毅内阁成立时，我国当局派人去亲善的故事可以前后辉映，可不知道要不要朝见出同一结果来。）但除了法国内阁以外，德、奥、日三国的新内阁都表示出右派的得势，和法西斯蒂运动的胜利，我们在前次已说过，法西斯蒂运动原是时代的必然产物，但近来这运动更有强大的发展。除上述三国外，法西斯蒂势力在斯坎狄那维亚半岛的丹麦、瑞典、挪威、芬兰等四国，在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均有新的发展。此中，我们觉得应特别提出来说的是：

德、日二国的法西斯蒂运动。这次白鲁宁内阁的总辞职起因是由于兴登堡总统不愿签署内阁提出的“指拨一部分地主田产给失业者垦殖”的提案，但实际上不过是表面的原因。其实，白鲁宁内阁大该在未提出这提案之前就预料到总统是不肯签字的，而且或许连白鲁宁自己也没有实施这提纲的决心，他所以故意提出这提纲的原因，不过是想籍此做个内阁总辞职的藉口而已，且如此可以在临下台时留个漂亮声名。白鲁宁内阁辞职的真实原因却在于经济危机而引起的全国财政经济的紊乱，在于国内左右两极端势力的对峙的尖锐化以及代表极右派势力的国家社会党在各邦议会选举中之大胜利。旧的资产政党的群众鉴于现社会之日趋没落，议会制度之逐渐失去驾驭民众的力量，因此都开始对于自己原来所隶属的政党发生不信任，于是他们便成了法西斯蒂党的基础。因此德国希特勒派在近两年来每次选举中得了新的胜利。在



最近的各邦会议选举中，希特勒派几乎得到了一半左右的选票。法西斯蒂势力的膨胀直接就促成了白鲁宁的下台。白鲁宁内阁解散后，由保守主义的巴本出任组阁。新政府成立后首先就答应了希特勒的三项要求：（一）改选国会；（二）撤销解散该党挺进队之禁令；（三）取消新闻检查及示威行动禁令。希特勒派认为达到了这三项要求以后，在新的选举运动中一定能得到大多数的选票，于是可以以“合法的”手续握得政权。我们在目前还不能确定希特勒是否能在这次选举中夺得绝对大多数的选票或能否起来组织清一色的法西斯蒂政府，但我们可以断定希特勒派至少将能取得左右下届新政府的实权。然而到那时德国清一色的法西斯蒂政府或半法西斯蒂的政府对于德国内部及全世界的政局将发生如何的影响呢？

许多人以为希特勒派的极端国家主义者，所以他们的主要纲领为复兴德意志帝国完全脱离凡尔塞和约的束缚等。但那个德意志帝国的“死敌”——法国帝国主义者对于希特勒派的这次大胜利却抱了极冷静的态度，反没有两年前希特勒派初次抬头时那样惊惶的情形。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希特勒派的国家主义首领的真价值了。其实这纲领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希特勒派的真正任务将如一切法西斯蒂运动的任务一样。它应当是：以铁血镇压一切革命运动，并建立赤裸裸的财政资本的独裁政治。所以希特勒派的胜利应当是造成德国左右两极端势力的正面冲突的局面。同时这或许亦就是全世界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肉搏之开始。

日本犬义毅首相之被刺及齐藤内阁之成立亦是在同一背景上发生的。日本对于世界市场的依赖比任何一国都要深切，所以它



受世界经济危机地影响比任何一国都要严重。农业在日本国民经济中仍占极重要的地位，但大部贫农是完全处于破产地位，因此近年来到处都发生农民的骚动。同时工人罢工运动也到处爆发。日本财阀军阀们本想藉占领满洲及出兵上海等来援和国内空气，但结果不仅没有他们所理想的那样圆满，而且反使本国财政更加紊乱。日本两大资产政党（民政党和政友会）成了三井、三菱两大财阀暗斗的工具，这更增加了一般民众对于现制度及资产政党的仇视心。政治暗杀层出不穷。社会上所谓“危险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到处风行。同时，也如其他各国一样，与此对立的法西斯蒂主义也应时而生。于是就发生了二三十个军官暗杀首相犬义毅，捣毁警察署等政府机关的事变。国本社等军阀团体领导下的法西斯蒂运动因此成了一种不可轻视的势力。他们要求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来对付国内外的复杂的事变，以便更忠实地维持财政资本的独裁。犬义毅内阁倒后，经过了元老军阀们的长期磋商成立了齐藤为首的所谓“超然内阁”。虽说是“超然”，其实却完全受军阀法西斯蒂团体的意志所左右。新政府的对外政策当然将更坚决地侵略东三省。首相甚至宣言如国联将干涉日本对满洲的政策，则不惜退出国联。此外，因新政府之成立，日、苏及日、美的冲突也必然将更加尖锐。新政府的对内政策在于如何安定濒于破产的社会经济。我们已说过，农业在日本国民经济中占极大意义，而日本帝国军队的士兵和下级官佐大多亦出身农家，所以如果新政府不能挽回农家破产，那么不仅将动摇到全国国民经济，而且将动摇到日本海陆军的军心，动摇到帝国的支持者。因此新政府上台后，一方面裁汰大批政务人员，节省政费以挽救将破产



的财政，而另一方面马上颁布农村救济方案以信用借款救济农民，兴办大规模的工程以吸收失业工人。但所说的这些借款不仅是杯水车薪无济大事，而且这种借款也只有有信用的地主及富农可以拿得到，至于一般贫苦农民是没法染指的。至于所办的什么建筑工程等更不足以吸收广大失业群众的什一。这些把戏是美国在一两年前（危机开始时）早已实行过的，而且当时美国的财力比了现下的日本要雄厚好几倍。但这些把戏实行的结果，除了危机地加深以外，又得到些什么呢？从此我们亦可以料到日本新政府的农村救济的前途了。

1932年6月14日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

——两种相互排斥的经济原则

离今四年以前，关于“五年计划”的故事会成了各国新闻纸上的笑料，被当作布什维克乌托邦主义者的梦呓。当时有一位德国教授曾说过：“其实就是能完成‘五年计划’的四十分之一亦已经是一种了不起的奇迹，然而这完全是一个乌托邦呀”！但在嘲笑和蔑视的环境下，“五年计划”终究被完成了，而且完成的时间较预定的还早了半年，完成的程度较预定的更超过了許多。“五年计划”这名称再不成为笑话的对象了。它现在鼓舞了千百万大众，惊倒了虎视眈眈的许多野心家。计划经济已被纳入经济科学的研究领域，成为它的新的一系。同时，“计划经济”这四个字亦成了一个时髦名词。

然而计划经济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它有什么特点？它为某一种社会制度的特产，抑是在任何社会中都可以存在的呢？本文的任务便是在企图解答这些问题。

一卷六号的《申报月刊》上载有樊仲云教授翻译的，日本向井鹿松氏的一篇关于“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的论文。他的这篇

* 本文署名：孙宝山 原载《中华月报》1卷2期，1933，2。



文章，实际上，是当今“在朝”经济学对本问题的代表思想。向井鹿松氏在他的这篇文章中，经过许多曲曲弯弯的解释，目的在说明下列几点：

（一）“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不是互相排斥的经济原则，……并且二者是相对相交的同时存在着”的。譬如在每一个工厂和作坊的内部存在着统一的意志的领导。在那里一切事业之经营完全在厂主经理和工程师的指挥下进行着，这就是计划经济。但另一方面，在各工厂和作坊之间，即整个国民经济，则由市场为之联络，受市场价格的无政府状态之支配，此即市场经济，因此“从对封锁的国内经济一直转移到近世的市场经济，其间不能有一定的划分”。

（二）计划经济“有其自身的限界，若超过此限界，其经济便为不合理的”。虽则资本主义的经济无政府地无计划地活动着的。“其间势必要发生冲突和无益的浪费……但若把这样大的组织（指整个国民经济——宝山注）而加以计划经济化，就其不合理来加比较（即与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生产相比较——宝山注）则尚算是合理的”。向井鹿松氏认为计划经济之所以不能施于全社会即计划经济之限界，“乃是人之组织力和其技术尚未达到能包括全国民经济的程度的缘故”。

（三）苏联军事共产主义（1918年——1921年）之废除是表示“无市场之计划经济的试验及其失败”。以后苏联经过新经济政策的准备，经过无产阶级的数年努力，在计划经济的实施上，虽得有许多新的成功，但“这些成功是暂时的，其组织对象尚未普及于经济生活的全部”。而根据理论上的推测，可以断定“严



格意义的计划经济”即包括及经济生活的全体，连个人消费亦在内的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今后能做到的计划经济乃是一切重要产业之统综合的计划制，而且在这上面市场经济虽局限混缩至若何程度，然而它的命脉恐怕还是全般的永久维持着”。

这里，最使人不能同意的是向井鹿松氏对计划经济所下的定义。他所了解的“计划经济”不是指整个社会经济制度，而是它（这种）制度的雏形或胚胎。他认为凡是存在人类意志的统治的地方，不论它的范围的大小，都可以称为计划经济。因此，那种工作坊主领导下的手工业作坊的生产，或工厂主和工程师领导下的现代工厂的生产，在向井鹿松氏看来，都成了存在计划经济的左证。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来了解计划经济，那正不必有了手工业作坊或现代工厂才能说计划经济之存在。因为就是当不存在这些手工业作坊或现代工厂的时候，每个单独的手工业者或农民在每一年每一月，甚至每一天的开始，对于自己在这时期内，所应做的事业亦必定有一番考虑（即计划）的，虽则他们的总的经济结构可以完全为无计划无政府的状态所统治着。

固然，那种以工厂（或手工业作坊）内部的打桩工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已经是全社会的计划经济的雏形了，因为全社会的计划经济之实现就是在于这种技术分工之扩大，在于那种以交换为联络的社会分工之消减。但这恰如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中，已经存在近代资本主义工厂的雏形（例如以取得利润为目的的手工业作坊）而我们不能把中世纪的封建社会认作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我们亦决不能把包含计划经济的雏形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制度就当作计划经济。



其实，这种计划经济的雏形早已越出了手工业作坊或工厂的范围。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财政资本把许多属于同一的或不同的生产部门的企业集中在一个垄断组织（托拉斯、康采仑等）的管理下。这垄断组织之下的各个企业，宛如每个企业之内的各个部门一样，一切事业之进行完全受总董事会（即少数财政资本家）的支配。例如当瑞典的火柴大王克鲁格未死的时候，他每年要和他所雇用的经济专家们为他的火柴托拉斯制定一个本年度的营业大纲。他们首先应该预计到的这一年世界市场将能销售多少火柴，而这数量之中有多少将为他的竞争者夺去。然后他将根据这估计命令他的火柴工厂在本年内生产多少的火柴，他的森林应砍伐去多少木材，他的矿山和化学工厂应供给多少的磷和硫黄，他的轮船公司应预备多少船只以运载所生产的火柴及其原料，他的银行应预备多少现款以接济这些企业的流通资本，除此以外，更应预备多少现款以从事投机事业，或用以借给外国政府以换取火柴的专卖权。总之，凡是火柴托拉斯之下的一切企业如何进行它的事业将完全按照一个总的计划进行着。如果照向井鹿松氏的说法；那么这便是更巨大的一个计划经济了。但我们便说瑞典的经济制度是计划经济制度吗？那是谁亦不会赞同的。虽则在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类似的垄断资本的组织都有几十个，但它们的总和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海洋中，在经济计划化的意义上所占的地位比了沧海之一粟大不了多少。因为在每个垄断组织的内部，虽则完全为意志和计划的统治，但在它们相互之间，在农村中，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仍为无政府状态的市场经济所统治着。每个企业，或每个垄断组织的内部的计划和单层的统治，非但不能减



弱市场经济的无政府生产的势力，而且反因之而使得后者的破坏力更加凶猛了（这在此次经济危机的深刻和久长中可以看到）。反之，市场经济中的一切变化（繁荣或危机）处处影响到了每个托拉斯或康采仑的本身（单个工厂更不用了）。目前，在欧美各国不是有许多大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因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而倒闭或停工了吗？这次经济危机之到临，对于各国的资本家和经济学者不是好像青天霹雳一样地突如其来吗？这些事实都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单个企业以至于多数企业的计划经营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化说来其作用是多么渺小呀！

当然，现代的大规模的工厂生产对于计划经济的建立是一个正号而不是负号。在某种同一的社会条件下，从市场经济转变为计划经济，在产业发达的国家，比在产业落后的国家必然要容易实现。但是这正和一切有机体的消长一样，在每个旧的有机体中，都已经包含着新的有机体的细胞了；然而当新的有机体向未长成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个包含新的细胞的旧的有机体当作已长成的新的有机体，那简直是大笑语了。

同时我们应指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是两个绝对不相容合的经济制度，是两种相互排斥的经济原则。凡是计划存在的地方，交换便随之消减，市场经济的势力便被排斥。同样，在市场经济存在的地方计划经营便无从实现。而且市场经济之存在亦正是计划经济的实力还不足以消灭前者（市场经济）的证明。这是一种矛盾的统一，亦正是向井鹿松氏所不能了解的（Dialectics）。

如果认清了计划经济是整个经济制度而不是它的雏形或胚胎之后，那么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历史上，有许多社会的



经济结构是建筑在计划经济原则上的，最明显的例子，便如原始共产社会和中世纪的封建领主的庄园经济（关于历史上的几个计划经济的先例，因限于篇幅不能在这里详细叙述，读者对这问题如有兴趣，请参考卢森堡著的《经济学入门》，汉译本改名《新经济学》陈寿僧译，民智书局版）。

但到底是什么东西“限界”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计划经济的雏形之长成，使它不能扩大于全社会的范围呢？换句话说，顺应潮流是计划经济的基础是什么呢？在向井鹿松氏看来，这种“限界”或基础“乃是人类之组织力和其技术”。但从历史上的许多事实中可以看出这论断是完全靠不住的。无疑义地，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组织力和技术比托拉斯、康采伦统治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要落后不知若干世纪呢。但前者的经济却为人类意志所统治（即计划）；而后者却全为无政府状态所统治着，在目前且为失业、破产、工厂停闭、市面不景气而闹得头晕脑涨哩。或者有人要反对说：原始社会或封建社会的经济组织是太简单了，那里可以与巨大复杂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相比拟呢！然则我们更可以举一个目前的实例来说明这一点。向井鹿松氏大该总不致于否认这个事实吧：那个引起了此次计划经济问题的讨论的“五年计划”不是产生于欧美任何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而是产生于工业较落后的俄国呀！谁个要说美国人民或德国人民的组织力和技术不如1928年（五年计划的开始一年，但实际上，苏联的计划经济还远在1928年以前就开始施行了，因为计划经济的基础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的那一天便建立下的——宝山注）时的俄国，那未免是太蔑视了德国人和美国人吧。可见计划经济的基础并不在



于人类的组织力和技术方面。显然，五年计划的基础是在于苏联的特殊的社会制度。我们不要忘记，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无产阶级独裁政府已把全国重要的生产资料（包括大的工厂作坊、银行、运输机关、土地等）收归国有了。只有以这种基础才能建立起包括整个国民经济的经济计划。试问：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条件下，当每一个企业主拼命保持自己的“生产秘密”，使他们的竞争者不能探知自己的底细，那么如何能够把他们团结在一个总的领导下，使他们把自己企业的情形按期报告给中央领导机关（没有下级的详细的统计报告，计划是无从规定起的）并且照后者所拟定的计划去进行生产呢？但向井鹿松氏向我们预言道：“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准备着渐次推移于计划经济的”。同时，他又补充：“今后所能做到的计划经济乃是一切重要产业向综合的计划统制”。

关于资本主义将逐渐演进为有组织的经济制度而原有的无政府生产状态将逐渐消灭的论调（即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在读者们想来不是第一次听见了。这理论曾由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希法亭（Rodolf Hukferding）唱之于先，有各国社会改良主义者和之于后。但目前这理论早为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打成粉碎了。被认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基础的托拉斯、康采伦等垄断组织已被危机的怒浪倾覆了不少，其余未倾覆的亦处于今日不知明日的状态中，所以向井鹿松氏在今天还要把这个破产的理论再提出来（虽在另一种方式下，即在计划经济的旗帜下），那未免太不聪明了。但退一万步说，即使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即“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或“计划的”市场经济）是可能的，所谓“重要产业的综



合的计划统制”是可以实现的。那么这种“计划经济”与真正的计划经济相同的地方，或许只有名称而已。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一切生产关系不变的条件下，尤其是生产资料之占有形式不变的场合下，此种“重要产业的综合的计划统制”只不过是一个全世界（或全国）的资本家剥削大联合。一切旧的生产关系：——生产资料占有者和劳力出卖者的对立；剩余价值之榨取；为利润而生产等等，——非但将继续存在而且将因于这个大联合之存在而更形巩固。劳动者之解放将因敌人之坚固团结而更难实现。自然，这样的“计划经济”将不为千百万劳动大众所拥戴。但那个领导苏联工农大众实施五年计划的斯大林却说：“生产计划是千百大众的活的实际行动。我们的（苏联）生产计划的现实性在于创造新生活的千百万劳动者身上”。显然，资本家大联合的“计划经济”将失去这种现实性了。同时我们可以相信，这种“计划经济”即使能够实现，其不合理处，正如向井鹿松氏所说的一样，将更甚于资本主义无政府生产的冲突和浪费。因为这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之无期延长，将使它的一切不合理性处更加扩大。

关于 1918 年至 1921 年的苏联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因不在本文范围之内，不能多作解释。但这里应把一点显明的事实指出，即苏联军事共产主义的实施本来不会被认为是从市场经济“一脚跨入”计划经济的最好方法，而是为应付内战的环境所不得不采用的政策。但无疑义的，苏联计划经济的基础是在这时候奠定了（大工厂、交通运输机关、银行、土地等之收为公有）。

当苏联推行计划经济的时候，农民手工业者等等独立的小生



产者的私人经济会成为一种最严重的障碍。但在目前农民经济的绝大多数已团结在集体农场中，许多手工业者已加入了劳动组合，即是说苏联国民经济中的，最难统制的小私有经济亦已经为计划经济的势力所包括了。现今在苏联境内，一方面，计划经济的势力步步进展着；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范围到处缩小着，而如今且已开始放弃了它的最后的根据地而趋于完全消灭了。在苏联的国内贸易方面，大的“交易”全是国营企业之间的，生产产品的互换。在这里，货币不过是一种计算工具，它与市场经济中的商品流通工具的货币已经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了。至于零卖商业，一则因商品之供给者全为国营企业，二则因全国商业网几完全握在国营商业机关和合作社的手里，所以亦完全受计划的统制。因此这与市场经济下的商业已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了。但苏联为发展国内工业起见必需向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购入许多机器和其它生产资料。同时，为支付这些输入品的价值起见，又必需输出一定量的本国产品以抵偿。在这里，一方面虽站着垄断全国对外贸易的苏维埃政府，但在另一方面，却站着无数生存于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的外国资本家。因此苏联的国外贸易便免不了要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经济的牵制。这或许便是市场经济对计划化的苏联国民经济的最后的抗峙了。然而这种抗峙之制服已非苏联自身的努力所可达到的了。但就是这种抗峙——市场经济对苏联国民经济的最后的影响——亦将随着苏联之工业化而逐渐减弱，虽则苏联对外贸易的绝对量或将继续增长着。

向井鹿松氏认为计划经济所难经统制的乃是个人的消费。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上，这句话是绝对正确的。在那里，连以大工



业为基础的生产尚不能计划化，那么以个人为基础的消费自然更说不上任何计划统制了。但在另一种条件下，当全国的生产和消费已在一个总的组织的管理下，当全国的生产力人口的多寡已有了精确的统计的时候，要知道每年全国需要多少粮食，多少衣服用具等，当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向井鹿松氏对于计划经济的论点已被逐项驳复过了。但对于计划经济抱同样的观点的决不止向井鹿松氏一个人，而且类似的言论在最近的出版界中几是最普遍的现象。为什么各国出版界对计划经济问题如注意，且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相类似的结论呢？

这原因便是世界经济危机之扩大和苏联五年计划之成功这两种相反的事实对照之下，所造成的各国人民对现存经济制度之普遍的怀疑。合众国总统胡佛失望地说道：“提倡国民经济计划化的运动发展得非常迅速，因为民众是被苏维埃五年计划的思想所传染了。”卡温茨教授对五年计划的思想的解释中有一段说：“它（苏联）向西欧各国和合众国的人民挑战了。这次挑战或许是历史中最利害的一次挑战，但这不是共产国际发起的，不是红军或“格贝乌”（国家政治侦缉局）发起的，如各国大部分人民的幼稚的想像一样，而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发起的”。因此真如德国两位经济学教授，勃劳温和吕克司所说的一样：“对西方社会这是非常重要的，即马上应该规定：在这个新的经济制度（指计划经济制——宝山注）中，有那许多特点是应该从共产社会中移植到未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来的”。换句话说，各国的实业家，银行家和“在朝的”经济学家都“愿意”有一个不经过革命，不推翻旧制度的“计划经济”。他们想废除无政府状态的生产，但



不愿意得罪资本家们；他们想防止危机，但同时要尊重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及私有财产之神圣不可侵犯。他们的目的想叫那些对现制度发生了怀疑的人们相信资本主义社会是最好的社会制度，它只要经过几次改善便能成为合理的计划经济制。一切文章都是在这总题目之下发挥起的。

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说：“美国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实现不经过革命的计划化。这是一桩难事，但不是不可能的。”然而这真是可能的吗？每一个读者对于计划经济的实质有了一个概念之后，就能解答这个问题了。

应该结束了，在末了，另外有一段关于玫瑰花的评语，作为本文的总结。

玫瑰花是可爱的，它有鲜艳的颜色，有甜密的香味，它会陶醉了无数青年人的心灵。他们给了它各色各样的美誉。但亦有一部分人是不爱，甚至厌恶玫瑰花的，他们说：玫瑰花的味儿太恼人了，而它的血一般红的颜色是太怕人了。人们的审美观本是不同的，如果对玫瑰花发生了这样不同的两种评语亦不足以使我们大惊小怪。但有一种人对玫瑰花却有一种特殊的见解，他们说：玫瑰花是可爱的，只可惜长满了触人的木刺。倘使美丽的玫瑰花能开在青嫩光滑的牡丹花的枝干上，那就多么美满呀。这些人希望着一枝没刺的玫瑰花。他们表面上虽则是在赞美玫瑰花，但实际上却是侮辱了它。他们之所以要如此说，或许是因为自知直截了当地说玫瑰花不好未免太不聪明的缘故吧。



帝国主义铁蹄下的阿比西尼亚^{*}

译者序

阿比西尼亚已经在帝国主义列强的铁蹄下被蹂躏了数世纪之久。它的沿海区域已经统统被英、法、意三国所侵占了，它如今完全在这三国的殖民地包围中。它是世界各帝国主义列强共同宰割下的半殖民地。它没有新式的产业，它的经济是异常落后的。如今阿比西尼亚的领土只有 80 万平方公里（约当东四省的 6/10 强），人口只有 1,000 万余（约当东四省 1/3）。若在一两年以前，当意、阿纠纷未曾发生的时候，一般人恐怕除了在学校里上地理课以外，不会注意到地球上还有这么一个国度存在；即使偶一在新闻纸的国际电报中发现了它的大名，也不一定会引起读者的注意。然而如今这个向不被人注意的半殖民地国度居然打动了全世界的视听。如今，阿比西尼亚的人已“举国一致”地起来反抗欧洲—等强国的侵略，他们用标枪和大刀来抵抗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以自己的热血来争夺民族的生存权。不管他们的领导者是如何不坚定，他们的前途是如何艰难，但他们的英雄的民族独立

* 原著：苏联克莱脱涅尔，新知书店出版，单印本，1935，10，10。（1936 再版）



斗争的精神早已激动了中国大众的心灵。我们敢说，在这次意、阿事件中，世界上任何民族所受的刺激没有像我们中国人所受的这样深刻。这大概是因为阿比西尼亚人所处的境遇太和我们相同了，而双方对付这境遇的办法又太不相同了的缘故吧！

阿比西尼亚问题已成了时局的中心问题。报纸上天天登着意、阿事件的新闻。但是至今没有一本关于阿比西尼亚的有系统的著作。这便是我们介绍这一本小册子的原因。

出版这本小册子的拿里马诺夫研究所是培植苏联驻东方各国的外交商务等机关的工作人员的学术机关。在这研究所之下设有一个科学研究会，它是这个研究所里面的教授和优秀的毕业生所共同组织成的学术研究组织，它的性质大概就和普通大学里面的大学研究院相同。本书作者便是这研究会的阿拉伯阿非利加洲系的科学工作人员。

在原序中说，这本小册子是站在先进的社会科学的立场上研究阿比西尼亚的历史、政治、经济等问题的第一部著作。并自称是贡献给青年的先进的东方问题研究者的。全书分三章：第一章总述全国的自然环境；第二章分述帝国主义列强对阿比西尼亚的侵略史；第三章分析阿比西尼亚的社会经济机构。附录中有关于阿比西尼亚的风俗人情的有趣材料，和一部分对外贸易的统计图表。

正因为这本小册子是苏联学术界对于阿比西尼亚的第一部——即初步的——著作，同时它又为篇幅所限（全文仅五、六万字），所以它并不是一部很详细的著作。原序中自己也说：“严格地说来，这小册子还够不上说什么科学的研究”。但唯其因为这



不是一部专门的科学巨著，这仅是“推动日后阿比西尼亚问题的科学的研究的初步工作”；所以它是关于阿比西尼亚问题的最适宜的一种大众读物。读者只需费两晚工夫便可以把这部小册子读完，对于阿比西尼亚的社会经济机构和各帝国主义列强在东非洲国家的角逐情形得到一个明晰的概念。

从本书第二章中，我们可以知道，当世界大战以前，在阿比西尼亚从事帝国主义侵略的有英、法、意、俄四大国，大战后，帝俄已退出了世界政治舞台，代之而起的，则有美、日二国。但在阿比西尼亚的争霸战中，主要的角色只有英、法、意三国，美国还在其次。在这次意、阿冲突发生以前，法国几乎是最活动的一个；1896年时，阿比西尼亚就是在法兰西的直接支持下，才在阿杜华地方击溃了意大利的远征军。1923年时，法国想利用国际联盟的机关来支配阿比西尼亚，所以唆使后者加入国际联盟。在这时候，英国还联合着意大利起来反对法国的计划。可是在这次意、阿事件中，英、意冲突反成了中心问题，而法国反采取又可又不可的极冷淡的态度。本月10日意代表在国联大会上，辩护本国对阿政策的时候也曾说“国联于中、日争案会拖延至17个月之久。于大厦谷争案会拖延至两年之久。国联对于中、日之争与玻、马之争，并未援用制裁，意国民众殊不解国联曷为以不同之待遇施诸意国”。为什么在1923年时，英国联合意国，起来反对法国的对阿政策，而如今反同墨索里尼作对，硬要迫着法国一同起来在国联中提倡对意制裁呢？站在意帝国主义的代表地位的阿洛锡，对于英国态度“转变”之原因自然是很明白的。他在大会上，所以要提出上述问题来，仅是故意同英、法领导下的国联



为难，故意说出后者隐病，给它一个不好看而已。但“不在其位”的读者们对于这幕戏的背景或有不甚清楚的地方。

本书出版刚在此次意、阿争执发生之前夜，对于此次争执中列强关系之重新组合，未会有所论及。但我们从第二章的帝国主义对阿侵略史中，可以知道，英国政策之“转变”是必然的事情。本书作者在第二章中曾说，“尼罗河水源是了解英国对阿政策的锁钥”。而这尼罗河水源，——直言之，即查纳湖的统治权问题——也就决定了此次英国对于意、阿战争的态度。大家知道，英国兰开夏的纺织工业是建筑在埃及和苏丹的棉花上的。但埃及和苏丹的棉花田全靠尼罗河水灌溉，而尼罗河水则起源于查纳湖。谁统治了阿比西尼亚，谁就握有查纳湖水量的支配权。它甚至可以利用水闸建筑在阿比西尼亚境内灌溉新的棉田，造成埃及棉有力的竞争者。但这无异于打击到大英帝国的半壁江山——它的轻工业。因此英国对阿比西尼亚的政策是：一方面不让阿比西尼亚发展本国经济，不让自己利用查纳湖之天然富源；另一方面，不让任何其它帝国主义强国独霸阿比西尼亚。所以，英国在阿比西尼亚的政策有时对意大利是取支持态度；有时则又取旁观甚至反对的态度。在 1885 年意国占领马萨华港以前，英国为阻止法国势力之前进并压迫苏丹马赫琪^①主义者的骚动起见，对于意大利的侵阿政策是取支持态度的。但意大利自从自己在伊利特里的地位确定以后，它的势力又逐渐向西南推移直向查纳湖一带侵入。于是英国便又丢开了意大利。1896 年，阿比西尼亚在法

① 马赫琪相传为穆罕默德的人间使者，这里所说的马赫琪主义的骚动，系指一种民族独立运动而言。



国直接帮助下反抗意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英国便取旁观态度。意大利军在阿杜华之惨败，一半也是由于失去了英国的援助的缘故。但自意大利被击败后，法国人的势力大为扩张，且获有吉布蒂铁道之建筑权。全阿比西尼亚且有沦为法国殖民地之可能。于是英国复联合意国起来反对法国。法国则利用帝俄作为自己的助手。这时候，英、法冲突之尖锐程度已达极点。1898年，英、法两国的非洲远征军已在苏丹这边境地方相会面。两国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其紧张程度大约不下于今日之英、意冲突。此后英、法间冲突虽因协约国之缔结（为反德）而稍缓和，但两国间在东非方面的矛盾终未消灭。这时期内英、法二国在这方面的冲突远胜于英、意间的冲突。所以这时期的英国对阿政策之特点便是联意制法。1923年，英、意二国在国联大会上共同反对法国邀请阿比西尼亚加入国联军之提案，便是这一时期之结果。但自此以后，法西斯党独裁下的意大利履行生产合理化，加强劳动剥削，以发展全国产业。若干工业部门在这时期内，有了相当发展。其中，又以纺织产业为最。近年来意大利的棉织品且在近东夺取了英国的许多市场。不过，意大利很缺乏棉花及一般的原料。它每年要花很多的钱从外国输入很多原料。1931年棉花输入占意大利输入总数的9.3%；1933年11.3%，在输入货中已占第一位。意大利很想在自己的索谋里兰和伊利特里栽种棉花。但是这两个地方都是不毛之地，它的栽种棉花的计划统统失败了。最适合栽种棉花的地方是阿比西尼亚境内，即今回发生国境冲突的区域。此外，阿国境内所丰富的煤、铁、硫黄、铜、黄金、白金等资源亦是意国所最缺乏的东西。这些都是引起此次意帝国主义



者对阿侵略战争之主要原因。当然，意大利法西斯党企图把国内民众对法西斯统治之不满转向外面发泄，亦是促成此次事变之另一原因。但我们从上面对于英国政策之分析中，可以了解此次英国之所以要极力反对意国的侵阿计划是必然的道理。英国此次对意态度之“转变”是一世纪以来英国对阿比西尼亚的传统政策之必然结论。至于法国在此次事件中，所始终站在被动的地位，採取调人的态度，也是很显明的：因为它如今正操心着一个更切身的问题，这便是德帝国主义之复活。它现在正以全力对付这个旧的敌人，它没有余力来管到东非殖民地的事情；何况它在对付德国的时候，很需要意国之帮忙，所以它更不敢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中开罪于意国了。

然则，阿比西尼亚人民的反帝战争的前途如何呢？这想是读者们所必然要问的问题。我们不能做测字式的预言，但估计这事件的一般的发展前途是可能的。阿比西尼亚的封建统治者因于：（一）另一帝国主义者（英国）之暗中支持；（二）国内社会矛盾之比较的不甚尖锐化，比较的尚无后顾之忧；所以还敢领导人民反抗意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很明显地，他们是不彻的的，是靠不住的；他们很容易被收买，很容易向敌方投降，出卖全体人民的利益（最近报纸上已常见阿比西尼亚各地酋长携械向意军投降的消息）。同时，阿比西尼亚人民是在封建农奴制，以至于奴隶制的束缚下。他们这次是带着这个苛重的桎梏走上战场的。他们的这副桎梏如不被解除，那么他们的战斗力决不能发展。所以这种情形要是不变的话，那么即使意帝国主义在英国的压力下不能达到完全并吞阿比西尼亚的野心，阿比西尼亚的人民也决不能从



帝国主义铁蹄下解放出来，甚至他们所受的束缚将愈加深重，以至于完全为英、法、意等国所“和平”瓜分掉。

所以，阿比西尼亚的人民要想彻底反抗意国的侵略，要想完全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起来，那么应当利用此次反帝战争的机会，解除土著的剥削者所给与他们的一切桎梏。他们应当了解：真正能够领导他们作彻底的反帝战争的不是他们的酋长，国王，且也不应该到帝国主义者的队伍中去找寻自己的同盟者。他们的出路只有一条：在全世界的劳动大众和被压迫民族的同情拥护下，冲破土著的封建剥削者和一切外国帝国主义者的联合战线。

1935年10月10日，译者。

序

一般人把非洲称做黑色的印度。事实上，非洲也像印度一样是散居着千百万的殖民地奴隶（在印度，住有325百万人；在非洲住有200百万人）的一个广大的大陆。非洲也像印度一样，是一个富饶的资源所在地。国际垄断资本的王者从这里吸取大量的殖民地超额利润，和大量的廉价劳动。非洲也像印度一样，被帝国主义者变成了一个残忍惨酷的地狱；在那里，殖民地所献纳的贡税只要稍为迟缓一些，“文明的”欧洲人便会烧毁掉整个村落，把土人们整批地屠杀，甚至对于妇女儿童们都不加以丝毫怜惜之心。非洲也像印度一样，是帝国主义冲突的汇集点，是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斗争的对象。最后，在非洲也像在印度一样，正燃烧着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



然而，无论如何，非洲决不是印度，这中间有很大的差别。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度会被区分为两大类。在第一类的国度中，“已存在相当的工业胚胎，有时甚至已经存在高度的工业发展……但在全国的经济方面也好，或是在政治构造上也好，封建中世纪的关系尚占优势……主要的工商企业，银行，基本的交通机关，农业庄园，种植场等等，都集中在外国帝国主义者集团的掌握中”。关于这一类的国度，首先便是印度和中国。属于另一类的，“都是较落后的国度，在这里，没有（或者几乎没有）雇佣工人；在这里，大多数的人民尚在部落风气的条件下生存；在这里，还保存着原始民族形态的残余；在这里，没有民族资产阶级，即外国帝国主义者，主要也不过是侵占土地的军事占领者的角色”。

以整个印度而论是属于第一类国度的。非洲的绝对大多数是属于第二类国度的。但是这不是说，非洲是清一色的；不是说，非洲的各区域完全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同一历史阶段中。北非洲的许多国度，所谓“白色的”阿拉伯非洲的许多国度，差不多完全可以归入殖民地国度的较发展的那一类去。埃及可以与印度的前进的，最发达的各省并立在一起。反之，中部非洲，即所谓“黑色的”非洲，或黑人非洲，是许多落后的宗法国度的区域，在这里统治着部落的风气和原始氏族形态的残余，在这里，帝国主义“主要是成了侵占土地的军事占领者的角色。”

这本小册子里所叙述的阿比西尼亚便是横在白色非洲和黑色非洲的交界处的一个国度。在这国度里，还保存着原始氏族形态的残余。但是在里工业的胚芽已经存在，当然这胚芽是非常纤



弱的。在这国度的整个社会制度上——在它的经济基础方面也好，在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风俗的上层建筑方面也好——保留着鲜明的封建中世纪关系的痕迹。垄断资本的各个集团已经掌握着阿比西尼亚的银行，阿比西尼亚的铁道，汽车公路，商业机关，以及现在国内已经存在着的若干少数的工业企业。除此之外，这些集团已经开始经营阿比西尼亚的咖啡种植场，或者至少已经独占了阿比西尼亚咖啡在世界市场上的销路。所以，阿比西尼亚竟可以说是属于第一类较发展的殖民地国度的。

但是如果埃及可以称为非洲的印度，那么阿比西尼亚便是非洲的阿富汗。如果在埃及亦像印度一样，存在许多资本主义的欧洲式的大城市，很多的工厂，和发达的铁道网，工业和铁道的无产者；那么在阿比西尼亚亦如阿富汗一样，城市只是一种设有市集的大村落而已；工厂是没有的，少数的工业企业仅从事于矿物之开采，唯一的铁道和若干汽车公路还不足以解决道路交通之不便，无产者还在萌芽状态中，部落风气仍旧很浓厚。在国家组织上，阿比西尼亚亦很同阿富汗相像。这是一个君主专制式的封建地主政府所领导下的半殖民地国家；在形式上是独立的，但在事实上，它受着各个帝国主义集团的束缚，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顾问官，满布于所有的国家机关中，它们利用这些顾问官的职位，去支配阿比西尼亚。阿比西尼亚的社会斗争史（关于这社会斗争的主要潮流将在这本小册子中叙述到的），在很多地方颇与近年来阿富汗的社会斗争相类似。所以如果把阿比西尼亚的社会斗争史加以深刻的研究，那么这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将不仅对于阿比西尼亚有宝贵的意义，而且对于阿富汗，对于其它许多处于同等状



态中的阿拉伯国度（甚至对于波斯），都有重大的意义。

但是在如今，深刻的研究，不仅对于阿比西尼亚不可能，甚至对于整个黑色非洲都没有可能，这是将来的事情了。先进的社会主义科学对于印度，阿富汗，波斯和其它许多亚洲国家，已经有过相当研究。不错，在研究这些国度的问题的时候，会发现过不少机会主义的错误，和违反国际政策的倾向。所以，反对这些不正确倾向，并为这些国度的革命运动建立正确的科学的分析，仍旧是今日东方问题研究者的基本任务。但从大体上说来，代表这些国度的经济社会机构的若干基本事实——帝国主义侵入这些国度后所发生的社会经济演变，以及社会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一切经过事实——是大家所熟知的事情了；我们这里已经有很多著作。有时，这些著作对于好些基本问题虽然解释得不十分正确，但都包含有很丰富的事实材料。

反之，我们对于阿比西尼亚，怯尼亞，刚果，尼日利亚和黑色非洲的其它许多国度，还没有先进的科学的著作。我们刚刚才开始来研究这些国度，所以免不了还要经过一个实际资料的“原始积累”时期。这本小册子还是苏联著作界关于阿比西尼亚问题的第一次著作（除去一二杂志论文以外）。

当年卡尔·马尔克司对于印度曾说：“印度社会没有什么历史，或者至少是没有什么著名的历史。在这里，我们所能称为历史的，仅是各朝代的征服者相互更迭的历史而已。这些征服者在停滞不发生任何抵抗的社会的消极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国家。”

自从卡尔·马尔克司说了这一段话以后，已经经过了八十年之久，在这时期中，印度已经获得有自己的历史。自从新的征服



者——帝国主义者——到来以后，“停滞社会的消极基础”已经改变了。这还不算，而且更从消极的一变而为积极的了，如卡尔·马尔克司所预言的一样。如今印度对于自己的征服者已开始反抗，已产生了强有力的民族革命运动。产生了无产者大众，他们正为夺取这运动的领导权而斗争，为揭露民族改良主义者而奋斗，为彻底地解决印度人民的前进任务而斗争。这已经不是征服者的历史，而是真正的科学的历史，真正的社会斗争的历史。亚洲和北非洲的其它许多民族亦获得了同样的历史。

反之，对于黑色非洲仍旧可以适用卡尔·马尔克司对印度所说的上述那一段话，仍旧可以大胆地说，黑色非洲“还没有任何历史”。在大多数研究者影象中，黑色非洲还是一个未开发的处女地，它被各帝国主义征服者的刀枪分割了，又被它们重新分割了。整个黑色非洲的历史，成为这些分割和再分割的历史，成为这些交相更迭的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非洲社会成了征服者的“消极基础”，成了这些征服者的超剥削行为的舞台，在这里这些征服者还没有碰到什么严重的阻力。我们关于黑色非洲的主要著作，就是在这种视点下写成的^①。

但是，如果在黑色非洲的占领时期和分割时期，近乎原始式的土人部落的暴动，对于全副武装的帝国主义军队，几乎不成什么问题；可是如今，在无产者运动和殖民地运动的时代，这些骚动加入了世界的阵营，于是便成为一种严重的问题了。如今，尼日利亚和怯尼亚的骚动成为印度、巴勒土登、埃及、缅甸、塞浦

^① 达尔姆施得吉尔著：《非洲瓜分史》；孟著：《帝国主义和世界政治》；巴甫洛维契著：《亚非各洲争霸战》。



洛斯岛等等地方的反不列颠骚动的整个锁链的一环。如今，法属刚果的骚动与摩洛哥和安南的骚动连在一起了。黑色非洲正在获得自己的历史。“黑色的”国度加入了运动的总战线。先进科学的理论研究之任务，永远是被实践所决定的，如今我们的先进科学之任务，便是彻底地，全面地研究这个“黑色大陆”。

在这一方面，勇敢的，但并不是十分成功的初步工作已经做好了。已经发现了好些著作，不是仅把非洲看作帝国主义侵略的对象来研究，而是提出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来研究，把社会斗争和革命运动问题也提出来单独研究^①。我们这部小册子便是属于这些著作之一种，这部著作第一次提出这些问题来研究，且给以正确的答覆。

我们研究亚洲和北非洲各国是以直接的经验为基础的。在土耳其、波斯、阿富汗、新疆等地，苏联政府派有自己的外交或商业的代表；在中国、高丽、东印度、安南、印度、波斯、土耳其、叙利亚、巴勒士登、埃及、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等地有我们的友党的活动，它们根据了自己的经验研究各该国的现状；此外还有英、法等国的友党在英、法各殖民地领导革命工作，——在这种条件下，先进的东方问题研究者，可以获得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丰富的实际资料，即我们的研究所必需的真正科学的客观的资料。除此之外，在这些国度，还有各种资本家阶级的资料——报纸、杂志、统计报告，民族主义者的宣言和小册子等等，这些都可以供给我们许多关于经济革命运动的丰富资料。

^① 右弼著：《帝国主义在黑色大陆》（这本书里有许多错误观点）；右弼著：《东非洲的不列颠殖民地》；巨伐尔著：《法帝国主义在殖民地》（本书作者系非殖民地化论者）。



但是在黑色非洲各国和阿比西尼亚的情形完全不同。在这里没有活的联络，没有经常出版的报纸，和统计材料，没有民族主义的经济政治出版物，——这便是这些国度的特点。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只好利用那些帝国主义者的旅行者、教士、冒险主义者、外交官等等的著作，——当然，这种著作就是在实际资料上说，亦不能满足科学的研究者的需要的。

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对于阿比西尼亚，尤其是对于这国度的革命运动，要从事什么真正的研究工作，还未免太早。我们只能阐明若干基本的事实，提出几个基本的问题，并指出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对于这个问题的全面的答案，只有到先进的科学的研究者，能够直接与这国度接触之后才有可能；只有在依靠资本家和神父的著作以外，有了别的办法之后才有可能。

但是我们不能等待到这个时期到来以后，再开始非洲问题的研究。世界然而一步重似一步地打击了非洲经济，社会骚动接连着发生，在1930年就发生了一次大骚动。这次骚动有许多地方和阿富汗的内战相像，可是世界上一般人对此好像是完全没有知道似的过去了。非洲的大众——世界改造运动的两万万的后备军——已经开始发动了。而先进的科学的东方问题研究者，应当马上起来研究这个大运动中所发生的一切问题，切不能把它推延到适当的时期到来以后再开始研究。

因此，我们——东方问题研究所的科学的研究会之下的阿拉伯阿非利加系——虽是明知道这本小册子是很不够的，虽明知道严格地说来，这小册子还够不上说什么科学的研究，但仍旧觉得有把它出版之必要。我们认为，对于青年的先进的东方问题研究



者，这本书是很宝贵的一部著作。这部书是第一个把阿比西尼亚的历史，政治和经济等问题在读者面前单独提出来研究。这个第一步工作将能推动日后阿比西尼亚问题的科学的研究。我们的这个初步工作将成为研究“黑色大陆”之革命事件的、青年的科学的研究者们开辟一条未来的大道。

拿里马诺夫东方问题研究所，阿拉伯非洲诸国研究系序。

第一章 全国形势鸟瞰

（一）阿比西尼亚的地理形势

阿比西尼亚位于非洲东部，与赤道相接近；它的地域自北纬 3 度起至 15 度止；又自东经 35 度起至 42 度止。它的东西方面的阔度是很不相等的：在最窄的地方只有 450 公里，最阔的地方达 1,350 公里至 1,400 公里。

阿比西尼亚的地理形势是早就引起了欧洲人的注目的。在印度洋和红海的巨浪冲洗下，阿比西尼亚的地形（特别是它的东部），突出于海中；这是从欧洲经过非洲到印度和中国去的商业大道中的一个驿站。在原始积累时代，在“伟大的地理发现时代”，欧洲的商业资本不仅追纵着哥伦布的足迹向新大陆发展，而且沿着达伽玛所发现的航道向遥远的亚洲发展。

当印度和安南形成了欧洲的初期的殖民地（葡萄牙人、荷兰人、法国人）之后，阿比西尼亚的驿站意义更为增加了。从那时候起，欧洲人就想与阿比西尼亚通往来，并且在它的海岸各地建立根据地，但这些企图都失败了。此后，在 19 世纪，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同沿海各地的小的封建诸侯们协议的结果，获得了阿



比西尼亞的沿海许多地方（阿萨白，奥卜克），他们想利用这些地方做自己的停泊船只的码头。

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因苏伊士运河之开通，阿比西尼亞的意义更为增大了。阿比西尼亞成为英国到印度去和法国到安南去的要道上的必经之地。这些强国之中，每一个都想独霸海上的航路，都想保障自己与殖民地的联系，使能无阻碍地榨取这些殖民地。因此，便引起了它们想夺取“帝国航道”上一切沿海要地的野心。这是很显然的事情：这些列强抱着同样的野心，想夺取同一个对象——如对阿比西尼亞——，所以必然要引起它们之间的剧烈的冲突。关于这冲突的详细情形，我们可以留待以后再谈。但是这冲突的结果，阿比西尼亞便遭受到了真正的殖民地分割：在目前，阿比西尼亞没有半寸沿海的土地，但在从前，它的海岸线从苏亚金起至达夫伊角折向方向，再沿着东非洲的海岸一直到桑给巴尔为止。如今一切海港完全为欧洲诸强国所侵占去了。在过去许多时期中，阿比西尼亞被迫着和英、法、意三国订立了好些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条约，这三个国度不仅夺取了阿比西尼亞的沿海各地，而且占领了内地许多地方：北部诸省被意大利所压，西北各区被英国所占，且被后者并入苏丹的领土中去了。

结果，阿比西尼亞本国是在帝国主义各国的殖民地的包围中，这些殖民地大部分领土都是以前阿比西尼亞的地方。在西北方面，阿比西尼亞与英埃，苏丹为界；在北方和东北方面与意大利的伊利特里为界；在东方与法国和英国索谋里兰为界；在南方与不列颠的东非洲和意国索谋里兰为界。

经过了阿比西尼亞的长期的独立斗争，和列强相互间的不断



的争论（为了每一公尺的侵占地），直到 20 世纪的初期，才把阿比西尼亚和这些国度的境界线割分清楚。

但是阿比西尼亚之所以惹起帝国主义列强的注目，还不仅是在于它的地理形势；就是它的富源亦足以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野心。

（二）阿比西尼亚的富源——农村经济

整个阿比西尼亚是一个极高的，多山的三角形的高原地；这高原地的西北方面向尼罗河流域倾斜着，在西南方面向河流甚多的谷地倾斜，在东方向红海方面倾斜。

这高原地的高度在海拔 1800 公尺至 3000 公尺。个别的山峰达 4500 公尺，一年之中，有大部分的时期堆积在白雪中。

由于地面上山峰之多，阿比西尼亚的气候是非常不同的。在海拔 1500 至 1600 公尺之间的较低的地带，气候是热带性的。在这里，可以栽种许多热带的作物，即最足以使帝国主义列强垂涎的，最贵重的热带产的原料（树胶、咖啡、棉花）。在较高一些的地带，（有的在海拔 1600 公尺和 2400 公尺之间，有的在 2500 公尺以上），气候是温带性的；在这里，付钱的农作物较少。最后，在海拔 3500 公尺以上的地带，便是积雪地带了。

当年，昂格斯在研究东方的土地所有形式的发展的时候，会特别注意到“气候和地质”问题。他曾说道：在东方横着一个“伟大的沙漠地带。这沙漠地带起自撒哈拉大沙漠，经阿拉伯，波斯，印度，鞑靼以至于最高的亚细亚高原为止”。昂格斯又说道：“在这里，农业的第一个条件便是人工灌溉”^①。后来昂格斯

^① 1853 年六月六日致马尔克司信。



在反杜林那本著作中，更明切地指出：“从波斯起到印度为止，从埃及起到中国为止，在那里所有的国度中流行着一句民谣：没有水便没有农业”。

阿比西尼亚在“伟大的沙漠地带”的南部，它有很充分的水源，有许多山溪和大河流过阿比西尼亚的领土，在本国境内，也有许多大的水源，如查纳湖的水源等。除此以外，阿比西尼亚的农业还有自然雨量——赤道雨——做保证。同样阿比西尼亚的土壤亦很肥沃，这与邻接的阿拉伯诸国的多石和多沙的脊地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阿比西尼亚农业的自然地理环境是非常优越的。这是阿比西尼亚与其它许多殖民地国度不相同的地方。

阿比亚尼亞的西北部是尼罗河的发源地，由此一直流入地中海去。大家知道，尼罗河是世界上几条最大的河流之一。尼罗河发源自两个水流——即白尼罗河和蓝尼罗河。蓝尼罗河发源于阿比西尼亞的小谷中，它自发源地起，经过了 150 英里路程流入查纳湖，然后复在距离 1100 英里的地方与白尼罗河合流。在尼罗河的水分中夹带着不少冲积的沉淀物。

近年来，尼罗河水源问题常带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争夺水源的斗争在前世纪中便已开始，但因查纳湖的水闸建筑问题之发生而更形增加了。

不仅是阿比西尼亞的农业，甚至于整个尼罗河流域——苏丹和埃及——的农业都有赖于阿比西尼亞山中的岩石和泥地中冲洗下来的沉淀物。被冲洗下来的泥土为湍激的流水沿着高山的斜面向下流去。在这里，蓝尼罗河和它的主要支流（发源于山谷中的



支流如何脱巴拉河）起有重大作用。为要能够获得埃及的经济政治生活的全部监督权起见。英帝国主义者预备在尼罗河的两大支流上建立许多水闸和运河，它预备利用这些水闸和运河去调节尼罗河的水流，使埃及永远处于水源恐慌的威胁下。查纳湖的蓄水池和水闸的建设计划便是英国这些建筑计划之一。但同时，美帝国主义者亦加入了夺取查纳湖的斗争，于是这个湖便成了国际政治和帝国主义冲突的对象。

除了尼罗河和查纳湖以外，在阿比亚尼亚还有许多较小的河流和湖泊。这些河流中，较大的有马立勃，阿脱巴拉和雪季脱。这些河流都是注入尼罗河的，并且都挟带着许多肥沃的火山岩的总和物。除了查纳湖以外，在南部还有许多湖泊，其中最大的便是罗特尔甫湖，这湖的大半部是在邻国家怯尼亚境内。

阿比亚尼亚的丰富的雨量（900—1000—1200 毫米）也助长农作物发展。雨量的降落是定期的，所谓非雨量是从 9 月的起至 6 月中旬为止，雨期便是从 6 月中旬起至 9 月的为止。在大雨之前，先要经过一个小雨期（在 2、3、4 月）。

阿比西尼亚的气候是足以助长许多有价值作物之生长。但沿海岸的地域（吉布蒂和奥卜克等等）是一个例外，关于这个地域的情形有一个叫做莱伊的英国人曾说过：“这些地方，只把它看一次是很有趣的，但是你决不愿意看第二次”。有一位帝俄政府的代表，司克拉独夫斯基曾用道地的俄国式的事物来形容这地域。他说道：“你可以想像你是住在澡堂子的阁楼上一样，当澡堂里的蒸汽向上蒸发的时候与这地方的情形有些相同”。事实上，沿海岸 90 — 120 公里以内的地带，都满布着石子，泥砂和火山



岩。所以，在这区域之内是完全没有植物生长的。

但是阿比西尼亚其它地域差不多是“地上的乐园”。这里的土壤非常肥沃，所以虽则农具和耕作方面是那样幼稚，虽则灌溉制度是那样的原始式（这里的全部灌溉工程仅是田旁的水沟，——在雨季里，这些水沟中蓄积满期了水，以备作雨期之需用），虽则有一个较长的旱燥季节，可是阿比西尼亚的农民每年仍能收获三次，在有些地方竟能收获到四次。

但是“地上的乐园”并不能保证居民的生活。阿比西尼亚的农业处于非常低下的水准上，土地是用木制的锹和锄或木制的犁耙所耕种的。金属的工具非常稀少，而且农民们亦没有办法可以获得这些金属工具。同时，在保存着农奴制的，奴隶制的廉价劳力地方，在合法的赋役劳动制的条件下，地主们亦没有採用机器的必要。

莱伊曾引证一位阿比西尼亚地主的说话，这地主说：“我为什么要利用机器犁耙呢？在我这区域内的每个农民都应该带着犁耙和耕牛到我的田里来耕田；我要他们做多少天工作，他们就得做多少天工作。为款待这些农民，我只要宰割几条牛便够事了，但几条牛值不了多少钱。除此以外，我便不要任何其它开销。仅是为了耕田迅速一些，我何必花费很多金钱去购买机器呢？”

其余的耕作过程也是同样的原始而落后。五谷成熟后，便用小刀镰刀齐着穗剪割。割下来的穗堆在场上由牲口践踏，这样便代替了打谷的工作。然后把谷物当着风播扬，这样便代替簸谷机的工作。

农业的技术水准之落后，也可以在农业自身之构成上表现出



来，这里所种的作物太半是不值钱的东西；谷物以高粱、大麦和小米为主。高粱和小米是人民的基本食物，大麦用以制酒或饲养口。

高贵作物——咖啡、棉花、胡椒——的栽种办法也是非常落后。野生的咖啡是到处都存在的，但野生咖啡之大部分是没有人去采集的，因为土人所采集仅是村落附近的而已。土人们并不特别栽种咖啡。虽则个别的地主亦有经营咖啡种植场，栽种上等的咖啡的；但这样的种植场为数甚少。垄断了阿比西尼亚咖啡出口贸易的外国资本家，很想自己来经营咖啡的生产事业。在阿罗咀区域，有若干比国公司所经营的咖啡种植场。但直到今日为止，阿比西尼亚咖啡之大部分是土著人民的零细经营，以极原始的办法去采集来的。

棉花的好些区域中也是野生的。以棉花的质地而论，并不劣于世界上最上等的埃及棉，但并不专门从事栽种。虽则在阿比西尼亚，棉花生产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虽则苏丹的棉业新提卡和英国其余的托拉斯早有利用阿比西尼亚栽种棉花的计划，但资本家们终于未能在这里发展棉花种植事业，未能建立起棉花种植场。还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前，全世界的棉花市场便已充塞满了剩余生产物；到了如今，全世界的棉花市场便已充满了剩余生产物；到了如今，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资本主义体系的生产的可能性，在植棉业中一般说来已经涸竭了。事实上，如今苏丹地方的原有的英商棉业新提卡都已经陷于破产，埃及的棉花耕地面积都在想法缩小，在各地的堆栈里，充满了卖不掉的存棉（美国产的和东方产的）；请问在这种情形下，在阿比西尼亚那里还有开设棉花种植场的可能吗？



因此直到今日为止，阿比西尼亚人仅仅从事于野生棉花之采集，以供给手工业的土布生产之需要。

阿比西尼亚的林业也处于这样落后的原始状态中，虽则它的自然条件是非常优越的。同时这里的森林遭受到一种近于掠夺行为的摧残。在从前，山坡上栽种着树木的，但如今这些树木统统被砍去建筑住宅、桥梁、道路、牧场等等。虽则阿比西尼亚的森林中有许多极贵重的树木（如无花果树、眠草属树、椰子树、橡树等），但没有人去专门培植，所以这些树木的工业用途是没有的。橡树是一种很贵重的原料，仅生产于东非洲的森林中。苏丹在事实上已成了这种贵重原料的垄断生产者，出口数量甚多。但在阿比西尼亚这种贵重的原料几乎没有去采集的。椰子的收获差不多还不够土人们自己的消费。同样，各种各样的果树供给土人们以各色水果。但在这里，园艺事业之经营差不多是没有的。果树（主要是橘子，无花果，柠檬，香蕉，葡萄等）都是野生的，采摘无定时，往往一年采摘数次之多。

比较发达的事业是畜牧业和狩猎，这也足以证明阿比西尼亚的经济发展之落后。阿比西尼亚的大宗出口货品是畜产品，其中又以皮革为主。这也很足表示阿国经济之特色的。

最后，阿比西尼亚矿物的蕴藏也很富饶。这可以算是阿比西尼亚的自然财富之一。但这些矿藏都还没有开采。在阿比西尼亚会发现丰富的金矿（沙金和石英岩矿），宝石矿、铁、铜、白铜、褐炭、加里等。此外，和英国索谋里兰相邻接的地方，会发现石油矿。有一个英美合资的托拉斯马上就获得了这一区域的石油采掘权。但这石油矿到现今还没有被开采。



阿比西尼亚因有富饶的天然资源，所以便成了帝国主义国家间的争夺对象。复杂的气候，丰富的雨量，肥沃的土壤，——这些都是发展贵重的农作物的天然前提。畜牧事业之发展可能性和棉花咖啡之种植场经营之发展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此外再加上阿比西尼亚全国的富饶的尚未开发的宝藏，这都是使帝国主义列强——英、法、意；在过去还有帝俄，如今则加进了一个美国——要如此热烈地争夺着统治阿比西尼亚的原因。

不错，如我们在前面所已说过的一样，这些自然富源大半还没有被开发。原因就是帝国主义者在开始经营阿比西尼亚的时候，资本主义已进入了腐化时期。在这时候，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可能性是很受限制的。在日趋死亡的社会形态的范围内，生产力发展在大体上说来，已经是停滞了，甚至是退化了。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这时代，夺取原料的斗争已经缓和了。反之，帝国主义者且以更大的努力去获得生产原料（煤油，矿产等）和商业原料（咖啡棉花等）之垄断。他们要垄断这些原料的来路，其目的不倒在开发这些资源并扩大种植场经营，而是在限制生产，减缩生产量，保持生产品之高贵价格（甚至在危机时代）。正因为这缘故，所以在阿比西尼亚有许多矿山和煤油和煤油田的开采权虽然早已租让给外国资本家了，但并没有被开采。正因为这缘故，所以在阿比西尼亚并没有建立起新的咖啡种植场和棉花种植场。但同时，争夺阿比西尼亚和阿比西尼亚原料的斗争非但没有缓和，而且倒反激烈化了。

还在各帝国主义者开始获取新的土地并开拓殖民地的时候，还在它们初次分割世界的时候，阿比西尼亚便已成了帝国主义冲



突的目标，成了它们宰割下的肥肉。到如今，当资本体系的诸矛盾异常尖锐化的时候，阿比西尼亚更成了世界事变中心问题之一。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过程愈是迅速，那么夺取市场，原料生产地和资本投殖场所的斗争亦愈加激烈化。阿比西尼亚决不能站在这斗争之外。资本主义的矛盾愈是尖锐化，那么各帝国主义侵略者瓜分阿比西尼亚的斗争亦愈趋烈，而阿比西尼亚亦将由形式上独立的半殖民地而沦为正式的殖民地。

第二章 帝国主义侵入阿比西尼亚的历史

（一）帝国主义时代以前夺取阿比西尼亚的斗争

这本小册子开首便指出过，欧洲商业资本想把阿比西尼亚沦为殖民地的初次企图是发生在原始积累时期，即 15 世纪和 16 世纪时代。

在 15 世纪末（1492 年），葡萄牙的商人初次派遣“外交”代表至阿比西尼亚。数年之后，又会派遣过一次代表。在 1541 年有一个葡萄牙的冒险主义者，叫赫里斯督福尔·达·咖玛，在四五百葡萄牙籍的剑客帮助下，领了一支阿比西尼亚的军队，跟阿国北部的一个回教的封建公国恭达尔作战。在宗教统一的假面具掩护之下，（以基督教民族联合反对好战的回教民族之进攻为口号），葡萄牙的商人想在阿比西尼亚获得新的榨取对象，和新的活动区域。但葡萄牙的资本未曾能够把阿比西尼亚变为自己的商业膨胀领域。

在 16 世纪至 17 世纪之间，偶而也有天主教的教士去访谒阿比西尼亚。在 18 世纪末，便有英国人侵入阿比西尼亚。



但阿比西尼亚之殖民地分割是在 19 世纪开始的。

阿比西尼亚位于到印度去的航道上。自从法兰西人的势力被逐出东印度，而后者（东印度）又完全变成英国殖民地之后，法国和英国便在印度航路的各段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还在 19 世纪初，拿破仑一世曾远征埃及，巴勒士登和叙利亚等地，他想征服阿拉伯诸国的首长。在整个 19 世纪，法国想巩固自己在埃及的地位，并且想驱逐英国人在埃及的势力。英法二国在阿比西尼亚境内，亦发生了同样的冲突。

阿比西尼亚全国分裂为无数独立的，有时甚至是相互仇视的封建小国；所以从帝国主义者看来，阿比西尼亚是一个较易征服的猎获物。各帝国主义者在阿比西尼亚利用了各王朝之间的倾轧，和各部落，各教派之间的冲突，暗中制造了不少阴谋。它们一双手维持了这一批封建诸侯，但另一双手又拉拢另一批封建诸侯。它们用尽种种方式来挑拨这些封建诸侯之间的军事冲突，以便削弱这些封建诸侯的实力；然后自己就起来作仲裁人，以便获得割让地和特殊权利等谢礼。在 1847 年时，英国人便同一个叫做赵的封建王国订了条约，1849 年复兴阿姆哈拉和蒂格勒二王国订立条约。同年，法国亦与赵王国订立条约。

（二）帝国主义时代瓜分阿比西尼亚之开始

自从帝国主义时代开始以后，瓜分世界的争斗愈形积极化，英法二帝国主义继续着原来的阴谋挑拨政策，同时复转向积极的侵略行动。

1862 年法国藉口“建立煤站”，用一万美金购买了奥卜克港。1884 年奥卜克港完全成了法国的属地。1885 年连奥卜克港周围



的地方都为法国所有。法国的土地占领，得到了当地封建诸侯的条约的承认。在以后四年（1884—1888年）中，法国的势力扩张到塔柔拉、杜尔纯、苏勾、萨加洛、安巴独等区，最后，自从占领了海岸各岛屿（木达赫岛、巴勃岛、兄弟岛等）之后，便在吉布蒂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这样便形成了法属索谋里兰。吉布蒂之成为法国法属索谋里兰的中心地点，是1892年以后的事，那时候已完全证实奥卜克地方不能成为一个良好的海港。

在这时期，英帝国主义也并不是袖手旁观的。为获得印度航路的监督权起见，英帝国主义占领了阿拉伯的红海沿岸的亚丁港和丕林岛。

然后，英国便开始侵略阿比西尼亚的领地。在1884年（与法国之完全占有奥卜克港在同一年，这当然不是偶然的符合，而是秘密协商之结果），英帝国主义占了阿比西尼亚的齐拉港和贝比拉港，及其附近地域，这便形成了所谓英属索谋里兰。1888年英法两国相互承认了自己所占领的利权（1888年2月2日和2月9日的协约）。

意大利帝国主义跑上历史舞台的时候，较晚于英、法二帝国主义；因此它是没有殖民地的。如今在英法二国的上述那些领土侵略之影响下，也开始企图扩张自己的领土。1870年，意大利亦藉口“组织煤站”而收买了阿萨勃，1885年复占领了玛萨华。在致占领地带居民的布告中曾说：“意大利政府是英国、土耳其和埃及的友邦，因此它有权利占领玛萨华”^①。阿比西尼亚政府宣称埃及没有

^① 事情是这样的：玛萨华在以前曾为埃及总督伊兹马伊耳的军队所占领，但埃及在当时是土耳其的一个省份而同时又为英国所占领着。因此在这宣言中提及英、埃、土三国的国名。



权利把自己非法占领的土地让给意大利，同样英国亦没有权利可以批准这种领土让渡。不用说，可比西尼亞这种宣言是毫无效果的。不果。英国之援助意大利亦不是无代价的。一方面，意大利之出场可以阻止法国的前进。另一方面，英国需要一个联盟者帮助它去抵御苏丹的马赫主义者的暴动。在阿比西尼亞的东北方面（伊利特里），由意大利军队在卡萨拉区建立成一个纵的掩护线；并利用意大利军队从北方去压迫马赫主义者，向南推进（即使他们向阿比西尼亞推进），英国利用了声势浩大的马赫琪主义运动，作为压迫阿比西尼亞的新工具。英国在这里，利用“客观”情势，实行它的两重政策^①。英国的政策是成功的，阿比西尼亞是被牵扯入到马赫琪主义的战争中。阿比西尼亞军队遭受到了重大的损失，蒂格勒区的国王，且于此次战役中阵亡了。

意大利利用了阿比西尼亞的军事失败，就从玛萨华向南进攻，直到蒂格勒省为止，于是便形成了现今的意属伊利物里。

当时，整个阿比西尼亞分裂为无数封建小国，这种分割形势使帝国主义的侵略更为轻易。互相仇视的封建诸侯们都去求助于各帝国主义国家；因此阿比西尼亞的情势便更形复杂了。例如，蒂格勒省的国王约安曾援助英国人纳普耳的远征军去反对另一个封建诸侯。赵省的国王密涅里克又利用意大利人的帮助去反对约安^②，经过几年之后，又在别的欧洲强国的援助下去反攻意大利人。

① 关于这个时代的情形，请参考PT孟所著帝国主义和世界政治，第七章。

② 意大利（根据乌溪阿里条约）以数十万枪械，若干大炮和弹药等供给密涅里克，使后者去攻打约安，因当时意大利亦在攻打约安。后来密涅里克又利用这些枪械和意大利作战。



(三) 阿比西尼亚国家之形成

意大利之对阿侵略 和阿比西尼亚之反意斗争

19世纪末，在阿比西尼亚发生了政治的统一运动。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在统一各个封建王国，以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这个统一运动是阿比西尼亚全国经济商品化之结果，是成立国内市场之结果（当然；这是很狭窄的，很原始的国内市场，因为这个国内市场是建立在封建农奴制的基础上的，是以保持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关系，以保持封建农奴制的剥削方法为基础的），这是土著商业资产阶级的势力扩大之结果，是这阶级想铲除国内封建割据的意志表现。这个运动的领袖便是密涅里克二世；法国作者把他称做是阿比西尼亚的彼得大帝。

如果密涅里克不把阿比西尼亚统一起来，那么毫无疑问地，在相互仇视的各诸侯的封建割据下的阿比西尼亚，到20世纪初年，就很容易沦为各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战利品。密涅里克削弱了各封建诸侯的势力，统一了这些封建诸侯的领土；除此以外，他还征服了许多重要的游牧民族。

1901年征服了最后一个封建王国考怯姆。于是密涅里克创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民族，以与各帝国主义者相对抗。不断的内战外患，以及帝国主义占领的各区域中的殖民地的剥削，造成了一般人民的不满意，这也是密涅里克得能成功的另一原因。

在反抗意大利的斗争中，充分表现出了民族统一之效果。还是当密涅里克在意大利人的援助下反对蒂格勒王国的时候，他便与意大利订立了一个亲善互助的条约，即所谓的乌溪阿里条约



(1889年)。当密涅里克做了全阿比西尼亚的国王之后，意大利便想利用这条约以建立自己对阿比西尼亚的保护权。但意大利的这个野心企图遭受到俄、法二国的反对。“和平地”占领阿比西尼亚的沿海地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友谊地”分割独立国家的时代早已完结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利害关系又重新冲突起来了。

1891年英、意两国共同划定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根据1891年3月21日和4月15日所订立的条约，英国承认了意大利对于阿比西尼亚各区的保护权，连法兰西的经济势力所统治的哈萨克拉尔省亦在内；但是把尼罗河的发源地除外。意大利的军队充满了阿比西尼亚的北部（蒂格勒），且逐渐向南进展，同时在东部和南部也采取同一步骤^①。

密涅里克两次抗议意大利的行动，且通告废弃乌溪阿里条约；但这抗议不会发生效果。法国也起来反对意大利的势力扩张，它怂恿密涅里克与意大利开战，并且答应给阿比西尼亚以各种援助；因为意大利想占领全阿比西尼亚的野心将威胁到法国在阿比西尼亚东南各地的已得“权利”。战争是正式开始了，1896年意大利军队大败于阿杜华地方。这次军事失败给与意大利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意帝国主义的意识代表者——克利司比——所领导的意国内阁且因此而下台。这次战争使意国资本家阶级对红海方面的冒险政策的态度大为改变。战争是公认为失败了。意大

① 1892年，意大利在英国的援助下，获得了索谋利兰沿海岸的一部分地方。这区域在阿比西尼亚说来，不是什么贵重的地方，因为它在这里，本来亦只有一些名义上的政权而已；但在英国说来，也不是什么贵重的地方，因为这里都是贫瘠的沙土，人口极少，商品流转甚微。自阿萨勃向北至玛萨华为止的一部分沿海红海的地方（达拿勾耳），亦被承认为意属领土。这一部分沿海区域亦没有什么贵重的价值。法属索谋里兰和意属伊利特里间的界线直到1908年才划定。



利给了密涅里克很多赔款，且放弃了自己的侵略计划。

战后所订立的和约（1896年10月26日）首先便废弃了乌溪阿里条约。为免除误会起见，新的条约是用阿姆哈利克文和法兰西文写的，但没有用意大利文。可是阿比西尼亚需得酬谢法国的“援助”。

法国获得有吉布蒂至奇立达瓦的铁道建筑权，阿比西尼亚终于没有获得通港海港的自由出路。吉布蒂完全成了法国的海港。英国同样要求获得“保守中立”的谢礼，它的这个要求是被满足了：它得到了密涅里克对于英属索谋里兰的正式承认。

所以，就是阿比西尼亚获得军事胜利之后，它这胜利亦被各帝国主义者利用着作为继续实行瓜分的藉口。不错，由于阿比西尼亚胜利之结果，意大利退还了蒂格勒省的大部分地方，但阿比西尼亚的北部和玛萨华港仍旧握在意大利人手里。这个区域自1890年起就被称为伊利特里。

（四）英法争夺尼罗河水源的斗争

——帝俄和阿比西尼亚——

但阿比西尼亚之被瓜分，并不因对意战争而中止。法国想扩充自己的非洲领土，——自刚果起，通过整个中部非洲（连阿比西尼亚在内），直达索谋里兰。法国的野心企图同英国的利益发生了直接冲突：英国想把东非洲的属地，从开义罗起至好望角为止（也包括阿比西尼亚在内）打成一片。而在意大利方面也热望着创立一个自地中海起至印度洋为止的大帝国。在这种局势之下，阿比西尼亚得能利用着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相互冲突以维持自己的形式上的独立，虽则它也已经因此丧失了许多领土。



在过去，意帝国主义者是经常获得英国的援助的。英帝国主义者为抵抗自己的主要敌人（法国）起见，会利用意大利的势力；但法国提出了自己的反对计划。据法国宣布，由吉布蒂至奇立达瓦的铁道仅是整个泛非洲大铁道的第一段而已。这铁道将使非洲的法国属地得能相互连接起来，建筑这铁道的动机完全是政治的。这铁道的经济意义直到后来才显露出来。在开始建筑这条铁道的时候，有英国的资本参加。但不久以后，法国得能很迅速地把英国人手里的股票收买回来。法国想获得使用这铁道的垄断权，并保证绝对的行动自由。这铁道是在非常恶劣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岩石性的地质）下建筑起来的，但建筑的速度异常迅速。在 1902 年时，至奇立达瓦的一段已告筑成。这条铁道再往前建筑的时候，遭受到英国方面之坚决反对^①。法国不能为了一个阿比西尼亚而公然与英国反面，于是被迫着接受了英国的要求。一直经过了长期的谈判，法国已放弃了独占阿比西尼亚的野心企图，且答应与英、意两国共同分配势力范围之后，英国才在 1909 年答应法国把这铁道延长到阿京亚的斯亚比巴。这一段铁道之建筑，是在 1917 年落成的。

法国的势力扩张，对英国有什么危险呢？首先，英国所害怕的便是法国想把整个阿比西尼亚（查纳湖在内）变为法国属地的野心企图。阿比西尼亚的水源便是了解英国对阿政策的锁钥。埃

① 法国的成功不仅威胁到英国在阿比西尼亚的利益。并且如果“铁道建筑完成以后，吉布蒂将成为英属亚丁港的劲敌。吉布蒂的地位则是在法国到马达加斯加岛和安南等殖民地去的要道上，亦就是往南非和澳大利洲去的要道上；因此吉布蒂成了一个发展非常迅速的商港，它并且抢过了亚丁港的地位。我们可以预料到，吉布蒂——富饶的阿比西尼亚的门户和法属殖民地的要港——在不久的将来，将成为印度洋中的马赛港。”（俄国驻阿比西尼亚公使馆的前任医生高汗诺夫斯基致外交部长萨重诺夫的报告书，1913 年 6 月 1 日）。



及和苏丹是靠尼罗河过活的。英国自从占领埃及和苏丹之后，就决不能让阿比西尼亚放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外。尼罗河的水源——查纳湖，便是最使英国人不能忘情于阿比西尼亚的主要原因。调节尼罗河水流的一切水利工程统统应该受英国人管理，这原则便是英帝国主义的整个阿比西尼亚政策的基础。在这一点上说来，可怕的倒不是阿比西尼亚本身；因为它自己决没有那许多资本来建筑这水利工程；可怕的是不断向阿国内地扩张自己势力的法兰西。因此，英国便想尽了种种办法来阻碍法国的活动，它或者采取直接威胁的政策，或者怂恿其它国度起来反对，这中间主要便是意大利。

在反对法国的斗争中，形成了英意同盟。于是法帝国主义便想利用帝俄的帮助来反抗英、意。帝俄对于阿比西尼亚事件亦是积极参加的。

帝俄政府所以对阿比西尼亚发生兴趣，因为它觉得这是用以打击英国的最好机会。“建立一个阿比西尼亚帝国，以便利用它作为抵抗埃及的堡垒，不使英属非洲殖民地连接起来，——这政策对于俄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①。还在 1888 年时，俄国便由尼热哥洛特省的省长，巴兰诺夫将军之建议，派遣了一支哥萨克队伍去占领阿比西尼亚的沿海区域，这队伍的领袖是一个叫做流施诺夫的冒险人物。在巴兰诺夫给亚历山大三世的奏章中，曾提议建立一个俄非公司以便开发阿比西尼亚。巴兰诺夫在这奏章中曾说道：“当地的财富对于推销我们的商品是一种很好的前途”。但阿施诺夫“太恍惚”了一些，他去占领了法属奥卜克港，于是他

^① 高汗诺夫斯基致萨重诺夫的报告。



被法国人俘虏了去；这闹成了一个外交上的大笑话。帝俄政府只得马上丢开了阿施诺夫和随着他去的管长巴伊克。但是经过了五年之后，帝俄政府又去从事阿比西尼亚的冒险了，——不过这一次行动是得到法国承认的，并且是同它联合着干的。

1894年俄国政府派遣了自己的代表立昂吉夫到苏丹和阿比西尼亚去。他归国以后，便派了一个“教会团体”到阿比西尼亚去。根据正式发表的理由，派遣这团体的宗旨，是为联合阿比西尼亚和俄罗斯的教会^①。1895年阿比西尼亚为报答俄国教会团体的访问起见，派遣了一个公使团到俄京彼得格拉。1896年，在阿京亚的斯亚比巴成立俄罗斯的公使馆（立昂吉夫）。阿比西尼亚代表在宗教会议上热烈地讨论教会联合问题。使节之交接引起了欧洲报纸的注目。叶夫立姆管长曾老实地写道：“我们要利用宗教的亲善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我们的祖国应该在红海沿岸，在黑海与印度洋相接的地方建立一个强大的基础。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印度边疆处阻住英国，才能保证我们的舰队通到远东的洋面去”^②。

但俄帝国主义所热中的计划是命里注定不能实现的。“为日本所打败后的俄罗斯已抛弃了自己在世界政治上的支配地位。它裁减了自己派在阿比西尼亚的使节，减缩了自己对阿比西尼亚的用费，放弃了以前的友人保护者的行为”^③。

不用说，俄帝国主义者之放弃这个侵略计划不是出于自

① 关于此次旅行的详细情形，参考叶夫立姆（俄国代表团的领袖）所著《阿比西尼亚之行》，1896年出版。

② 前引书114—115页。

③ 《新东方杂志》第五期，326—327页。



愿的。

在其它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英国——的压力下，战败后的俄国被迫着放弃了许多原有的势力范围。当然这并没有完全阻止帝俄政府在别的区域（如在近东）中的帝国主义活动。

在 19 世纪末，英法二国争取尼罗河水源的冲突达到了最紧张的地步。在有名的勾庆奴卿（后来在世界大战中被任为英军司令）指挥下的英国远征军，以最残忍的行为镇服了苏丹的独立运动，然后从埃及南下，一直向尼罗河的上游进军。同时，法国的远征军也从西面的法属赤道非洲向尼罗河上游进攻。1898 年两支远征军在苏丹的法叔得地方碰头了。法国的军队和英国的军队面对面碰在一起了。在这时候，外交战有转成正式战争的危险。全世界的注意点都集中于“法叔得事件”，大家都深恐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将在这两个大国间爆发起来。但法帝国主义感觉到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发动战争，于是法国便投降了。法国政府命令远征军的司令退出尼罗河的发源地。

当然，法叔得事件并未减弱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仅是暂时地延期了而已。

在法叔得事件发生后数年间，整个国际政治局面已经改变了样子。在 20 世纪初期以前，当帝国主义列强正在瓜分世界的时候，基本的冲突是发生在参加此瓜分的两个最积极的帝国主义者之间，即发生在英法二强国之间。但是自从 20 世纪开始以后，瓜分世界的工作大致已经完结了，在这时候的问题，已经不是世界之瓜分，而是世界之重分配。这时候，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现了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便是德意志。于是基本的冲突便



转移倒英德二国之间来了。大家知道，青年的德意志帝国主义的发展是非常猛速的。德国的五金工业，造船工业，铁轨和一切铁道设备的生产，是非常迅速地发达起来，德意志垄断资本的势力是非常迅速地扩大起来。迅速地发展起来的德意志帝国主义带来了强烈的殖民地侵略的野心。但德意志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膨胀，到处碰到了先辈的殖民地强国，即英法两大国的封锁。“日光所照的地方”统统占领了，德国想要获得这些地方只有先同以前的殖民地占领者争斗。于是德意志便向近东各国（土耳其、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等）进攻，它为的是要争取英属印度去的道路。同时又发生了德法二国在北非洲，在摩洛哥的争霸战。此外，德国在非洲各地，在中国，在海洋上亦开始积极活动；但是在这里，它也和旧的帝国主义列强发生了利害冲突。

（五）协约国的成立

——列强在阿比西尼亚的势力范围之划分——

在英、德冲突和法、德冲突日益扩大的局面下，英、法间原有冲突退入次要的地位去了。当然，英、法间的冲突在事实上并未减少；但如今英、法二国已经组成了一个同盟。双方互相作让步，建立成一个帝国主义集团，即有名的协约国。这协约国便是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的反苏联武装干涉的组织者。建立协约国的目的主要是为着共同抵抗新兴的德意志帝国主义。俄罗斯自从对日战争失败以后，也加入了这个腐败的充满了内部冲突的协约国，同时意大利（以秘密形式）也加入了协约国。新的联盟者马上便开始谈判殖民地之和平分配。英法二国在1904年所订立的第一次条约，就已经是一种典型式的殖民地掠夺条



约。如今接踵着这一个条约，又开始划分其它地方的势力范围。1906年在英法意三国之间成立了一个“三国协商”，划分这三个国度在全阿比西尼亚的势力范围。从此，阿比西尼亚便从形式上的独立的国度，而变为外国资本的半殖民地。

无疑义地，这协约之缔结，在一方面是新的帝国主义竞争者在世界舞台上出现后所促成的，另一方面也是这竞争者在阿比西尼亚出现后所促成的结果。1903年，阿比西尼亚与北美合众国订立了通商条约。1905年又与德国订立通商条约。在英法二国看来，德国是比北美合众国更可怕的一个竞争者。1906年，德国在阿比西尼亚设立公使馆。1905年，奥国与阿比西尼亚订立条约。

三国协商在形式上是承认了“阿比西尼亚的完全独立”，各缔约国答应不破坏阿比西尼亚“宗主权”，并且往后在阿比西尼亚也应该采取共同行动。但这个阿比西尼亚已经被划分为三个经济的势力范围：与意属伊利特里相衔接的北部阿比西尼亚，被公认为意大利的经济活动地带；本部和南部阿比西尼亚是英国的经济活动地带。所以这次协商也可以看做是过去一个时期中争夺阿比西尼亚的一个总结。阿比西尼亚已被帝国主义列强所瓜分掉，已经完全成了它们的半殖民地。

（六）大战后争夺阿比西尼亚的斗争

阿比西尼亚之被分为经济的势力范围，仅足以造成“大国”间的形式上的和平而已。

欧洲资本在阿比西尼亚的商业膨胀，逐渐深入到全国最闭塞最遥远的区域。列强间争取阿比西尼亚的冲突，也日益激烈化。

除了夺取阿比西尼亚市场的冲突以外，同时夺取租界的冲突



仍旧继续扩大着。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总想占有阿比西尼亚经济的支配中枢，但是它们的这种野心企图，往往同另一个国家的同种企图发生了冲突。同时占取尼罗河水源的斗争也是日益尖锐化，并且在这争斗中如今又加入了一个美帝国主义。

各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经济斗争的主要对象，便是阿比西尼亚的市场和交通。交通足以帮助商品之推销，因此铁道建筑的让与权（租借地）之获得，足以保证该铁道范围以内全区域的经济监督权。

还在 1894 年时代，法国因为自己在意阿战争中守了中立态度，且以各种军需品供给了阿比西尼亚，所以得到了吉布蒂港至阿国内地的铁道建筑权。这铁道之建筑直到 1897 年才开始，即在建筑该铁道的股份公司征集到了必要的资本并克服了英国方面的阻难之后。

自吉布蒂至奇立达瓦的一段铁道（共长 306 公里）建筑了五年，而于 1903 年正式开车。由于其它列强对于日益扩张的法国势力之阻挠，这条铁道之继续敷设，在 1909 年之前，未能继续进行。但是自从三国协商成立之后，这铁道之建筑又重新开始了。自 1909 年起至 1917 年为止，这铁道已延长到阿京亚珠斯亚比巴（该段共长 406 公里）。这条铁道连停车道在内，全长 783 公里。于是代表阿比西尼亚的两个主要省份（赵省和哈拉尔省）之商品流转的基本动脉的铁道建筑就算完成了^①。这条铁道经过奇立达瓦地方，——这是最富饶的哈拉尔省的经济中心，是山岳高原地前门；同时这铁道以亚的斯亚比巴为终点，——这是阿比

^① 关于铁道的货物运载量见附录一。



西尼亚的首都，是赵省的中心点，而且整个东北区（卡发省和考怯姆省）在经济上都是以这地方为归宿的。如今，阿比西尼亚的对外贸易，有 70—75% 是经过这条铁道的。

吉布蒂到亚的斯亚比巴的铁道成了法帝国主义者垄断阿比西尼亚中部商业的绝好工具，而同时亦是做政治压迫的有力武器。但经过这条铁道运往阿比西尼亚内地去的不完全是法国的商品。虽则在哈拉尔省和赵省，法国货是最流行，但是其它各国货物的竞争也很厉害。各外国商行侵入阿比西尼亚内地以后，便极力从事于夺取市场的斗争。全阿比西尼亚的商品流转，若以价值计，有 70% 是经过铁道运输的；但是法国所占的比例恐怕还不到 25%，其余的便是英、德、比、美、日、意和其它国度的商品。然而无论如何，这一条铁道已足以保证法国在阿比西尼亚的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领导作用。

但如果法国的势力是在阿比西尼亚的中部，那么与意属伊利特里和玛萨华港相衔接的地方（蒂格勒、拉司塔、捷蒲尔、孟罕德尔、安姆哈拉、查纳湖），即阿比西尼亚的北部，便是意国的势力圈了。

蒂格勒是阿比西尼亚的几个富饶省份之一，共有人口 250 万至 300 万。意大利想独占这一区域的商业，它差不多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从玛萨华港经阿斯玛拉（意属伊利特里的首都）至阿戈达特，已经建筑了一条铁道。如今正在建筑阿戈达特向南至奥姆哈姆拉（邻接阿比西尼亚的一个小地方）的支线。所以，从意属海港至阿比西尼亚边境区域的铁道也已经建筑成了。

除了这条铁道以外，在意属伊利特里的全领域内，建筑有无



数汽车公路。这些汽车公路或者是与铁道并行的，或者是走别的方向的，但都与阿比西尼亚的边境相衔接。在阿比西尼亚境内，交通非常不便，从南部跑到蒂格勒省去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整个北部阿比西尼亚便成了意大利的经济势力范围。目前意大利在这个区域内还没有碰到其它外国资本之竞争。玛萨华港的设备，并不劣于吉布蒂。玛萨华港的商品流转量的十分之九，是与北部阿比西尼亚有关系的；因为在意大利输入伊利特里的商品，只有很少一部分是供给伊利特里的人民（总数 40 万至 45 万）的。

法、意间的经济冲突发生在沃洛和达拿勾耳省，这是与伊利特里东部相邻接的地方。

在伊利特里的南部有一个叫做阿萨勃的小港。在阿萨勃港和沃洛区之间的道路是非常恶劣的，甚至连骆驼队商的交通都不甚方便，因为这里所过的道路不是狭窄的山路，便是灼热的沙漠地。但法国人到沃洛区去的道路就比较便利些，法国从南方（从阿京沿队商道路向北复折向东北）运入沃洛区的商品，并不少于意大利经过蒂格勒运转进去的商品量。

为要排斥这一个区域内的法国资本势力起见，意大利人预备建筑一条汽车道，从阿萨勃港起，直达沃洛省的中心点——台西地方，共长 430 公里。到阿比西尼亚边境的那一段路（54 公里）已经完工了。这条汽车路的意义，就是在于改善意属阿萨勃港到沃洛省的商品运输，并阻碍其它竞争者的商品输入。这条道路之建筑实际上就等于对法国的经济宣战，意大利政府经过了长期的踌躇，才决定投资建筑这条道路。主张积极的殖民地政策的激烈份子，且因此而责备政府行动之不活泼，甚至说，这是政府之懒



惰。他们说“我们的竞争者将因为我们的懒惰而得到了抵御意大利竞争的保障”^①。

但法国方面也并不会把光阴蹉跎过去，它以非常快的速度，着手建筑阿京亚的斯亚比巴至台西的道路。但是当建筑了 96 公里的道路之后，才发现这条路之继续建筑是不可能的，因为所经过的地方统统是坚固的岩石，且须从很远的地方绕过去。于是法国这条道路之建筑就此中断了。但意大利政府却在 1930 年投放了 350 万里拉的资本，以建筑阿萨勃港到台西的道路，并改良阿萨勃港的本身设备^②。

然而意大利还并不因此而满足，它同时又设计建筑一条贯通阿比西尼亚的铁道——这条铁道将从阿比西尼亚与伊利特里边境处的一个小地方奥姆哈姆拉筑起，一直通到意属索谋里兰的克里齐玛约港为止，全长 1,500 公里。这条铁道建筑计划是在世界大战前便存在的。1913 年时，在共达尔地方且已开始进行测量工作，在米兰且已创立了一个意非商业公司，有资本 2500 百万里拉。战争之爆发阻止了这计划之实现。但是我们可以预备断定（根据大战前英法报纸的论调），如今其它列强将用尽种种方法来阻挠这铁道之建筑。在目前，这只是一个空的计划而已。但就是这个空的计划，亦很足以表示法西斯意大利对于殖民地侵略的野心。这个计划如果实现，那么在阿比西尼亚的任何区域内，意大利对于他的竞争者，将占有绝对的优势。

站在意属殖民地的内部联络的立场上说，伊利特里至索谋里

① La camionabile Assab - Dessie, "Lolremare" No. 10, 1929

② 建筑费的总预算，为 12—15 百万里拉。



兰的直达铁道也有重大意义。

英帝国主义也想夺取阿比西尼亚的市场，它用了种种方法去发达苏丹和阿比西尼亚之间的贸易。英国的货物是先用轮船从苏丹运到巴诺河的迦姆培拉埠头，然后再用骆驼向各地运送，这样不仅费贵，而且所需时间亦很长久。因此英国人也预备筑一条铁道，以迦姆培拉为起点，把考立，密阿督等等阿比西尼亚西部的山岳区域连接起来。1928年英国的 *Ethiopian Transport Co. Ltd.* 托拉斯便开始建筑这条铁道。这条新的铁道将能提高英国在阿比西尼亚商业流转中的地位。除了铁道以外，英国人还建筑考立至迦姆培拉的汽车路（英国和希腊合资创办的）。考怯姆和卡发两省在地理形势上是与苏丹接近的，自从便利的交通道路筑成之后，这种地理的接近且将成为经济的接近。法国的商品原来亦从阿京阿的斯亚比马运向两个省份来销售了，但如今将因此而遭受极大打击。

最后，英国又想从东南方面的英属索谋里兰，夺取阿比西尼亞的市场。有一个时期，这条道路是很重要的。但自从吉布蒂铁道筑成以后，便完全失去作用了。英国会用尽种种方法，想夺取吉布蒂港的一部分商品流转，使它改走英属索谋里兰的贝比拉港和齐拉港。为了这目的，英国会使海关上的检查工作简单化，会改善贝比拉港设备，会减轻港口的租金和转口税率，但这些手段都没有能够达到所希望的目的。在这一方面，法国资本和它的巩固的基础——吉布蒂铁道——是占了上风。

除了英、法、意三帝国主义以外，美帝国主义也参加阿比西尼亞市场之争夺战。在世界大战时，美帝国主义者获得了阿比西尼亞市场之经治权；美国商品满布于全国各地。直到大战终止了数年之



后，美国在阿比西尼亚对外贸易中所处的地位，才逐渐低落下来。

但美帝国主义不仅想获得阿比西尼亚的市场，而且想统治尼罗河的水源，想在查纳湖建立一个极大的蓄水池，以便利用大规模的沟渠建筑，把阿比西尼亚变成一个美国的富饶的热带种植场。

查纳湖每年平均能供给 35 亿平方公尺的水量。1927 年，美国的瓦脱公司会向阿比西尼亚政府提议在查纳湖建筑一个大水闸，这水闸筑成后可以使水的供给增加到 80 亿平方公尺。全工程的费用估计为 2000 万元，阿比西尼亚政府已经预备接受这提案了。但这时候，英国又起来干涉这事件，于是查纳湖问题成了一个很大的国际事件。这事件有什么政治意义呢？查纳湖的水是流入蓝尼罗河去的，该河复在苏丹境内与白尼罗河汇合。当然，这是很显明的：美国资本家决不愿意把多余的几亿平方公尺的水去供给苏丹和埃及，使英国人得能利用了不花钱的水在自己领土内去灌溉一个新的区域。美国资本家预备自己利用这增加起来的水量，去灌溉查纳湖和苏丹边境之间的那个区域，因为他们在这里已经成为全权的主人翁了。水闸之建筑仅是美帝主义的大计划中的一部分而已。这个全面计划的内容就是想以“和平的途径”在阿比西尼亚西北部获得一个巨大的新的区域，想以非洲建立一个新的殖民地。但是英国人亦想占有尼罗河的水源，亦预备在这里建筑一个巨大的水闸。至 1927 年时，英国人的要求更为坚决了。在阿比西尼亚政府面前发生了一个严重的威胁：英国人将藉口“保障埃及和苏丹的生命利益”而直接占领尼罗河水源了。据埃及的民族主义者的分析，英国想占领查纳湖并在那里建筑水闸的计划，这就是表示英国想把苏丹造成为棉花生产中心，供应英



国纺织工业之需要；也就是表示英国想获得尼罗河的水源“调节权”，以便利用这“调节权”，作为压迫埃及的强有力的工具，使后者完全向英国投降，甚至放弃形式上的独立权。英国之所以没有占领尼罗河的水源，正因为它在这问题上与美国的利益发生了绝大冲突。阿比西尼亚若是把查纳湖的建筑权让给美国，那么它就要与英国破裂。英帝国主义者对于美国的计划马上发生了反响。伦敦方面发出了警告性质甚至威胁性质的通牒。美帝国主义便决定让步了。同英国公开冲突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何况尼罗河水源问题在英美冲突的整个锁链中，仅是次要的一环而已。1930年6月，双方获得了一个妥协办法；这办法的内容便是：阿比西尼亚将被认为查纳湖上一切水利工程的所有者；水闸之建筑将由瓦特公司承办；所积蓄的大半应该供给埃及和苏丹，但苏丹政府在首先50年内，应该支付一种水费，以担保美国所发行的股票的利息。

但是发起这事业的美国银行家对于这条约颇不满意。于是又重新开始谈判，结果是查纳湖的水闸建筑到今天还没有开工。

根据英国报纸的消息，美国公司同苏丹，阿比西尼亚两国政府的协定将于1931年10月在阿京签字。同时，不仅将建筑查纳湖的水闸，而且还要建筑由阿京至查纳湖，复由查纳湖至苏丹这边的道路。瓦特公司所派遣的美国工程师且已经在1931年开始做测量工作了。但下文如何，报纸并未告诉我们。不过在这里，我们还要补说一句，即美国顾问在阿比西尼亚的政府机关中占有支配地位，阿比西尼亚的银行是在美国资本的影响下，所以美国帝国主义在阿比西尼亚的积极活动是必然的事情。



我们决不要以为 1906 年的三国协商，能够使阿比西尼亚完全避免政治分割的危险，以为各帝国主义者的活动将仅以经济斗争为限。进行新的侵略的野心企图仍旧存在着。没有一个强国不想把自己的“势力范围”，和自己的半殖民地变为完全的殖民地。实际上这种侵略已经开始实现了，不过在目前，这种侵略还是用种种方式掩饰着的。各帝国主义列强在阿比西尼亚内部的社会斗争中，是积极参加的，它们暗中援助阿比西尼亚的各派封建诸侯，挑拨他们内讧，以便从中巩固自己的地位。

各帝国主义列强对于阿比西尼亞除了建立经济的统治权以外，还想建立政治的统治权。为了这目的，它们便极力宣传阿比西尼亞的混乱局势和奴隶制度。大家知道，奴隶制度在英国和法国是殖民地也存在的。但是它们对于这里的奴隶制度是从不做声的。各帝国主义者对于半殖民地国度中所存在的奴隶制度总是极力喧嚷着。它们所以要这样做，并不是真的想反对这种奴隶制度，而是想加强自己对于这半殖民地的统治权。它们嚷道：阿比西尼亞还存在奴隶制哩！国际联盟已开始同这奴隶制度斗争了。它（国际联盟）将增强自己对阿比西尼亞的“国际”监督。但是因为国际联盟是资本主义强国手里的工具，尤其是法国手里的工具，所谓“国际”监督实际上就是法国的监督，也就是给了法国以干涉阿比西尼亞内政的特权。为要使阿比西尼亞完全接受国际联盟的指令起见，由法国发起，把它拉进国际联盟。这是完全与法国的利益相符合的。法国占有阿比西尼亞的外国投资的最大部分，它在那里握有最大的政治和经济的利权；同时它又是一个“世界的强国”，在国际联盟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和最大影响；所以



法国利用了国际联盟的机关，想强迫阿比西尼亚接受种种“国际义务”——因这些义务之执行是有利于法国的。

阿比西尼亚不能拒绝参加国际联盟，因为国内奴隶制度之存在是铁一般的事，虽则密涅里克已有取消奴隶制的命令，虽则阿比西尼亚在以前已经签订过条约，承认有各种义务。阿比西尼亚如果拒绝加入国际联盟，那就等于是对“欧洲文明”挑战，势必引起种种不愉快的结果。因此阿比西尼亚政府便接受了法国的提议。但英国和意大利却一致起来反对法国的计划。它们一定不准许阿比西尼亚加入国际联盟，且在联盟会议上屡次起来反对法国的提案。英国在意大利的援助下，提出了不能接受阿比西尼亚的种种理由：1. 其它较文明的国度（新西兰）尚未接受为国联会员；2. 阿比西尼亚尚未裁减军备（！），并且不履行限制野蛮国家输入军火的各种条例等等。英国和意大利的驻阿公使屡次警告阿比西尼亚的独裁者塔发利说：法国的行为是含有恶意的，它们（英、意二国）是阿比西尼亚的真正友邦。这种话当然是谁也骗不了的。同时法国也揭露英国自己想并吞阿比西尼亚的种种野心企图，因为如果英国能够占领阿比西尼亚，那么整个东非洲——从埃及起至南非洲联邦为止——将完全入于英国的统治。从开义罗起至好望角为止的铁道将能筑成一条直线，且完全从英国的领土内经过，以获得最大的安全保障，且成为法国非洲属地的经常威胁。

结果，国际联盟的第四次大会（1923年9月）通过阿比西尼亚为国际会员，并且准许它在日内瓦驻设经常的代表。但是由于英、意二国之联合抵制，法国未曾能够完全利用自己这提案（使阿国加入国联的提案）所应发生的一切利益。



直到今日为止，英国仍旧是反对平等待遇阿比西尼亚的。英国报纸为制造这种舆论起见，甚至捏造了许多事实。其中最可笑的就是把共产主义这罪名加之于阿比西尼亚政府。1929年12月25日出版的第275期东阿非利加杂志甚至说，阿比西尼亚国王是与莫斯科政府相勾结的，说阿比西尼亚驻英、法、意各国的代表是苏维埃的代理人，因此主张阻止阿比西尼亚加入国联。

英国除了在报章杂志上做宣传，要求重新考虑阿比西尼亚加入国联的问题以外，并且利用意法冲突以组织英意共同战线，反对法国在阿比西尼亚的活动。

1925年，英国“赞助意大利的阿比西尼亚大铁道（由伊利特里至索谋里兰的铁道）的建筑计划。英意间且已订立了一个划分阿比西尼亚的经济势力范围的协约。为报答英国的援助起见，意大利须赞助英国建立查纳湖水闸的计划”^①。1926年5月1日阿比西尼亚对这协约在国联提出抗议，当然它这抗议是得到法国支持的。结局，这协约还没有改变现实的情势。欧洲各列强间的关系还没有变动，阿比西尼亚仍旧是外国资本的半殖民地。而且外国帝国主义强国仍旧继续着进行瓜分阿比西尼亚的斗争，继续想把它变为完全的殖民地。

第三章 阿比西尼业的各社会集团及其相互斗争

阿比西尼业的社会经济制度是各种生产秩序和各种社会阶层的复杂的混合体。在一方面我们在这里可以遇见（特别是在边疆区域）宗法氏族制度残余，带有鲜明的自然经济色彩的遊牧经济

^① （注四）伊凡诺夫著：《英法衝突》1919年——1927年，页102—104。



和原始共产主义制的公社。在另一方面，在中央各省——趟省和哈拉两省——，资本主义生产的胚芽已经发生，铁道建筑已经开始，对外贸易正在发展。但阿比西尼亚的生产关系之基本形式是封建农奴制的关系。人民之基本大业是在占有大规模田地的少数地主之封建农奴制的束缚下。不论在任何地方，封建地主阶级的重要部份是僧侣和神父。在阿比西尼亚，除了封建农奴制关系以外，还保存着奴隶制度；但是这只有次要的意义。

基本的统治的生产方式是封建的生产方式。

然而由于帝国主义侵入之结果，阿比西尼亚的封建制度已经失去了许多基本特征。

阿比西尼亚的农业经济有许多已经商品化了——它为着国外市场而生产商品。货币关系亦已发展，地租和税捐均以货币征收。国内市场已经形成，不过这国内市场是适应对外贸易的利益的。封建农奴制的关系与相当发展的市场和相当发展的商业并存着，与帝国主义对全国经济中枢这统治权并存着。换句话说，封建形态已经在帝国主义的努力下，开始腐化并崩溃。但同时，帝国主义又维持这个腐败的和崩溃的形态，维持封建农奴制的关系，巩固封建农奴制的剥削形式。阿比西尼亚封建经济腐化——保持着它的腐化的形式，而不能过渡为更高的经济形式——亦就是阿比西尼亚的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在这一点上说，阿比西尼亚不是一个孤独者，在这里所发生的演变是代表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典型现象。阿比西尼亚已被帝国主义的经济政策驱逐进了绝路。最后，又受到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大打击。如今它应该设法从这绝路中逃脱出来。它如今正在找寻自己的出



路，这可以把阿比西尼亚农民骚动作为证据。这些农民骚动在外表上虽带有反动性质，但实际上却是革命的。

本章的任务是在提出阿比西尼亚社会发展的几个基本问题。我们对于这些问题，还不能给以圆满的解答，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国度的研究还不充分；但我们可以指示这些问题之解决方法，而且这亦是一件必要的工作。

我们在目下就已经可以指示出阿比西尼亚的宗法氏族制度残余和封建制度的性质，指示出现存的经济政治关系在帝国主义侵入后，如何改变了它的形态，使阿比西尼亚陷入于何等样的绝路，并且从何种途径可以使它跳出这绝路。

(一) 前资本主义关系

A. 宗法氏族制度的残余

部落宗法制度的残余，主要是保存在遊牧部落中；保留在定居的部落中的，仅是很少的一部份——这是在很闭塞的地方，在山谷中和国境地方。

但现今所保留着的这些残余，决不是纯粹的形态了。

我们决不要把这种残余看做是完全脱离了全国其它人民而孤独居住的原始部落。每一个这样的部落是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是在全国所统治的生产关系之影响下，是在这部落和临近居民们的交换关系之影响下。因此宗法的秩序是在崩溃了，是被新的封建秩序所代替了。目下正进行着某一生产方式转为另一生产方式的过渡工作。

目下在阿比西尼亚所遇见的部落，是处于宗法制度崩溃的阶段中，是正在过渡为新的封建关系。



在每个部落的若干氏族中，有某一个氏族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占有基本生产资料的原因），变成了全部落的统治者。同样在这一氏族的内部，也发生了分化过程，政权逐渐移到某个个人的手里去。于是原来归该氏族公有的财产，现在也集中到某一个人的手里去了。

成为统治者的那个氏族便成了领导者：凡是全部落之移居，对其客观存在部落宣战等等问题将完全取决于该氏族的族长。在起初财产是集团性的，直到下一个发展阶段中才发生个人的财产，才产生对封建关系。在这封建关系下，主要和部属，诸侯和家臣都变成为单独的个人。

在遊牧部落中，在没有定住于某一地方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封建的关系；牲口之私有制已代替了原来的集团所有制。

当某一个遊牧部落在某一个地方定居下来的时候，在畜牧时代所形成的生产关系亦遗传到土地关系（即对基本生产资料的关系）中来。这时候的土地关系有两种形式；或者是一切土地都算作领袖氏族的集团财产（如在阿拉爱部落中）；这一个氏族自己选择了最好的田地，把其余的地分派给隶属于它的其它氏族，而土地之占有是带有集团性质的。或者是由于氏族内部分化之结果，土地分裂成为个人的田产，于是便逐渐过渡为小的私有财产，同时又发生了土地集中的运动。

有些部落中，统治和隶属的关系不是存在于各个集团（氏族）之间，而是在各个个人之间。在这里，统治和隶属的关系是个人化了（如敏隆，濮谷司和其它畜牧氏族）。臣属是没有权利改换自己的领主的。要离开这一部落的范围，只有得到主子的允



许，并支付相当代价（牲口）之后，才有可能。牧场之占有是集团形式的，大家对于水和森林之利用享有同等权利。每个个人可以出售自己个人的私产，但先得尽自己同部落的人购买，要同部落的人不愿购买的时候才能出售给部落以外的人。

如像库拿玛部落就是一个“自由人的自由联合”^①。所有重要的问题都在部落会议上决定，在这会议上每一个人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如关于战争或议和的问题，移居问题，法庭裁判等）。这部落已与交换关系相接触，集团式的财产已经崩溃了，但私有财产还没完全形成。已占有的牧场是公有的。但是倘使该部落中的某一个个人自己去垦殖田地，那么这土地（他自己的劳动结果）便归他自己享用。

从上述这些实例中，已经可以充分证实阿比西尼亚还存在宗法氏族制度的残余。在统治的封建形式的社会经济生活之影响下，又在国内市场逐渐发展之影响下，这个宗法氏族制度的残余已经开始崩溃了。

B. 封建制度

根据古代阿比西尼亚的历史纪述，各游牧部落之逐渐地，大批地过渡为定居的生活是在西历纪元前便开始了。所谓的封建关系在那时候开始产生。到八世纪至十世纪之间，便已完全形成为一种社会关系。这社会关系在阿比西尼亚，直到今日还差不多完整地保存着。氏族的或部落的属员都受一个酋长的指挥，有许多精选的武士做这个酋长的禁卫队。酋长之产生是由于他执行了许多社会职务：“解决争讼；镇压个人侵占分外的权利；监视水槽，

① Carlo Conti Rossini, Princpi di diritto consultudinario dell'Eritrea. P. 777.



……以及宗教的任务”。^①

氏族内部各属员之间的经济不平等是增加了。在酋长（和他的亲信者）的手里，积聚了许多礼物和谢仪，这都是要求保护并支付贡税的人送给他们的。往往一个酋长同时兼做军人，僧侣和法官。僧侣的职务也是很多有利益的。

但是这些领袖逐渐“从公仆而变成了主人”。“他在社会上的独立地位，日益扩大以致变成了社会的统治者”。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是因为他已经成了基本生产资料的垄断者。他已经把全部落的公有财产，变成了自己私有的封建财产。在这基础之上产生了阿比西尼亚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产生了阿比西尼亚的封建制度。

在目前，阿比西尼亚的土地差不多完全集中在封建地主的手里，农民的土地是非常少的，大多数的农民都向地主租借土地。在有的场合中，农民是不得不向地主租种土地，因为自己的土地不够耕种；但在有的场合中，是地主自己去强迫农民们租种他的田地，虽则有的时候农民连自己的土地还没有时间去耕种。

在农民的土地和农民的住宅附近，便是地主封建主的土地。地主封建诸侯之对于农民，比阿比西尼亚国王或各省拉司（拉司即各省督军）之对于全阿比西尼亚的权力还广大。仅是根据法律上的规定，每四天之中，农民就应该为地主封建主做一天工。

根据法律上的规定，一切土地都属于阿比西尼亚的国王，后者把这土地交给各省长官和其它人员暂时享用。但事实上，所有的土地早就归个人所有，且成了他们的世袭财产。阿比西尼亚全

① 昂格斯：《反杜林》。



国满布着这种小的（但有时亦有很大的），闭塞的世界，在这世界的范围内农民是完全无权力的，是完全被地主的意志所屈服的。地主们帮助政府代理人（长老）向农民们征收税捐。长老是直属于各省督军的。政府创设长老之目的，就是要使国家向农民所抽的税捐不落入地主的私囊，且能越过了地主的掌握直接归入国库。但实际的情形并不能如政府所期望的一样。长老们往往成了地主的管账人，成了他们的代办人。长老们的工作主要的倒是去帮助地主监视农民们执行赋役劳动，而不是去监视农民们缴纳国税。国税的很大一部分落入长老和地主的私囊中去了。农民们对于地主的非法行为，非法的待遇和苛重的诛求是无处申诉的。不论是谁——是督军也好，是长老也好——若是同万能的封建主们闹得不好，那是他一定要吃亏的。地主们可以把农民送到国王的军队里去，可以使农民倾家荡产，可以把他们的土地并入自己的田产中去；谁亦不能阻挡地主的行为。农民们也没有地方可以逃避；他们想到别的地方去耕田，但是别的地方的土地又是为别的地主所有的，那些地主也很愿意行使自己的职权。他们或者愿意加入游牧部落去，但游牧部落是不会接受他们的，因为深怕接受了异族人将引起不愉快的结果。农民们在名义上是自由的，但实际上他们是农奴。

C. 奴隶制和农奴制

正式的奴隶贸易——人口买卖——在阿比西尼亚是被法律所禁止的，且要受死刑的处罚。阿比西尼亚政府曾签字承认各种反对奴隶制的国际义务。但事实上，奴隶制是存在的。奴隶之主要来源是：征讨反叛部落时所获得的俘虏，不肯缴纳税捐的人民和



奴隶们所生的儿女。各省督军把获得的俘虏分给那些帮助他作战的封建主们。占有奴隶的人仅是大地主和商人。奴隶们是地主的家奴，但也利用他们做田间工作。在阿比西尼亚，虽则没有公开的奴隶市场，但奴隶是可以交换的，是可以用作抵偿债务的。

农民的地位亦很同奴隶相像。很多农民因为债务，因为无力支付租金或无力清偿债欠，而成了地主们的负债劳役者。他们不能到别的地方去；他们被束缚于地主和地主的土地上。在交换关系发展的影响下，农民之被束缚的程度也愈增加。地主们加强了对于农民的剥削，他们尽力榨取农民的剩余生产品，因为他们需要很多的生产品去作商品交换。如果农民不把债务偿清，不执行地主命令，而企图逃开地主，那么他将遭受到残酷的处分。凡是教会，法庭，地方政权和民团等机关完全是站在地主一边的。

阿比西尼亚的封建关系，以及这关系所造成的生活秩序和风俗等，起源于极远的古代。地主封建主阶级和军阀是不可分离的整体；这是反对变更现制度的最有力的一种政治势力，它将坚持一切旧有的制度而反对任何新的运动。

D. 僧侣是封建制度的柱石

现在的阿比西尼亚的教会是最大的封建领主之一。这是完全独立的一个机关。在形式上，阿比西尼亚的教会是埃及亚力山大的考泼脱教会一部。但事实上，阿比西尼亚的教会，并不受埃及教会的什么牵制。形式上的联系并不给以任何束缚，唯一的义务便是阿比西尼亚的主教要由埃及教会所委派的埃及人所充任。但这事实并不起什么重大作用。这从下列事实中可以得到证明：被派遣的主教没有权力可以离开阿比西尼亚，倘使他自己愿意造成



真正的势力和地位，那么他就得随波逐流，跟着当地教会领袖所决定的宗教政策跑去。主教所管的仅是教义和神学方面的纯粹宗教性质的问题。关于都会财产，修道院和教会从属体系之支配等事务，全由主教的两个助手管理，后面这个人才是当地僧侣阶级的代表。教会于长期参与全国经济政治活动并勾结封建阶级之结果，获得有大批财富。封建主们把大批田产酬谢自己得力的同盟者；如今阿比西尼亚的土地有三分之一在教会的掌握中。英国的旅行家莱伊对于阿比西尼亚都会曾有一段很有趣的记载：

“教会之隆昌和它的势力之浩大，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修道院和教会满布于全国，且占有无数田产。田产的收入用以维持无数的修道僧，牧师，神父们。据阿比西尼亚人告诉我，这些靠上帝吃饭的人们，共有一百万人以上——我很难相信这估计，但我可以断定，在阿比西尼亚的人口中有四分之一的男丁是这一类的寄生主义者。他们是寄生虫，因为他们并不做什么有益的工作，他们仅靠种田人所献纳的贡税过活；他们自己不仅不做任何工作，且解除了一切军役。他们几乎都是无智识的不识字的人，在他们之中能读文字的人很少，至于能够写的人是更少了”。

莱伊又写道：

“僧侣阶级而有这样大的势力地位——这决不是阿比西尼亚的幸福。这种局面为各种不同的原因所造成：如传统习惯，财富，田产等，同时亦因为牧师（或者是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是国内能够了解古代开士语的唯一种人，所有的法律和类此的书籍都是用这开士文写成的。这给了他们很多特权，使他们成了一切法庭中的必然助手——全国所有的法庭可以说都在他们的掌握



中”。

这是很明显的，阿比西尼亚教会既然拥有这样多的田产和其它财富，又是唯一的法律的解释者，于是它必然的成了一种大的反动势力。所以毫无疑问地，“这些都会人员亦将如其它都会的僧侣一样，成了一切进步和新势力的坚决反对者……”（莱伊）。

教会的干部人员都是阿比西尼亚本地人，主要是封建诸侯，官僚，军人的子弟和无数修道院中所教养出来的生徒。所以教会组织带有世袭的等级门第性质的。奴隶不能当牧师。而且就是贫农们——那怕是纯粹的阿比西尼亚人——亦不能充任牧师，但是他们可以做修道僧。

僧侣阶级在内政方面竭力企图巩固现存的社会关系，并维持这社会关系所藉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这便是他们的反作用。

（二）帝国主义在阿比西尼亚的统治中枢

帝国主义并没有改变国内现存的生产关系。反之，它是巩固了封建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因为民族工业之建立和封建财产之废除，同帝国主义者的利益是不相符合的。但是帝国主义改变了阿比西尼亚的经济生活。

自然性的经济被破坏了。如果在以前，农民所供奉给地主的蜡，是用做地主住宅内点火用途的，所供奉的数量仅是地主家里所需要的量；可是在如今，地主向农民们需索更多数量的蜡，并且要迫使他们把蜡弄得很洁净，因为地主不仅要他们供给自己的需要，而且要拿出去销售。对于咖啡和牲口之供奉亦是如此。农村经济已经商品化了，已经形成了一个适应对外贸易之需要的国内贸易；而这都足以促成农奴制关系之建立。



帝国主义带了许多新的东西到阿比西尼亚去。骆驼的队商从亚的斯亚比巴到吉布蒂要走 40 天，骡子的队商要走 20 天至 25 天。但火车只要三天功夫便可以把这点路程跑完了。这非常加速了商品流转的速度。在都市中，设立了外国商行的代理处和其它商业机关。阿比西尼亚商品之销路更扩大了，它与国际市场的关系更密切化了。交换关系愈加复杂化了，甚至连国内的最边僻的地方都已经被牵入了日益发展的商品流转。然则耕种的方法改变了没有呢？农村经济强度化（集约化）了没有呢？最后，在帝国主义的影响下，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变更了没有呢？对于这许多问题的答覆都是否定的。一般地说来，农业生产的水准仍旧是很原始式的。虽则也有少数的地主迫着自己的农奴们到种植场上去栽种咖啡，但土地仍旧在地主们的手里，赋役制劳动照旧保留着，在种植场上做工的农民所受到的剥削终是有增无减。在大体上说，生产方式仍旧没有变更。新的汽车路，都市中的大街，两层楼的房屋，无线电台，电话线，铁道列车等等，仅足以改变阿比西尼亚的外貌，但不会改变它的封建的生活形式。商业行为之形式是复杂化了：阿比西尼亚的商人已经脱离了简单的买卖而采取信用，期票，兑换券等等方法。在阿比西尼亚甚至已经成立了银行组织。但这些新的事物，仅是被帝国主义者利用着去加强对于阿比西尼亚劳动人民之剥削，并增加自己的利润而已。

如果在以前，经济的统治中枢是在封建领主的掌握中，但如今，自从改变了它的性质以后，自从商品货币关系侵入之后，经济的统治中枢已转入外国资本的掌握中去了。

外国资本“主要是混入了商业范围，仅以高利贷资本的形式



活动着，……它所追求的目的便是想获得对于土著资本家阶级的形式上独立的各政府机关之全部监督权……”。“输入的资本集中起来……去获取原料及其初步的改制工作。……这些资本被利用着去发展交通机关……使能更便利地吸取原料……”。“垄断了全部对外贸易，于是便节制了殖民地经济和世界市场之间的一切联络，并且把它放在自己的监视之下”——这便是在阿比西尼亚活动的“财政资本的各个垄断集团之基本企图”。上面所指出的这些原则，在阿比西尼亚的实例中得到了显明的实证。然后，外国资本便开始建筑铁道和汽车公路，获取租借地，因为有了租借地便可以获取开采矿产原料的独占权，吸收农业原料（主要是咖啡），最后便统治了阿比西尼亚的银行，国家财政和政府机关。

A. 对 外 贸 易

1923 年时，莱伊曾写道：“阿比西尼亚的全部出入口贸易只有 2250—2500 英镑，像阿比西尼亚这样的国度，有这么广大的疆土，这么多的人口和这样富饶的自然蕴藏，但对外贸易只有这么一点，这真是很好笑的数字”。

莱伊是一个英国资本家，他的头脑是在发达的商品资本主义社会中教养起来的，所以在在他看来，这数目只有好笑而已。

但事实上，在阿比西尼亚国内，直到今日为止，还是自然经济统治者，且在原始式的交换形式下，所以这数目是不好算少了。这数目已经是上面所分析的各种进步之结果。

在 1909 年时代，阿比西尼亚的对外商品流转还只有 20 万磅，在 1916 年时只有 50 万磅。但在 1923 年时，商品流转量已达 300 万磅（据莱伊说是 250 万磅）；在 1927 年达 700 万磅；而至 1928



年已达920万镑了。

直到危机开始为止，商品流转量是继续增加的。

阿比西尼亚的主要出口货是咖啡和皮革。^①

但是阿比西尼亚出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是很不稳固的。在这里，充分地显示出阿比西尼亚的社会的技术的落后性。欧美商品有资本主义技术的高度水准作为保障，它的竞争力自然远胜于落后的殖民地阿比西尼亚商品。阿比西尼亞生产品之销售直到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前，仍旧是年复一年地扩大着，这一方面是由于阿比西尼亞生产品（咖啡）的上等质地所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阿比西尼亞农民所身受的残忍之剥削所造成的。

在入口货中，棉织物占第一位，这都是普通的棉织物，大半是用以制造土人的衣服的。^②

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各帝国主义列强间争夺阿比西尼亞市场的斗争。因为阿比西尼亞的主要输入品是棉布，所以市场斗争主要亦是销售棉布的斗争。在大战年间，美国的棉布没有遇到过竞争者。亚丁，吉布蒂，亚的斯亚比巴和东部非洲的其它许多大都市（其实是整个近东——土耳其，叙利亚等等——的市场）都充塞满了美国商品；美国商品代替了英法意等国的棉布。这并不是美国货排挤了许多国度的商品，而是因为这许多国度的商品退出了这些市场，而被美国货去代替了它们的地位。

① 在大战前，曾有大批的蜡轮向俄国去，但自大战后，蜡的出口量大减。象牙出口本来也占有相当地位，但由于象之大批残杀之结果，象牙的生产大为减少，而象牙的出口量亦就减少了。

② 关于其它货物的出口量见附录二。



但是不久以后，在大战停止后的初年（1918年—1920年）发现了一个新的竞争者，这便是日本。日本的货物比美国货便宜许多，它很快地代替了美国货的地位。

大家知道，大战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争夺市场的斗争非但没有减少，而且反增强了——这尤其是在1920年至1921年的经济危机之后。在1922年至1925年间，由于法意两国工厂（尤其是意大利工厂）之生产合理化和技术改组之结果，使意法两国又在阿比西尼亚市场上出现了。如今这两个国度所供给的商品比日本货还便宜。

资本主义的生产合理化使各国间的矛盾更为深刻化，使争夺市场的斗争更为激烈化。在目前，意大利是阿比西尼亚的主要的棉布输入者，其次便是日，美，法三国。后面这三个国度所供给的数量，差不多相等。竞争之激烈简直可以把它与经济战争相比拟。

表示对外市场之容纳量的一切统计材料是不充分的，因为这些材料并不会把偷运的数目估计进去。然而据熟悉阿比西尼亚国情的人估计，偷运的私货总在全国商业流转的15%以上。偷运入阿比西尼亚的货物有：酒精、烧酒、火药、军器等；从阿比西尼亚偷运出来的货物有：黄金、白金、宝石、乌木、象牙等等。

照吉布蒂铁道局之估计，阿比西尼亚的对外贸易是入超性的。但是如果把偷运的货物和北部阿比西尼亚（经过伊利特里）的贸易算进去，那么我们可以断定，直到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为



止，阿比西尼亚的贸易对照和贷借对照是处于相对的平衡状态中的。^①

阿比西尼亚的对外贸易是完全在外国资本的监视下。某几种入口货是各外国托拉斯的垄断事业。例如，食盐输入是法商食盐公司的垄断事业。这公司在吉布蒂设有许多大规模的盐灶，它供给了全国所需的食盐。这专卖权是以 40 万元美金向阿比西尼亚欧大陆政府购买来的。煤油和汽油之输入，在事实上是被英国的世界煤油托拉斯（壳牌火油公司）所垄断了。^② 但棉织品销售和阿比西尼亚土产品之购买，成了各垄断资本集团间的斗争对象。在阿比西尼亚境内，有许多外国的——意、法、美、英等国的——商行在活动着。除此以外，设立在伊利特里，索谋里兰和苏丹的外国商行亦在阿比西尼亚做买卖。所有这些商行在阿比西尼亚全国各地的买办资本家阶级——印度人、阿拉伯人、希腊人、叙利亚人亚美尼亚人和一部分阿比西尼亚人——中间，满布着自己的代理人。这些买办资本家大半是为外来的欧洲人的老板“做

① 在几条基本的商品运送路线中，经济意义之比较如下：1927 年时，700 万金磅的商品流转中，吉布蒂方面占 80%，伊利特里占 15.3%，苏丹占 2.9%，英属索谋里兰占 1.2%，意属索谋里兰占 0.5%。此后几年中的数目字如下（单位金磅）：

	入 口	出 口	
	1929 年	1930 年	1929 年
经过吉布蒂的	49,092	42,163	21,538
24,950			
经过苏丹、伊利特里、索谋里兰、怯尼亞的.....	16,364	14,000	7,180
			8,300

所以在 1930 年时，整个商品流转有 75% 是经过吉布蒂的。这些统计材料并不能完全表示各国在对阿贸易中所占的地位。各国在阿比西尼亚全部对外贸易中所占百分比大概如下（根据 1927 年和 1928 年的材料）：法兰西占 30%，意大利占 25%，美国占 10—12%，英国占 10—12%，日本占 10%，德国占 5—7%，比利时占 3—4%。自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这比例发生了相当变化。一方面对英（经过苏丹）贸易流转量是增加了，但我们没有充分的材料足以表示各国在阿比西尼亚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之增减。

② 但煤油生产品之消费量是很微小的，这是因为工业不发达和汽车太少（全国共有汽车 50—100 辆）的缘故。



工”的，他们仅是站在中间人和代理人的地位。

对外贸易仅是外国资本用以统治阿比西尼亚的国内市场和整个国民经济的一种杠杆。但阿比西尼亚的国内市场是极有限的。国内市场之发展，与阿比西尼亚乡村中现存的封建农奴制关系发生了冲突。且从大体上说来，它（国内市场）仅是对外贸易的一个附属体而已。

B. 工 业

外国资本除了操纵商业以外，同时复操纵工业——或确切些说，操纵开采工业，即“夺取并开采原料”的矿山企业。反之，改制工业是遭受了外国资本之摧残和破坏。不差，这里的改制工业是很原始形式的——手工业或家庭手工业的形式。在人口货——主要是大众消费品如棉布等——的压迫下，本地的改制工业几乎完全被扫除光了。所剩下来的仅是次要的手工业部份而已，如生产木器（马车、家具等），篮子，食器和艺术品（马鞍、马缰、十字架、手镯、耳环等等）的手工业部分而已。除此以外，在本地还保留着若干种农产口的初步制业，如制酒业和生皮革之原始的改制等。

阿比西尼亚的手工业劳动者还没有组织起来，手工业联合还没有成立。手工业者亦就是小的市场贸易者，他们自己出卖自己的生产品。当地的商人（普通就是骆驼队和骡子队的所有主）收买了手工业者的生产品，然后把它运到全国各地去，或向游牧民族去交换兽皮、象牙；或向定居的农民去交换咖啡、皮革、蜡和其它农产品。但这些商人所带的商品不仅是当地手工业者的生产品，而主要是外国商品——棉布、酒、食器、金属、军火等等。



在阿比西尼亚，虽则工业发展的自然前提是顺利的，但大体上说来，手工业是在破产中。好像军器制造业、五金业、织布业等是完全被淘汰掉了，陶业是几乎都被淘汰了。但在五十年以前，阿比西尼亚的刀剑生产是很著名的。会有许多手工业者专门从事锻练刀剑的工作。在以前阿比西尼亚因为有自己的棉花和羊毛，所以穿着的衣服完全是自己生产的。如今仅有少数的织布匠以长久的岁月，去为封建领主和牧师们制造衣服上的装饰品；但是他们对于自己日常所需的普通布匹之生产，已经完全放弃了，因为手工业作品已经没有办法同外来的商品去竞争。陶器的生产已经完全被破坏了；因为输入的食器比土制的出品还要便宜。

阿比西尼亚的手工业已经破坏了，但是并没有现代式的工厂和作坊来代替它。垄断资本只把阿比西尼亚看作是本国生产品的销售市场，所以用尽全力来阻碍民族工业的发展。

但垄断资本极愿意获取原料的租借地——主要的就是矿山开采之租借地。

根据最近意大利的统计资料，^① 阿比西尼亚政府在各个时代给外国资本家）——希腊人、美国人、意大利人、德意志人的租借地，共有 13 个之多。但是到现今为止，已开始经营的，一共只有四个租借地。希腊资本家苏尼奥司在哈拉两地方开採云母矿；在阿比西尼亚北部，有一个叫做安得里安诺·马司督里的意大利人设立了一个开採加里矿的企业，这租借地有 50 平方公尺的面积，租借年限为 50 年。^②

阿尔培督·泼拉索，是欧洲人中最大的租借地主。他的租地

① “Rassegna economica delle colonie”，No. 1—6, 1929, Leconcessioni minerarie in A bissinia.

② 1929 年时，他已经把这租借地转让给“Società mineraria coloniale de Torino”经营。



的历史是很有趣味的。^① 他本人是一个冒险主义者。他的一生在赤道各国过活，为的是找寻金矿和白金矿。他在罗得西亚探索的时候，发现了许多旧的，被发废弃的矿坑。据传说，这些矿坑是古代埃及人和其它几种现已滅亡的民族开采黄金的地方。泼拉索开始搜索这些废弃的矿坑，而在阿比西尼亚真的发现了丰富的白金矿和黄金矿。他从阿比西尼亚政府得到了两个租借地；^② 并用手工业式的方法开始工作。

1926 年时，他在巴黎^③设立了一个公司，共有资本 900—1000 万法郎，并且使开采工作完全近代化。1926 年共采得 26 公斤白金，1927 年采得 50 公斤，1928 年采得 100 公斤，1929 年采得 200 公斤。

由于租借地企业之活动结果，在阿比西尼亚形成了一个矿业无产者的干部。在租借地上，共有好几千土著工人在工作。工人们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他们在草棚中，工资非常低贱，剥削非常苛刻，工作是在欧洲人的工头监视下，这种生活，与奴隶的生活及其它的殖民地种植场上的强迫劳动者的生活，是没有什么差别。在铁道上服务的土人（车房和工场中的工作以及脚夫等）所处地位也并不比较优待些。

C. 交 通

“输入的资本被利用着去发展交通机关（铁道，港埠建设等等），使能更便利于吸取原料，并使殖民地更密切地与宗主国发生关系”。我们在前数章中已经用事实来证明了这原则。

难道法国所筑的吉布蒂铁道不是成了推销法国货，吸取阿比

① 根据 “African World” NO. 1419. 1930.

② 第一个租借之期限为 50 年，从巴洛河起到阿比西尼亚西南边疆的一个小地方，名叫玛奇的为止；第二个租借地在伏立迦，面积 32 平方公里，期限也是 50 年。

③ Societe Miniere des concessions Pradion on Abyssinie.



西尼亚原料，统治阿比西尼亚中部经济的一个工具吗？

难道从玛萨华至阿比西尼亚边境的意属伊利特里的铁道，不是促成了意国资本对北部阿西尼亚的统治吗？意大利岂不是想建设横贯阿比西尼亚的大铁道吗？英资本家岂不是在赶筑苏丹的铁道吗？最后，英、法、意各国的资本家都在建筑汽车公路，以便保证自己对于某一区域的经济之统治权，使这些区域能够因这些道路而牵入商品流转。而且这些道路的建筑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阿比西尼亚沿海各地（伊利特里和索谋里兰）的港埠建设，是同时并进的。

D. 财政

最后，外国资本在半殖民地国度内，“以高利贷资本的形式活动着，它所追求的目的，便是想获得对于土著资本阶级的形式上独立的政府机关之全部监督权”。

在阿比西尼亚，处于这种监督者地位的机关便是阿比西尼亚银行。这是一个英国银行，成立于 1904 年；这银行的章程悉照埃及国民银行，因为它是后者的分行。该银行的职务便是信用放款和发行兑换券^①（兑换券之发行自 1915 年起，票面金额为：5、10、50、100、500 泰立等五种百分之百的作准备。^② 根据该银行

① 在 1929 年 12 月 31 日，已发行钞票 1,524 千泰立耳。

② 阿比西尼亚基本货币单位是银泰立耳，这种币是在维也纳制造的。阿比西尼亚国币之铸造是奥国政府的特权（自 1919 年起，奥政府把这特权之一半让匈京布连佩斯的造币厂）。自 1926 年间，在维也纳共铸出 84,599,500 泰立耳；其中大半是送到阿比西尼亚去的，其余的送往也门和波斯湾诸国。泰立耳是 28.0668 斯雷姆重的银货，上面经常刻有 1780 年的字样，但铸进的年限是不刻明的。泰立耳的银货在很久以前便从欧洲侵入阿比西尼亚，泰立耳的价值常因世界上银价之变动而发生动摇。泰立耳的比价大概为每 10.36 换一金磅。

除此以外，有一种叫做吉耳希的铜货——十六分之一的泰立耳也很流行。铜货没有一定的市价，由于国内各地的各种不同的条件而发生涨落，有时每泰立耳值 10 吉耳希，有时值 16 吉耳希，有时值 16 吉耳希以上。此外，还存在一种铁的铸币。有的区域中，岩石也当作货币使用。这种岩石在当地称为阿莫立，长 10 英寸至 12 英寸，厚 1.5 英寸至 2.5 英寸。在不同区域中，每 1 泰立耳可换 10 块岩石至 40 块岩石。在别的地方，枪弹亦当作货币使用。



与阿比西尼亚政府所订立的条约，解行获得有执行这两种职务独占权，期限为 25 年。这独占权的期限于 1931 年 1 月 1 日终止，但得到双方同意之后，又得继续延长。所以，外国资本已经得到了监督阿比西尼亚经济的主要武器——即发行货币的独占权。

资本主义的矛盾，造成了各资本主义国度间争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中枢的斗争。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财政资本的各集团在阿比西尼亚争取交通机关和贸易统制权之冲突。英国得在 1904 年把银行机关抢在自己手里头，这是法国资本家所未及预料的。随着对外贸易和商品流转之发展，银行的商业信用放款的职务大为扩张，因此银行的影响亦随着扩大了。

在条约快要满期的时候，争夺银行的斗争亦愈加尖锐化。1930 年末，大家知道阿比西尼亚国王已经决定向英国人收还银行，把它改组为国立银行，并同时实行金本位货币制。因为实行这工作需要大批金钱，所以政府于 1931 年初颁行几种新的间接税；一方面是增加了劳动人民的苛重的负担，另一方面是妨碍了人口的销路。除了汽车发动机和机器以外（即是除了美国所输入的货物以物），所有入口货都要负担新的关税（除了 10% 的从价税以外，需另课 5% 至 30%）。

这是很显然的事情，如果没有美国资本的代表（爱凡尔脱·高尔逊）做后台，那么一向在外国资本支配下的阿比西尼亚政府，决不敢采取这样的步骤。

高尔逊于 1930 年被聘为阿比西尼亚政府财政顾问。阿比西



尼亚政府完全由于高尔逊的提议，才决定关税和银行的改革问题。^①当然，这次决定并不能使阿比西尼亚政府脱离外国资本监督；反之，这仅是加强了美国资本的统治而已。

这次决定是与美帝国主义的全盘计划有密切关系的，它正在企图建筑查纳湖上的水闸，并在这水闸周围兴办许多有价值的种植场，使阿比西尼亚成为美国资本家猎取热带原料的根据地。

(三) 阿比西尼亚的国家制度

国家机关是外国资本掌握中的重要的领导中枢之一，帝国主义者利用了这机关去统治全国经济政治生活。在形式上，这机关是立宪性的。但阿比西尼亚就是在形式上也与资本家阶级的民主制度相去很远。有两个议院，议员由各省委任，但各需由国王个别的批准，这是 1931 年 7 月所通过的阿比西尼亚新宪法中的最大限度进步。这两个议院所能过的立法案须由国王批准后方生效力。

但在实际上，就是这种温和宪法也是一种虚饰的具文而已。实际让的支配者是外国顾问。一切封建的法庭，军事领袖，督军大臣等都是这些外国顾问手里的工具而已。

从大体上说来，阿比西尼亚的国家制度仍旧保持着各种封建的特点。第一，还保存着封建割据的痕迹，虽则在形式上，阿比西尼亚是一个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

当 19 世纪中叶，在现今的阿比西尼亚领土内共有 10 个王国

^① 对银行还要付 15 万金磅。改用金本位制也需要这么多的现款，此外改组银行所需要的准备金还不算在内。但政府只有 10 万金磅。有了 2、3 年的新税收入政府就可以实行这计划了。但如果发行外债（以新税收人为担保），那么这计划更可早期实行。高尔逊的这些计划，对于英帝国主义者在阿比西尼亚的经济地位是一个重大打击。



和 10 大省。

自从阿比西尼亚统一以后，还剩三个王国——蒂格勒、安姆哈凉白开，和赵。其余的便改划为许多省和州。王国是由世袭的部落领袖所支配的，这些封建主可以说是第二等国王，他们受全阿比西尼亚国王之统治。^① 因此阿比西尼亚国王亦称为王者之王。已被废弃的各王国（在过去独立存在的）之内的省和州，现在已成为国王的领地；这些地方或为世袭的部落领袖所支配，或为国王所委派的各级官吏所管理。^② 蒂格勒王国以玛加尔为首都，共分 20 省。安姆哈拉王国以公达尔为首都，也分为 20 省。赵王国以亚的斯亚比巴为首都（它同时也是全阿比西尼亚的首都和王国所在地），共分三部份：上赵、下赵和沃迦登。不入王国领域的各省区，主要是在阿比西尼亚的西南部。这些省区或由当地的部落领袖所支配（国王便是这些部落领袖的君主），或为国王所委派的督军所支配。

委派的督军和世袭的统治者拥有全部民政、军事、立法诸权。乡村的长老（或者是各级官吏直接受督军支配。这些长老倒是国家机关中主要的一环，因为一切财政收入和税捐都经过他们的手掌的，而税捐之多寡一部份也受这些人决定。我们应该承认，在好些区域中政权既然握在有势力的世袭的封建主的手里，那么在这些地方，中央政权的意义是有限制的；我们决不能把这种意义过份重视。每一个阿比西尼亚人直接是受自己的封建主之统治，只有经过了这些封建主才受国王之统治。在国家行政事务

① 他同时也就是赵国国王。

② 这些省和州都属于三个基本王国。



上，有许多大臣做国王的助理，这些大臣是国王在阿比西尼亚显贵中挑选出来的，或是特别聘请来的外国专家。外人之参与国家行政并支配行政中枢，是半殖民地国度的特色。

英人哈尔普脱“帮助”阿比西尼亚政府履行税务制度之改革。法人里佛尔和莱内在公共工程部服务。美人高尓逊是财政顾问，伏尔克是国民教育顾问。不久以前，有一个叫做高莫琴的瑞士人被聘为外交部的法律顾问。各外国使馆极力主张阿比西尼亚政府应有熟练的顾问和咨议，并不时把本国的后补人介绍与后者。阿比西尼亚被迫着接受了各使馆的要求，聘请外人到政府机关中来服务。站在首要地位的外国人顾问，便是政府所选聘的美国人高尓逊和伏尔克。这两个人是美帝国主义的代表，他们企图统治阿比西尼亚的全部政府机关，以便排除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势力，并使阿比西尼亚完全变成自己的殖民地。

国家收入亦带有封建色彩。收入来源全是关卡进款，而主要是内国税。内国税中包括典型的封建的什一税（一部分是用宝物支付的），军队维持捐，地方捐和封建主所征收的个人徭役——即赋役制（照法定是每四日作徭役一日）。什一税和军队捐的是经过长老和督军的手，送交亚的斯亚比巴的国库的。地方税用以维持省内的机关。因为农民们在每四天之中就要为封建主做一天工（这是法律所规定的，但在其余时间内，封建主也可以强迫农民在自己土地上做工），所以封建诸侯们要以武装的战士，和搬运军需品的脚夫供给政府。

军队亦带有浓厚封建色彩。每一封建主养有一批给养颇丰的近卫兵团。战争时，封建主应供给一定人数的，全副武装的军



队。这军队的主要成员是农民，而其基本干部便是近卫兵团。封建主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徵募管区内的农民来补充自己的军队，而农民们在死刑之威协下也不敢不听从这些封建主的命令。倘使被征集的农民没有武装，则普通仅以刀枪等军器来武装他们；他们或者以自己代替了车马之征派（在军队中当搬运夫）。至于近卫团的武装，则以火器为主。

国王自己也有好几万人的军队。他们军饷和伙食是非常恶劣的，所以他们在战争和演习之余，常从事小买卖和手工业。国王或各省督军于必需时，可以命令各部落会长和地主封建主们供给必需的战斗人员（普通是带有武装的）。督军只有封于自己很亲信的队伍提供给现代的新式武器，把他们组成自己的警卫队，和精选的近卫队。如今阿比西尼亚的军队正在专聘的比国军官团的指导下实行改组。目下已经组成了二千人的新式军队。政府已拥有若干军用飞机和飞机场。飞机操作士是外国人。但已经派了若干本国人到外国去学习航空技术，以便代替这些外籍飞机师。阿比西尼亚的裁判制度和裁判手续，完全为僧侣阶级所操作，且被利用着去保护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现代阿比西尼亚的立法基础，还是四世纪时代定下来的法典。自十三世起各法律条例已译为开士文，它的内容直到今日为止，未曾变动过（全部法典分为三部分：教会法、民法、刑法）。

在阿比西尼亚，一切琐碎的小问题，如掠夺牲口，小窃等等，均由人民自己解决。较大的问题由政府的法庭解决；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机关，它的职务便在解释那些谁也不了解的法典。这样便更扩大了教会的权势，并且使教会和地主封建主阶级之间的



关系越形密切。以“一眼还一眼，一齿报一齿”的原则为基础的刑罚制度，充分表示出现代阿比西尼亚的司法制度之古代性；这司法制度还是在早期封建制度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刑罚是当众举行的。在都市的广场和街道上，时常可以遇见因凶杀而被绞死的尸体。莱伊曾描写阿比西尼亚监狱中的凄惨的景象。监狱对于被禁的犯人不供给口粮，当政府不利用他们做公共工程的时候，就要靠亲属或路人的布施过活。在地方上，除了正式的法庭以外，部落和种族的领袖也受理案件。如在大多数的半殖民地一样，欧洲人是不受阿比西尼亚裁判机关管理的，欧洲人案件由三个人合组的混合法庭处理，混合法庭中的裁判长是阿比西尼亚人，其余两个裁判员中，一个也是阿比西尼亚人，另一个便是欧洲人所属国度之驻在领事。

(四) 阿比西尼亚的社会斗争和 1930 年的骚动

自从帝国主义侵入以后，阿比西尼亚的经济发生了很大激变。这激变影响到各社会集团之实力配置，加深了各集团之间的矛盾，增强了各集团之间的斗争。农村经济是商品化了，农产品是输到外国去了。国内市场之发展虽很缓慢，但终是在发展着；就是商业资本也在发展着。这许多变动是发生在保持封建生产方式条件下，发生在巩固封建农奴制度的剥削形式的条件下。

随着这些变动之发生，商业资本家阶级的作用也增加了。

当欧洲资本侵入阿比西尼亚之前，商人们在全国政治舞台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大概他们也从不曾想要变得此种地位。商人的活动差不多仅仅限于对外贸易方面。因为在原始的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和商品交换不甚发达的条件下，所有封建公国完全是闭



关自守的，是各自为政的，所以国内贸易之发展不能有良好的前途。与某几个国度（阿拉伯，印度）的贸易在数量上虽不怎样多，但是利益甚大。从阿比西尼亚输出的是象牙、咖啡、野兽的皮毛等，输入阿比西尼亚的是香料和贵重布匹等。全部商品流转仅供当地显贵之需用，这不论是在阿比西尼亚抑是阿拉伯和印度，都是同样的。

充当商人的一半就是封建主所委派的代理人，他帮助封建主们推销农场上的剩余生产品以交换奢侈用品。地主们往往自己充当商人。直到今日为止，阿比西尼亚的商人仍旧与地主阶级不能分离；商人阶级好像是从地主阶级中生长起来的一样。许多阿比西尼亚的贵族往往从事商业投资，以股东资格赚取利润。

当欧洲的商人在帝国主义军队之直接援助下，占领了一切出海口，抢夺阿比西尼亚沿海各地的商人们的优越地位和丰厚的利润之后，阿比西尼亚的商人便开始有组织地活动起来，在他们之间便开始发生政治自觉的份子。有一部分土著商人把自己的优越地位让给了欧洲人，而自己做一个纯粹的雇员（买办、掮客、中间人等等）。另外的大部份土著商人，便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到国内贸易方面去。

这并不是说这两部分商人是绝对对立的，往往一个人同时执行了两职能。以原料供给出口商行的中间人，时常亲自到国内市场上去收买货物；另一方面，收买商亦企图跳过了中间人之媒介，而与国外市场发生联系。

在独立的闭关自守的封建小国之统治局面下，在多头政治和无秩序的偶然性的交换关系中，商品交换也带有无秩序的偶然的



性质。

于是便生了阿比西尼亚商人阶级反对封建割据的斗争（但不反对封建的生产方式和封建的剥削形式），发生了阿比西ニア商人阶级对于企图统一全国的密涅里克二世之援助，因为全国之统一，可以使国内商业入于常态的环境中，在这斗争中，商人阶级得能利用封建阶级之内部涣散的弱点，并且把一部份开始适应新的经济条件，主张发展商业关系的封建地主拉在自己一边。另一部分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地主，企图维持这自然经济，使它避免商品货币关系发展之影响下所不可避免的崩溃。这一部份的地主，便起来反对上述那个地主商人阶级的同盟。商人阶级以及与它相接近的封建地主阶级，是为了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而奋斗，反之建立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的那一部份封建地主，是为了维持地方分权的国家制度而奋斗。

在阿比西尼来，也如在其它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度一样，我们在一方面可以看到土著商业资本家与外国资本之结合；在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土著商业资本家与当地的封建地主集团的结合。由于同外国资本相结合之结果，阿比西ニア的商人成了外国资本的代理人，他们帮助外国资本扩张势力，并为维持外国资本的利益，为造成帝国主义者之对阿统治权而奋斗。这一部份商人主要是通商口岸的资本家和内地商业中心区的一部分大资产者。他们是外国资本和阿比西ニア劳动大众之间的一个连环，他们只起一些次要的作用；即使他们代替了外国资本家单独活动，但他们的行动仍以外国人为归依。所以，这些商人资本家们就是在政治方面，亦成了外国资本的代理人。在这一部份买办商人之内



部，也有冲突发生，因为他们是与英、美、法、意等利害不同的
垄断资本的集团发生关系的。

阿比西尼亚资本家之另一个重要集团，便是与封建主地主发生经济关系的商人。这一批人中间，有一部分是商人兼当地主的；另外一部分是借了地主的钱经营生意的（他们要支付利息）；最后，还有一部分商人是国外市场和地主经营之间的媒介，但他们主要是以地主经营为依靠的。属于这一集团的人，现今在国内政治生活中起有很大作用。商业资本家们决不是封建关系之仇敌。反之，在封建制度上生长起来，而自己的商业行为又以地主经营为基础的商业资本家们，只会加强了对于被束缚的农民的剥削而已。不过对于整个商人集团有一点是很了解的，这就是：要发展商业关系，必定先要增强中央政府的权力。为达到这目的，首先就要铲除许多封建残余（真到今日为止，这些对封建残余及为阿比西尼亚国家机关之代表特征）；实施税捐制度之改革，使农民所缴税不至于被地主们中饱，而能全部归入国库；组织并巩固国王之中央军队，解除分权倾向的封建领主的军队。除了这主要政纲以外，还有改良裁判制度，调节商业契约等等要求。

整个这纲领引起了封建的地方分权主义者的激烈反对。封建领主们对于自己的特权地位——例如：教会掌握中的法庭，任意破坏契约而不受处分，半路上拦截商之习惯等等——决不肯毫不反抗而就放弃这些特权。于是冲突就发生了。封建领主们在教会的援助下，为保持旧有的一切而起来奋斗。但商业资产阶级和与它有关系的封建地主集团，达到了统一全国和铲除地方上封建领主的政治独立权的目的。在 19 世纪末，他们就把密涅里克二



世捧上了王位，他是领导中央集权运动，建立阿西比尼亚君主专制政体的领袖。

自从以铁腕掌握全国的密涅里克二世死亡以后，中央集权的国家，就有马上崩溃的危险，地方上的封建公国，也有复活的趋势。虽则在一方面这时候的教会，仍旧是一个大封建领主，但另一方面，它自己已经参加了商业活动。所以它现今是站在中央政府方面的教会，大封建主和商业资本家们得能把密涅里克的女儿闹乌奇多捧上了王位（1916年）。密涅里克的姪儿泰法利·玛康宁做了摄政王。但僧权扩大主义者的意志，与热望政治独立的地方分权主义的小封建领主的企图，是不相符合的。因此便爆发了内战。在这战事中，新政府军队变得全部胜利，泰法利成了事实上的统治者。对外贸易之发展，国内经济之商品化，欧洲资本之商业活动，这些都是以促成土著商业资本家之自觉，使他们发生了蓄积实力以扩大经济政治活动之自觉心。但是社会制度中的封建残余阻碍了他们在国内市场之范围内的活动。泰法利便起来做商业资本家运动的领袖，他成了阿比西尼亚的改革主义者。但改革之目的并不是在于铲除封建制度，而是使这制度去适应新的经济条件。所以在这次运动中，仅仅产除了封建社会形态中最陈旧的上层建筑（如教会对于裁判机关之独占权，教会和封建领主在纳税的优待等等）。

教会和封建领主为对付此次改革运动起见，就起来反对泰法利，反对这一位阿比西尼亚的维新主义者。教会把全国的反动分子统统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闹乌奇多便成了这次反动的封建集团的旗帜。教会曾企图促成一次政变，以便推翻商业资本家和与他



们有联系的一部分封建领主，以便推翻这个地主商人资本家的代表人——泰法利。

1924年泰法利往欧洲游历。教会和封建领主们利用了这个良好的机会，起来反对泰法利，说他想把国家出卖给外国人，并且用一个保护团去包围他，去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但泰法利却违背了保护团的意志而去从事军队之改组，便于万一发生政变的时候，可以作为自己的支持者。

而在这时候，阿比西尼亚国内的一切条件也变更了。封建剥削之一切重荷，本来就是完全压在农民的肩膀上的；但如今，由于商品货币关系发展之结果，他们的负担更加苛重了。封建领主们为了市场交换而索取更多的剩余生产品，但除此以外，高利贷者和收买农民生产品的商人也增强了自己的剥削。在农民中间，对于封建农奴制剥削和商车高利贷剥削的不满意，日益扩大起来。世界经济危机之发展，更使阿比西尼亚农民陷于绝路。白银（阿比西尼亚之货币单位）之继续跌价，和农产品价格之低落，更增加了他们的不满意。骚动是在酝酿着。反动份子便起来利用农民中的骚动，并且做了这运动的领导者。

骚动中的主要动力便是农民，农民是这次骚动中的主要参与者。但因为这运动的领导者是教会和封建主，因此此次运动的革命意义几乎等于零了。这运动是在复古的封建口号下进行的，所以这运动如果在阿比西尼亚变得胜利之后，将等于反动势力之凯旋。那时候，封建制度非但不能被取消，而且将恢复旧状而继续存在。教会人士很巧妙地利用了世界经济危机对阿比西尼亚乡村之影响，以此证明泰法利之叛国，证明他已经把国家卖给外国人



了。骚动的领袖是古达司·伐里督军，即女王闹乌奇多的丈夫。各封建主的联合军队在农民之中积极帮助下向阿京亚的斯亚比巴进军。1930年3月31日发生了一次大战。叛军的力量虽还胜于政府军队（10万人对5万人），但终于被击败了。在这次战争中飞机起有极大作用。^① 在此次战役中叛军领袖古达司·伐里也被飞机轰炸死了。泰法利决定把阻碍他取得王位的一切仇敌，统统铲除干净。于是战胜的一日，女王闹乌奇多由于过分悲哀及其它未详原因，死于自己宫里（英国电报所载）。

女王既已死亡，叛军又已溃败，各地的骚动也很快地平静了。于是泰法利即宣布自己为阿比西尼亚国王。

泰利法政权之巩固亦就是商业资本之胜利的反动势力之衰退。但封建领主们很快的就瞭望泰法利是自己人，因为他所施行的法令没有一条会侵犯到地主的基本权利（即无限制地榨取农民并占有大批田产的权利）。但他们多少亦让了一点步。税务整顿工作之实施，使从前地主们在徵收税捐时所中饱的那部分收入逐渐减少，而使国库收入增加。这对于军队之改组，和新式武装之置备是很重要的。目前泰法利正在进行解除人民的武装，他的藉口就是说要铲除各地的自由贸易之障碍。但在目前各封建领主仍旧保持着自己的自卫团。如果泰法利的中央集权政策要坚决地实行到的，那么他或者会同封建领主们发生决裂。在泰法利对于创办学校所采取的步骤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想教育的学生，完全是地主富商们的子弟。

泰法利所领导的商人地主分子，反对教会和封建领主等反动

^① 这些飞机是泰法利在发生骚动不久以前购买来的，驾驶者都是法国人。



份子的斗争，并不是建立新的社会形态和反对旧有社会形态之斗争。这个斗争之结局，决不会改变阿比西尼亚的社会机构，决不会破坏失败阶级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这是在同一社会形态之范围以内的斗争。这是剥削阶级中较先进的部分，反对落后部份之斗争。这斗争的目的是为要团结该阶级之内部力量，为要创造更适宜的条件。使能巩固剥削者阶级的经济政治地位，这斗争的目的，是为要增加对被剥削者之榨取率。

(五) 世界经济危机和阿比西尼亚^①

世界经济危机给了阿比西尼亚的经济政治生活以很大的变动。

好几种阿比西尼亚农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销路激急地衰退。牲口之输出，自 1926 年之 6690 头，改为 1930 年之 1928 头。某几种出口货之输出（如阿拉拍树胶和象牙）完全停止了。

其它各种商品之输出，在数量上即使没有减少，但总价值是减少了。如 1931 年之皮料输出量甚至比 1929 年还要增加些（8200 吨对 7136 吨），但这种增加一方面是名义价格低落之结果，另一方面是阿比西尼亚银货跌价之结果。阿比西尼亚的另一种很重要的出口农产品——蜡——处于同一状态中。末了，咖啡价格之跌落，亦达到了惊人的速度，1931 年时，阿比西尼亚的咖啡出口增加了四倍，但咖啡之出口总值几乎没有变动，因为价格在名义上差不多也跌了三四倍。但由于阿比西尼亚银货之跌价，实际上的跌落程度还要厉害。

价格之跌落，使阿比西尼亚农民更陷于贫困。在事实上，阿

① 因本书作者到外国去了，这一节目结论是阿赫尔继写的。



比西尼亞农业经济的水准是非常低下的。巴西大规模的种植场上所生产的咖啡，在成本上比起零细的阿比西尼亞的农夫所生产的，要低廉许多。在危机发生以前，即在“常态的”条件下，阿比西尼亞的咖啡还能同巴西货相竞争：这完全是阿比西尼亞农民之野蛮的剥削所造成的。他们被迫着以低於实际价值的市值出卖自己的农产品，同时把自己的生活要求降到了饥饿水准以下。但瞬息万变危机发生以后，情形更恶劣了。巴西咖啡的价格是跌落得那么厉害，而卖不出的存货又是积累得那样的多，使得巴西的种植场主人和投机商人，把咖啡成千成万吨的向海裏抛弃，或丢在火裏烧毁。在这种种条件下，总觉得阿比西尼亞的咖啡已经绝对没有在世界市场上出售的可能了。但阿比西尼亞的农民又被迫着接受了世界市场的新价格这价格比危机发生以前的价格（即前面所谓饥饿水准以下的价格）更低廉了三四倍。农民们在工作中，榨取尽了自己的和自己家族的一切血汗，把自己的最后的一文都交给了地主，收货人和代征税捐的长老。他们被迫着过更凄惨的生活。这怪不得连亚的斯亚比巴的英国领事在最近的报告书中，都承认道：“农民的生活不论在那一个非洲国度中，总没有像在阿比西尼亞那样艰苦的”。

除了名义价格以外，银价之危机亦给与农民很严重的打击。白银是殖民地国度的基本货币单位，但如今白银的价格到处惨跌着：在中国，印度，也门，阿比西尼亞等国，到处都是一样的。阿比西尼亞的原料依照最低廉的名义价格出卖。即在名义上价格是停於同一水准，但因於银价之低落，物价在实际也将跌落。阿比西尼亞农民之可怜的积蓄，也因此而减少了价值。但进口货的



价格与阿比西尼亚土产品相较，不论在名义上也好，抑是实际上也好，都是上涨了。欧洲资本家供给同量的商品，但要求较多的银币。

曼奴夷耳司基说过：“在各个生产部门中，垄断化之不平衡发展，造成了价格涨落之不平衡性。在危机时代，高度垄断化的工业部门，比了末曾垄断化的工业部门，易於抵抗竞争之压力，易於自律，并易於防止物价之低落。但是在殖民地国度，对於宗主的垄断资本之压力，是完全没法抵抗的。因此殖民地原料之价格是不可挽回地向下惨落下去。这便是殖民地的危机所以异於资本主义国家的（在形式上也好，抑在本质上也好）原因之一”。^①

事实上，这是很显明的：大规模的棉织工厂和棉织托拉斯——不论是在英国抑是日本，是在美国抑是法国——就是在争夺国外市场的斗争最激烈化的时代，就是在商品倾销的时代，也比較阿比西尼亚的分散的小农民易於抵抗价格之跌落。

阿比西尼亚的农产品价格之惨落程度是那样惊人，例如咖啡的价格在名义上跌到3—4倍，而在实际上，由於银价低落之结果，价格跌落的程度尚不止如此。但是在垄断化的生产范围内所生产的入口棉织品的价格，是从没有跌落得那么厉害的。

除此以外，我们还要知道，阿比西尼亚的千万分散的零细小农，在国内市场上的对手，是代表外商银行和外商托拉斯的少数外国资本家和土著商人。虽则争夺阿比西尼亚市场的斗争是非常激烈，但这一部分商人总能把阿比西尼亚割成若干势力范围，以便用垄断价格来要挟阿比西尼亚的农民。即是说，以极低廉的价

^① 曼奴夷耳斯基于1930年2月18日至20日国际会议上的报告。



格收买农民的生产品，同时复以较高的价格把日用必需品出售给农民——这里所谓日用必需品，不仅指比较垄断化的生产范围内所制造的工业生产产品，而且还有输入的粮食（这是种咖啡的单一农作区中所非常感到缺乏的）。

工业品价格和农业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形，资本主义宗主国商品的价格和被束缚的殖民地商品的价格之间的剪刀形，垄断商人所出卖的商品价格和分散的小商品生产者所出卖的商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形，在阿比西尼亚的对外贸易统计中，表现得很清楚。關於阿比西尼亚对外贸易的完整的材料是没有的，我们所知道的仅是吉布蒂铁道上的出入口货之运载量而已。但这材料已经很足以反映出阿比西尼亚经济危机的殖民地性，这是大多数殖民地国度所通有的现象。

事实是如此：经过铁道所运输的出口货物以物量计是相当增加了，但以物价计反减少了许多。例如咖啡的运输量自 1929 年之 13683 吨而增为 1930 年之 14412 吨；蜡的运输量自 326 吨增为 346 吨；皮革运输量自 7136 吨增为 8015 吨。反之，入口货物运输量上是照例减少了，但物价之低落却远不如物量之迅速。例如布匹之输入自 7077 吨而减为 5900 吨，食盐自 21037 吨减为 19314 吨，食米从 610 吨减为 297 吨，高粱自 1223 吨减为 126 吨。糖的输入从 1928 年之 3363 吨改为 1929 年之 2023 吨，至 1930 年仍保留在低下的水准上。一切大众消费的入口货（除了煤油以外），没有一样不减少的。这就是说，阿比西尼亚农民之收入是减少了，他们自己拿了很多的生产品只换得很少的粮食和布匹；这就是说，农民们的购买力是降低了，他们的贫困是扩大了，中小农



经营的景况是退化了。至 1931 年，阿比西尼亚劳动大众的贫困化程度愈厉害。阿京亚的斯亚比巴的英国领事告诉我们^①：“在 1928 年时，阿比西尼亚人民差不多购买了 3000 吨的棉织物，但至 1931 年时，仅购买了 700 吨”，即减少了四倍以上。

阿比西尼亚的危机是与世界经济危机密切相联的，尤其是与世界农业危机密切相联的。这危机首先是生产过剩的危机，是生产机关之扩大和各资本主义国度和殖民地国度中，人民购买力降低之结果。

阿比西尼亚已经碰到过好几次危机，在每次危机时代，阿比西尼亚的农产品（特别是咖啡）在外国市场上的销售量便大为减低。但此次危机与以前历次经济危机，有许多不同地方。

第一，这不是仅仅波及某一国度和某一经济部门的局部危机。反之，此次危机包罗了全体资本主义国度和殖民地国度，包罗了一切生产部门。如今在阿比西尼亚所发生的危机，是同那个震荡了全资本主义世界的深刻的经济危机密切相关的。

第二，这不是普通的生产过剩的危机；这是发生在战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基础上的危机。这危机一方面加深了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另一方面，自身又因於这总危机之影响而愈加尖锐。阿比西尼亚的原料价格从没有如此猛跌过，阿比西尼亚农民也从没有如此贫困过。

资本主义总危机扩大了殖民地阿比西尼亚经济机构之一切矛盾。帝国主义在这里破坏了旧有的一切生产力，但没有建立新的生产力来代替它。在这本小册子的开首曾讲过某一时代中相当发

^① Near East and India 5, V. 1932, P. 374.



达的阿比西尼亚手工业之衰落情形，和特别落后的原始式的阿比西尼亚农业之退步情形。农业之退步，是由帝国主义在这里保持了封建的和奴隶的剥削，保持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因为在这种范围内，生产力的发展，是绝对没有可能的。如果想提高阿比西尼亚农业技术之水准，那么先得消减阿比西尼亚农民的无地状况，把他们从封建农奴制的剥削下解放出来，把修道院和封建领主的土地交给农民。但不论是国王个人也好，抑是他的政府也好，抑是外国帝国主义者也好，都不会这样彻的地铲除旧有的土地制度，决不会这样坚决地来清除一切束缚土地的封建关系；因为国王本人就是一个最大的封建领主和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他的政府又是许多大封建领主所组合成的，而外国帝国主义者也清楚地知道：这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是帮助他们掠夺阿比西尼亚人民的。

帝国主义甚至连灌溉工程和种植场经营等很赚钱的事业，都没有能力去创办。到今日为止，关于尼罗河水源之水闸建筑问题已经举行过不少谈判，但这建筑终未实现。当然，在现存的条件下，就是这水闸建设成功了，也不能改善阿比西尼亚农民的地位；这水闸所产生的一切利益将全部被外国资本家所享受去，后者且将利用这水闸作为剥削阿比西尼亚农民的新工具。

然而无论如何，这个水闸工程之完成，将是全国生产力发展之一大进步。这水闸筑好以后，将能扩大耕地面积，将能栽种许多新的贵重作物，并增加其收获量——虽则阿比西尼亚劳动大众要获得此建筑之全部收成，祇有在驱逐帝国主义者并铲除封建领主之后。但是由于各帝国主义之相互冲突，这水闸至今还没有建



筑起来；而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时代（尤其在世界经济危机时代），帝国主义者的相互冲突愈加激烈化，且成了总危机的最显明的表现之一。

“帝国主义国家的掠夺性质在危机的环境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便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者行为这增强和各帝国主义者扩大自己的殖民地领土和势力范围之企图……”“危机特别增强了英美二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同时英意法等国斗争夺非洲殖民地的冲突也是危机之另一表现”。对于这些原则，我们都可以用阿比西尼亚的实例来证明。阿比西尼亚是一个被划分“势力范围”的“独立”国家。这特别是在危机时代，很足以引起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地侵略者的野心，它们极力想把阿比西尼亚完全变成自己的殖民地。英美二国为了尼罗河水源这统治权和全阿比西尼亚之霸权而斗争。查纳湖水闸建筑之冲突，美国资本之争夺阿比西尼亚银行和政府机关之领导中枢。英国人之内政阴谋和对于个别封建领主之收买，英国机关在阿比西尼亚各地宣传英属殖民地（怯尼业，乌干达）的繁荣消息——这些都是英美冲突中之各个节目。此外英意法三国在道路建设方面的冲突，在市场争夺和内政阴谋方面的冲突，都在日益扩大着。

帝国主义国家想利用这次世界经济危机，来加强自己对于阿比西尼亚的统治权。它们共同派遣了一个调查团（以倍克斯顿为首领）到阿比西尼亚去考察奴隶制度并研究废除奴隶制度的方法（1932年3月）。当然，欧洲的“文明的”奴隶所有主决不是真心想去铲除奴隶制度。他们觉得：为什么不利用了阿比西尼亚政府的财政关系——当它失去了任何抵抗力的时候——以反对奴隶



制度为藉口，来握住阿比西尼亚的公开的政治统治权呢？

阿比西尼亚的国家财政困难，的确有使它沦为殖民地国度的危险。农民的税捐负担之苛重，已经达到了极点。但第一，所征收的税捐中有一大部分是被封建领主和长老们私吞掉了；第二，农民已贫困到极点，他们出售生产品所得到的金钱是非常少，所以在他们身上简直也榨不出多少油水来。在许多征收现物的地方，虽从农民所抽的生产品的数量很是不小，但由于价格低廉的缘故，亦卖不出多少钱来。

在这种局面下，阿比西尼亚的真正的出路只有一条，这便是没收修道院和封建领主所有的一切土地和财产；没收他们的仓库（因为在邻近的村落中尽管有饿死的农民，但修道院和封建领主仓库中，总是经常充满的），没收寄生阶级的财富去救济饥饿的农民，使他们可以扩大自己的经济，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把他们从帝国主义的，农奴制的，奴隶制的剥削下解放起来——这是逃脱经济危机的唯一出路，可是这种纲领当然只有在推翻帝国主义者和封建领主的统治之后，才能实现。

然而，现存的封建政府觉得宁可选择别的途径来巩固自己的财政，它觉得在危机时代，宁可加强封建和剥削，宁可增加苛捐杂税地租贡役等（增加到超过于“常态的”水准以上），宁可以武力镇压农民的骚动，以帝国主义的赏赐来弥补预算上的漏洞。当然，殖民地的买办资本家和封建领主为了这一点赏赐将出卖国家之独立权，为了负债劳役式的借款将把全国的政治统治权让与帝国主义者。但是这些条件至于他们并不心痛的，因为掠夺式的高利贷利息用不到他们来支付，而有劳动大众来负担；同时为了



支付外债利息而冻饿死的不是封建领主，也不是商人，而是农民，奴隶，手工业者和苦力。

在这一点上，泰法利国王并不孤立。埃及、伊拉克、阿富汗和其它类似的“国家”，没有一个不伸着手向外国银行和外国政府借债的；它们把本国的独立权（当这种独立权不保存着的时候）、领土、政府职位、铁道、飞机场、海关收入、煤油矿和其它富源作为借债的抵押品。这些“国家”如今都在帝国主义之支配下，而后者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些“国家”之支配权，完全是得力于各该国内部的奴仆式的封建买办分子之援助。增加殖民地大众的桎梏，以新的外债去束缚他们——这便是帝国主义的，逃脱危机的纲领。这纲领是帝国主义的封建奴仆们（国王和封建领主，买办等等）所竭力拥戴的。所以阿比西尼亚的泰法利国王要聘请美国顾问，并把财政监督权交给他们，同他们进行水闸建筑和种植场经营的谈判，并商借负债劳役式的外债（虽则对于外界仍旧发表了许多官冕堂皇的宣言）。

但是这个逃脱危机的纲领，实际上只能增加帝国主义和封建阿比西尼亚人民大众之剥削，只能促成殖民地制度中一切矛盾之继续尖锐化，并造成普遍的饥荒而已。这纲领必然要促成阿比西尼亚民众之反帝国主义封建主的斗争，推动他们用革命的途径去逃脱危机。“在经济危机和农业危机相互密切结合之影响下，在帝国主义和封建高利贷剥削加强之影响和大众破产之影响下，推动了千百万大众起来反对整个帝国主义殖民地制度，起来从事民族革命运动，于是迅速地酝酿成了深刻的革命危机”。

在印度和中国，这危机已成了一种很显然的形式，但在落后



的阿比西尼亚，这运动还在较低级的阶段上。然而这运动是在发展着，因为饥寒将迫着大众起来斗争。在这一点上，1930年初的骚动和此后所发生的几次骚动，都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①

不错，这些骚动是与封建领主和教会的政治阴谋联在一起的。是与封建贵族间的内讧混在一起的。但同时，危机之加深，必然地要引起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斗争之发展，推动大众从革命的出路去逃脱危机，实行没收修道院和宫室的财产，占取并分割封建主和教会的土地，推翻封建主和他们的帝国主义后台老板的统治。“在这里（在封建中世纪关系系统治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度——著者）反对封建制度和前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的斗争，彻的的农民土地革命，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统治和拥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占有中心意义”。

这公式明切地指出了阿比西尼亚劳动大众的面前所摆着的基本任务——为独立和土地而奋斗，反对当地的剥削者和外来的剥削者的双重压迫。阿比西尼亚人民在这个斗争中并不孤立。在他们面前，反帝国主义运动和土地革命展开了非资本主义发展唯一可能的道路。阿比西尼亚将越过了历史上已经陈旧了的，非必要的资本主义阶段性，而走向新社会之建立。

附 录 一

阿比西尼亚的风俗文化

封建的社会形态在阿比西尼亚的风俗文化上留下了很深的痕

^① 1932年6月，本书付印以后，在北部阿比西尼亚（考怯姆）又发生了一次大骚动，此次骚动是封建诸侯所领导的，但大概以农民为基础。详细情形如今还不大清楚。



迹。中世纪的压迫、教会的压迫、农奴制度、宗法系第的殘除，数世纪来与外界隔绝的孤立生活——这些现象如今在阿比西尼亚仍旧保留着，这促成了阿比西尼亚的异常落后的文化。因为这缘故，在阿比西尼亚保存着许多风俗文化上的特点。

A. 人种和语言

在阿比西尼亚居住的有好几种人民，“他们之间不仅存在种族上的差别，而且就是在语言、习惯、宗教和外表容貌上都有不同的地方。”

真正的阿比西尼亚人占全人口的 1/3 以上。

根据意大利的材料，在阿比西尼亚的 1000 万居民中，迦拉司人占 400 万至 500 万左右，阿比西尼亚人占 350 万至 400 万人，内中属于部落赵的有 120 万人，属于蒂格勒部落的有 80 万人，属于安姆哈拉部落的有 100 万人，属于考怯姆部落的有 60 万人等等。

阿比西尼亚人居住在蒂格勒、阿姆哈拉、考怯姆之北部和赵省之中部。迦拉司人种以人数计居第一位（400—500 万）。他们散居在全国各地。在西部边境住有黑种人部落（腔卡拉人）；在东部边境住有达拿勾耳人；伊萨族和其它部落属于索谋里兰人种。

阿比西尼亚国内最流行的语言是阿拉伯语和阿姆利克语。除了这两种语言以外，其次便是哈迷源的迦拉语。许多迦拉司人种的部落都讲这种迦拉语，但每一部落都带有各种不同的方言。

B. 部落风俗

上面已经说过，迦拉司人在数量上超过了基本人种的阿比西尼亚人。这种迦拉司人主要是散居在阿比西尼亚的南部和西部的



边境地方，虽则有几个部落——如打塔尔、阿齐部、叶湖、活洛、迦拉——也住在东部边境地方。各部落之间常在经济的基础（争夺牧场和狩猎区域等）上发生许多冲突。部落间的这种冲突时常牺牲了他们的许多性命，这直到今日为止，还是如此的。这种冲突常为政府所利用。政府往往利用了某一部落之援助去压服另一部落，这样它（政府）便维持了它们之间的相当的“秩序”。

在文化水准上，迦拉司人还不如阿比西尼亚人。迦拉司人的衣服，便是粗制的兽皮，他们的武器便是镖枪和弓箭。生活之不衍生（如住处之不洁等）简直非笔墨所可形容的。在家庭中男子占主要地位。在迦拉司人眼中，女人还不至于如此没有地位，还不至于如此不自由。在那里，女人亦像男子一样在田间工作。但有一点是两方面（迦拉司人的部落和阿比西尼亚人的部落）所共有的现象，这就是女子不能参加税捐，选择牧场，租佃等问题之讨论。这些事物都是男人做的。

在这里，还有一种很有趣味的风俗；这种风俗可以说是氏族内部的残酷的生存斗争之结果。当一个青年要结婚的时候，他的父亲应该先得到他的全体亲戚的同意。同时，他要带了山羊，食器，牛皮等很重的礼物送给亲戚。全氏族差不多把这礼物看做是抵偿该青年出走后所蒙之损失，即低价劳动力之丧失；或者至少是因为青年在结婚以后，他的一部分时间和生产品消耗在妻子身上，这礼物好像便是用以抵偿这一部分损失的。但女孩子的父亲却可以为自己的女儿向亲属和朋友处征集嫁妆。按照向来的风俗，这些亲属朋友应该毫不吝啬地尽自己的能力供给他一切东西，以帮助他出嫁自己的“吃白食的”女儿。有时（大概视各部



的物质条件而定），他们把新生的女孩子抛弃在树林中让野兽吞食。根据族法的规定，如果妻子离开了丈夫又去嫁了一个人，那么她和第二个丈夫一同生的男孩仍旧应送给原来的丈夫。迦拉司人的经济发展水准非常低下。莱伊会告诉我们，有一次他在一个边僻的迦拉司人部落中，因为用火柴点火，会引起全部落人的惊慌，可见在这次以前，他们没有见过火柴取火的事情。

在迦拉司人中间，以定居的农业部落，和流浪的狩猎部落为最多，畜牧部落比较稀少。在他们中间，至今还保存着宗法关系的残余，这事实就足以解释为什么他们的文化水准是如此落后。

达拿勾耳人和索谋里兰人的部落完全正确过着流浪的渔猎生活。他们比迦拉司人发展水准愈加落后。

酒精中毒之普遍，亦就是文化落后的一种实证。

一般人民所通用的酒是叫做“吉琪”的蜜酒。这酒是用蜂蜜和忽布宝（蛇麻子）酿造的。啤酒，烧酒，酒精等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时候都可以找得到的，在有些地方，甚至已代替了货币的职能。外国人（尤其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有鉴于酒类销路之广，把酒精和烧酒等大批私运入阿比西尼亚，以交换必需的土货，这种普遍的酒精中毒行为完全是教会所提倡出来的。狂饮烂醉是一切宗教节日中不可避免的事情，但在阿比西尼亚，宗教节日是非常多的。在伊斯兰教流行的时候，阿比西尼亚教会为要反对伊斯兰教，拉拢信徒并保持自己的经济地位起见，便奖励教徒们在宗教节日饮酒。这政策很足以接拢一般土著的回教徒。于是狂饮烂醉便成了一种风俗。这种风俗常被封建领主、地主、教会所利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被酒精所麻醉了的农民不用



说要容易欺侮一些。在这里很可以看出宗教之卑鄙作用，可以看出教会完全是一种反动的，属于某一社会集团的组织，它总是有系统地麻醉人民，以便保持自己的物质的优越地位。

C. 婚姻形式

严格地说，阿比西尼亚人不能算做是一夫一妻主义者，虽根据阿比西尼亚教会的教义，他们是不应该不如此的。阿比西尼亚人的婚姻，家庭组织以及一般人对于这些问题的观点都是非常原始式的，阿比西尼亚现在是从多妻制度而过渡为一夫一妻制度。教会对于现存的经济关系做了让步，它使离婚手段简单化，即是说实际上是放纵了多妻主义。在阿比西尼亚没有一定的婚姻形式。

普通男女间的关系不用任何法律上的手续，也没有什么宗教仪式，相互间也没有任何义务规定；同时，也不像资产阶级的礼仪社会中一样，非难或不承认这种关系。反之，在阿比西尼亚人看来这是很普通的一种婚姻形式。在这里，还统治着一种氏族社会的风气，所以不把婚姻问题看得那样重大，也没有种种结婚仪式，这些仪式都是私有财产和家族中的共同劳动制形成以后，才发生。

D. 教育

除了大都市中的若干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以外，在阿比西尼亚没有什么教育机关。人民差不多是完全不识字的。莱伊写道，有钱的人照例是解放了自己的读书工作，而雇用一个识字的书记。他们甚至连签字都不会的。在信札后面常以国章代替具名。懂得外国语的人只有教会学堂出身的生徒（他们大半是有产阶级



出身的子弟）。语言，方言，土音之复杂（有几种语言还没有自己的文字）也足以阻碍阿比西尼亚人的识字运动。也像在任何其它殖民地国度一样，帝国主义输入阿比西尼亚的东西，除了酒精以外，还有梅毒和圣经。

各派基督教教会和外国顾问一样，也是统治阿比西尼亚的一种工具。传教师在各地设立学堂以便从阿比西尼亚的贵族子弟中训练自己的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成绩最好的是美国教会（在迦拉区）。其次是法国教会和瑞士教会。

除了外国的教会学堂以外，在阿比西尼亚各大都市中，还有本国教会所办的学堂。到这些本国教会的学堂中去读书的人，都是教会管理机关所选拔的牧师神父等，他们所研究的便是神学和古代的开士话。僧侣们也就在这学堂中学习阿比西尼亚文字。在若干的修道院中，自己设有学堂，以教养修道僧。但普通的人（农民手工业者）不论在什么地方得不到什么教育的。教会把教育的垄断权握在自己的手中，并利用这作为剥削和压迫劳动大众的工具。



附录二

表 一①

吉布蒂铁道货物运输吨数

(1910 年至 1928 年)

年份	人口	出口
1910	6004	7426
1911	8713	7619
1912	9146	7147
1913	8197	9240
1914	15060	8363
1915	17431	10885
1916	14579	9011
1917	20022	14166
1918	20770	15320
1919	15234	14796
1920	21358	11196
1921	11535	10360
1922	14281	13490
1923	22962	15191
1924	18693	23855
1925	25474	26571
1926	33843	24082
1927	39466	25361
1928	47724	24416
1929	49092	21538
1930	42162	24950

① 引自 “Rassegna economica delle colonie” No. 1 - 2, 1930.

关于 1929 年和 1930 年的数字引自 “Bolletino di informazioni Commerciali” No. 39. 26. IX, 1931.



表二
经过铁道输入阿比西尼亚的商品 (单位吨)

货别	1927年	1928年	1929年	1930年
阿布开奇特布	4793	4638	5180	5116
其它布匹	2931	3148	1897	785
煤油	1706	1680	1816	2222
盐	18240	19243	21037	19314
糖	1630	3363	2023	2113
肥皂	517	507	543	421
啤酒	153	233	301	125
葡萄酒	667	195	272	252
酒精	331	419	705	112
椰子	147	268	175	145
米	292	575	610	297
高粱	29	3503	1223	126
麦粉	230	109	68	230
铁器	591	372	118	221
玻璃器	275	299	411	247
麻袋	459	449	551	446
烟草品	43	125	82	34
香	313	302	328	240
挥发油	—	609	967	628
汽车	—	370	259	284
建筑材料	481	1490	705	1783
行李	138	127		
金属	—	1459	9821	7021
其它	—	5246		
合计	39466	47724	49092	42162

上表 1927 年 1928 年两年的合计数，跟上列数字的总和略有出入，但原文如此，未便改动。译者



表 三

经过铁道从阿比西尼亚输出的商品 (单位吨)

货 别	1927 年	1928 年	1929 年	1930 年
土产肥皂	63	37	22	77
哈拉尔咖啡	7262	5093		
阿比西尼亚咖啡	7090	7658	13683	14412
废 物	40	22	8	12
蜡	410	317	326	346
象 牙	6	7	4	3
干 皮 草	9474	10451	7136	8015
高 粱	147	84	—	1344
谷	180	249	29	22
番 薯	10	9	—	—
木 炭	1	19	—	—
菜 干	47	43	34	25
麦 粉	67	—	—	—
行 李	341	308		
其 它	223	119	296	694
合 计	25361	24416	21538	24950



一九三六年度的苏俄文学出版计划^{*}

——预备出书 2300 万册——

——包含中、日、菲等国革命文学作品——

1936 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的一份子）国立文学出版局的出版计划，在规模上和内容上比较 1935 年的出版计划都有不同的地方。最近国立文学出版局经理哈谷略谷夫（N. N. Hacoriacov）关于这个计划的内容发表谈话如下：

未来的 1937 年是我们的大诗人普希金（Pushkin）死后百年周年纪念。因此我们预备在 1936 年把这位大诗人的遗著完全再版，并且预备出几种论述这位诗人的著作。关于这一类的书籍，国立文学出版局总共预备发表 500 万册。这里面，仅普希金文集（合订一大册，附有插图）就占 30 万册。其余如像：叶甫盖尼·奥琴《别尔金的故事》、女王《抒情诗选集》、《叙事诗选集》、《戏曲集》和《杜白洛甫斯基》等等作品，都预备发行单行本，每种至少印 20 万册。有若干种作品，预备印行 100 万册。

在论述普希金的著作中，有好几种新著的科学的研究的《普希金传》，有专为大众读者写的《普希金略传》，有批评或研究普希

* 原载《世界知识》3 卷 9 号，1936，1。



金的论文集等等。此外预备印行普希金的《小悲剧》的艺术版（附有艺术家 A · 克拉符钦谷的木刻插图）和《普希金全集》六卷。

在 1936 年，国立文学出版局预备出版戈果里（Gogol）全集六卷，并且开始发行新版的高尔基全集。除此以外，预备出版的文集有：勃留沙夫（Bryusov）文集三卷；倍林斯基（Belinsky）文集三卷；独勃洛留薄夫（Dobrolubov）文集二卷；精装的托尔斯泰文集十四卷；谢特灵（Shchedrin）文集五卷；斯丹达尔（Stendha）文集四卷；巴尔扎克（Balzac）文集五卷；歌德文集四卷；莫泊桑文集七卷；佛罗贝尔（Flaubert）文集三卷。同时，我们预备出版的单行本有下列各种：高尔基的选集，和他最近脱稿的长篇小说《克里姆 · 萨姆琴》（共四章）；托尔斯泰，戈果里，简洛连科（Korolenko），屠格夫（Turgeneff）奥新脱洛夫斯基（Ostrovsky）等人的选集；苏霍伏 · 高倍林（Sukhovo - Kobylin）的三部曲；孚特（Fot）的抒情诗；莱芒督夫（Lermontoff）的诗和散文；拜命（Byron）的诗；魏尔哈仑（Verhaeren）的戏剧；黑尔凡第斯（Helvetius）的《幸福论》；但丁的《地狱》；狄德罗（Diderot）的《拉穆之侄》（Le Neveu de Rhneau）；雪莱（Shelley）；米茨勾维契（Mitskevich）夫莱利格拉（Freiligrath）等人的诗集；拉伯雷（Rabelais）的《班答拜里爱尔》（“Pantagruel”）和《卡康久》（“Gargantua”）和其他等名著。

总计 1936 年间，国立文学出版局关于古典作家的著作（连普希金纪念版在内）预备出版 1300 万册。

国立文学出版局关于现代的文学作品，预备出版 560 种，共



900 万余册。

在 1936 年里面，新著作的出版也是最为丰富的。以下便是我们预备出版的几种最有兴趣的新著作：伊凡诺夫（Ivanov）的《克立姆尔宫城》，立昂诺夫（Leonov）的《大洋上的道路》，巴符灵谷（Pavlenko）的《战争之命运》；奥立希（Oleshi）的《转变之机器》；比里克（Pyinyak）的《果实之成熟》，唆罗诃夫（Sholochov）的《静静的顿河》第四卷和《新垦的处女地》第二卷；维施涅夫斯基（Vishnevsky）的《水手》；拔赫密计叶夫（Bakhmetiev）的《进攻》，阿尔留姆·佛肖留（Arliem Vesielec）的《天上的鹤》；立文（Levin）的《青年》；马卡灵谷（Makarenko）的《教师的诗文》第三卷；马留施金（Malyshkin）的《三十年》；彼脱洛夫斯基（Petrovsky）的《烧尔司》；巴乌斯督夫斯基（Paustovsky）的《社会主义的故事》；罗曼洛夫（Romanov）的《罗斯》（俄罗斯之古名）第四及第五两卷；赛甫林娜（Seifullina）的《国度》；雪尔拜叶夫·青斯基（Sergeev Chensky）的《搜索和发见》；法兑耶夫（Fadeeff）《乌德黑人的最后一个》（第三第四卷）；沙勾娘（Shaginyan）的《热力学的定律》；斗涅谷夫（Tyniacov）的《普希金》；福尔施（Forsh）的《加桑地方的地主太太》；阿列克雪衣·托尔斯泰（Alexei Tolstoy）的《苦难的经历》的第三卷和《察利津之防御》；费丁（Fedin）的《欧罗巴之劫掠》（第二卷）；怯褒金（Chapytin）的《散步的人们》（第二卷和第三卷）；希施谷夫（Shishkov）的《蒲卡曲夫》（Pugachev 是古代俄罗斯农民骚动的首领）；几霍诺夫（Trhonov）的《达吉斯坦的故事》，叔溥立夫（Sobolev）的



《重要的修理工程》(第二卷)；以及卡凡林 (Kaverin) 的《意志之执行》(第二卷) 等。

在诗文方面，我们预备出版极米养·柏特尼依 (Denyan Bednyi)，巴斯吉尔涅克 (Pasteruyak)，斯维特洛夫 (Svedrov)，雪尔文斯基 (Selvinsky)，泼洛高非叶夫 (Prokofiev) 季洪诺夫和其他作者的新诗集。

“苏联各民族创作”，这一部分，也预备出版大批书籍。其计划是想把乌克兰乔治亚、亚美尼亚、白俄罗斯、亚塞拜然和其它各民族共和国的优秀著作，译成俄文出版；共计有 93 种。

在 1936 年里面，现代文学作品中最好的 70 种打算发行再版。

国立文学出版局鉴于苏联社会对于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和美国革命作家大会极感兴趣，预备把这两个会议的材料，加以整理，出版两本书。

“外国文学部”(散文和诗文) 也有很多新鲜的东西。

勃莱特尔 (Bredle) 的《实验》，巴比塞的《火线下》，史曼特莱 (Smedley) 的《短篇小说选集》，安娜·蔡格可司的《经过二月的道路》，费赫脱横拜尔的《奥崩拜姆的家庭》都预备大批的出版。

此外，在计划中预备出版的美国文学，计有贝尔·卜克 (Pear Buck 即赛珍珠) 的长篇小说《母亲》，特莱赛 (Dreiser) 的《关于我自己的书》，果尔德的《短篇小说选集》；W·福兰克 (Waldo Frank) 的《十字路口》；汉敏威的《打倒军火》。在英国方面，计有海克司李 (A. Huxley) 的《古代舞》，福司特的《到印度的道路》和其它等。在德国方面，计有勃莱赫脱 (Brecht)



的《尖头的和圆头的和穷人的》长篇小说，伐雪曼（Vussirman）的《赵捷甫·盖诺曼的生活》，曼诺姆（Mannom）的《享利四世的少年时代》，泼利甫叶的《阿答化尔地方的惊人事件》；费赫脱横拜的《欧战》和《犹太人横拜》；曼诺母文集的第三卷和第四卷等。

从最近的法兰西文学作品中，我们预备出版下列几种：巴比赛的《史达林格诺》，（Guehenno）的《一个四十岁的欧洲人的日记》；尚母逊（Chamson）的《被镇服者的年头》；罗曼·罗兰的文集七卷，马耳洛（Maltaux）的《煤油》；纪德（Gide）的文集两卷；纪奥诺《幸福是要来的》和其它等作品。

此外，我们预备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计有：西班牙作者卜那维台司（Bonavides）的《阿乌斯多利亚》；中国革命文学选集；波兰女作家伐西立夫·斯卡耶（Vasilevskya）的《祖国》；土耳其文坛的诗集；日本革命的农民文学家的选集；以及捷克斯拉夫、意大利、丹麦瑞典、挪威、芬兰、菲列宾、荷兰等国的著名作家的作品。

关于文学历史部分，预备出版下列几种：独白留宁的《古代起至十九世纪止的俄罗斯文学史概论》；希立尔的《西欧文学史》第三卷；达尼林的《巴黎公社的艺术政策》和一本《关于西欧的写实主义的选文选》及朱尔蒙斯基的《俄罗斯文学中的歌德》。同时并预备开始出版契尔内蓄夫斯基（Tchernyshevsky）的精装的全集。

在“戏院和剧本”方面，预备出版 93 种书。这里边有“共和国功勋演员”梅耶荷特的著作；右夫司基关于闹伐特史基剧院



的小册子；和司维特洛夫，卡高琴，阿芬诺金诺夫等人的新作品。

这是 1936 年苏俄国立文学出版局的出版计划的大概。以这个计划的规模而论，比较 1935 年的计划扩大了许多。在 1935 年，我们出版了 890 种书，共印 1766.4 万册，在 1936 年预备出版 921 种书，共印 2300 万册。（译自俄文文艺新闻）



拥护不可分割的和平^{*}

我的过失在于我把复杂的形势看得太清楚了。然而我仍旧看得出这些形势地复杂性。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把这些形势的重要程度分别清楚。有许多混乱和错误往往是由于情感上失去了平衡而产生起来的。这种平衡失去以后便要使人们对于宝贵东西失去了知觉。

我们是生活在历史上最危急的一个时期中。欧洲——接着便是整个世界——都处在大火灾的前夜。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得到战争的气息了。但是我总不觉得这里有什么理由可以使们失去自主力；而且对于我们法国局势是很确定而显明的，倘使我们对于这种情势能够把坚定而有决断的眼光去注视它。

希特勒的德意志狂热地在准备着进攻。有许多最近从那里回来的，最可靠的目睹者，惊慌地告诉我们许多关于备战狂的消息，而且说，威胁的枪口是对准着法国的。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不管赖伐尔地卑躬屈膝的妥协态度，已经不做法国的同盟者了；如果欧洲发生冲突的时候至多也只能获得它的中立态度而且这也是极不可靠的。但是无论如何意大利由于对阿冒险战争的结果已经

* 本文作者署名 Romain Rolland，原载《世界知识》4卷2号，1936，1，29。



受到了致命的重伤，这将使它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不能在欧洲有所行动。棋盘上的棋子的分布情形既是如是，那么局势是很显明的了。法、英、苏联盟，是自然而然会发生的事情。只有这个同盟才能够对于不可避免的危险给与有力的抵抗，而且甚至于可以预防住这个危险。然而为什么还要踌躇和观望呢？

由于非常的局面，使我们国度里两个敌视的潮流，两种不同的政党——民族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相互协调起来。一切爱护法兰西的聪明的爱国者都知道了希特勒的德意志以外，法国没有再可怕，再渴望着复仇的敌人了。而这一个德意志也是两个国际——社会主义国际和共产国际——的共同的死敌。那么这些政党之应该联合起来，似乎是无庸置疑的事情了，如果关于此种接近的思想的本身和关于鼎鼎有名的神圣统一的回忆不使他害怕欺骗的话。

但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应该毫无隐讳地来讲；我们不用隐讳说它们是倔强地分离着，也不用隐讳说它们是不免要接近起来。难道不共戴天的死敌为要团结自己的力量以抵抗自然的灾祸，如水患和火灾的时候不会讲和妥协过吗？难道保持健全的思想便是放弃自己的信仰吗？

如今我们面对一个类似天灾的一个可怕的祸患。这好像是妖魔们脱了锁链，他们已经不为政治的思考所节制，而为无知的骄傲以及疯狂和贫困的失望所支配着。而这一切都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基础。不用说，战胜者的协约国对于这些是要负相当责任的。而且负的责任也并不小关于这一层我们在下面还要讲到的……但是在目前，第一要紧的是防止血的洪流。



因为这个关系我们就要同我们的真正的非战主义者朋友们发生当面接触了。他们的学说之形成，我们自己是直接帮了忙的。如今他们在责备我们，说我们是抛弃了他们，虽则我们是经常在为着公共的和平事业而服务着。我们只是反对那些想为和平服务，但是失去了健全思想和真理的人们，“Usque ad absurdum”（做成蠢事情。）这里，我特别是对于这些友人中，我所敬爱的两个朋友讲话。第一位是勇敢而贤能的弗里辛·舍莱——在不久前我们还会庆祝过他的，在他一生中，他的沉着的永不畏缩的精神成了我们法兰西荣誉。第二位是乔治·米匈，他是最正直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是最不为妨害真理之探究的一切学派的成见和传统观念所束缚的历史学家。像人们这样的，以拥护和平为共同的主要的职责的老同志，怎么会因为这样明白的问题弄到分手呢？

但是舍莱和米匈所拥护的这个和平，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不会与健全的思想和事实真理相违背的。凡是违背健全的思想和事实的真理的，都要归于毁灭。然而，我的朋友们，当你们说，“为要保护和平，应该信赖那些企图战争和破坏的人们的良心”的时候你们岂不是也违背了健全的思想和事实的真理了吗？

你们否认他们是要战争和破坏，可是我们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观察都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在准备战争和破坏，而且在以最顽固的态度和最疯狂的情绪准备着！你们是反对明明白白的事实，而去保证“Mein Kampf”（《我的斗争》——希特勒政纲式的著作）的作者的意图纯洁。希特勒是永远不会放弃他那部挑拨人种的仇视，和宣传对法复仇的，圣经中的一字一句的。他以官家的



力量，把这部书成千上万份地散发到德意志人的家庭中去。他在这部书里面甚至厚着脸，把自己的计划说了出来：他想以政治的欺骗手段离间协约国，然后再把它们各个击破。^①

米匈！你责备我们不应该断言“希特勒是明天的侵略者”而且说我们“这样便是为法国的军国主义者和法国的产业大王们作辩护，因为他们便是想在分散国人对于他们的注视呢……”然则，倘使我们已经证实了“希特勒是明天的侵略者”，可是因为害怕“法国的军国主义和产业大王”要多占了便宜，难道我们就应当把这事实遮掩起来，甚至因此而撒谎吗？我们只应当设法，使这些军国主义者和工业大王不要开心得太长远了；而我们对于这一层毫无疑义是会做到的。然而，难道我们就可以因为不信任和仇视内部的敌人而就去信任外部的敌人吗？（从你们的主张中必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来。）如果是这样，那是太蠢了。难道在今日狂人般的惊惶失措的混乱局面之下，就不能够在两个极端的，同样不智的决议——向希特勒投降以及向汪德耳、施内德尔^②和他们在法兰西国会中的代理人投降——之间，找一个维持平衡的办法了吗？至于说到我个人，那是我很能够维持这平衡的。我将握着武器反对两面的敌人，我将要把这事情作为我自己的任务，我将如国王尚的儿子在普阿菊地方一样，向着大家喊道：“爸，当心着右边！爸，当心着左边！……”反对国内的敌人，同样也反对国外的敌人。

① 同样也是从自己的不纯洁的心里出发，（舍莱和米匈，你们对于这一点是不会不知道的，）希特勒曾利用了一切手段，阻止法国人阅读他们的著作的法文译本，但同时又把反对法国并鼓励仇法心理的这部书到处在德国国内散布。

② 汪德耳和施内德尔系法国的大军需工业企业家——译者。



在目前主要的敌人是国外的敌人。你们为什么忽视了这敌人呢。

舍莱！如果你们忍住了自己的厌恶心，把自己的纯洁的手伸出去，同那个屠杀克拉乌司和其他几百个劳动者（他们唯一的罪名便是因为他们忠实于劳动阶级的事业）的凶手们，同样那个屠杀苗闸姆和立辛教授的凶手们，同德意志国会的纵火者们，同拷打拘留营里面的囚犯的侩子手们（均指希特勒及其党徒——译者注）去握手，是为了必要——如果你们认为确实有这样必要——是为挽求和平，那么我也就不来责备你们了！我们的伟大的祖先国民会议（法国大革命时——译者）的政治家们在极端的场合中曾经说过：“让我的名誉被毁了吧，只要共和国能够得救！”为了挽救和平，为了保留千百万人的生命，（他们将要作为未来战争的牺牲者，）我们可以牺牲我们的任何一种最高尚的情操，甚至可以牺牲我们的名誉，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同意摧毁人权的罪恶。不论如今掌握着德意志的命运的那些人是如何厉害地引起了我们的厌恶心，但是我们总也不会想要发动战争去推翻他们；为要颠覆这些被厌恶的人而牺牲无数无辜人民的鲜血，那代价是太贵了。我们是亲身经历了前次的“伟大战争”的人，我们从经验中，很好地知道：在现今的社会制度下，人民对于战争是不负责的，他们只是被迫着做了战争的工具。德国人民就是在希特勒的压迫下，仍旧是我们的伟大的兄弟民族，只是由于人工造成的纠纷把他们和我们的民族分离了开来，而且使它来反对后者。而我们的最深远的愿望，我们的永不怠懈的努力也就是想利用广大的理智的国际合作，使他们同我们联合起来。就是在这最后一刻钟



之内，我们还是不顾到一切威胁，促成德意志民族加入全欧各民族地集团内，在互助和互不侵犯的公约下大家联合起来。可是问题就在法西斯蒂的领袖们拒绝接受这种提议，他们的拒绝已经充分地证实了他们种种计划的罪恶。他们愿意保持自己行动的自由，而且愿意用局部的条约来巩固这行动的自由权，以便攻击欧洲整个集体的个别部分。也正就是这一点，政治上的预见不允许我们答应这事情，因为这是缺乏任何理由的。舍莱！要知道我们所要的不是神奇，而是现实是充分的和平。为了保证西方的和平，我们甚至于准备同魔鬼订立条约（如那神圣的神父所说的，）但是他终于把它“欺骗”了！为的是想用“和平不可分割”的集体条约把它（魔鬼，即指“德国”——译者）限制着，使它处在欧洲的监视下，不能再来伤害别人。但是，舍莱！我们决不允许你因为害怕那魔鬼有所不满，就同意它反对“不可分割的和平”（这是可以约束签字各国的唯一和平，）这样你是落进了这魔鬼的陷阱了，这个陷阱也就是专为我们而设的。这陷阱的内容便是在西方订立局部的暂时的和平，使它在东方可以保持行动自由，以便劫掠并破坏我们最伟大的同盟者！关于这同盟者对于我们是什么，和对于你已经不是什么的问题，我姑且放在一边不讲。舍莱！你因为由于仇恨，敌意和包围着你的那些人们的错误，已经同这个同盟者隔离得很远了。对于我们苏联是在未来的进化上，唯一可靠的希望，是我们人类国际的堡垒！我们在这里没有功夫开什么讨论会。我们只要有一个健全的思想便够了。舍莱！我们凭良心说吧，像你这样，为我们的最狠毒的死敌去做火上加油的工作，使它可以破坏我们自己的防御工程，难道不是太无意义



吗？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知道你已经预备用撤退防御的办法来对付目前快要到来的侵略者，这与其说是对于胜利的信仰，无宁说是斯多噶主义（Stoicism）的绝望的办法：“倘使法西斯主义的侵犯要挨到我们头上了，那么也就让它来吧！我们用我们消极抵抗一定能够把它阻止住的！”舍莱！你难道真的这样想吗？舍莱！你的消极抵抗主义的人民在那里呢？即使我们假定在西欧还能找到一个民族，也像你自己一样，因为厌恶那种牺牲人家的生命来保护自己生命的方法，所以如今准备来把自己牺牲，那么你是不是认真地以为在破坏势力的面前，这办法是公平的呢？甘地曾经预备领导着自己的人民来实行这个英雄的试验。但是甘地在数千年来受着一种特殊的学说薰陶过了的三亿印度人民中，成功的可能性要比较多了许多！自从法西斯蒂进军罗马以后，十二年之内，我们在欧洲见到放恣的法西斯主义的野兽式的凯旋在西方的许多优秀的、而未能自卫的人民中所造成的荒凉景象。他们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处于被镇服的地位，他们不仅遭受了暴力的摧残，不仅遭受了侮辱和拷打，而且在道德上都受了打击，在精神上也受了屈辱，以致于抛弃了自己的信仰。然而你难道以为我们的人民倘使投降了以后，倘使失去了自己的领袖，失去了工人和知识分子中所推选起来唯一的领导团体以后，还能抵抗什么吗？精神和物体的反抗只有在如今是可以抵御侵略者的，若是把这抵抗延到失败之后再来干……那是多愚蠢的事情呀！

“Ignavia est jacere, dum Pssis Surgere”^①

① 不中用的人当他能够爬起来的时候是睡倒着的。



德国的和意大利的亡命者目睹着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野蛮的独裁政治之下所造成那种荒凉景象，他们当火焰向着我们这边漫延过来的时候，就喊道“失火了！”可是你因为厌恶战争的缘故就宣布这些亡命者是战争的罪魁祸首，——难道你竟不懂得这是最残酷的不公平的行为吗！你总是在责备我们，然而你难道没有看到我们正在以全部精力从事于伟大的任务——我们正在设法不让那个破坏整个人类文明的战争爆发起来，正在建立一个防止战争之进展的唯一的障碍物？难道你不应该来帮助我们完成这工作吗？

不，我们决不愿意战争！我们愿意战争不发生，而且因为我们将是这样希望着，所以我们愿意采用那个能够阻止战争爆发的唯一的手段，我们要采用三个强国共同努力的办法；这三个国家因于不同的动机，都是绝对地必死地需要长期的和平。这三个强国便是：法兰西；不列颠帝国和苏联……唉！我还不能够担保这三个国家的联合努力就能够不让战争爆发，狂人发起性来，人家是没有方法可以阻止得往的！但这样至少就可以使他碰一个头破血淋了！

当大火或水灾当前的时候，是不用这样长篇大论来商量的。这时候，需要用全副精力来防止破坏。但是当火已经熄灭了，大水已经退了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来研究灾祸的起因，并且应该来消灭这祸根，以免将来的危险。关于希特勒这个祸患的起因，一点都没有什么神秘。在十五年以前，当协约国政府在凡尔赛订立了那个代表可耻的压迫的不公平的条约以后，我们就指出了这个祸患的原因。我们从没有放弃过反对这条约，并要求修改这条约



的义务。这是公正和荣誉的义务。这是对于法兰西的义务，是对于全人类的义务……我们无条件地要求达到这目的。在整整十五年之间，我们就见到而且指出了凡尔赛的战胜者的非理智的冥顽不灵的政策，推动了一个伟大的民族走向愤慨和反抗的道路上去，这个民族陷于穷困和侮辱夹攻中，它要求在太阳底下重新占有自己应得的地位！我们曾经预言过（我竟可以说是断言过，）这种愤慨和反抗的情绪将会激成一种非理智的事情来，将会被走狗的首领们利用了造成一个复仇和民族自傲的怪物。但是他们（指战胜国的统治者——译者，）不听我们的警告，他们总去损害德意志共和国，要不是这样，德意志共和国将能忠实地帮助我们调解西欧的两个兄弟冤家的。于是被雇佣的匪徒登台了。德国在他们手中成了一个燃烧着的大火把。如今面对着全欧洲大火灾的威胁的时候，已经适应讨论修改条约了，因为在暴力强制下的条约修改已经不是公正的行为，而是懦弱的行为了：这种修改对于和平是有损无益的。如今只有先来肃清这个火把周围的地方。等到这火把熄灭以后，法国就应该起来做组织欧洲和平的发起人，把这体系从许多违反健全思想，违反公正原则的种种愚蠢和罪恶之中解放起来，因为如今这种体系完全被这些东西所弄脏了。应该平静地根本地来修改各种条约。

但是在目前欧洲各国应该手拉着手，共同起来组织一个圆舞队！组织一个和平的圆舞队！谁个要求侵害它，就请谁个吃些苦！德意志呀！我们并不禁止你，而且欢迎你加入这圆舞队。但是我们决不让你拆散它。

1936年1月29日（冶方译）



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中的土地立法*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土地问题之研究很为热烈。我们觉得在这研究中，把现代中国的土地关系与资本主义诞生前夜的欧美各国的土地关系相比较一下，是很有意义的。本文是叙述 17 世纪英国革命时代的土地关系。当时英国的资本主义还在萌芽时代。离工业革命还有一世纪之久。但当时英国的新佃户——资本主义式的佃户——的势力已很雄厚。他们之中有的租种到 9 个采邑和 3 个猎苑，建筑到 2 个仓库。他们被称为“财主”，常成为地主的债权人。他们能向地主提出更高的条件，以排挤原有的佃户。显然，今日中国乡村中的高利贷商业资本的财主决不能与当时英国乡村中的这种财主同日而语。而今日中国乡村中的富农经营也不能与当时英国的这些新佃户的经营相比较。

本文是作者在苏联学士院的历史研究所的演讲节录，载 1935 年“Historic – Marxist”杂志 5、6 期合刊。(译者)

—

自从英国革命以后，在英国土地所有者的成分方面发生了很

* 本文作者：苏联，阿尔汗格耳斯基，原载《时事类编》4 卷 12 期，1936，6。



大的变迁。这变迁表现于 1643 年 3 月 27 日的法令发表后的整个革命时期的土地立法上。1660 年 4 月 4 日的勃莱特檄文的冗长的条款，开了复辟时代的土地立法之新阶段。在这时期中，已局部地恢复了封建式的土地立法。关于保王党，英吉利教会，和王室的所有地的土地立法，是从下列各种条款构合成的：规定这些所有地让渡于政府机关的代理人；规定这些所有地的出售办法；规定从出息最高的土地收入中划出一部份作为国家利权；规定以充公的田产担保革命时代所发行的公债；保证新的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所有权，使之成为完全合法的，和确定的权利。

革命时代的土地立法，是我们观察 17 世纪英国土地制度之变迁的最适宜的对象，尤其是观察封建土地所有之动员情况的最适宜的对象。不论是在这时期以前也好，或是在这时期以后也好，从没有看见在这么短的时间以内（自 1643 年至 1660 年，）在政府支持下（或者是完全不得政府的支持），动员了这么多的土地，而且在这时期以前，这些田产都有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的禁律保护着的，（主教司祭长和僧侣会议的土地；王室的土地；森林地）。这次动员破坏了地方上的陈旧的——且往往是老朽的——土地关系，使新兴的资产阶级得到了获取土地的机会。这新兴的资产阶级有的是金钱，它痛快地践踏了一切旧的禁令；但是在自己用得着的时候，它又能很巧妙地利用封建关系的一切旧的法律形式。

根据革命时代的土地立法的内容和它的原则，以及议会中编制这些法案的情形，我们就可以推测到环绕着此次立法场而产生的，各社会集团间的利害冲突。但是在从事实施这些法案的委员



会的文件中，在这时期的小型刊物中，在各个人的往来书翰中，在后人的回忆录中，这种利害冲突表现得更为具体。这些材料使我们可以更深一层地来研究英国革命，使我们可以研究土地分配在各地方的变化并分析实施这些法案的方法和乡村中资本主义关系发展后所引起的利害冲突之实例。

A. 沙文和林拿特研究 17 世纪英国乡村的历史的时候，把三、四百年间各个时代中的关于各个采邑的描写作一比较，他们因此发现了这些采邑中的若干变迁。在许多描写中，有一篇是属于革命时期的东西。根据这一篇东西，与同一采邑的前一时期的和后一时期的记载相比较之结果，便可以了解革命后所发生的变化。但这种比较常要把许多重要现象疏忽过去，如：革命期间，各地方因争夺土地和改革经济制度而发生的斗争；政府的土地政策；旧地主们夺还土地的努力；新地主们想在新的基础上利用土地之苦心熟虑；使用者想维护自己的利益，反对新旧地主双方剥削的奋斗；农场所想以更有利的条件租种土地的奋斗等等。仅靠这种采邑记事之比较，也足以使我们疏忽了革命时期产生起来的新人物；这些人往往是城市的居民出身，他们在这时期，在英国各地购买土地，因而成了新的土地所有者或农场所主。倘使仅以采邑记事之研究为限，那么很难捉摸到整个经济系统中的全体演变，和复杂无穷的经济立法关系。仅仅从事采邑记事之研究，将使研究者太与历史生活的整个潮流相隔绝。但如果我们将研究革命时代的立法和这立法在当地实际生活中的变形，那就能够把各社会集团争取土地的全幅景象全部在我们面前展开来。



二

土地筑围实际也就是等于侵占公社土地，并把农民驱逐出原来耕种的土地以外。我们从历史文献中可以知道，这种现象在整个 17 世纪中，从未停止过，这种现象充满了这一世纪的 40 年代和 50 年代，并且直到革命之后还继续着发生。革命时期的立法中，没有限制或反对土地巩固的规定。关于这个问题从未颁布行过任何法令。不过在 1656 年 12 月 9 日，在国会中曾有一个议案提出，这议案就是关于节制公社土地之分割的。在培尔顿底日记中，关于这议案有这样一段记载：

“‘Master of the Rolls’ 是反对这议案的，因为不论任何议案，只要是牵涉到财产问题的。总是使他不高兴的。凡是本身包含有不合理的内容——强迫政府经过了第三者来确定财产——的议案，决不是好东西。曾经有一个时期，我几乎信托治安判事去决定牧牛的牧场，虽则我们现在的治安判事是很好的，但谁又能够担保以后的事情呢？”

“议案的发起人惠莱（Whilly）少校曾说过：‘与其说，我可以因这议案而得到些利益，无宁说，我将因此而遭受损失。因为我没有公社土地；我的所有的田地已经被筑过围了。这议案是以公众的利益为宗旨的：这即是防止人口之逃亡和增进人民对农业之兴趣。’要知道，农业是我们共和国的一种重大基础。议案的目的是要使政权不落在三个委员手里，而交给治安判事。”

“督惠尔先生说：‘在议会里所讨论过的一切议案中，这是最有害的一个。这议案将使人口逃亡，将使财产制度破坏。’



‘大家决定不再把这议案举行二读。大家把这议案否决了。’”

我们从培尔顿的日记中引证了这么长的一段记载，为的是指出，在当时的英国，对于以法律来限制土地巩固的办法有赞成和反对两种意见。在这两派人之间发生了斗争，我们的目的亦就是要来解剖这斗争的内容。反对以法律来限制土地筑围的人是维护土地所有主的利权的。他们的口号便是：不要干涉地主和公社农民间的相互关系。1664 年，又重新企图在众议院中通过一个“关于公社所有的荒地之改善和筑围”（to enclose and improve commons and waste lands）之议案。但这议案是以 105 权对 94 权被否决了。1666 年在贵族院中又提出了一个议案，企图批准那些根据公平法庭（IN courts of equity）之判决而兴办的土地筑围。但这议案在议院的委员会上又碰上了壁。

1696 年又提出了一个解释密尔顿法规和其它法规（都是关于公社土地之改善问题的）的议案，但又被否决了。这些立法企图都是反映当时英国各地的非法完成的土地筑围运动；这大概是无可否认的一种事实。17 世纪的出版物对于土地筑围也常有论及。仅仅描写这个土地筑围运动的轮廓是比较容易的，但如果要确定这一运动在每十年中的范围，强度和地域等那就比较困难了。

在英国革命时代，可以指出那几件重要事情来呢？1653 年 11 月 22 日的关于王室森林地及其出售办法的法令是以划定森林地和草地池沼等附属地（这原来是乡村居民所共同享用的）的境界，实行筑围，并保障这些田地的购买者的利益为宗旨的。森林地之筑围和改善被看作是助长公众利益和促成社会幸福的事业。在不久前施行筑围的公社土地均被豁免税捐负担。



一部份用以出售的森林地被解除了原来负担的一切义务约束，即是说，这些土地已经可以筑围，或挖掘，或转卖他人。另一部份森林地交与农民公社以抵偿公社原有的池沼草地等附属地之损失。如果这土地在两年之内，不为指定使用的各方所分配，那么接管国王的森林地的保护人有权利出卖这种土地（即留作公共使用而未筑围或分配的土地）的四分之一，出售所得代价归共和国所有。在给与森林地清丈人的指令中，曾规定了土地购买者和他的邻区的业主所应建筑的篱垣数目。1654年8月21日和30日以及1657年6月16日的保护法令是很有趣味的。因为这法令不仅扩大了应归公卖的森林地的面积，而且使田产之丈量和登记更为严格，这几次法令反映了争夺土地的斗争，亦可以说是为资本主义发展“肃清了道路”。委员们在实行查清时应详细地记明：有多少公社社员有权利享用公社土地；公社社员们每年要放逐多少牲口到这土地上来；有否侵占他人土地，建筑篱垣，新近的纠纷和冲突等事发生。篱垣是受依利萨伯王朝第43年的法规所保护的。根据这法规，“凡是破坏篱垣的人均将受罚”自从清理了“茅屋主”（Cottager）的利权，并查明了他们所付的地租以后，就规定了那一种茅屋应当保存，那一种茅屋应当拆除。

1649年至1659年间叔赛克司地方的王室土地的清单公布以后，证明当时的茅屋的确分为两种：一种是应保存的，有一种是应拆除的。

有许多耕地完全是人工的排水工作所开辟起来的。当革命时代，土地之筑围在这些地方，很为流行，同时围田主和当地农民的斗争也很激烈。这些田是在两个大区域中：一个便是约克希



耳、林肯、霍金哈姆的 Hatfield chase，另一个便是诺耳福克、雪福克、肯姆勃利支、与金登、霍姆浔泼顿等郡的大沼地（the great level of fens）。这些区域的排水工程有专门的公司管理，这些公司都得到共和政府之正式承认的。根据 1654 年 5 月 26 日的法令，凡是破坏水闸和沟渠建筑的须处罚双倍的损失费。我们从 1653 年 4 月 23 日克伦威尔的信件中可以知道，破坏水闸和沟渠的事情的确是存在的。

在这两个区域中，土地之筑围先经过排水等重大的准备工作，使这土地可以适宜于耕种。但筑围后所产生的利益完全为投资于这事业的垦植公司的股东所得，而当地的农民徒然丧失了池沼草地等附属使用地，但得不到半点补偿。

根据众议院和贵族议院所出版的公报上的记载，自 1641 年至 1643 年 6、7 月为止，在英国全国各郡中，就发生了 43 次农民骚动。这些骚动中间，有一大半是由于反对土地筑围而发生的。农民们拆毁了田里的篱垣，把牲口放逐到筑围的田里，破坏了侵占公社土地的筑围人的住宅。在前述 43 次骚动中，有 25 次是属于这一类性质的，即占总数 58.14%。所以英国革命初期的农民运动主要是反对土地之筑围。反对土地筑围的运动在革命时期的后半个阶段中，亦常发生。这在 1649 年至 1659 年的国务院的档案中可以看得出来。

革命时代的新的土地所有者坚决地铲除了乡村生活中的传统的秩序。考瓦立夫斯基曾举出两个实例：一个是罗脱兰特郡的事情，另一个是司泰福尔施尔郡的事情。在革命时代购买进的土地上，旧制度被破坏得很厉害。但是我们对于反对方面的运动，对



于农民拥护旧有权利的斗争，和他们反对土地筑围的斗争亦不可忽视。在革命时代的法院诉讼中可以看出，农民是拥护谷物经济的；他们很想把草地猎场统统都变作耕地；他们热心地去维护牧场，有时甚至去扩大牧场；当这些牧场被出卖掉了，或被禁止使用以后，他们便都激怒起来了。农民承认自己对于土地的权利是自古相传的权利。50 年代的危机引起了失业之发展，羊毛需要之减少，毛织物销售之减退和粮食涨价；这些都足以阻止土地筑围之发展。根据档案材料来解释这些事实，便是研究英国革命中的土地问题的当前任务之一。

三

《资本论》第三卷四十七章所指出的三种前资本主义地租在 17 世纪的英国以货币地租为最流行。至于力役地租和实物地租已经是很偶然的现象了。

货币地租之发展或者使“土地变为自由的，农民所有的财产，或者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态，变为资本主义的佃户所支付的地租”。

英国革命在前资本主义的货币地租的发展史上占有什么地位呢？马克思曾说，在货币经济时代，自有一部份土地并亲自耕种的直接生产者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传统的习惯法的关系必然地要变为正式法律所规定的契约关系，即变为纯粹的货币关系。然则英国革命时代，在这一方向有了什么进步没有呢？

在这里首先应该知道，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时代中，英国的货币地租是怎样一种东西。关于英国地租的性质，我们可以在国



会所颁布行的关于征收土地税的各种法令中，可以知道它的大概情形。在这些法令中把地租分为两种：第一种称为市场的地租，与土地的岁入相近；第二种称为轻地租，或称为小地租（easie or small）和已改地租。在第一种场合下，地税由地主负担；第二种场合下，地税由地主和使用者分担。犯法者被抄财产的清单也可以使我们了解货币地租的实质，因为在这清单中包括有简单的收入来源之登记。

在上述文件中，可以看出，这些地租带有很浓厚的古旧的和地方的色彩。我们可以说，在转形的货币地租和资本主义地租之间，存在许多过渡的形态。过渡期中的特征便是漫长的租期，和经常固定的低廉的地租。不过这低廉的地租有时亦因支付罚金（fines）而无形提高，有时则直接实行涨租。在犯人的收入来源中存在一种老地租（old rents）。这里说的老地租便是指前资本主义时代遗传下来的，经过了16世纪和17世纪的价格革命而仍未发生变动的，所谓“未改善的”低廉地租。在646张清单中，采用这种老租的130张，即占20.12%。所谓“改善的”地租所占地位应在老地租和市场地租之间。照实价计算的老地租的租额在英国各地并不一律。改善地租的租额，（即近于市场地租的租额）也不一律。这租额是为各种不同的原因所决定的。土地使用期间之长就是表示此种地租的古旧色彩。这里的租期总在二三十年以上。在文件中，我们发现好几次租佃期限为一千年。在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时代，地租的古旧色彩并非在全国各地都是同样程度的。在我们根据六四六份清单所编成的一张图表中，在东部各地完全没有老地租存在；关于老地租的各种材料都属于西部各郡。



我们如今再进一步来研究另一个问题，即英国革命对于土地关系中的这个主要部门（地租）发生了什么影响没有呢？我们从革命时代的土地立法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立法在好些场合中是反对古旧式的地租的。

根据 1646 年 11 月 9 日的指令，凡是存在旧的习惯地租而租期又是从 1641 年 12 月 1 日以前算起的地方，仅仅对于期限在 21 年以内的租佃契约是给以安全保障的。1649 年 4 月 30 日的法令（关于司祭长和僧侣会议的土地出售问题）亦系同种内容。但 1650 年 1 月 25 日的法令对这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很不确定的。根据这法令，政府委员有全权可以审查一切地租，租约及其担保，并且可发给准许状，如果这些条约都是双方自愿 (*bona fide*) 订立的，而且是在财产被扣押以前发生的。经过此次审查以后，政府代理人可以从被扣押的财产中赚取最大的利益。达到这目的的方法便是产除古旧的土地租种办法，并吸引新的人来租借土地。1649 年 4 月 9 日的法令提倡犯法者的被抄田地之租契期限不要超过三年以上。1650 年 1 月 25 日的法令核准所有租契年限不得超过 7 年以上。最后这个年限是比较地合理的，因为如果佃户们花费了钱去改良土地，那么他们在这一时期内，刚可以把所投的资本收还来。

但不仅是政府的代理人，而且就是地主本人（如果他因为支付补偿费而把土地购回了），以至于新的土地所有者都会施行同样的政策：即依照新的条件出租土地，以便赚取最高的利益。我们在这里可以举出几个代表新佃户的具体实例。有的佃户建筑了两个仓库；有的在租种的田地上筑围；有的购买了羊子；有的租种了九个采邑和三个猎场，有的租进了整个农场和打毛坊，土地等。有些佃



户往往是土地所有者的债权人；这种佃户被称为“财主”。这种新的佃户向地主提出更高的条件，以与原有的土地使用者竞争；粮食跌价，和商业萧条，在他们看来都是蚀本的事情。

他们的经济是建筑在纯粹货币的计算上的。勃然拉伊司是革命时代的资本主义农场主的意识代表者，他在自己著的英国的土地改良者（The Englosh Improver）中，极力主张颁布一条新的法令，使每个地主或者应该抵偿佃户在改善土地中所花的资本，或者应该延长租佃期限。他以佛兰特里亚地主的制度作为实例。

四

“在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上，凡是在资本家阶级形成过程中，起有作用的一切事变都带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那个被克拉立唐称为“大叛乱”（Gieit Rebellion）的英国革命，当然也是属于这一类的事变。马克思所谓资本原始积累就是指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那个过程；他告诉我们，随着生产者与生产资料之分离，不仅使土地转入资本家手里去，不仅铲除了一切封建的束缚关系，而且剥夺了生产者的生活保障，但在过去，他们的生活是有旧的封建的制度作担保的。

17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英国土地史之分析，可以使我们看到原始积累过程的各种不同的倾向和不同的形态。长期议会先曾颁布过出售主教田产的命令，后来又颁布命令出售司祭长和僧侣会议的田产。同时这长期议会又决定审查土地使用者的使用权，要后者在一定期间提供使用田地书面证明和其它种种充分证据。新的田主对于租佃契约，法院判决文之副本和田地使用者的



其它证明书——总之，对于教会田地的使用者用作使用田地之根据的一切证明书——是非常关心的，他（新田主）可以利用这些证明书去审查使用者的权限。凡是期限在 21 年代以上的租佃契约均被宣布无效。在 17 世纪的 40 年代，在长期议会的内容关于犯法者的土地出卖问题发生了争论。在 1651 年至 1652 年间根据长期议会所颁布的命令，把这种土地出卖了若干批。所以在革命时代，被查抄的贵族田产可以分为三类：（一）第一类田产已转入新地主的手里，这些新地主普通都是市民和军官，属于绅士先生们的较少；（二）第二类田产已归还旧的地主，因后者支付了若干补偿费，以显示自己对国王之忠诚；（三）第三类田产仍由政府代表人所保管着。在这三种场合之下，原来的土地利用者都处于不利的地位。

在第一种场合下，原来的土地使用者的田权将被重新审查；虽则在田产清单发表后 30 日之内，原来的使用者有购买此项田产之优先权，但这并不能在事实上帮助他们去购买土地。在第二种场合下，田产归还给旧的田主，使用者只能待之于土地之自动出售，待之于抵押借款；只能采用新的剥削形式，或者是采用精练的旧的剥削，以利用旧的束缚形式。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在 17 世纪的 40 年代或 50 年代，关于保护善良的土地使用者和反对地主的问题，曾屡次在议会中提出，但是议会中大多数议员是主张不干涉主义的，因此这问题终于未能通过。地主们的政策就是：要求收还未得他们的同意而支付与官产（被查抄的财产）委员会的地租；要把官家发的领耕证书变为租佃契约；要驱逐旧的使用者，而把新的，愿出较高的地租的新佃户代替他们，要强迫



佃户到地主田地上去做赋役劳动，当“佃户的作物因缺乏人手而在田里发芽”的时候；要实行森林之独占权；要求法院惩罚不顺从的佃户等等。在一次农民请愿书中，曾说道：“地主们滥用自己的权位破坏我们的一切旧有习惯，剥夺了我们原有的公平的权利；把苛重的负担放在我们肩上，这非但不是我们所能胜任的，也不是我们的田地所能胜任的；把我们变成了仆役和农奴，使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世世代代陷于贫困的境地。”地主政策的唯一目的便是增进自己田产之出息。为达到这目的便要使小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

至于留在政府代理人手里的土地，则完全出租于佃户，以征收“改善地租”。佃户们排挤那些支付旧的定额地租的原有的使用者。有时甚至把他们赶出了农场。就是土地在当地的委员会保管中的时候，使用者的地位也只能稍稍改善些，因为当地的委员会的政策亦想从田产中赚取最大的收益。

我们在上面所述的这种演变也波及到站在王室方面的贵族和教会的土地使用者。我们应当根据查抄田产的清单来继续研究这个演变过程，以释明这演变的详细内容和它的普遍程度。

17世纪50年代，关于王室土地和森林地之出售，曾颁布过好几次命令，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原始积累过程中的其它许多现象。例如，在那时候，实行审查“茅屋主”的权利，这种“茅屋主”是乡村中最缺乏土地的一部份居民。我们从叔赛克司郡的王室田产的清单中可以看出，经过此次审查后，拆除了猎场内的许多茅屋。乡村公社对于森林地的使用权也重被审查过。根据土地分配情形看来，此次审查又是有利于大畜牧场的主人的。农民



对于森林地之公有产权并未完全取消，但这种公有产权的经济平等的基础已被破坏不少。

农民们因争取森林地常发生群众的骚扰，这在 17 世纪 50 年代更为普遍。

在爱尔兰地方（发展中的英国资本主义的这个殖民地附属地），原始积累之进行更为猛烈。数 10 万人民被赶出了土地。在格林兰地方建立了英国的土地财产。这土地财产的代表人便是商人冒险主义者，军官和兵士。在 1652 年 8 月 12 日的法令中，便指出好几种等级的爱尔兰人；这中间有的已完全失去了土地，有的已失去了自己的田产之 $2/3$ ，或 $1/3$ 至 $1/5$ 。詹姆士在自己著作的“Social Problems of the Puritan Revolution”中，曾指出伦敦及其近郊和全国各郡中，穷人数目之增加。他认为此种贫困是旧的中央的和地方的行政机关破坏之结果，这些机关在多铎尔和斯图亚特王朝时代是很关心于穷人的生活的；他认为此种贫困是内战后全国破产所造成的结果。但我们认为 17 世纪 40 年代至 50 年代，英国的贫困化之扩大是与当时英国乡村生活中的演变有直接关系的。

1662 年关于接济穷人的法令中，曾提及伦敦范围内，和整个英吉利威尔斯王国境内的穷人数目之增加。但这时候，已经离开内战时期很远了。这怪不得“穷人的维护者”的作者张伯伦要提议，把王室的和教会的土地收归国有，并拆除田间的篱垣以改善穷人的生活。

五

土地法是 17 世纪英国民法中的重要部份之一。这土地法是



以习惯法——各个采邑的法律——和一般的公法合组成的。这两种法制（地方的法制和全国的法制）之对立，陈腐的内容，已死亡的制度和新兴制度之矛盾结合——这些都是这土地法被人攻击的理由，这便引起各种法律改革案（有的主张全部废除旧法，有的主张局部的修改）的原因。

法制改革问题好像是小议会中的主要的工作对象。在起草计划的时候，曾预备取消土地使用者的一切旧的束缚，但实际通过的仅仅承认了使用者使用土地的权利，（如果他是以某个个人的名义出面的。）曾取消了无理的罚金，但代之而起的又实施了不得超过一年租额以上的罚款。对于田地借款之清偿实施了担保办法；规定一切土地契约之缔结必需正式登记。这些政策都是十分不彻底的，所以英国的土地法离开彻底的资产阶级立法尚是很远。

但是整个这些改革案，终于成了一个漂亮的企图。英国革命未能建立新的民法，如像它未能取消国立教会所收的什一税一样。昂格斯曾说，英国立法改革“保持着许多旧的封建立法的形式，但在这封建的形式中灌进了资产阶级的内容，甚至在封建的名称下，直接插了资本主义的解释。”发生此种奇异现象的原因就是由于英国的商人已变成了土地所有者，而封建的土地所有者也已经变成了商人。这两种有力的等级不需要资产阶级社会的模范的法典，他们已经在“封建的名称下，直接插了资本主义的解释。”这便是英国的土地法发展之最大特点。



苏联历史科学阵线上的几个重要文献^{*}

在下面发表的几个文件中，第一个是说明了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党中央审查历史课本的经过情形，和今年人民委员会和党中央对于改编历史课本的具体决定；第二第三个文件是 1934 年党政领袖对于两个历史课本——《苏联史》和《新历史》——的提纲批评。第三个文件都公布在今年 1 月 27 日的《消息报》和其它各大报纸和杂志（2 月号）上。这几个文件展开了苏联历史学界的新局面，指出了历史科学应走的道路，所以这对于历史科学的发展实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苏联编制历史课本时，对于弱小民族史的注意也足以反映出弱小民族在这个新国家中的地位。同时，从这几个文件中也可以看到苏联党政当局及其领袖们不仅是新国家的组织者和经济建设的领导者，而且是学术界的权威；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他们不仅是对于学术关心而已，并且在必要时能够把陷入了泥坑的学术界拯救出来，安放在健全的基础上（前数年经济学界的烦琐的论争也因于党政领袖的有权威的指示而结束的）。第一个文件中更谈及 1934 年 5 月 16 日人民委员会和党中央“关于苏联各学校中教授公民史的决议”，可惜我们已无

* 原载《新世纪》1 卷 2 期，1936。6。



从找到这决议，不能把它介绍给读者，好在这决议的重要地方已经摘录在第一个文件中了。

我们希望根据这些新的指示而改编过的历史课本，能早日出版，并早日介绍给中国的读者。

一、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党中央的指示和决议

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党中央委员会，因为觉得把学校中教授公民史的问题适当地提出来，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所以，早在 1934 年 5 月 16 日就公布过一个“关于苏联各学校教授公民史问题的决定”，这是大家已经知道的。在这决定中，人民委员会和党中央（以下简称他们——译者）确认苏联各学校教授历史课的情形不能使人满意。他们断定历史课本的缺点和教授方法本身的缺点就在于它们的抽象性和公式性：“教授公民史不会有活泼的具有吸引力的形式，各种最重要的事件和事实的叙述不会按照它的历史的年代的次序，对于历史上的活动人物不会有批评和估计。对于学生们只给了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抽象和定义。于是就把抽象的社会学的公式来代替了公民史之有系统的叙述。”（摘自 1934 年 5 月 16 日人民委员会和党中央的决定）。

他们曾经指出：“使学生们牢记并领略历史课程的决定的条件就是在于叙述历史事件的时候，应该遵守历史的年代的次序，并且必须使学生的记忆中深印着最主要的历史现象，历史人物和年月日。只有这样的历史课程才能保证学生所必要的历史唯物论易于被接受，并且能够一目了然而具体化；历史事实之正确的分析和正确的报道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面才有可能——而这种正确



的分析和正确的报道是能够使学生走向卡尔主义的历史见解的。”

为着适应这种需要，所以就更进一步决定在 1935 年 6 月以前，准备编辑下列几种新的历史课本：

A. 古代史；B. 中世纪史；C. 新历史；D. 苏联史；E. 非独立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历史。

他们决定组织了五个小组来编这些新的课本，并且批准了各小组的人选。

早在 1934 年 6 月 9 日，他们就决定在初级小学和不完全的中等学校中，增添苏联基本历史一课，并且组织了若干小组以编制苏联基本历史的课本。

1934 年 8 月 14 日他们又通过了一个决议，赞成斯大林、基洛夫，和时达诺夫等所提出的，对于《苏联史》和《新历史》这两个新课本的提纲所给与的指示。

在这指示中，对于这两个提纲做了详细的分析和严厉的批评；而且同时又断定《苏联史》的提纲是做得最不能使人满意的——因为在这提纲中，确是充满着许多未成熟的，从卡尔主义的观点说来是缺乏常识的定义；这提纲犯着完全未加检点的毛病，这种毛病在编制课本时是最不允许的，因为“在课本中，是每个字每个定义都要秤份量的。”《新历史》课本的提纲也犯有很大的——虽是数量较少的——毛病。

斯大林、基洛夫，和时达诺夫的指示尽情地指出了提纲和编制中的课本所应认定的方向。但是，他们不得不承认这次交于他们审查的几种历史课本，大半仍旧不能使人满意，而且犯着上面所说的同样的毛病。其中伐那格教授一组所提出的《苏联史》的



课本以及明茨和洛静史基教授一组所提出的初级小学用的《苏联基本史》的几种课本是最不能使人满意。上述几种课本的著者，他们对于党已屡次揭露过而显然不能成立的种种历史的定义和编制法（这些定义和编制法都是根据卜克洛夫斯基的错误而来的）仍旧继续坚持着——因此他们不得不承认，这种事实完全是下列局势的佐证：即在苏联某些部份的历史家中间，特别是编制《苏联史》的学者中间，那种反卡尔主义和反伊里奇主义的观点，即实质上也就是对于历史科学抱着取消主义，和反科学的观点，是已经生着根了。他们强调地指出：这种想取消历史科学的倾向和企图首先是跟所谓“卜克洛夫斯基历史学派”所持有的错误的历史学见解在苏联某些历史学者之间的流饰有联系的。他们指出：克服这些有害的见解是编制历史课本的必要前提，也是发展卡尔伊里奇主义的历史科学和提高苏联的历史教育所必要的前提——而这些对于我们的国家事业，对于我们的党的事业，以及对于教养那些发育中的后代都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

因此，他们“为了审查和根本地改善现有的历史课本——必要时甚至改编现有的历史课本——起见，设立一个人民委员会和党中央委员会（这是由他们共同委任的——译者）。这委员会的人选是：时达诺夫（主席）、拉狄克、史樊尼席、考林、罗根、耶谷甫立夫、培司脱良斯基、闸东斯基、发衣乍拉、霍特若也夫、巴乌曼、蒲勃诺夫和布哈林等人。这个委员会有权力设置若干小组以审阅各种课本，同样也有权力举行新课本的竞赛，以代替委员会所认为必须根本改编的现有课本。第一批应予审查的课本是关于苏联基本史教程的课本和关于新历史的课本。”（这就是



他们于 1936 年 1 月 26 日正式公布的决议，末了曾由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和党中央书记斯大林签过字。)

同样，他们又决定把斯大林、基洛夫和时达诺夫三人的指示以及关于这问题的其它种材料在出版物上公布出来。

二、对于苏联史课本提纲的指示

伐那格一组没有完成任务，甚至还没有了解任务的本身。该组所拟的是《俄罗斯史》的提纲而不是苏联史的提纲——就是说，这是罗西（俄国之旧称——译者）的历史，而没有包括苏联各个民族的历史。（没有顾到乌克兰、白俄罗斯、芬兰和其它沿波罗的海诸民族，中亚细亚和远东诸民族，以及伏尔加流域和北部诸民族——鞑靼、巴希勾耳、毛尔特夫、丘代希和其它各民族的历史资料）。

在提纲中，没有强调俄罗斯沙皇制度，以及俄罗斯布尔乔亚汜和俄罗斯地主的领土侵略和殖民地侵略的作用（“沙皇制度是各民族的牢狱”）。

在提纲中，没有强调从卡德林娜二世起至 19 世纪 50 年代以后为止的时期内，俄罗斯沙皇制度在对外政策上所尽的反革命作用（“沙皇制度是国际的官兵”）。

在提纲中，把封建制度和农民还未曾被束缚住的前封建时代搅成了一团，把专制政治的国家制度，和俄罗斯还分裂为无数独立的半国家的封建制度搅成了一团。

在提纲中，把反动和反革命，“一般的”革命，布尔乔亚汜的革命和布尔乔亚汜德漠克拉西革命等概念乱七八糟地搅成了一团。



在这提纲中，没有把沙皇政府所征服的俄国各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条件和泉源指示出来。于是要把十月革命作为使这些民族从民族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革命，就变为没有根据的了；同样，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建立也将成为没有根据的了。

这提纲充满了陈腐而惯用的定义：如“尼古拉一世的警察恐怖”，“拉浔党徒”和“蒲卡曲夫党徒”（拉浔和蒲卡曲夫都是俄国历史上农民运动的首领——译者），“19世纪70年代的地主反革命运动的进攻”，“工农改革的初步”，“沙皇政府和布尔乔亚犯在反对1905年——1907年革命的最初的步骤”，以及其它等类似的定义。

这提纲的作者抄袭了各派布尔乔亚犯历史家的陈旧的和完全未成功的定义，忘记了他们自己应该以卡尔主义的，科学上有根据的定义去教授给我们的青年。

提纲没有反映出西欧布尔乔亚犯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对于俄罗斯形成布尔乔亚犯革命运动和普洛社会主义运动所发生的作用和影响。俄罗斯的革命家曾经是以西方的布尔乔亚犯革命思想或卡尔主义思想的许多著名的倡者的弟子和信徒自居的。这一点，提纲的作者显然是忘记了。

在提纲中没有估量到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源和沙皇政府在这战争中的作用——即是为西欧帝国主义列强充当后备军的作用；同样也是没有估量到俄罗斯沙皇政府以及俄罗斯资本主义受制于西欧资本的那种附属作用。因此十月革命使俄罗斯从自己的半殖民地位中解放出来的那种意义也就成为没有根据的了。

在提纲中，没有估量到世界大战之前，全欧洲的政治危机之



存在。这个政治危机的表现就是布尔乔亚汜德谟克拉西和议会政治的衰落。因此，从世界史的观点出发来观察的苏维埃的意义（即把苏维埃当作普洛德谟克拉西的寄托者和工农脱离资本主义束缚而获取解放的机关）也成为没有根据的了。

在提纲中，没有顾到苏联在党内部各派别的斗争和反对脱洛茨基主义的，即反对小布尔乔亚汜的反革命活动的斗争。

诸如此类的缺点真多得很！

一般地应该说一句，这提纲是写得缺少检点的；而且从卡尔主义的观点看来，是缺乏常识的作品。

至于这提纲的许多不精确的语调，和玩弄“文字”的地方，如把伪特米脱里改称为“所称的”特米脱里，又如“18世纪间旧封建诸侯的凯旋”等语句（可是，如果在这时期内另有“新的”封建诸侯存在，那么这些诸侯后来到底如何结尾的，他们的行动又是怎样的），我们却无从知道以及其它许多地方，我们不必去讲它了。

我们认为必须把这提纲依照上面所说的原则，根本改造过；同时在这里应该估计到的就是：我们所讲的是课本的编制问题，课本中的每一个字和每一个定义都是应该秤一秤份量的；这不比那种可以不负责任的杂志论文，（在那里是可以不管责任心而趁心所欲地随便谈论任何问题的）。

在我们所需要的《苏联史》课本中，大俄罗斯的历史是不跟苏联其它民族的历史相分离的，这是第一点；第二，苏联各民族的历史是不能跟全欧洲的历史和一般的世界史相分离的。

（1934年8月8日，斯大林，时达诺夫，基洛夫签字）。



三、对于新历史课本提纲的提示

因为新历史是内容最丰富而且充满着无数事件的历史，又因为在布尔乔亚各国的新历史中（如果以俄国十月革命以前的时代而言），最主要的事情是法兰西革命的胜利和资本主义在欧美二洲之确立——所以我们觉得新历史课本最好以法兰西大革命这一章开头。为要跟以前的事件发生联系起见，可以在前面放一个小小的导言，以便简单地叙述尼德兰革命和英吉利革命中的主要事件，而把尼德兰革命和英吉利革命中的各种事件的详细叙述移到中世纪历史课本的末尾去。这就是说，我们提议把提纲中的第一部份（共六章）删去，也即是把整个第一篇删去而代以简略的导言。

我们认为这提纲的主要缺陷，是在于它没有充分锐利地指出法兰西革命（布兰乔亚汜革命）和俄罗斯的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差别和对立性的深刻程度。可是关于布尔乔亚汜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对立性的观念恰正是应当成为新历史课本的基本的中心思想的。指出法兰西的（以及任何其它国家的）布尔乔亚汜革命把人民从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的锁链下解放了出来，同时又给人民锁上了另一个新的锁链，即资本主义和布尔乔亚汜德谟克拉西的锁链；可是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打断了任何一切的锁链，是把人民从一切剥削形态中解放了出来——这应该是成为新历史课本的基本思想的。

因此，不能把法兰西革命简单地用一个“大”字去形容它，而应该把它称作布尔乔亚汜的革命。

同样，也不能把我们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简单地称作十月



革命，而应该把它称呼并解释为社会主义的革命，或苏维埃的革命。

要与此相适应着去改编新历史课本的提纲，并采用适当的定义和术语。在提纲中是把新历史划分为两个部份。我们认为这是缺乏充分理由的，而且是偶然的划分，这是依照任何种不可了解的标志去划分的。我们认为比较适宜的办法是应该把新历史划分为三部份：

第一部份——从法兰西的布尔乔亚汜革命起到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为止（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不包括在内）。这是先进各国中资本主义胜利和确立的时期。

第二部份——从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起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帝国主义大战结束为止（十月革命和大战结束包括在内）。在这时期里边，资本主义开始衰落，资本主义从巴黎公社受到第一次打击，旧的“自由的”资本主义已转长成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在苏联是被十月革命——创造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的十月革命——的力量所推翻了。

第三部份从 1918 年终（大战结束的一年）到 1934 年终为止。这在资本主义各国是战后的帝国主义时期，是这些国家遭遇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时期，是法西主义的时期，是夺取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斗争加强的时期，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在苏联，这是国内战争和外国的武装干涉的时期，是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开始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期，是苏联的胜利的社会主义的建设时期，是铲除最后的资本主义残余的时期，是苏联社会主义工农的胜利和高涨的时期，是社会主义在乡村中的胜利时期，是集体农场和苏维埃农场的胜利时期。我们认为提纲作者把历史中断于 1923 年是很大的错误。



这错误应该把它纠正过来，应该把历史延到 1934 年为止。与此适应着就应该把材料和节目的分配重新改编过。

最好把这提纲从旧的陈腐的字句——如“旧秩序”，“新秩序”等等——中解放出来。如果把“前资本主义的秩序”这用语来代替“旧秩序”那就比较好一些了；但是如果把“专制政体的封建的秩序”来代替它，那就更好了。至于“新秩序”这用语，就应当用“资本主义和布尔乔亚汜德漠克拉西的秩序”来代替它。把用语这样改变之后，那么就是所谓“新秩序”，即资本主义的秩序，在跟那个代表人类社会构成的最高典型的，苏联的苏维埃制度比较起来，也就自然成为旧的秩序了。

同样，最好把这提纲从过多的“时代”中解放出来。“总督府时代”、“拿破仑时代”、“执政府时代”——这样，时代不是太多了吗？

在提纲中，殖民地问题所估的地位是狭小得太不相称了，我们觉得这是不正确的。对于霞时·石恩特、施兵拜立尔、基泼林格等讲得很多，可是对于殖民地问题如中国这样的国家的情形却是讲得很少。

最好把“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结合”这个标题改为“德意志和意大利之统一而为两个独立的国家”。否则会使人得到一个印象，以为这里所说的不是指德意志和意大利这两个原来分裂的国家的统一斗争，而是说这两个国家之结合为一个国家了。

据我们看来，从大体而言，《新历史》课本的提纲是比《苏联史》课本的提纲要写得好一点，然而就是在这个提纲中，乱七八糟的地方仍旧很多。

(1934 年 8 月 9 日，斯大林、基洛夫、时达诺夫签字)。



苏联的经济建设^{*}

一 导 言

1917年11月7日，正当俄国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被颠覆的那一天，有一个孟什维克党人洪堡向美国社会党新闻记者约翰·里特说过：“……这有什么，布尔什维克党人或者是会取得政权的，可是他们三天都维持不了。他们没有管理国家的人材。最好让他们去试一试：他们自然会坍台的……”（约翰·里特著：《震动世界的十天》）。然而，三天过去了，三星期，三个月过去了，初次握取政权的革命民众，不仅没有坍台，而且把国家管理得好好的：他们在短短的时期内，居然创造了一个世界上最新的政权形式——苏维埃政府；这政权而且正在一天一天地巩固起来。

于是从前主张“让他们去试一试的”，希望他们自己坍台的人们，如今有些焦急起来了，他们知道这个新政权是不会自然坍台的。他们便在外国帝国主义的直接援助之下，发动内战，企图推倒新政府。在1918年初，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已处在外国的武装干涉军和白党的反革命军重重包围之中。然而被反革命者视

* 原载大众文化丛书，单印本，1辑24种，1937，1。



为不会管理国家的人物，不仅显示出了他们管理国家的才能，而且更证明了他们是天才的军事领袖和军队组织者。1918年新政府以工人和贫农出身的份子为基础，组织成了正式的军队——工农红军；这军队经过了四年英勇残酷的斗争，战胜了14个国家底武装干涉，消灭了无数反革命将军的军队。他们凯旋了。于是那些希望新政权“自然会坍台”的人们失望了。

1921年初新政府得到了军事上的胜利之后，接着就取消了内战时为集中财力（尤其是粮食）应付战争需要而采取的军事共产主义制度，颁布新经济政策；在政府统制之下允许私人企业存在和市场活动。全世界资本家莫不额手称贺；他们说，共产主义到底自己坍台了，布尔什维克党人不得不自动地向资本主义经济投降了。

然而，没有好久，他们又第三次失望了。新经济政策的采用不过证明了：新政府把作战阵线从战场上移到市场上来了。新经济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让步；然而这让步只是新的另一种形式的进攻的开始。在整个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主义的经济部门（国家经营的和合作社的经济）不断地巩固起来，私人的经济不断地被排挤着。到1928年时代，苏联地经济大体上已经恢复到了战前水准，在若干重要部门中并且已经超过了这水准。这时苏联已经从经济复兴期而转向经济改造期了。社会主义经济部门的任务已经不是排挤私人的经济，而是根本铲除私人经济了。伟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在这一年提了出来。

全世界各国的资本帝国主义者所希望的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计划，像梦一般消逝了。因此，他们咒诅着这五年计划的出现，他们抓住了苏联经济发展中的每一次波折，便把它说得像天



样大的难关。他们预言着，苏联的“经济冒险政策”的失败。

在 1928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发表以后不久，便有一位德国的教授宣布说“其实就是能够完成了这五年计划四十分之一也已经是了不起的奇迹了，然而这完全是一个乌托邦呀！”

可是被教授所视为四十分之一都不能实现的五年计划竟在四年之间完成了。接着一个规模更伟大的第二次五年计划又出现了，这计划如今正在胜利地进行着。

铁一般的事实在最倔强的敌人都低头了。美国的大富豪都承认苏联已经从革命前的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而变成一个伟大的工业先进国度了。法国的陆军参谋总长都承认苏联的陆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力。国联卫生部的官僚们都承认苏联人民是享受着世界上最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

不过，铁一般的事实在富豪们和将军官僚们承认它；但是这些富豪们和将军官僚们却保留有解释这些事实的全部自由权。他们可以依照有利于自己的方法来解释这些事实。在他们看来，苏联经济建设成功秘诀似乎仅在“节衣缩食，埋头苦干”而已（这解释另一面就说资本主义国度里的雇佣奴隶们还不够苦，他们应该把衣食消费便减少一些，以便为资本主义建立繁荣的局面），在他们的解释中，似乎那个跟资本主义各国根本不相同的苏联的社会经济机构本身，对于这成功是没有一点关系的。

不用说，这是曲解了事实，每个敢于向真理直视的人们都不会不承认苏联的特殊的社会经济机构是苏联经济建设成功的主要原因。所以，我们在谈到苏联经济建设的时候，首先就应该来分析苏联的社会经济机构特征。



其次，我们要进一步谈到苏联经济建设具体情形的时候，当然就脱离不了统计数字引用。统计数字是表示经济发展的最客观的材料。如今世界各国的报纸和杂志上也都充满着关于苏联经济发展的统计材料。我们如果把这些数字——即使是最重要的总数——统统搜集拢来，那么非但我们这本一两万字的小册子里容纳不下，主要是把这册子扩大到一二十万字的一本巨著也没有办法把它们容纳下去的。

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把五年计划的所有统计统统引证来了，亦不能使我们了解苏联经济发展地全貌。譬如我们说，1935年期间，苏联一共出产了1252万吨钢，2510万吨煤油。这两个都是很具体的数字，然而这数字还不足以使我们对于苏联的五金工业和煤油生产规模有一个明切的概念。但是如果我们说，现今苏联工业生产在全世界是站在第二位（次于美国），而在欧洲方面是站在第一位，那么这里虽没有具体的数字，却是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知道苏联在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地位。

然而，如今每一个研究苏联经济的人所要了解的主要问题却不是苏联目前的经济势力（我们知道，关于苏联经济势力地发展，连资本家帝国主义者都已经承认了），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苏联经济制度的优劣问题。仅仅说现今苏联已经占有世界工业生产第二位和欧洲第一位，还并不足以证明苏联经济制度优点，反转来说，这正是证明了苏联的经济制度还不如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它到底还没有赶上那个资本主义制度健者——北美合众国（例如1935年苏联的煤油生产量虽然只次于美国而占了世界的第二位，但是全年一共只产2500余万吨，跟美国的1.42亿吨



的产额相差还很远）。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了 1935 年的苏联经济现状之后，再回过头去看一看前几年的情形，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在 1928 年时，苏联在世界工业生产中还是只占着第五个位置。这就是说在不到十年的短短的时期中苏联已经赶过了欧洲三个最先进的工业国家（英、德、法）。根据这样的发展速度，在不久的将来，世界第一富豪的美利坚合众国也就要成为经济的落伍者的。这样的打破历史记录的发展速度，就不能不说这是那个新的社会制度的优点了。

所以，我们在分析了苏联社会经济机构的特征之后，接着就来分析苏联经济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和每个阶段中的经济政策地内容，最后才对于苏联建设现状做一个最概括的叙述，并且指出它最近的前途。

因此，这本薄薄的小册所牵涉的问题确是很多，我们对于其中每一个只能给与一个最简略的说明。

二 苏联的社会经济机构的特征

当我们来说明苏联的社会经济机构的特征之前，我们应该先来说一说商品资本主义经济机构的内容。因为苏联的社会经济机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躯壳中生长出来的：我们明白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机构之后，就更容易理解苏联的社会机构的特征。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每个商品生产者所制造的生产品是供给社会上其他人的需要的，也就是说，每个商品生产者为着社会而服务，他的生产是带有社会性的。这一点是商品经济跟其它一切社会形态相同的地方。但是商品经济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制的基础上的，



每个商品生产者以自己私有的生产资料（工具，原料等），独立地经营着生产，生产的结果是生产者的私有物。生产者不能白白地把自己的生产品交给消费者享用，消费者必须拿了同等价的生产品或货币去同他交换，否则生产品跟消费者便永远不会联起来的。所以在商品社会中，生产的社会性（每个生产者都是为供给社会的需要而生产）跟生产的私有形态（每个生产者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结果）发生了直接冲突，为社会而生产在表面上便成了为市场（为出卖）而生产。这是商品经济的第一个特征。

另一方面，在商品经济中，每个商品生产者虽然是为社会而生产的，可是社会并不会给他们任何指导。他们所生产的东西，社会是不是需要，生产的数量是否过多抑是太少——这在生产者没有拿着自己的商品跨进市场的时候，谁也不会预先知道的。因此建筑在私有财产制度上的商品生产是一种盲目的无政府状态的生产。这是商品经济地第二特征。

生产的社会性跟私人占有的矛盾使消费跟生产分裂了开来，而无政府状态的生产又时常使商品经济失去平衡——在这里，就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的胚胎。

自从单纯的商品经济（即是以交换其它使用价值为目的的小商品生产者的经济）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即是以取得利润为目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后，庞大的生产资料成了少数资本家的独占的私有财产，而生产者是成了除开自己出卖给资本家的劳动力以外，什么也没有的无产者。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迅速地扩大着，但是同时，人民大众的消费力（购买力）却是被他们的收入（工资或薪金）所限制着



的。资本家希望大家多多地去购买他的商品，可是他不愿意多付一个铜元给工人。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购买力的被限制成了一种不可调解的矛盾。于是经济危机的爆发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

市场上充满了买不掉的商品，物价一天一天地惨落下去，以至于剥夺了资本家的利润。但是利润是资本家生产的唯一目的（这是资本主义经济跟单纯的商品经济，即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的经济根本不相同的地方）。如果资本家得不到利润，那么他就宁可把工厂停闭起来，甚至把已经生产好的生产品设法销毁掉，以企图减少市场上的过剩商品，以提物价。至于工人是否要因此失业饿肚子，社会生产是否要因此遭受损失是资本家所不管的，而且站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上，是谁也没有权力去干涉他们的。

这种矛盾的现象在为帝国主义时代更加显明，财政资本的垄断组织（如托拉斯、新提嘉、卡德尔等）为要维持自己高度利润，它们就限制着生产地发展。一切新的技术发明，只要不能为资本家创造利润，那么即使它是很有价值的，是能够节省人类的劳动的，也只能永远被收买去锁在保险箱里搁起来。资本主义已经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生产力已经对它揭起了反叛的旗帜。

以上是讲商品资本主义经济机构地特点。然则苏联的社会经济机构是怎样的呢？

最近公布的新宪法草案第一章第四条载明：“颠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废除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以及消灭人与人的剥削制度的结果，所确定的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以及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构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的经济基础。”同章第六条：“土地、地下的富藏、水、森林、工场、工厂、石炭坑、矿山、水上和空中的交通机关，银行、电信机关、国家所组织的大规模的农业企业（苏维埃农场，机器曳引机站和其它，）以及都市和工业中心的主要住宅都是国家的所有物，即全人民的财产。”

所以，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在苏联已经被取消了，一切生产企业直接或间接地受中央政府节制；全国生产完全依照中央政府（即人民委员会）之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指示而进行着。全国应该生产多少粮食、多少原料、多少日常生产用品、多少机器、多少交通工具，——凡是这些问题都有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精确的统计材料所编制的详细计划规定好的。这个国家计划委员会就好比经济建设中的总参谋部，它的任务就在于研究并规划全国经济建设计划，而中央政府所属的各个“人民委员部”^① 也就是经

① 在苏联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之下，除了国民经济没有直接关系的苏维埃监察委员会、艺术事业委员会、最高学府事业委员会和国防外交、内政、司法、保健等五个人民委员部以外，其余大多数的委员会和人民委员部都是国民经济中各部分的最高管理机关，如：
国家计划委员会；
食粮储积委员会；
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
陆路交通人民委员部；
联系人民委员部；
水上交通人民委员部；
重工业人民委员部；
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
轻工业人民委员部；
木材工业人民委员部；
农业人民委员部；
谷物和畜牧苏维埃农场人民委员部。
财政人民委员部
国内贸易人民委员部



济建设中的各路总指挥部，它们的任务便是在指挥直属的生产部门去完成总参谋部（国家计划委员会）所规定的作战计划（经济建设计划）。这些人民委员部就是各个经济部门中的最高管理机构，每个经济部门中的每个企业的活动应该完全直属人民委员部的支配。因此，苏联社会经济机构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生产（非无政府状态的生产）。

不错，在今日的苏联，仍旧还保持着商品交换，工资，利润等名目。但是这些范畴的内容跟资本主义社会的完全不相同的。苏联的商品交换只不过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持一种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分配方式。工资和利润已经不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一种形态，因为在苏联，资本家已不存在了，工人们自己已经成了工厂作坊的主人。所谓利润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增进人类福利所必须的社会财富的积累，而所谓工资也不过是社会生产品总量中供给劳动者私人消费的那一部分生产品。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生产效力（生产率）的发展只是增加了资本家的收入，而劳动大众是永远处在贫困的境况中的。在苏联，劳动生产效力的发展就可以相应地增加工资，因为在这里除了扩大生产所必须的积蓄以外，全部生产品都是用于供给全体人民直接消费的。例如在 1930 年每个产业工人的工资为 991 卢布，在 1933 年增加到了 1519 卢布，即是差不多增了二分之一以上（事实上，因于这时期中物价的一般的低落以及社会保险事业和文化设备——医院，托儿所，图书馆等等——的扩大，工人的实际工资尚不只增加二分之一）。工资增加得这样快当然决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做得到的。



因为劳动在苏联还没有从生活的手段而变为生产的需求，因为智识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还没有完全消灭，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程度，所以在劳动生产资料的分配在表面上仍旧取工资的形式，而且各个劳动所得的工资仍旧有高低大小的分别，所以目前苏联还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社会，即是说，大家有按照自己的能力而劳动的平等义务，有按照自己的工作而取得报酬的平等权利。不用说，熟练劳动和简单地报酬的差别在苏联已经不像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厉害，而且这种差别是在一天一天地减小起来。

因为苏联的生产是有计划的生产，所以，决不会像商品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样，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率会失去平衡（如某一部分的生产品感觉到缺乏，而另一部分生产品又感觉过剩），即使偶一失去了平衡，也可以有计划地自觉地来调节它，而不会像商品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样遭受种种无为的损失（商品跌价、破产、倒闭等）。又因为苏联的生产以直接增进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产为目的而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所以生产力的发展不受利润限制，而大众的消费力也不受购买力所限制。生产品增加了，就可以用自觉的和有计划的减低价格和增加工资的办法来扩大人民地消费。在苏联，决不会像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样，一方面会有饥饿的劳动者，而另一方面有找不到买主的粮食。利润既不是生产的目的，也就不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束缚。新的机器的发明，只要是能够节省人类的劳动的，那么这机器就马上被社会采用了，至于这机器之采用是不是会增加利润，是不是要造成生产过剩等等问题是决不会放在考虑之中的。



此外，因为在苏联，没有剥削存在。劳动者不是为剥削者做工，而且是为自己，为着社会而劳动。为剥削者做工，做多好只是增加了剥削者的财富，自己是没有份的，而且要听雇主的指挥，自己完全失去了自由。为着自己，为着社会而劳动，那么劳动愈多，就愈能增加全社会地福利，自己就愈被大家所尊重而成为劳动英雄。同时，在苏联，劳动者自己就是工厂和农场的主人，他们在工作中有尽量发展自己的才能的机会。在这种条件下，劳动的效果当然远胜于资本主义社会。最近的斯泰汉诺顿夫运动就是这种优点的具体表现（关于斯泰汉诺夫运动，我们放在末一段详细谈）。

因为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使生产本身也合理化了，最显明的例子便是生产力的分配。譬如在革命前的俄罗斯全国工业的主要部份都是分配在中央工业区域——即彼得堡和乌克兰的。在 1912 年时，全俄工业的 66.2% 是集中在这两个区域中，而在地域广大的东部（包括乌拉尔和中亚细亚，以面积而论比上述的二区要宽大数十倍，）只占有 8.2% 的工业。并且就是在工业区域的内部，生产力的公布也是很不平衡的，例如在彼得堡区中。95% 的工业是集中在彼得堡城（即现今的列宁格拉特）的。

俄罗斯纺织工业的原料出产地是在中亚细亚，可是纺织工业的中心是在俄罗斯中部，即是说，把棉花运到工厂中去，要经过四千里路的路程，把棉花制成生产品以后，又有一部份仍旧要经过同样的路程运回中亚细亚去。譬如 1912 年时，全俄机器制造业的 64.4% 是集中在旧工业区，可是生铁的生产在这区域只有 4.2%，钢的生产只有 8.6%。



这种不合理的生产力分配完全是帝制俄罗斯时代的必然产物，这在一方面是受帝俄的民族政府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是受盲目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决定的。

在革命后的苏联，新工厂的建设完全打破了这种限制。如今许多新的大规模的纺织工厂已经在中亚细亚建立起来，而乌拉尔早已成了苏联的第二个重工业中心。

这种合理的生产力分配对于生产之发展自然是一种新的推动力，但是毫无疑义的，这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废除以后才能实现。（例如在资本主义的法兰西，五个工业省份的面积占全国总面积十七分之一，可是集中了全国工业生产的一半左右。）

在最近这次新世界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义世界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逃出了那个厄运，可是苏联的经济建设在这时期却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这里就已经显然证明了这种社会经济机构的优劣。

但是苏联的新的经济制度是以十月革命后的新政权为保障的。没有十月革命便不会有新的政权产生，没有十月革命后三年间国内战争的苦斗肉搏，新政权便不得巩固，新的经济制度也不能发挥其效能。所以赞美苏联的经济制度，便不能否定十月革命和这革命所建立的政权，否则也就等于赞美蔷薇花而要斩除它多刺的树干一样，是一种不智的行为。

苏联的新政权的实质如何呢，新宪法草案第一章第一条载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工人和农民的国家。”

同章第二条载道：“由于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颠覆和普罗列塔利亚特政权的获取而生长并巩固起来的劳动者代表会议（苏维埃）便是苏联的政治基础。”



第三条载道：“在苏联，一切政权属于都市和乡村的劳动者，即属于劳动者代表会议。”

三 苏联经济建设的几个主要阶段

在上面，我们已经说明了苏联的社会经济机构的特点，说明了它跟商品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机构的区别。

如今，我们就要来谈一谈苏联经济发展所经过的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即是说，我们要来谈一谈，今日苏联的胜利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怎样的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奋斗出来的。我们只有明白了这一段历史过程之后，才能彻底了解目前的苏联经济建设的全面的意义。

A 新政权的建立和军事共产主义

革命前的俄罗斯是欧洲最落后的一个国度。新式的工业只集中在少数几个工业区域中，而且这些工业的 78% 是外国资本家所建立的。^① 国民经济的基础还是建立在原始的农业生产上面。

1914 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英法银行资本的影响下的沙皇俄罗斯参加了协约国的军事集团。但是俄罗斯的落后的国民经济经不起现代战争的惊人破坏，到 1917 年十月革命的前夜，经过了三年多的战争的摧残之后，全国经济已经被破坏不堪，工业生产指数低落到了 1913 年战前水准的 69.9%。

^① 在 1914 年大战之前，俄国国民经济的最主要部门是在英法两国的大资本家手里；这也就是俄国所以会参加协约国一方作战的原因。譬如重要的五金工场有 55% 在法国资本家手中，22% 在德国资本家手中，10% 在德法合组的公司手中。在煤矿业中，法国资本家占了 75% 左右的产量，德国资本家占 13%。石油业有 20% 左右在英国资本家手中，有半数左右在英法合办的公司手中。



1917年11月（旧历十月）爆发了震动世界的十月革命，俄国的劳动大众推翻了沙皇、贵族、地主、资本家的统治之后，首先就废弃了旧政府所订的帝国主义的军事协定，退出了协约国，而与同盟国单独议和。所以，十月革命所产生的新政权不仅是本国的贵族、地主、资本家的死敌，而且从诞生的一天起，就成了各帝国主义者——首先是英法帝国主义者的眼中钉。国内的旧统治者想举行仪式复辟，恢复自己的统治，英法帝国主义便极力促成这种复辟运动，企图恢复沙皇俄罗斯帝国主义，使它继续成为自己在帝国主义分赃战争中的帮手，而德奥帝国主义者的目的则在占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以取得战时所必须的粮食和燃料（煤）的来源。

于是劳动大众的新政权建立后还不到一年就被迫着牵入了国内战争和抵抗帝国主义者的武装干涉的战争中，旧统治者的反革命军队和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武装干涉队伍把俄罗斯割据成了无数独立的军事政治区域。在最紧急的时候，革命政权的势力所及的地方只限于中央区域，有一个时期，反革命的军队已经逼近了革命的策源地——彼得格拉特（即现今的列宁格拉特），使新政府不得不从那里迁移到了莫斯科。

为了保证军事上的胜利，击退反革命军队，不得不集中全国的资力尤其是粮食以供应前方的军队和后方的劳动者的需要。但是新政府没有充分的现金和大量的工业品，不能以商品交换的形式去取得农民的农产品。于是采取了一种粮食征发制，实行严格的粮食独裁。这个时代就称做军事共产主义时代。这时期是从1918年夏季起到1921年春季为止。



这时候，新政权的经济政策主要的在于（一）继续励行工业国有化的政策；（二）动员现有的各种资源；（三）以粮食征发制集中粮食以供应前方的军队和都市的无产者。

这三种政策之彻底执行当然会引起城市的资产阶级和乡村富农的死命反抗，但是这种反抗是被产业无产者和乡村贫农有组织的坚决的意志所镇压了下去。因于这三种政策的完成，使新政权能够：（一）在全国经济完全被破坏的条件下，保证了军队和都市劳动者的给养，使得在前方获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二）取得了全国经济的领导地位（由于土地、工业企业、交通联系机关、银行，主要住宅等等之国有，对外贸易之垄断，合作社的和国家的国内贸易之建立）；（三）在工商业，银行，交通等经济部门，建立了国家的经济管理机关，（四）因于上述这三种胜利使新政权本身也大大的巩固了。

不过这时期有非常严重的缺陷。因于多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的破坏，因于原料产地粮食区域和燃料产区受了白军占领，工业生产陷于极度的衰落中。在 1918 年，全国工业产额已经跌到了 1913 年战前水准的 35.4%，到 1919 年跌到了 17%，1920 年跌到了 13.8%。在若干重工业部门中，可是生产的跌落更加厉害。例如钢铁工业是重工业中的主导部门，可是生铁的产额在 1920 年已经降到了 1913 年战前水准的 2.7%，而钢的产额降到了 1913 年战前水准地 4.6%。这就是说这个主导的重工业部门的生产的这时期中几乎已经完全停顿了。同时，各种交通机关也完全被破坏。这当然更影响到了各种工业部门地生产低落。因于工业生产之紧缩，交通机关的停滞使产业无产者的队伍也削弱了。



在农业方面因于粮食征发制的施行，征发掉了农民们的一切多余的农产物，有时甚至剥夺了农民们的必要食粮，因此就使农民们失去了发展生产力的动机。整个农村的生产力大大的低落。在 1921 年时，农民生产已经跌到了战前水准的 55% 左右，而且几乎完全自然经济化了。更因于通货膨胀的结果，使纸币的购买力几乎跌到了分文不值的程度。货币的职能已经由面包和食盐等类的商品来代替执行了。

由于战争和经济封锁的结果，苏俄的对外贸易也在大为减缩。人口贸易从 1913 年的 13.74 亿卢布而减到了 1921 年的 2.8 亿（即 1913 年人口额的 15%），出口贸易从 1913 年的 15.2 亿而减到了 2020 万（即 1913 年出口额的 1.3%）。

上面这些统计数字已经充分地表明了军事共产主义时代的国民经济的破坏情形。所以，在内战时代，为了镇压反革命势力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一种必要的政策，然而“这决不是什么‘理想的制度’，而是一种苦痛的伤心的必要。如果对于这种事情发生了相反的见解，那就是很大的错误”（依里奇的话）。所以到前线的炮声一终止，内战时期一过去以后，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取消和新经济政策之采用就成为必然的事情了。

B 新经济政策——复兴时期

从军事共产主义时代转向新经济政策的最大的关键便是废除粮食征发制，实行粮食税制度和恢复商品交换的市场关系。

在前面我们就已经说过，新经济政策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苏维埃政权对于资本主义势力的一种让步，是社会主义的暂时的退却。然而这决不是投降，这只是新的进攻的准备，也可以说是一



种包抄式的进攻。这只是表示两个体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战争已经从战场而移到市场和工厂中来了，也就是说这斗争已经从军事政治的斗争，而变为经济政治的斗争了。

在新经济政策实行的时候，苏维埃国家已经握有经济的领导中枢——这就是国有化的大工业、交通机关、银行、土地（包括地下的富藏）以及相当发展的国家的分配机关（这就是后来的合作社的国家的商业机关的前身）。因此，虽则在新经济政策之下，允许有商业流转存在，允许有私人资本主义的生产存在，并且相当地发展了小布尔乔亚的势力，但是同时社会主义的大工业生产和普洛列塔利亚本身在新经济政策之下却是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和巩固。

在整个新经济政策时代，也从没有允许富农和资本家所希望的完全的自由贸易存在。新经济政策下的自由贸易只不过提高了农民对于生产的兴趣，使农村经济得到了发展的可能性。这政策至多只能满足中等农民的需求，但是并不会损害到普洛列塔利亚特的利益。

新经济政策基本任务是在于恢复工业、农业、交通和整个国民经济，在于建立城市和乡村间的正常的经济关系，在于巩固健全的币制。因于这些任务的性质使这个时期得到了复兴时期（1921年至1927年）的称号。

这里所说的“复兴”仅是意味着：在这时期以内，经济的发展主要的是（然而不仅仅是）以利用旧有的生产机关为基础的，而且在时期以内，工业和农业的总生产量在大体上只不过是恢复了战前的水准而已。然而工业生产是以社会主义的形态恢复起来的，而不是以原来的资本主义的形态恢复起来的——这是非常重



要的一点。

在复兴时期，在各种社会因子的比重上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造性的演变：由于社会主义工业和合作社商业流转的迅速发展，使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因子的比重大大地增强了。同样各个工业部门之间的对比也变动了，然而从大体上说来，这些改造性的演变还不能算是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基础的根本改造（除了少数工业部门——如煤油类以外），在乡村中也仍旧是由小商品生产统治着，社会主义的农民经营还在萌芽时期，资本主义的根苗还没有从那里铲除掉。

在新经济政策的初期，扩展商业是主要的一个环节。因于实行粮食税并且准许商品交换存在的结果，使农民可以把自己的剩余的农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卖。这样一方面是增进了农民发展生产力的兴趣，另一方面是使工业得到了原料和粮食的保证，也即是推翻了工业本身的发展。同时，因于商品交换的恢复，使小手工业者的生产也复活了起来。在都市和农村之间的经济联系密切起来以后，工业和农业的本身也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于是国家财政也能够健全起来，通货也稳定了，这样才有可能从事积累，以便推进重工业，奠定社会主义的基础。

所以，如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商业是布尔乔亚汜的工具，可是在苏联，便成了普洛列塔利亚政权的工具，它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和铲除资本主义有非常大的贡献。

在 1922 年（即新经济政策颁布后的第一年），新经济政策的基本任务的完成就得到了极大的成功。在 1922 年，工业生产已经达到了战前水准的 26%，农业达到了 75%。对外贸易也开始活



跃起来。在这基础上面，市场也扩大了，财政也逐渐稳固了。国家预算也从 1921—1922 年度的 10 亿卢布的数额而增加到了 1922—1923 年度的 13.32 亿卢布。预算中的自然物部分从 55% 而减为 10.5%。1921 年成立了国家银行。这银行所发行的乞耳户涅茨票（值十个金卢布的纸票）也获得了很稳固的地位。

不过，在新经济政策颁行之初，马上就要振兴重工业是不可能的：第一，因为重工业的复兴需要大量的资本；第二，在战争中，重工业被破坏得最厉害。所以，在开始的时候，只能先从劳动力和原料起有主要作用并且能够直接以生产品供给工农大众以发送他们的物质生活的轻工业开始复兴起来。

但是当复兴事业逐渐完成，而且开始走向改造时期去的时候，重工业（尤其是五金工业）的意义也就随着扩大起来。

在 1923 年，苏联的执政政党就提出了“把重心从农民经济转移到工业方面去”的任务。在 1926 年时，更具体地提出了“在最低限度的历史期限以内，赶上并追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度的工业发展水准”这个口号。在 1925—1926 年度，大工业已经达到了战前水准的 94%，而在 1926—1927 年度，就已经超过了这个水准。这时期的苏联工业生产的发展可以从下列统计数字中表现出来（依照 1926—1927 年度的价格估计，单位为百万卢布）：

	1921 年	1926 年	1927 年
全部工业生产	2004	11083	12664
内中包括：			
重工业	898	4998	5720
轻工业	1106	6085	6944



在六年之间，工业生产量差不多增加了六倍以上，在这里已经完全表现出了苏联的经济制度的优点。

随着国家经营的大工业生产的巩固和发展，国家经营的和合作社的商业机关也大大扩展了。

在 1922—1923 年度，国家经营的零售贸易只占整个零售商业的总流转的 14.4%；合作社的占 10.3%，而私商占 75.3%。

经过四年之后，在 1926—1929 年度国家经营的贸易扩大了三倍多，即从 1922—1923 年度的 4.12 亿卢布增加到了 18.17 亿卢布，然所占百分比却只有 13.3%。

在这期间合作社的流转量增加了 19 倍（从 368 万卢布增加到了 6.838 万卢布），所占比重增加到了 49.8%（跟国营商业合在一起所占比重共为 63.1%）。私人的商业流转量所占量增加的数目还不到二倍（从 26.8 亿卢布增加到 50.63 亿卢布），但是因为流转总额已经扩大了四倍，所以私人商业所占比得便从 75.3% 而跌为 36.9%。

自从 1926—1927 年度起，私人商业的绝对的增加已经停止，到 1927—1928 年度私人商业的流转量就从 50.63 亿卢布跌到了 36.49 亿卢布，所占比重则降为 24.8%。

同时，乡村中的合作社网也扩张了，农村经济合作社的社员从 1924 年的 114.6 万人而增加到了 1927 年的 737.9 万人。

在援助贫农和排挤富农的政策之下，农村经济在这时期内也特别兴盛起来了。

新经济政策初期农村经济的复兴过程：



耕地面积	1922 年	1923 年	1924 年	1925 年
全部耕地面积	77.7	91.7	98.4	104.3
(单位百万公顷)				
谷物耕种面积	66.2	78.6	82.9	87.3
(单位百万公顷)				
棉花	70.0	221.0	447.0	591.0
(单位一千公顷)				
糖萝卜	179.0	263.0	379.0	534.0
(单位一千公顷)				

国民经济的恢复是苏联的伟大的成功，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但是在这胜利中又发现了新的困难的新的矛盾，克服这些困难和矛盾也就是苏联经济建设中的新的任务地产生。

这些困难和矛盾便是：

- (一) 随着农村经济的复兴，发生了乡村中的阶级分化和富农经济的绝对的和相对的增涨；
- (二) 随着贸易的扩大引起了私人商业资本的发展；
- (三) 重工业的落后。

在我们说到苏联农村中的富农问题之前，先让我们来说一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村社会分化现象。在资本主义各国，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地发展，便有大批农民破产而沦为贫农和雇农，只有极少数的一部分较富裕的农民在这过程中能够巩固了起来，而成为乡村中的剥削阶级——富农或农业资本家。所以，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度中，农村的发展是两极化式的，一方面形成了少数富强的农村剥削者，另一方面是大批破产的贫农和雇农，处在中间地



位的中农相对地和绝对地都在日益孤单起来。

但是在苏联，农村社会的发展就是在新经济政策时代也不是这样两极化式的。在小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因于市场交换之存在，富农是得到了发展的机会。然而因为土地国有制度上之存在，租用田地和雇用工作之被限制以及苏维埃政府的赋税政策和放款政策，富农的发展是大受限制的。另一方面，中农和贫农（尤其是贫农）因为得到苏维埃政府的种种优待和帮助，能够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各级农民的相互关系演变可以从下面这个统计表中看出来：

各级农户在农户总数中所占%：

年份	无地农民	1俄亩以下的	2俄亩至4俄亩	4俄亩至6俄亩	6俄亩至10俄亩	10俄亩至25俄亩
1922年	4.1	50.5	30.6	9.9	4.3	0.6
1923年	3.3	45.4	31.7	12.3	6.2	1.1
1924年	3.1	40.1	34.6	13.9	7.0	1.0
1925年	1.8	36.3	36.9	15.7	8.0	1.3

从上面这个表格中可以看出，无地农民和两俄亩以下的农户是从54.6%而减为38.1%，乡村中的资本主上层份子是增加了（由4.9%增加到90.3%），而同时，中等农户的地位和户数是更巩固了。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中等农户是命运注定破亡的，但是在苏联，中农却是乡村中的“中心人物”。所以，现在苏联的执政政党，在二月革命（布尔乔亚汜德漠克拉西革命）以前对于农民的基本口号是：联合一切农民反对地主和沙皇政府；在十月革命和



新政权建立的初期，这个口号是：联合贫农，使中农中立，反对富农；但是等到新政权逐渐巩固，内战快要得到胜利的时候，这口号就改变为：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反对富农。这不仅仅因为在这时期中新政权的军事政治上的胜利已经打破了中农的动摇观望的态度，而且因为中农的社会经济地位也根本改变了，他们的地位已经由动摇而趋于巩固，以至于成为乡村中的“中心人物”了，执政的普洛列塔利亚政党如果不跟这乡村的“中心人物”联合起来，那么社会主义的建设就根本没有希望的。

当然，富农是乡村中的资本主义份子；所以，富家的发展以至于存在始终是社会主义的心腹之患。但是在复兴时代，苏维埃政府还没有充分的实力足以摧毁资本主义的这个最后的壁垒。在那时候，主观的力量和客观的条件还不足以克服小商品生产的经济，而小商品生产却是资本主义的最好的滋长地。

所以，为要铲除乡村中的最后的资本主义势，先必须以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村来代替小商品生产，可是没有重工业——首先是生产农业机械的工业——的发展，集体农场是建立不起来的。因此，从复兴时期的第一个困难和矛盾中便产生了两个新的任务：发展重工业，施行农村经济集体化。

如今，我们再来说复兴时期的第二个困难和矛盾，即私人商业资本的发展。在经济复兴时代，为了发展生产力，增进商品流转，允许有私人资本存在。在经济复兴过程中，这个私人资本是相当地发展了。私人资本的势力扩大当然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威胁；对于这一点，苏联的执政政党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就看到的。但是克服这些危险的保障统统在政府手里。大工业十之八



九是国家经营的，因此私人资本在工业方面的活动地盘非常狭窄；在农业方面，因于土地国有化和租佃之限制，外面的私人资本要侵入进去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私人资本的主要活动地盘是在贸易方面。然而，贸易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部门。这是联络都市的无产者和乡村农民的一条大道。在这里，私人资本的无限制的发展可以影响到过渡时代的两个主要阶级——工人和农民——的联合；也就是说，可以威胁到苏维埃政权的生存。

但在复兴时期，私人资本地营养地——小商品经济——还是继续存在着；国营和合作社的商业机关还不足以供应日益扩大的国内商业流转；所以私人资本的取消非但不可能，而且足以妨碍到商业流转地扩大间接地也就是足以阻止了生产力（尤其是农村经济地生产力）的发展。

所以，在复兴时期，苏联政府对于私人的商业资本只取一种限制的政策。因为十之八九的工业生产品是在国家手里，对外贸易国家独占的，实际上，私人商业资本的命脉完全操于国家手中。在生产资料的流转中，自始至终没有被私人资本侵入，私人商业资本的主要活动地位仅限于消费品——尤其是农产品——的流转中。

在农产品市场上，私人资本的势力比较巩固。合作社的和国家的商业机关的发展虽足以排挤私人商业资本的势力。但是私人资本的根本铲除只有在小商品经济消灭之后。所以私人商业资本的铲除问题归根结蒂仍旧是集体化和工业化的问题（铲除富农阶级的口号在 1929 年就提出了，但是铲除私人资本的口号直到 1932 年时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政策获有绝大成功之后才提出的）。



新政权建立的初期，这个口号是：联合贫农，使中农中立，反对富农；但是等到新政权逐渐巩固，内战快要得到胜利的时候，这口号就改变为：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反对富农。这不仅仅因为在这时期中新政权的军事政治上的胜利已经打破了中农的动摇观望的态度，而且因为中农的社会经济地位也根本改变了，他们的地位已经由动摇而趋于巩固，以至于成为乡村中的“中心人物”了，执政的普洛列塔利亚政党如果不跟这乡村的“中心人物”联合起来，那么社会主义的建设就根本没有希望的。

当然，富农是乡村中的资本主义份子；所以，富家的发展以至于存在始终是社会主义的心腹之患。但是在复兴时代，苏维埃政府还没有充分的实力足以摧毁资本主义的这个最后的壁垒。在那时候，主观的力量和客观的条件还不足以克服小商品生产的经济，而小商品生产却是资本主义的最好的滋长地。

所以，为要铲除乡村中的最后的资本主义势，先必须以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村来代替小商品生产，可是没有重工业——首先是生产农业机械的工业——的发展，集体农场是建立不起来的。因此，从复兴时期的第一个困难和矛盾中便产生了两个新的任务：发展重工业，施行农村经济集体化。

如今，我们再来说复兴时期的第二个困难和矛盾，即私人商业资本的发展。在经济复兴时代，为了发展生产力，增进商品流转，允许有私人资本存在。在经济复兴过程中，这个私人资本是相当地发展了。私人资本的势力扩大当然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威胁；对于这一点，苏联的执政政党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就看到的。但是克服这些危险的保障统统在政府手里。大工业十之八



九是国家经营的，因此私人资本在工业方面的活动地盘非常狭窄；在农业方面，因于土地国有化和租佃之限制，外面的私人资本要侵入进去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私人资本的主要活动地盘是在贸易方面。然而，贸易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部门。这是联络都市的无产者和乡村农民的一条大道。在这里，私人资本的无限制的发展可以影响到过渡时代的两个主要阶级——工人和农民——的联合；也就是说，可以威胁到苏维埃政权的生存。

但在复兴时期，私人资本地营养地——小商品经济——还是继续存在着；国营和合作社的商业机关还不足以供应日益扩大的国内商业流转；所以私人资本的取消非但不可能，而且足以妨碍到商业流转地扩大间接地也就是足以阻止了生产力（尤其是农村经济地生产力）的发展。

所以，在复兴时期，苏联政府对于私人的商业资本只取一种限制的政策。因为十之八九的工业生产品是在国家手里，对外贸易国家独占的，实际上，私人商业资本的命脉完全操于国家手中。在生产资料的流转中，自始至终没有被私人资本侵入，私人商业资本的主要活动地位仅限于消费品——尤其是农产品——的流转中。

在农产品市场上，私人资本的势力比较巩固。合作社的和国家的商业机关的发展虽足以排挤私人商业资本的势力。但是私人资本的根本铲除只有在小商品经济消灭之后。所以私人商业资本的铲除问题归根结蒂仍旧是集体化和工业化的问题（铲除富农阶级的口号在 1929 年就提出了，但是铲除私人资本的口号直到 1932 年时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政策获有绝大成功之后才提出的）。



最后，我们要说到复兴时期的第三个困难和矛盾，这就是重工业的落后。大家知道，重工业是一切工业部门的基础，也就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但是我们已经说过，在复兴时期，主要的只是恢复了轻工业。例如生铁的生产量在 1921 年只有战前水准的 3%，1922 年为 4.5%，1923 年为 7.5%，1924 年为 17%，1925 年为 31.1%。在复兴时期初期，甚至连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工业基金都没有能够恢复，工业生产之恢复全靠旧的生产机关之利用。

然而，没有重工业的发展，非但整个工业以至于整个国民经济的继续发展是不可能的，而且连国家的国防都受到严重的威胁。

总括起来说，复兴时期的基本矛盾和基本困难就在于：一方面苏联的政权是建立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工业上的，而另一方面是建立在成为资本主义的滋长地的，分散的小农经济上的。这意思就是说，在复兴时期，还没有铲除全国的技术经济上的落后性。

为了苏联的国民经济的继续发展必须扩大集体农场化运动实行农村经济地社会主义改造，必须坚决地向都市和农村的资本主义份子进攻，必须执行工业化的政策，消除全国的技术经济上的落后性。基本的任务就是建立强有力的重工业——即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的技术的改造的物质基础。

于是，苏联的经济建设便从复兴时期走进了改造时期。

C. 改造时期的开始和两个五年计划

还在 1925 年的时候，即是当复兴时期还没有终了之前，苏



联政府就已经提出了扩大工业化任务。在 1926 年时，在这一方面就已经完成了不少工作。在 1926—27 这个经济年度，就已经有十亿卢布投入在重工业方面。当时约瑟夫说过：“一般工业的高整度的发展，特别是生产资料生产的高速度发展，是全国工业化的基本的开端和关键。”发展工业生产——尤其是重工业生产——在当时就已经成了苏联经济建设地中心任务。

然而，真正的伟大的的转变是在五年计划实行以后开始的；1929 年（第一届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被称为伟大转变的年头。

五年计划诚然是人类历史上的空前的巨著。这计划的发表惊动了全世界。布尔乔亚汜的经济学者恶意地宣布说：“能够完成了这计划地四十分之一已经是了不起的成绩了……”。然而苏联的劳动大众却把这计划在四年零三月中完成了（苏联的经济年度是每年第四季度起到明年第三季度为止。第一届五年计划原定自 1928 年第四季起至 1933 年第三季为止；但是在第四年间就已经把这计划全完成。因此在 1933 年 1 月起就开始第二届五年计划。就此以后，苏联的经济年度便改从每年一月开始）。这更是惊倒了全世界的事件。

第一届五年计划特别着重于重工业的发展。在第一届五年计划中，投殖于整个国民经济的资本达 505 亿卢布，其中有 213 亿卢布是投殖在重工业方面的。重工业方面的投资占到整个国民经济（社会主义部门）的 40.6%，占全部工业投资的 86%，比了 1923—24 年度到 1927—28 年度这整整五年之间的重工业投资总额（36 亿卢布）差不多增加了六倍。

结果，使得苏联的重工业在四年零三个月之间增加出



157.1%，达到了战前水准的419%。重工业生产品在整个工业生产品之中占了优势（由1928年的44.3%到1932年的52.5%）。

重工业的发展在机器制造和电力生产方面最为显著。机器制造是每个国度的工业化的重要指标。在第一届五年计划完成之后，苏联的机器制造业就可以用本国产的钢材设计并制造任何种复杂的机器和国防用的军械。

电力生产在这时期中增加了2.4倍，达到了450万启罗瓦特的数目，即是超过了1913年战前水准的4.1倍。

在第一届五年计划的四年零三月的时期中，苏联的整个工业生产量增加了118.5%，占欧洲第一位和世界的第二位（美国第一）。

在第一届五年计划中，无产者的队伍是大规模地扩大了。工人和职员的总数增加出96.6%，即从1928年的1159.9万人而增加到1932年的2280.4万人。农村中的国营农场和机器曳引机站中的无产者增加出200万人。同时，工程师、技师和机匠的人数也增加了好几十万人。

在1928年到1932年这个时期中，代表农业经济方面的特征就是全地域集体化的运动。在这时期内，一共组织了20万个以上的集体农场和5000个左右的苏维埃农场（即国营农场）。在第一届五年计划的末期，有60%的农家和70%的耕地是被包括入集体农场了。在复兴时期中，商品谷物（即农民出卖的谷物）只有五六亿普特，可是第一届五年计划之末，这数目已经倍了一倍了。

大规模的先进工业之建立，全地域集体化之施行，富农阶级



之消灭，苏维埃贸易（国营和合作社的）的开展和私商之根本铲除（这是 1932 年开始的）——凡此种种那是表示：“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社会主义的阵地已经巩固起来了，资本主义的份子已经从那里驱逐出来。”苏维埃政府已经有直接领导整个国民经济的可能。

自从十月革命以后，直到 1928 年为止，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的部门只是主导的一个部门，而不是压倒一切的部门。自从“伟大转变”的一年（1929 年）之后，社会主义部门开始在国民经济中成为压倒一切的部门，到了 1931 年之后，就是在农村经济中也成为压倒一切的部门了。这就是说苏联已经走入了社会主义的阶段，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

第一届五年计划结束之后，又来了一个更伟大的第二届五年计划。第二届五年计划的任务就是完成技术上的改造，消灭阶段的区别和经济机构的区别，使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成为国内唯一的生产方式。

第二届五年计划的总投资有 1334 亿卢布，较第一届五年计划的五百零五亿卢布增加了二倍半。仅从这一点上就足以充分显示出它地伟大性来了。

在第二届五年计划中，特别注意于交通事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轻工业的增涨速度规定为 269%，重工业的增涨速度为 209%。因于轻工业的发展和农产品的增加，更因于零售物价之减低（第二届五年计划中规定零售物价减低 35% 至 40%），使一般人民的物质享受大大地改善了。

按照第二届五年计划规定，在农村经济方面，应该达到全体



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要完成整个农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所有的农业劳动全部份或绝对大部份能够机械化。根据这计划在 1937 年时，农产品总价应该增加到 266 万卢布（照 1926—1927 年度的价格估计），即是比 1932 年的 131 万卢布增加到两倍以上。

以上述的工业化、集体农庄化和国民经济的根本改造为基础，应该完成第二届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消灭社会上的阶级划分，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

四 苏联经济建设的现状和前途

今年——1936 年——是第二届五年计划的第四年。在这三年多的时期，苏联的经济建设又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呢？为要明瞭目前的情形，我们不得不简略地举一些数字来说明。第二届五年计划的基本的经济任务是完成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为了完成这任务，对于新企业的创办投殖了大批资本。在 1933 年到 1935 年这三年间，总共已经投了 646 亿卢布，超过了整个第二届五年计划的总投资额（505 亿卢布）六分之一以上。还在 1935 年初，整个工业界的生产资本就有 73%，五是属于 1928 年到 1934 年间设立的或彻底地改造过的新工厂的。在某几个产业部门中这百分数达到了 90% 以上。大工业的生产资本的总值在这几年来增加如下：

年 份	大工业生产资本总值
-----	-----------

1913 年	68 亿卢布
--------	--------

1928 年	99 亿卢布
--------	--------

1932 年	216 亿卢布
--------	---------

1935 年	375 亿卢布
--------	---------



由于工业的发展使苏联得到了完全的技术上和经济上的独立。下面这个统计说明了若干主要生产品的供应中苏联本国的生产品所占的百分数：

	1913 年	1928 年	1935 年	1936 年
煤油	100	100	100	100
石炭	80.3	100	100	100
铁矿	100	100	100	100
锰	100	100	100	100
电气炼钢	0	8.9	95	98.1
铅	9.7	6.4	97.1	100
铝	0	0	85.3	100
树胶	0	0	40.1	56.0
过磷酸盐	44.5	70.9	100	100
织维素	78.0	70.0	99.1	99.3
棉花	44.4	63.8	100	100
曳引机	0	24.6	100	100
铬	100	100	100	100
糖	100	100	100	100

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对于苏联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造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第二届五年计划的执行过程中，苏联建立了自己的先进的机器制造业。如今苏联不仅可以自己计划并制造任何种机器，而且全国各产业部门对于机器的需要，有绝大部分是由本国生产品来供应的。在 1933 年到 1935 年这期间，苏联机器制造业的产量增加了 75%，比 1913 年大战前的水准超过了十五倍。

由于新的技术之采用，和新工厂之设立，苏联的工业发展速度



逐年在增高着。在 1933 年时，整个工业生产量比前一年增加 6.2%，在 1934 年增加 18.7%，在 1935 增加 20.7%，在 1936 年，照计划规定可以增加到 23%，但事实上，根据预计，在 1936 年上半年已比上一年同时期增加了 33.7%。在一年以内。全国的工业生产量增加三分之一以上——这简直是打破了历史上的一切记录！

由于这种迅速的发展，使苏联得在许多主要的产业部门——尤其在重工业方面——在四年之间（即在 1936 年间）就可以完成这个更伟大的第二届五年计划了。

在第二届五年计划中，轻工业的发展比较以前更加迅速。在 1933 年到 1935 年这三年间，新开工的消费品工厂值 52 亿卢布，但在第一届五年计划中，这种新开工的消费品工厂只有 25 亿卢布，这就是说在这三年间新设立的工厂比整个第一届五年计划增加两倍以上。

跟工业的发展相适应着，技术人员的数量也增多了。在第二届五年计划的前三年中，有 14.42 万个受高等教育的技术人员和 24.3 万个受中等教育的技术人才新加入国民经济的建设工作。在大战前，俄国工业中的技术专家只有 4.65 万人，如今却有 35 万人了。

由于重工业——尤其是农业机器制造厂——的发展，使苏联的农村经济在这三四年间完成了它的技术改造。

在苏联各地的乡村中有一种叫做“机器曳引机站”（M. T. S.）的组织。这是国家经营的一种机关，在这里有一切农业机器和各种农业技术上的设备，供给全区域内各集体农村的需要。在“机器曳引机站”之下，更附设有政治部，指导全区域内



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所以“机器曳引机站”也可以说是苏联乡村中的技术中心和政治的参谋本部。

这样的“机器曳引机站”在第二届五年计划的前三年间增添了 1930 个，从 1932 年年底的 2446 年增加到了 1935 年的 4376 所。在 1935 年，“机器曳引机站”包括了集体农村地耕的面积的 72.8%，到 1936 年，这百分数可以增加到 80%。

在 1933 年 1 月，苏联乡村间的曳引机共有 222.5 万匹马力，到 1935 年年底就增加到了 654.3 万匹马力（因损坏而停止工作的不在内）。按照这样的速度增加下去，五年计划中关于农村经济曳引机化的大网也可以在四年中完成了。

因于农业经营的面积的广大（集体农村和苏维埃农场）和经营本身的有计划，使得苏联利用曳引机的成绩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国度。虽则苏联所用的曳引机的平均马力要比美国的小两倍，但是在 1935 年间每一曳引机平均所耕的面积却是多出了两倍。

1935 年间，全苏联出产的割打两用机有 20200 架，但照第二届五年计划的规定到 1937 年只要出产 20000 架而已。在 1935 年末，全国的割打两用机已经有 52500 架。由于使用合理的原因，用割打两用机所收割的田地面积已经跟美国——农业最机械化的国度——在 1930 年间的数量相等了。照计划预定，在 1936 年间，将生产 61000 个割打两用机。

由于农业机械的增多，使苏联大部分的农业劳动机械化了。至于苏维埃农场（国营农场）实际上早已成了机械化的农产品制造厂，这里的劳动有全部或绝对大部分已经机械化了。

在第二届五年计划的过去这几年间，在苏联的交通事业——



尤其是铁道交通——方面成绩更大。

在第二届五年计划的初三年间，在铁道事业方面的投资有 86 亿卢布（在整个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仅仅 64 亿卢布），在这三年间，开始利用的新建筑总共值 81 亿卢布（在整个第一届五年计划中为 56 亿）。在 1932 年时，全国铁道运货量是 267.9 百万吨，在 1935 年是 390 百万吨，照 1936 年的预定计划将增加到 457 百万吨。

此外，水上的运输（内河航运和海洋航运）在这几年中也有很迅速地发展。如今在这一方面投资很多。最近的将来，苏联的航运业就要在世界海运业界露出它的锋芒来了。

汽车的运输是第一届五年计划中新成立的一种事业，在这几年来的发展速度简直是非常惊人的。如今汽车已经成了短距离运输的一种基本工具。

在 1932 年 1 月 1 日，全苏联还只有汽车 75400 架，到 1935 年年底就已经增加到了 26 万架，照预定计划到 1937 年初将要增加到 40 万架。

由于整个国民经济迅速发展，苏联一般劳动者的物质境况和文化水平也迅速地提高了。表示全国人民的物境况改善的一般的指数就是国民收入的增加，尤其因为在苏联，国民收入直接是归劳动者支配的。苏联的国民收入增加如下表（以 1926—27 年物价为坐标）：

年 份	(国民收入 10 亿卢布为单位)
-----	------------------

1913 年	21.0
--------	------

1932 年	45.5
--------	------

1935 年	65.7
--------	------



全国的工资总额从 1932 年的 327 亿卢布而增加到了 1935 年的 562 亿卢布。每个工人地每年平均的工资从 1932 年的 1427 卢布增加到了 1935 年的 2271.5 卢布。这就是说，在三年之间，每个工人的平均工资增加了 59% 以上。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中，某一个个人的收入（尤其是薪水阶级的人），由于职业的更换或其它等原因，在二三年之间，增加 50% 至 60% 是颇有可能的，这也就是劳动者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有时会发生留恋或幻想的原因。但是整个劳动阶级的收入要能够普遍地增加这么许多是绝对不可能的。

对于工人生活的改善，除了直接工资的增加以外，国家对于文化娱乐保健等事业上所花费的金钱也有极大的帮助。用在这些事业上的经费在 1932 年是 43 亿卢布，在 1935 年是 67 亿卢布，在 1936 年是 83 亿卢布。

此外，再加上第二届五年计划中一般物价之低落数（平均降低 35% 至 40%），那么苏联工作的物质生活在这三四年实际上已经改善了一倍了。

在乡村方面，集体农场的现款收入在 1935 年间增加了 83%。据苏联中央统计管理处的调查，在 1936 年 1 月 1 日，集体农庄社员的谷产储蓄比前一年增加了 20%，马铃薯增加 52%，肉类和脂肪增加了 46%。同时，在集体农场的市集（贩卖农民的日常必需品的）上，一般物价较前减低了二倍半。

随着物质生活改善，文化教育事业也有惊人的进展。

依照第二届五年计划的规定，要实施七年级的综合技术（Polytechnic）强迫教育。在革命前，农家的子弟只在小学校中读二三年，工人子弟只在小学中读三四年。如今有全体的都市儿童和 67%



的乡村儿童都读完了四年级以后再升入五年级去了。全国儿童在五年级至十年级读书的在 1932 年还只有 360 万人，在 1935 年就有 645 万人了。

在 1935 年时，在高等学府，或高级技术学院读书的学生有 50.99 万人，在 1932 年还只有 47.72 万人，而在 1913 年时只不过 12.4 万人而已。

在前面已经说过，第二届五年计划的社会政治任务便是消灭社会上阶级的区别和经济机构的区别，使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成为全国唯一的生产方式。

剥削阶级的最后的残余——富农和商人——在第一届五年计划时代就被铲除尽了。

在 1936 年初，在全国的基本的生产基金中，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所占的比重为 98.5%，只有 1.5% 的基金还在私人经营中。90% 的农家已经加入集体农场（在若干区域中，有 95% 以上的农家已加入集体农场了）。在从前，全俄国有 2000 多万的分散的农民经营，如今代之而起的成立了 24.91 万个集体农场，这种大规模经营的集体农场平均每个包括 60 个至 200 个农家。有耕地 250 公顷至 3500 公顷。

农村经济中集体化运动的成功，工业、商业和交通事业中社会主义经营形态的巩固——这些都足以表示出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表示出人与人的剥削制度在这个国度里已经被铲除了，表示出一切寄生生活的可能性在这里已经根绝了。1935 年产生的斯泰汉诺夫运动更表示出人类意识中的最后的资本主义残余已经被克服了，



表示出人类对于劳动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表示出了新的社会意识的成立。

所以，我们如果在末了不把这个新的运动的内容和意义简略地说一说，那么还不能了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部胜利，更不能了解它的最近的前途。

斯泰汉诺夫是顿巴斯煤矿区域的一个矿工。他在 1935 年 8 月 30 日至 31 日的晚上创造了一个空前的掘煤记录：普通一个工人在 6 小时的工作时间中只能采掘 7 吨至 8 吨煤；（德国鲁尔矿区的最优良的矿坑中，也不过采掘 16 吨至 17 吨煤）但是他在那天晚上，应用了新的方法竟采到 102 吨煤，后来斯泰汉诺夫本人和其他许多工人把他的掘煤方法加以若干改善之后使 6 小时之内的采煤量竟增加到了 200 余吨，即是说把原来的劳动生产率增加了 20 余倍左右。于是斯泰汉诺夫便成了苏联的民族英雄，这种提高生产率的运动从一个煤矿蔓延到了另一个煤矿，从一个经济部门蔓延到了另一个经济部门，在这一年来，工人把生产率提高五六倍以至于十几倍的事情，成了惯常的现象。于是便形成了轰动世界的斯泰汉诺夫运动。

约瑟夫在 1935 年 11 月间的全苏联斯泰汉诺夫运动者的会议上曾经说过：

“为什么资本主义会摧毁并且征服了封建制度呢？因为资本主义创立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标准，它使得社会有可能比在封建制度下面得到多出不知若干倍的生产品。因为资本主义使得社会更富足了。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而且应该以至于一定要战胜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呢？因为社会主义能比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产生更高度的劳动典型，更高度的劳动生产率。因为社会主义能够比资本主义经



济体系给与更多的生产品，能够使社会更加富足起来。”

苏联的劳动生产率的发展速度本来就快过于任何资本主义国度。譬如在第二届五年计划的前三年间，苏联的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发展速度为 10%，但是美国在 1920 年到 1930 年这时期以内的生产率发展速度只有 3.9%，德国在 1925 年到 1929 年这个时期以内为 5.7%。但是革命前的俄国的劳动生产率是非常落后的，所以 1935 年时，苏联的劳动生产率比了 1913 年时代虽然已经增加到 125% 的程度（即增出四分之一），可是苏联的劳动生产率的绝对的水准还赶不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度。

斯泰汉诺夫运动的产生可以使得苏联的劳动生产率的发展相对地和绝对地都胜过了资本主义各国，使得苏联的新的社会秩序能够建立在一个新的、更高级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望尘莫及的——经济技术基础上。在过去，没有人与人的剥削的、真正自由平等的、富足和快乐的社会只存在于先进思想家的理想中，而如今这样的社会已在地球六分之一的面积上，在苏联，实实在在地建立起来了。



撤销领事裁判权和救亡运动*

撤销领事裁判权的运动差不多同中国存在领事裁判权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当每次提出撤销领事裁判权的问题的时候——不论这问题是由政府提出的，抑是人民团体提出的——总获得全国响应。可见撤销领事裁判权已经不仅是多数工商业者的要求，而且成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希望了。但是问题虽是屡次提出，总因于我们没有充分的决心和魄力，以至终于没有达到撤销的目的。本年二月间，三中全会又决定“对于领事裁判权，国民政府仍须与各国交涉”。三中全会以后，新任外交部长王龙惠博士又重新申述了撤销领事裁判权的外交方针。不到一月，就有上海律师公会，上海市商会和全国其它各地一二百个公私团体的赞助。于是撤销领事裁判权的问题又重新成了全国报章杂志的中心论题之一。因为在这一次，撤销领事裁判权的问题，是在国内外的新的政治条件下提出的；直言之，就是在国难严重的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开展的条件下提出的；所以在这次讨论的时候，大家必然会把撤销领事裁判权同救亡御侮的任务联在一起讲了。但是在讲到这个问题本身之先，我们先得简略地说一说形成领事裁判权的经过。

* 原载《自修大学》1期，1937，6。



最早在我国取得领事裁判权的国家是英国。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同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就规定英国人民在中国如有诉讼案件，应该归英国领事审理。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就援引英国的先例，陆续取得了这种领事裁判权。到前世纪末为止，取得这样的领事裁判权的国家总共有 19 个之多。后来苏联因革命成功自动放弃了帝俄政府在中国所取得的领事裁判权。德、奥两国的领事裁判权在我国参加世界大战时，被我国政府宣布取消了；大战后，又得到了德、奥两国政府的正式承认。1929 年，墨西哥政府也放弃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此外在中国享受领事裁判权的国家，有的是已经同中国政府签订有正式条约，愿意放弃领事裁判权，但是事实上，还是享受着领事裁判权（比、意、丹、葡、荷兰、挪威、瑞士等），有的是原来的条约已经期满，但是仍旧不愿意放弃这不合理的特权（英、美、日、秘、瑞典），有的是旧条约尚未满期，更不愿表示放弃它（如法、巴西）。

从领事裁判权的发生历史看来，列强在中国享受这种特权完全是以不平等条约为根据的；而且这些条约中间，有好些的期限早已满了。然而列强非但不肯放弃这领事裁判权，倒反要设词曲解，用种种方法来扩大这种特权。通常帝国主义为这种不合理的特权作辩护的主要借口，就是中国司法制度的腐败。在过去每次当中国政府要求撤销领事裁判权的时候，帝国主义的喉舌就对于中国的司法制度来一次攻击和指摘，或者是派一个调查团到中国来调查一次司法制度和监狱设备等，调查的结果便起草一个带有教训式的司法改革计划交给我们的政府。这样，帝国主义列强，在原则上已经承认领事裁判权可以撤销，但是事实上是把这撤销在调查和计划等黑幕下



延宕到不可知的将来去了。我们中国的外交界、司法界和舆论界往往不严厉的驳斥这种阴谋，倒反而去欢迎这种调查和计划，或者是宣扬我们的司法制度和监狱设备已经在如何如何的改良，或者是已经改良到如何如何的尽善尽美等等。表面上这是灭人家借口的好办法，而事实上是无关乎承认列强在中国享受的领事裁判权，至少在过去是合法的，即是我们的司法主权的被破坏是应该的。

在过去和现今，中国的司法制度和监狱设备倒底是好是坏，我们中国人自己固然很清楚，就是外国人也不是用宣传可以左右他们的主见的。但是司法制度和监狱设备的改革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不用外国政府过问；中国当局的改善司法监狱制度是民主政治下政府对人民应尽的义务，而不是为的讨好外国侨民，奉承外国政府。外国侨民到我们中国来，就应该受中国政府和中国法律的保护，犯了法应该受中国法庭的裁判，这是一个独立国家应有的主权，不容人家侵犯的。我们不用引什么高深的国际法原理，只以日常生活中人情来往做个比喻。例如我们要到邻舍去作客，邻舍主人如何款待我们，是他的事情；我们觉得人家款待不好，或者饭菜不合我的胃口，那么下次不去或是少去好了。如果我们稍知礼节，或者邻舍不是一个农奴，而我们也不是一个封建时代的地主，那么就决不能（也不会）老着脸要人家如何如何的款待我们。而如今列强对待我们也恰正就如封建地主对待自己的农奴主的邻舍一样。他们跑到我们中国来作客（他们当初原来是硬打进来的），不愿受我们主人的节制，倒反而自己做起主人来，这样那样的来指挥我们，欺侮我们。

老实说，中国的司法制度和监狱设备，就是在我们中国人也并



不觉得是如何的完善。然而试问在国社党的统治下德国和黑衫党统治下的意大利，司法制度就真的合乎“现代的”民主的要求了吗？在那里不是不经过法庭审判，也可以把无辜人民给与枪毙或是杀了头？许多政治犯岂不也是坐了几年监狱，还没有见到法官的面？他们在监狱里岂不也是受尽了种种“文明的”残酷刑罚，等到跑出监狱门时已经成了终身的残废？此外，因为稍稍触怒了黑衫同志或褐衫同志而被关进了集中营，充当惨无人道的苦工的人们又何止千万？试问帝国主义列强曾经有那一个敢于以司法不良为借口向罗马政府或柏林政府要求取得领事裁判权吗？又如在没有几个星期之前，在“文明的”（当然是“司法制度完备的”）美国南部，在许多“文明的”白种人却从监狱中劫了几个黑人的罪犯出来，把他们吊在树上处以“凌迟”私刑，用火活活烧死了。但是伦敦、东京等政府是否敢放个屁，派一个调查团到那里去呢？

总之，帝国主义在中国所享受的领事裁判权，除了束缚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外就没有别的法理可以作为自己的根据，也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可以为它辩护，我们除了无条件地要求撤废以外，不能给与任何让步。

所以，撤销领事裁判权在原则上本是无用争论的了；目前大家所研究的，以至于大家所争论的是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向列强提出撤销领事裁判权是否适当的问题；说明白一点，就是当我们需要集中力量对付我们的主要的民族敌人的时候，我们向一切列强普遍地提出撤销领事裁判权的要求，是否要增加我们对外的磨擦，中了敌人的离间计，减弱了我们的救亡实力等等问题。

当然，不愿放弃领事裁判权的不止日本一国，列强中间，英、



美、法等对于这非法的特权也还坚持着。它们甚至想曲解领事裁判权，破坏我们的行政主权和税务制度。领事裁判权本来只规定外国侨民相互间或是同中国人有什么诉讼事件不受中国法庭裁判而受各该国领事审理。但是如今各国侨民在中国所设立的工商企业（尤其是日本的）想以领事裁判权为借口，拒绝受中国工厂管理法节制，拒绝支付中国政府所规定的税捐（如所得税），而取得中国本国企业所没有的种种便利。然而即使在这一点上，英、美、法等国对于领事裁判的利害关系，也至多是像日本一样关切罢了，决不能如像张志让先生所说的目前对于领事裁判权不肯放松的只有英、美、法等国，而日本倒反是满不在乎似的（见张志让先生：国难中撤废领事裁判权的缓急问题，申报周刊二卷十六期，但最近张先生的意见已有若干修正）。若是从其它各方面来说，那么我们可以说，恰是在目前，领事裁判权的保持是军事侵略者的日本所最不肯放松的，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倒是跟其它各列强的利益相违背的。

我们知道，日本在目前对付中国的主要政策是军事侵略政策，然而当它的军事占领还不能达到全国各地的时候尤其是快要侵入某一地点之前，它就先从事种种准备工作，如像情报谍探机关（特务机关）的设立，麻醉和杀害人民的毒化政策，破坏我们中国的经济财政体系和货币制度的走私运动。敌人灭亡我们国家民族的这种种恶毒政策能够在我内地公然进行，就莫不以领事裁判权做护身符。远的不论，最近的事件如像郑州破获的特务机关中附逆的汉奸是被正法了。但是日本籍的人员却不能不引渡给日本领事馆，他们不进入日本领事馆又是立刻获得自由，马上又跑到天津去开特务人员会议，以便继续再来进行他们的特务工作（在独立国家，捉到了



别国的谍探是可以处以徒刑或死刑的）。敌人的走私货可以大模大样的用轮船汽车往内地运载，我们的税关当局却奈何他们不得。偶而因于缉私人员的勇敢和机警截住了他们，他们却会用武力来抵抗。甚至已经被没收的私货都会被他们用武装丢了回去，或是被他们的领事馆要了回去。上海海关同人在不久以前发表的宣言也说：“近一年来在上海的日本码头，关员为走私事件与日本浪人冲突不下十余次，在这十余次的场合，我们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被打断手指，现在竟闹得一天厉害一天，差不多海关人员已不能在日本码头执行职务了……”。又说：“有两三次已经被海关缉得的走私铜元竟为日本领事馆的人员在码头上强行领去。”

要日本肯答应放弃领事裁判权只有一种情形下是可能的，那就是日本军人觉得他们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够，他可以直接用军队占领全中国，把法官都换了日本人，即是使全中国都“满洲国”化了以后。日本人在“满洲国”不是已经放弃了领事裁判权，而且已经“代表”“满洲国”人民向各列强提出了同等的要求吗？然而当日本军队还没有占领全中国之前，他们还要加紧做上述各种准备工作，换句话说，他们在这时候，还决不愿意放弃领事裁判权，而且要强化这个非法的特权。

英、美、法等国的对华政策是建立在一种矛盾上面的；它们一方面固然不愿见到独立强盛的中国，另一方面也不愿让日本独吞中国。如果整个中国成了第二“满洲国”，它们的经济“利权”将受打击，门户开放将成为对日本一国的开放，而且它们所享受的领事裁判权也会由日本来宣布取消（如现在的“满洲国”）。至于在目前呢，各国在中国的商工业也大受走私运动的打击；而领事裁判权



恰正是中国缉私运动的一种大障碍。

在目前，使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利益受到最大威胁的不是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扩张；同时，英、美、法因于种种关系，在目前也还不能以武力来维持自己在这一方面的利益。现在它们的政策是尽力维持现状，保持中国人民对它们的好感，以取得工商业方面的经济利益。中国如果坚决提出撤销领事裁判权的要求，它们决不至于同我们产生正面的冲突。不过在日本方面如果不放弃这一个特权的时候，它们也落得把这特权多保持一天再说。

至于说到日本呢，从我们上面所举的事实看来，它正要借着这领事裁判权为它的军事侵略打头阵，决不肯轻易放弃的。

所以，总结起来，撤销领事裁判权在目前主要的也不是对英对美或对法的问题，而是对日的问题。而且正因为领事裁判权已经成了敌人侵略我们的一种工具；所以领事裁判权的撤废，实际上已经成了我们的抗敌救亡工作的一部分了。唯其因为如此，所以在目前提出撤废领事裁判权问题是最迫切的要求，而我们从敌人方面所遇到的阻力也必然比过去任何时间更大（日本外交官口中所说的“很同情中国撤废领事裁判权运动”仅是空洞的外交词令而已，或者更确切些说，这同情是要以整个中国的“满洲国”化为交换条件的）。

最后，在今天我们提出撤销领事裁判权的要求来应该具有下列两点基本认识：（一）不要像过去一样把这问题当作空喊的口号提出；（二）撤销领事裁判权运动是整个抗敌救亡工作的一部分，我们把这局部的要求同整个工作分裂开来固不对，但是把这局部



的要求来代替整个救亡工作，提出了撤销领事裁判权的要求而忘记了东北四省之收复，忘记了冀东伪组织之撤销，忘记了缉私和铲除敌人汉奸的工作，那更是民族国家的大罪人，而且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事情。



全民抗战的理论基础*

一、前　　言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目标是整个中华民族。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胜利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灭亡。做了亡国奴以后的工农大众固然将陷于万劫不复的地位；做了亡国奴以后的地主资本家的家产也将受到威胁。今日朝鲜台湾的工农大众，要谋自身解放，自然更比未亡国时要艰苦百倍；今日朝鲜台湾的资本家想谋事业的发展，也要比未亡国时更要困难万倍。然而在今日，朝鲜人民和台湾人民的命运，却很快就要降临到我们头上了。所以，在今日，我们除了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阵线，以全民抗战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以外，没有别的出路了。日本帝国主义者要灭亡我们全民族，所以我们也只有以全民族去跟它拼命。这本来是最明显的事情，别无高深的道理可讲。然而却偏有人说，主张统一战线，即是别有企图的过激之谈，提倡全民抗战，即断送民族前途的误国政策。更有人以革命家自居，站在“社会主义者”的立场来反对统一战线，他们说社会上有阶级分化，阶级利益是不

* 黎明书局出版，单行本，1937，8。



可调和的，国家是阶级的统治机构，所以全民抗战只是一个幻想，或是欺骗大众的烟幕弹，主张爱国便是背叛了被压迫阶级的利益，强调了抗日是中了英美帝国主义的奸计……等等。因此，我们倒不得不对于某一般人——头脑清醒，未曾钻入牛角尖的人们——所认为是最明显不过的事情，来一个比较详细的解释。

二、全面抗战的条件

我们当然承认社会上存在有利害不同的许多阶级，因为这是客观地存在着的事实。然而有时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仍旧可以把这些利害不同的（甚至是利害冲突的）阶级联合起来，采取一致的行动。如今我们的对日抗战也就是使中国国内各阶级联合起来的一个共同目标。然而我们又要进一步问了：为什么对日抗战能够成为全民的抗战，即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呢？在这里，至少可以举出四点理由。确切些说，即是促成全民抗战（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四个主要的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这次抗战的反帝国主义性。

我们这次抗战是中国近百年来的民主主义运动的直接继续，是这运动的一个新的阶段。产生这运动的背景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社会关系的压迫。所以反帝反封建便成了这运动所提出的中心任务。但是这一个运动的完全胜利，即反帝反封建任务的完成，在其它社会经济条件不变的条件之下（如私有财产如商品经济之存在等，）只是为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肃清了道路，只是使中国变成了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所以，这种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也叫做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然而这意思



并不是说，民主主义革命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单独要求。反之，这正是说明了这革命是多阶级的联合抗战。因为既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那么资产阶级本身至少就有参加这革命的可能性（可是并不一定参加）；此外其它的社会阶级，如工人、农民和都市中的小资产者，为了自身的解放却是必然要来参加这革命运动的。所以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应该是一个包括一切民主主义势力的，即是多阶级的革命运动。前面说过，现在我们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是近百年来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运动的继续，是它的一个新的阶段；因为我们的抗战的主要任务也不过是在求得民族解放，是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过在目前我们是偏重于反对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某一个——即日本帝国主义者。所以，我们的抗战的民主主义性质也就是使它能够成为全民抗战，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个原因。

但是有人说：这是一百多年以前，法兰西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真理。现在是帝国主义时代，世界上已经没有革命的资产阶级了。说这样话的人往往以俄国革命时代的事实在作例证。

不差，在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资产阶级非但始终是不革命的，而且是反革命的。然而在这里我们不能忘记一件事情，这就是：当时的俄国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度；而现在的中国却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度。俄国的资产阶级自己就是一个帝国主义侵略者，是殖民地弱小民族的压迫者，他们当然是反革命的。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是被侵略者，是被压迫者；所以他们是反帝国主义的，就是说，在某种条件下，它是有可能参加革命的（尤其是反帝运动。）

中国的革命运动史正足以证明上面的分析是正确的。因为中



国近百年来的几次重要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除了太平天国运动以外都是发生在帝国主义的强盛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开始于 19 世纪末），例如 1911 年的辛亥革命，1919 年的五四运动和 1925 年—1927 年的大革命等。在这几次主要的革命运动中，都曾经有过资产阶级参加；虽则他们在革命过程中所表现的坚决性和坚拼性，却大不如一百多年以前的法兰西资产阶级了。

说到这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反对者又可以拿 1927 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的这一个事实来做他们的论据了。然而这论据也是无用的。不错，民族资产阶级在 1927 年退出了革命，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在今日又重新回来参加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成为参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份子。反之，在 1927 年使资产阶级退出革命的原因，却真是今日重新回来参加革命的理由。在这里，我们不能不重新回过头来，讲一讲历史上的故事。

我们在前面说过，近百年来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有两个中心任务：一个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另一个是解除封建势力的束缚。然而，在中国革命的每个具体的历史阶段上，这两个任务并不是完全不分轻重地同时提出的。例如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发生是在鸦片战争失败之后，辛亥革命发生在八国联军之役，中日之战等重要的外交和军事的惨败之后。换句话说，这两次革命运动都是帝国主义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侵略所直接引起的。所以反帝国主义的任务当然已经直接摆在这两次革命运动之前了。然而这两次革命的主要锋芒却是对准满清政府的，换句话说，这两次革命运动，直接地都是以反封建势力的形态出现的。



发生在五四运动的直接的导火线是外交问题，然而这运动的主要锋芒仍是对准北洋军阀政府的，而且这运动的继续发展更变成了反抗旧礼教和封建思想的运动。换句话说，五四运动也仍旧以反封建势力的形态出现的。1925年—1927年的革命是以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开始的，即是说，这次革命运动在发展的初期已经是直接以反帝国主义（主要是反英）的形态出现的，虽则反封建势力的任务仍旧存在着——因为在前三次革命中并没有真正的解决这任务（辛亥革命革除了封建势力的一个最腐败的躯壳——满清政府，而换上了一个新的躯壳——北洋军阀政府）。然而革命运动的发展，使革命的锋芒又逐渐从反帝而转向于反封建。北伐开始以后，这个反封建势力的革命运动（因于革命自身的需求，也即是由于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扩大而且深入成为广大农民群众的土地革命。于是在这次革命中建立起来的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就开始发生了裂痕，民族资产阶级由动摇而终于退出了革命。更因于留在革命营垒中的其它社会力量的主观上的错误（由领导者负责），不能在联合阵线分裂之后，独立支持局面，使这次大革命中途夭折了（因为革命的两个主要任务之中，在本质上都不曾成功）。于是便造成了此后十年间国内的残酷的内战。

如今为什么又有可能使这个革命的联合战线重新团圆的可能了呢？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谢谢我们的万恶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

“九一八”以来，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得步进步的侵略使资产阶级、甚至地主、军阀官僚都发生了存亡问题。日本帝国主义者同整个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随着日本军阀的足迹的深入内地而逐渐成了



中国社会上的主要的矛盾；而中国内部的社会矛盾——主要是封建制度同全国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便反比例地缩小，而逐渐成了中国社会上的次要的矛盾。这样便改变了国内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局面，使中国国内各阶级又重新有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中国土地属于日本帝国主义，还是属于中国人，这是首先待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对于共产党放弃以暴力没收土地的政策的解释，也就是中国民族统一战线重新恢复的一个极好的说明。所以促成这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或全面抗战——的第二个客观条件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和中日矛盾之尖锐化。

以上两个客观条件都是属于国内的。但是近年来国际间的情势也是有利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的。

这个有利的国际情势就是和平阵线和侵略阵线的形成。不管人们怎样的否认，然而客观的事实告诉我们：如今世界上有一部分国家愿意在目前维持国际现状更不愿以战争来改变现状；属于这类的国家即英、法、美、苏等国。不论这四个国家的政治机构是如何不同——例如英、法、美三国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而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不论他们反对战争的出发点是如何不同——例如苏联反对战争因为战争是根本同它的立国原则不相容的；而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机构却本来是产生帝国主义战争的最好土壤，不过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前辈“富豪”，又是前次帝国主义大战中的胜利者，如今整个世界已经有一大半操纵在它们手里，它们在目前的主要打算是在怎样保持现状，防备别的帝国主义者来分赃；（这宛如有了身价的白相人一样不像普通的瘪三一样穷凶极恶了；）总之，这些国家



——英、美、法苏等——在目前都愿意和平反对战争却是一个事实。所以这些国家便形成了国际间的和平阵线。但是除了这一部分国家以外，另外还有一部分国家却愿意掀起战争，破坏和平，以满足它们的侵略欲望。属于这一类的国家主要为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这三个国家在帝国主义侵略者营垒中，都是后进的“暴发户”。其中德国是前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的战败者，大战结果负担了惊人的赔款不算，还损失了所有的殖民地领土。意大利在前一次大战的结果，虽不曾担负赔款不曾丧失殖民地（因为它能够看风转舵，在中途出卖了它的同盟者，投降了协约国），然而也没有分润到一些赃物。至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交了鸿运的，然而它的独霸远东的优利地位，它的富饶而孱弱的邻邦都是增进了它的侵略胃口。不过，对于这三个国家所以成为侵略国家起有最主要的作用的是这三个国家中的军事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机构。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最脆弱的这几环中，统治者不得不以暴烈的手段白色恐怖来维持这垂危的社会制度，更不得不以对外的侵略战争来做它的强心针。这些国家正在掀起人类史上第二次的大屠杀，正在到处放火以便引起第二次的世界大战。这些国家便在国际上结成了所谓侵略阵线。

在和平阵线中的苏联不用说可以成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最忠实的友人；可以在我们的全民抗战中给我们精神和物质的援助。其它如英、美、法等国，至少也可以对于我们的全民抗战维持友谊的中立；在我们的灵活而正确的外交运用下甚至也可以给我们以积极的支持。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了这些国家的帝国主义的本性，在某种场合之下，它们是可以出卖我们的，可以



使我们的抗战中途妥协（即投降）的，然而这主要是在我们自己了。只要我们自己立得稳脚，不受别人的怂恿，坚持抗战到底，它们也是无可奈何我们的。因为我们在目前至少有把握可以说英、美、法等国积极援助日本帝国主义者来同我们正面作对是不至于的。此外，全世界各国的（尤其是日本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势力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尤其是朝鲜，台湾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势力，是可以作为我们的反日帝国主义的全民抗战作有力的声援的。

最后，就是国际侵略阵线的本身，除日本帝国主义以外，德意两国在目前也没有可能同我们的敌人联合着，向我们作军事上的进攻，它们至多也不过是暗中帮助我们的敌人而已（至少在中日战事未扩大为世界大战之前，这估计是可靠的）。所以，在目前，直接能够在军事上同我们作战的仅仅日本帝国主义者而已。这也可以说是促成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民抗战的第三个客观条件。

我们的任务正在于看清了上面所说的国内外的情势，在国内巩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及阶级，孤立我们的主要的民族敌人，进行持久的民族抗战，粉碎日本军阀的“使支那屈膝”的幻想。“我们要以千万个子弹向着一个枪靶瞄准”——这便是根据客观的条件所产生的全民抗战的主要战略。

在上面我们分析了促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全民抗战的三个客观条件。但是在这里我们必然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疑问：上面所说的这三个条件都是早已存在了的。例如：对日抗战的反帝国主义性



是自从中国有了反帝国主义运动以来就存在着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和灭亡我整个中国民族的野心至少在“九一八”以后是已经明白地向我们宣示了的。此外，国际间侵略阵线和和平阵线之形成也是四五年以前的事情了。然而为什么直到一九二六年二月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才在大体上停止了国内的政治和军事的敌对局面呢？为什么“九一八”东北的沦亡，“一二八”淞沪抗战，长城各口之役，以至于去岁绥远的抗战都还不曾扩大成为全国性的抗战，直到今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日本军舰的大炮又第二次在黄浦江畔响了起来以后，才形成了全国性的抗战呢（而且主要的还只限于军事方面）？这些事实就是告诉我们仅仅客观条件的存在并不足以马上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民抗战的实现。这还需要我们的主观上的努力。历史上任何革命运动的发生都有它的客观的必然性，然而如果没有革命阶级的努力就决不会成功，而且徒然增加了后来读史的人发生“坐失机会”的感叹。

自从“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对内和平，对外抵抗”的呼声就被喊出。此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加紧，这呼声便逐渐传佈开来。经过了一二·九和一二·一二的壮烈的大示威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运动弥漫到了全国各地救国会的组织深入了社会各阶层。然而直到西安事变以前，统一战线运动始终还没有打动政府当局的心。西安事变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事件的意义当然并不在于它本身，而是在于它所起的客观作用，在于它提醒了最高当局一件事，即是：“对内和平对外抵抗”的要求已经不仅是一般民众的



要求，而且已经被一部分军队所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运动已经动摇了政权的重要基础。因此就不得不对于过去的对内对外的政策重新加以通盘考虑。因为要是不这样的话，那么政权基础的动摇是不免要更扩大起来的。于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国内政局便逐渐地，虽然很慢慢地，然而继续不断地向着民族统一战线的路上跑去。西安事变对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有这样重要的意义当然不能说是事变发动者的什么功绩，因为这事变的本身只不过是“九一八”以来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或救亡运动——普遍发展的一种反映而已。但是如果要论“功”那么主要的应该归功于那些为这运动而奋斗、牺牲的千百万的大众。至于那些拥护或提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体及其领导者的努力，以及他们的坦白诚挚的态度等对于这运动的成功，当然也有很大的帮助的。

所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四个条件是主观上的条件，即“九一八”以来，全国民众，和团体政党等对于救亡运动的努力。

三、全民抗战的意义

我们的全民抗战的本身的意义是用不到在这里详细申说了。因为全民抗战完全胜利的结果，首先就可以使我们免于亡国灭种的惨祸，使我们的子孙不致沦为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奴隶。仅就这一点来说这个伟大的解放战争的历史意义，就已经是不可抹煞的了。然而我们的全民抗战的全部意义却还不止于此。

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的全民抗战是近百年来一脉不绝的反帝



国主义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一个新阶段。我们的全民抗战的胜利对于中国整个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前途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关于这一层我们可以分成以下三点来说明：

第一、我们先来说中国此次全民抗战对于我们整个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前途有何种影响。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全民抗战是专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我们的抗战非但不是一般的反帝国主义的抗战（即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抗战），我们在这抗战过程中而且极同意其它帝国主义建立友谊的外交关系。然而我们仍旧可以说，反日的全民抗战的胜利也就是整个反帝国主义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或者至少可以说是整个反帝国主义民族解放中的最主要的一部分工作之完成。对于这一层，我们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者在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营垒中所处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地位来说明。

日本同帝国主义各国发生往来还是在中国以后。在它初被美国人的炮舰打开大门的时候，也同中国一样是帝国主义列强所侵略的对象，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度。可是它经过了明治维新的政变，改革了国内的封建社会关系；便踏上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更经过了中日之战□□□□□，摆脱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束缚，而且自己也挨进了帝国主义□□□□□开始向它的积弱的邻邦，（即它的殖民地时代的老大哥）——中国侵略。不过在最初的时候，它在中国的经济的政治的以及军事的势力，都赶不上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后来又经过了日俄之战的胜利，经过了世界大战的好机会，没有多少时候，它在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统治势力中已经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我们先来看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势力的发展。据堪督洛维契的材料，在1931年（即“九一八”事变的一年），对外贸中占主要地位的英、美、日三国在中国进出口中所占比重如下（把经过香港的转口贸易估计在内）^①

	美国（连菲律宾）	日本（连高丽）	不列颠帝国
出口	16.0%	34.0%	15.6%
入口	24.0%	22.3%	25.4%

由这表里的数字看来，日本在中国的出口贸易中远胜英美两国而占了第一位，在入口贸易方面也只比英美稍稍逊色一些，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优势主要是从世界大战以后取得的。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利益还不止这一点。我们还没有把他在中国的投资作估计到。根据雷谟的材料，1931年英、美、日三国在中国的投资额如下^②

总额（百万美元）	在外人投资总额中		对各国在1914年 投资额的百分比
	所占比重	所占比重	
大不列颠	1189.2	36.7%	199.8%
日本	1136.9	35.1%	517.7%
美国	19.68	6.1%	399.0%

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外人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由大战初年到1931年为止的这16年之间，增加了五倍多，几乎赶上了英国而超过了美国五六倍。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

① 堪督洛维契著，《美国争取中国》，页4860，1935年莫斯科出版。

② Remer: 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 New York 1993.



帝国主义者占领了东北四省，更在事实上控制了华北各省。在几年来，它在那里的经济膨胀，自然更是意料中事。在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势力，毫无疑义已经超过了英美两国之上。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势力的膨胀，它在中国的政治势力，当然也随着而增加了。而且因于中日间的特殊的历史上的关系和地理上的接近，使日本在中国的政治势力更比它的经济势力要强大。更重要的是：在上面已经说过的国际关系下只有日本帝国主义者才能以军事实力直接来镇压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

在目前，日渐衰老的不列颠帝国主义在西欧和地中海正被德意两国侵略者弄得头痛，决没有可能像日本帝国主义者那样用一百多艘军舰，四五十万陆军来镇压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至于美国，它虽然不像英国那样有许多后顾之忧，然而它想要企图并吞中国，必然要引起英日的联合反抗。它的军事实力能够调遣太平洋方面来的决没有日本那么强大而且便利。所以，在目前企图并吞中国，而且能够以那么多的兵力来对付中国人民的只有一个日本帝国主义者，如果我们这次对日的全民抗战能够胜利，这一个最凶横最野蛮的侵略者能够被我们打倒，那么要解除其它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们的束缚是比较容易的事情了。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分乐观，以为抗战胜利之后，即可完全以和平手段来解决这些束缚。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在此次抗战胜利之后，我们已经完成了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最艰难的一段工程。

第二、我们来说此次全民抗战对于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运动的意义。资本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同当地的封建势力是利害一致的。在经济关系上，帝国主义者不愿意殖民地半殖民



地的国度走上工业发展的道路，它希望后者永远成为宗主国的原料供给者，即希望后者永远停滞在落后的农业社会的现状下。因此帝国主义者总是以全力去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封建政权，并阻挠一切进步的运动。

中国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开始于太平天国革命，而太平天国在英帝国主义的直接帮助下失败的（英国戈登将军所领导的长胜军对于满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曾经起了很大作用）。辛亥革命后，继续着满清政府而起的北洋军阀的封建政权，主要是英日两个帝国主义者所支持的。后来国民党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的时候，英帝国主义便挑拨陈炯明等小军阀起来反抗这革命政权，以军械接济买办陈廉伯阴谋反革命的商团暴动，甚至几次以军舰开入广州作直接的威胁。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便在北方支持奉系军阀反对广东政府的友军——国民军（冯玉祥的军队），甚至直接出兵满洲镇压郭松龄的暴动。广东政府出师北伐后，各帝国主义者更用尽种种方法支持军阀政府的统治。就是后来北伐军到了长江流域，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之破裂，也脱不了帝国主义的阴谋。甚至最近十年来的内战，一半也是帝国主义者暗中策动的。

如果在过去，在摧残中国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英帝国主义者，那么随着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经济政治等势力之增长，在今后担任这个革命镇压者的责任的主要的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了。所以，全民抗战的胜利也就是铲除了国内封建反革命势力的一个最主要的支持者，也就是中国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减少了一个最凶恶的敌人。



第三、就是全民抗战对于发展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的意义。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的抗战决不能是单纯的军事上的行动。我们必须争取全民的动员才能保障这抗战的最后胜利。抗战如果继续下去，那么不管政府当局的主观意志如何，民众运动的相当开放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任何政治集团如果在这伟大的时代中不愿被人民所遗弃，那么它就得站在最前线，为争取民众运动的彻底开放而奋斗，争取抗战的胜利和抑止民众运动是两相抵触的政策。同时，这一次抗战亦是锻炼我们民族的一个最好机会。抗战将影响到国民生活的每一个部门，将牵涉到我们的每一个集团和每一个个人。凡是经受不了这一次艰苦锻炼的集团和个人，都要在这一次抗战中被淘汰；凡是能够经过了这一次锻炼而存在的个人和集团都已经成了钢铁一般的队伍，它将能克服前途的任何困难。这次抗战更能增进全国人民的政治水准和组织能力。而最重要的是全国各阶级和各政治集团，经过了这一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奋斗，更能促进相互间的了解和认识，使全国人民都能够更比以往清楚地认识谁是他们的领袖和同盟者，谁能够引导他们走上彻底解放的道路，当然这些一切对于中国整个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前途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但是，我们的全民抗战的意义还不止于此，我们的敌人，是毁灭人类文化，破坏世界和平，以发起反苏联十字军和镇压世界革命相号召的国际侵略阵线的主要的一员。所以我们的抗战具有更重大的国际使命。我们是为自己的民族独立而斗争；然而同时也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保持人类文化而奋斗，为世界革命运动，铲除一个最凶恶的敌人，为全人类的解放去除了一个大障



碍。也正是因为这缘故，我们的抗战可以获得全世界的援助；而且全世界也有给我们以此种援助的义务。

四、结 论

在上面我们说明了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实现全民抗战的理论基础，更举出了全面抗战对于我们的整个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和世界革命运动的意义。但是，到今天为止，仍旧有许多人在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这里，我们因为限于篇幅没有机会来把这些高论详细批评。只是把这中间最重要的几种做一个概略的检讨。

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大概发自两种人。一种人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是左翼集团的口号。但是他们觉得左翼集团所信奉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学说，是跟统一战线不相调和的；而他们所主张的国际主义更是跟爱国主义相矛盾的。所以他们说左翼团体所提出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是没有诚意的，这是一种“阴谋”是一种“手段”。他们的结论便是安内攘外，主张剿灭了这些“阴谋家”，再来对付外来的敌人。

其实，这种反对的理由是不成其为理由的。因为在今天，除了少数空谈的“革命家”以外，没有人在把社会主义革命当做行动口号，而这些空谈的（即鲁迅先生所说的“高超的”）“革命家”是根本反对统一战线的。凡是真正革命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当前的中国革命并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而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认为不经过这一个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便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列宁曾经说过：“凡是要想达到社会主义而不想



经过民主政治的人，……都必然要走到反动的结论上去。”当前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现阶段最迫切的一个任务。一个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想到反动的结论上去，不想做日帝国主义者所雇佣的汉奸，那么都会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看做自己当前的主要工作。同时，每一个实践的社会主义革命者都可以看到，在日本帝国主义同整个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极度尖锐化的今日，能够参加这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的也决不止社会主义者一种人，决不止无产阶级一个阶级。所以，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必然要以全力来完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更愿意同一切反日的势力缔结同盟——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者和无产阶级自己说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是自己的革命行程中的一个阶段——而且是最初步的一个阶段，他们必须忠实地而且彻底地走完它。这是他们的整个任务的一部分，而不是他们完成自己任务的一种手段。这好像一个须要跑完一百里路的旅人一样，他不能不忠实地而且彻底地跑完最初的一半路程；同时，也决不能把这最初的一半路程看作是自己跑完后半个路程的一种“手段”。至于在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们说来，如果不愿把自己看做是抗日斗争的敌人，不愿把民族解放的工作看作是旁人的任务，那么就决不能把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说是被人“利用”；如果说人家提倡统一战线是不忠实的，那么自己就只有更忠实来实行抗日斗争，以便揭露人家的不忠实；如果恐怕人家利用抗日统一战线得了“人心”，造成了他们的势力，那么自己就应该更勇敢地站在抗日统一战线的队伍中来努力工作，以取得一切抗日民众的拥护。自己



不参加抗日工作，甚至来反对工作，那只是失去了人民对自己的信仰，促成了民众对别人的信仰而已。

至于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更不是矛盾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爱国主义决不是排他的爱国主义，而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的爱国主义。如果一个社会主义者不因“高超的”空谈而把国际主义误解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亚细亚主义”，那么他就决不能反对爱国主义，即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因为国际主义决不是帝国主义的并吞政策和我们的亡国政策；而是独立平等的各民族的自由的大同盟。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是以世界大同（即国际主义）为最高理想的；所以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就不应该说信奉国际主义就是不爱国。

自从“八一三”起，中央政府开始发动了全国性的（在地域上）抗战，和国共两党重新携手以来，上面这种反对统一战线的议论便逐渐消失了。但是除此以外，更存在有从另一方面来的反对论调，这便是上面所说的那些空谈的“高超的”革命家。这些人自称是社会主义者，而且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常常掮起这块革命的招牌来反对民族统一战线。他们所反对的理由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反日不应忘记了土地革命，反日更不应忘记了反英反美；以至于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反日不应同资产阶级订立同盟——即统一战线。

在这里，也因为限于篇幅只能作一简单答覆。第一，我们要知道提出这种反对理论来的人（主要的即托洛茨基主义者）本来认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所以他们向来是不把反帝的民族解放运动看作是当前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中心任务



的。他们如今忽然如此卖力地提出了这两个任务，主要的也是为了攻击别人的一种战略的动机。

如今我们要问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就是轻视了反帝和反封建（土地革命）的任务呢。当然，这决不是的。

不错，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党派都暂时已经放弃了土地革命，即放弃了以暴力没收土地的政策。在中日间的民族矛盾，即反日帝国主义的斗争极度尖锐化的现状下，这是必要的。然而这并不是否认了依照合法的途径相当解决土地问题的必要。土地问题的严重性及其解决之必要连阎锡山先生在前两年间都注意到了。再者，反封建和反帝民族解放运动虽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两大中心任务，然而我们在上面就已经说过，这两个任务并不是永远在革命中并重的。有时往往把反封建或土地革命变成了革命的直接课题，有时却因环境的变移，又把反帝——而且往往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者——做了革命的中心任务。在目前，我们集中力量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是客观环境需要我们此做的。这是第一。

第二，一般的反帝同军事上的反帝国主义斗争是两件事。一般地说，我们应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压迫者，然而我们却不能同一切帝国主义者作战。我们为减少我们的敌人，孤立我们的主要敌人起见，必须使其它帝国主义者保持中立，甚至帮助我们。“把千百万颗子弹，向着一个枪靶上射击”——这是最好的革命战略。

第三，为了同一目的，我们应同国内一切反日力量（不论其坚决心如何，不论其时间久暂）结合统一战线。反对统一战线者



常常以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同其它阶级订立同盟之后要被其它阶级出卖为理由，而反对加入统一战线，或是为了争取所谓领导权而反对加入统一战线。其实他们的理论正是表示了对于自己以至于对于工人阶级的坚定性和革命性失去了自信。即以争取领导权而言，试问自己站在这个伟大的群众运动之外来反对这运动，（谁也不能否认抗日已成了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还能取得群众的信仰吗？还能取得什么“领导权”吗？

对于自己都失去了自信，空喊无产阶级革命和土地革命，空喊反对一切的帝国主义者——但实际上放松了当前的最凶恶的一个帝国主义者，放松了革命的主要敌人。对于这样的革命家，怪不得鲁迅先生要问道：“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吗？”（《现实文学》卷一《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其实，即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并未出钱叫这些“革命家”办报；但这些“革命家”偏能为日本帝国主义者，义务效劳，在日本军阀说来不是更合算了吗？同时关东军特务机关长的报告书中，不是早已把这些“革命家”当做是自己的意中人了吗？（见《申报周刊》）

但是除了上面两种主要的反对统一战线的议论以外，更有很很多曲解统一战线的议论。这种曲解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途，也是很有危险的。例如近来有些原来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战士，为了担心这统一战线的破裂，害怕各党派各阶级的冲突影响到了抗日斗争的前途，便讳言斗争，甚至讳言党派和阶级，有人说统一战线是超阶级的、超党派的或超经济的。

这种统一战线的定义，是同“统一战线”这个概念的本身相



矛盾的。什么叫超阶级的、超党派的。用浅近的话来说，就是非阶级的、非党派的。然而所谓统一战线的本意，却就是“各党各派各阶级的大联合”；这就是说，统一战线不仅不是超阶级的、超党派的、而且是多阶级多党派的。“超阶级超党派”论者所解释下的“统一”不是辩证论中的“统一”，而是形而上学（玄学）的“同一”。

但是稍稍研究过一些哲学的人都知道形而上学的这一个范畴——“同一”——是多么肤浅，多么跟现实相矛盾呀！形而上学者只知道“同一”而不知道“差异”（矛盾），只知道 A 等于 A，但是却不知道 A 同时又是不等于 A 的。“植物，动物和每一个细胞，在自己生命的每一瞬间是跟自己相同一的，然而同时又跟自己相差异的；这由于物体的吸收和排泄，由于细胞的呼吸，形成和死亡，由于循环过程——总之，是由于不断的分子变化的总和（这些分子变化形成了生命，而且这些分子变化的总和在生命的各个阶段中——胎儿生命，幼年期，性的成熟，繁殖过程，衰老，死亡——都一目了然地表现了出来）”。

“统一的本身就包含有差异的，这事实表现在每一个文句中。在每一句文句中，客语（The Predicete）是不可避免地同主语（The Subject）有差异的。莲是植物，玫瑰是美丽的：在这里，或者是在客语中，或者是在主语中，总有一些东西不是主语或客语所全能包括的。”

因为把形而上学的“同一”代替了辩证的“统一”，所以便说是“超经济的”，意思是说不能有经济的斗争存在的；或者正确些说，正是因为反对经济的斗争（在事实上，只是反对现今在



经济上处于被剥削地位的阶级做斗争），所以才说是“超经济的”，“超党派的”和“超阶级的”。

然而，阶级和党派的存在是客观的事实。阶级的发生，本身就是由于经济利益的不同，各阶级的经济利益既然不同，那么便不免要发生了斗争。

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这不是不同的阶级吗？资本家对工人说：现在是国难时期，你们应该多做些工，少拿些钱；地主说：救国是大家的责任，救国公债应由大家均摊；然而工人和农民却说：我们只有气力，没有金钱；为了救国，我们可以供献气力，可以牺牲性命，但是请你们牺牲些经济的利益，让我们的一家老小可以有一个温饱，免得我们在前线上还有“后顾之忧”，至于救国公债只好请你们多负担一些了。

总之，不论是地主资本家的地租利润也好，是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也好，抑是抗日救国的军费……也好，都出之于工农所生产的物质财富。资本家地主多拿进或少拿出了一些，那么工农便不免少拿进，或多拿出一些。地主资本家既不愿多拿出少拿进，那么难道工农倒肯多拿出少拿进——关于这拿进和拿出的“争论”，岂不就是所谓经济斗争？

明达事理的人不在于闭着眼睛否认事实，而在于解释事实。在于说明：这些利害不同的阶级，在今天是否有可能找到一个共同的立场作为建立统一战线的基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和亡国灭种的惨祸之前，这样的共同立场是存在的，因为不仅“中国土地属于日本帝国主义还是属于中国人”的问题需要先解决，连中国的工业是否要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农业中国”的



政策，所以窒息死的问题，也是急待我们全国人民首先解决的问题。在这共同的立场上便产生了“抗日第一”（在目前是“抗战第一”）的原则，便产生了各党各派各阶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但是“抗日第一”的原则并不就是消灭了各阶级之间的（也即是各党派之间的）经济的斗争；更不是消灭了他们之间的政治斗争（如民主问题）。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抗日第一”的原则，只是迫使着使这种斗争要服从于它（“抗日第一”的原则），只是给了这斗争一个限度。

如果这斗争的结果（如政治民生化和改善民生之实现）是帮助抗战的全民动员，扩大并且坚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争的势力，那么即是站在民族的立场上，这斗争非但不应反对，而且应该赞成为的，反之如果这斗争要削弱抗战的实力，那么就是从任何一个阶级的利益观点出发，我们也应反对这斗争。

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各阶级和各党派，只有这样坦白的提示出自己独特的立场，更各自从立场来为民族解放的共同目标而奋斗，那才能得到开陈布公共同合作的最大效果；反之，如果，各把自己的本来面目遮掩起来，空喊“宽容”，那真是充分表示了自己的虚伪而已。政治家不是三家村的和事佬，用不到满口“宽容”的“慈悲脸”。只以“宽容”来做政治的基础，那么这基础太软弱无能，太可怜了。

在这里，顺便讲一讲“超经济”这一名词的本身。不错，奴隶制度下的剥削，和帝国主义的剥削，可以说是超经济的剥削，然而这倒不是因为奴隶主义和帝国主义者“不但要剥削他们的剥



余劳动，而且还要剥夺他们的身体自由和生命保障”，也不是因为帝国主义的“恐怖的刀光要掩盖了一切‘人权’，‘人道’……的招贴”，而是因为这种剥削，主要的往往不是依赖经济的力量和依照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剩余价值法则来取得的；而是依赖政治的力量，或法律上的身份等级关系来取得的。同时反对奴隶制的斗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也用不到罩上一件“超经济”的外衣。把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称做是“超经济的”，在字面上或许可以减少些“铜臭”，使得我们自己可以“高尚些”；然而却抹煞了我们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真实的意义。因为我们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主要的不是为了空洞的民族“光荣”，也不仅是为了政治上的独立，而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更为了我们儿孙的“生存”，即是为经济。



中国当前的民族问题^{*}

造成今日中国的民族危机——或者称做国难——的基本原因是上一个世纪以来的帝国主义侵略，但是直接的起因是“九一八事变”。这似乎是敌人故意同我们开玩笑似的：他们在事后对于自己一手造成的傀儡国的解释是要替我们解决一个民族问题：解放满洲民族。此后敌人在我们边疆上造成的纠纷也莫不以民族问题为藉口（如内蒙问题，如最近新疆的缠、回变乱）。

“满洲国”的造成不能以“解放”满洲民族做藉口是明显的事。因为第一，这不是一般满洲人的要求，而只是卖国贼郑孝胥之流的阴谋；第二，在东北四省中，真正的满洲人只是极少数。以上两点理由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还有一层理由可以驳斥敌人的，这就是满洲人已经不能单独成为一种民族，而只是一种种族了。为要说明这一点，所以我们在讲到我国当前的民族问题之前，先来说一说民族的定义。

（一）什么是民族？

民族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形成起来的，人类的一种安定的共同

* 原载《自修大学》2卷2辑14号，1937，7。



体；他有共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领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生活——这是民族问题的权威者约瑟夫对于民族所下的定义。

首先，民族不是人种或种族。同一人种或种族可以是不同的民族，而同一民族也可以是好几个种族结合而成的。汉人、高丽人、日本人同是黄种，然而三个不同的民族。现在的意大利民族是罗马人、日耳曼人、希腊人、阿拉伯人、爱脱罗斯克人和其它许多种族结合成的，法兰西民族是罗马人、日耳曼人，虽自称是“黄帝”的子孙，但是实际上也混杂了许多种族的血结合而成的。

民族不是偶然地暂时结合成的共同体，而是较安定的一种共同体。不过也不是每个安定的共同体都可以算做民族的。澳大利亚和俄罗斯是一个较安定的共同体，然而澳大利亚和俄罗斯都只是一个国家而不是民族。在从前的俄罗斯帝国和现在的苏联包括有好几十个民族。

然则怎样的一个历史的安定的共同体才可以算做民族呢？

第一，一个民族必定具有共同的语言文字。同一个民族，必然是使用同一种语言文字；决没有一个民族说几种话，用几种文字的。汉人——或中华民族——虽有不同的方言，然而文字是统一的，就是语言的构造也是一致的。然而并不是使用一种语言文字的人必然是同一民族的，英吉利人、爱尔兰人、北美合众国人都是用英语和英文；然而这是三个民族。所以，除了共同的语言文字以外，必定更要具备有其它几种特征才能算做是民族。

第二种重要的特征就是共同的领土。即使是同一种族，如果



散居在地球的不同的地点，就不能成为一个民族了。自从一部分英国人离开了祖国移植到美洲去以后，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北美合众国，这便是最好的实例。

第三种特征便是统一不可分离的经济生活。只有统一的领土，本身还不足以形成一个民族。必更要有统一不可分离的经济联系，把民族的各部分事例为一个不可分解的共同体。在封建时代，一国内部分裂为无数小的诸侯王国，在这些王国之间，除了打仗以外，在平时，人民之间没有来往，更说不上密切的联系。因此这些王国决不能说是一个统一的民族。所以，现代的民族，都是在封建制度发生崩溃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而逐渐形成的。中国各地的——正确些说是汉族内部的——方言的不统一，除了象形文字的关系以外，国内缺乏密切的经济联系是主要原因。近数十年来；这也足以证明统一的经济生活对于民族统一的重要。

第四，民族的最后一种特征便是同一的精神生活——或称为民族性。精神生活或民族性，是不可捉摸的一种东西，然而每一民族都有它的一种特殊的民族性是不可不论的事。不用说，精神生活或民族性的本身不是不变的永久的东西；它是由各民族在每一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形成的。

以上所说的各点都是每一民族所不可缺少的特征。如果缺乏了这些特征中的某一个就不能成为一个民族；反过来也就是说，仅仅具有这些特征中的某一个或数个还不能算是民族。

（二）帝国主义和民族问题

以上说明了民族的定义，如今我们再来说民族问题本身。民



族问题就是一民族受另一民族的压迫而引起的反抗运动。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压迫主要的是从帝国主义国家方面来的（当然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统治者，而不是全体人民）。所以因反抗民族压迫而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也就是反帝国主义运动。

目前整个世界还是在帝国主义统治下，全世界一切最前进的力量都集中在反帝国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凶恶的支持者——的斗争；人类正在完成历史上最光荣伟大的任务：把资本帝国主义世界改造成为世界大同的社会主义社会。所以按照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而言，虽然并非是社会主义的，而是布尔乔亚民主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功，在国内一切社会机构不变的条件下，其本身并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运动是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革命运动的一个支流。是拆除旧的资本帝国主义社会机构，建立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整个人类的巨大工程的一部分所以一般说来，现代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具有非常前进的意义的。

然而，我们并不能够说，一切民族运动都有先进的意义，都值得人类的先进势力的支持。大多数的民族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然而有的民族运动反是帝国主义所策动的。在大战前的德帝国主义，常到近东去策动各种民族运动以反抗英帝国主义。不过这已经是历史上的故绩，而且距离我们还很远。近年来内蒙一部分王公所领导的“独立”运动和上月间报纸上所传闻的新疆回变乱，是更迫近的事实。这些运动和事变显然是日帝国主义者所策动的；它不能具有反帝国主义性是当然的事，而且它是日帝国主义侵略工作中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我们反对内蒙和新疆的这



种“解放”运动，并非只是为了汉族自身的利益，而且也是为了蒙古民族和回族自身的利益。中国内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虽然还没有完全建立在健全的基础上，而且为了我们大家的抗敌斗争的胜利起见，这关系有马上放到健全的基础上去的必要；然而大家应该明白：我们的主要的民族压迫者不在国内而在国外，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以，国内各民族在目前应该密切团结起来打击这主要的敌人。任何民族（其实只是某些民族上层份子）如果要同这万恶的敌人妥协，甚至去勾结着来对付国内其它民族，那么吃亏的不仅是其它民族，而第一个倒是这民族自身。高丽的亡国史就是前例。当日本灭亡高丽的时候，最初也是以援助高丽民族的独立为钓饵的。但被援助的结果，是使高丽民族成了亡国奴中的老前辈。如今日本帝国主义者又在蒙古和新疆等地方施行它的灭亡高丽的老方法了，我们希望边疆各民族——尤其是各该民族的上层份子——看一看高丽的前例，不要再上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当。

总之，为了全人类的幸福，为了各民族自身的利益，各民族的解放运动应该同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巨潮汇合一起，成全推动历史进步的一种力量；反之，与帝国主义勾结的一切“独立”运动，必然要促成民族自身灭亡，成为历史上的最反动的潮流中的一条支流。

至于我们国内的民族问题的解决原则，留到末了再讲。

（三）民族解放和“世界大同”

由此看来，现代大多数的民族解放运动都具有反帝国主义的



革命意义。同时，也由于时代的不同，现代大多数的民族运动者都是革命的民族主义者——都是国际主义者——而不是纳粹式的民族主义者——即我们普通所谓国家主义者。国际主义或“世界大同”的主张，已经成为世界上一切先进份子的共同信仰了。因此就有两种人从两种似乎对立而实际是一致的立场来曲解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主义的关系。

有一种人是根本反对国际主义的。他们对一般前进的民族解放运动者说：你们既然是信仰国际主义的，那么你们那里还有什么国家和民族的观念呢，可见你们所说的民族解放运动完全是一种虚伪的号召工具。这些人忘记了孙中山先生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的民族主义者，然而他同时也是以世界大同为最后宗旨的。

另外有一种人是赞成国际主义的。他们攻击民族解放运动或爱国运动的理由便是社会主义学说中的一句格言：“工人无祖国”。这种人不了解国际主义跟日帝国主义的“大亚细亚主义”是不能混作一谈的。我们固然希望达到世界大同的国际主义；然而这不是要让自己的民族灭亡，让自己的国家失掉了独立，去做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同高丽和台湾的关系决不是国际主义的平等关系，而是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统治关系。要实现真正的国际主义，先必需实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只有在真正独立平等的各民族之间才谈得上真正的国际主义。

至于说到“工人无祖国”的口号，这是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相对立的一个口号，然而不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相对立。

在世界大战的时候，帝国主义者以“保卫祖国”为号召，驱



使劳动大众去做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炮灰。当时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工人无祖国”的口号。在当时的帝国主义国家中，这口号是正确的，是革命的。因为当时的帝国主义国家并无侵略和防御的分别，所谓“保卫祖国”全是无的放矢，是侵略战争的掩护。当时一切前进份子的任务是怎样推翻财政寡头统治，把帝国主义侵略战变为革命的内战；因此喊出了“工人无祖国”口号。在当时帝国主义国度内，“工人无祖国”是真正的国际主义的口号。

然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情形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民族的独立的确受了威胁，帝国主义者在行使着它的侵略并吞政策。所以在这里，一切先进份子的任务，是在策动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换句话说，正应该提出“保卫祖国”的口号才对。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际主义应该拥护“保卫祖国”的口号。这和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工人无祖国”的口号非但不相矛盾，而且是收得殊途同归的功效的。

以国际主义来反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只是证实了这反对者本人是一个反国际主义者，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辩护人而已。不过，无论如何这种反对的方法是很恶辣的。因为从下面来反对民族解放运动或是爱国运动，必然要遭受人民的唾弃；被视作为汉奸。例如，中山先生在满清时代就提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推翻满清统治的民族主义。当时的满清政府就把中山先生这种主张称为犯上作乱的大逆不道。满清政府的这种反宣传只能为官僚地主等反动份子的宣传，但是反要激起国内人民的忿慨，反要促醒人民的民族自觉。现在一般人民的政治认识当然已经不是二三十年前的情形所可比拟；因此满清时代



所用的反民族运动的理由已经不适用于今日。于是聪明的反对者便比人民站得更“左”，他们便从“国际主义”的立场来反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即是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爱国运动。这种反宣传比了正面攻击民族运动是会发生较大的效果的。

(四) 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

对于民族问题的另一种曲解，便是关于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关系问题。有人以为目前既然应该集中一切力量来解决民族问题，那么就不应该再谈社会问题；因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是不免要引起种种社会纠纷，减少了民族解放的力量，但是这种反对议论只是知道了事实的半面。

不错，在目前我们应该集中一切力量于民族问题的解决。谁要在抗敌以外，再耗损一部分民族实力，谁便是民族的敌人。在目前，民族的利益——即争取民族的胜利——应该高于一切。然而这句话并不能作为禁谈社会问题的解释。反之，虽其是为了全民族的利益，我们应该相当解决社会问题，相当改善劳动大众的经济政治地位。

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压迫，主要的也就是对于那里的劳动大众的压迫；非劳动者所受到的种种剥削，在最后仍旧是转移到劳动大众的肩膀上去的。所以，所谓民族解放，主要的也就是劳动大众脱离帝国主义压迫的解放。劳动大众是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主力军。这个主力军的力量如果没有完全发挥起来，那么解放运动难有成功希望。关于这一点是大家所明白的。

然而大家也知道，劳动大众的经济是早已陷于绝境了，他们



的社会地位是低微的，他们在政治上是受有种种束缚的。不把他们身上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种种桎梏稍稍松动一下，就决不能发扬他们的抗敌的积极性。所以，就站在民族立场上说，社会问题的相当解决也是必要的。不过这解决仍旧应该在“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总原则之下进行。所谓相当解决的限度也就是以此为标准：如果这解决足以发扬劳动大众的抗敌力量，而并不妨害其他阶层大众的积极性；或者虽然要减低其他阶层的积极性，但是劳动大众所新发挥的抗敌实力仍旧能够补充这损失的——那么这解决便是应该的。

所以，就是在国难时代下，在抗敌的时期社会问题的相当解决是同民族问题的彻底解决相辅而行的。

（五）对外的民族问题和国内的民族问题

中山先生解释自己的民族主义有两方面的意义：“一则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可见中山先生对于国内各民族的解放看得很重要的。然而中山先生的“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张虽则早已昭示于我们，但是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却是还没有完全健全化。

上面我们说过，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侵略我们的时候，曾经在我们国内制造了许多“民族运动”。满洲民族的“独立”固然全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创办的，因为满洲民族是早已和汉人同化了的。但是其他如蒙古民族、回教民族却仍独立存在着。蒙古民族和回教民族对汉族的关系未完全健全化，以至被敌人所利用——那是不可不论的事情。所以，国内民族问题的圆满解决也是抵抗



敌人侵略的一种重要方法。

在过去，中国政府对边境少数民族常用高压屠杀政策。地方官吏常由不通当地民族语言的人充当；把公事总是糊糊涂涂地敷衍了事，把贿赂敲诈当作是发财之道。住的，除官吏外，便是商人。商人们也常以种种欺骗敲诈方法掠夺当地人民。当地人民因为仇恨汉人的官吏商贾，因此便敌视到一般的汉人。他们这种仇恨往往是会被敌人所利用去的。

自己要压迫其它弱小民族的国家，就没有理由可以反对帝国主义对于自己的束缚。在另一方面，国内各民族的关系不健全化、不平等化，那么也就不能有统一的实力对外。所以，国内民族问题的解决对于抗敌前途是有重大意义的。

对于苏联革命的成功，民族问题的解决有起重大作用，当时，苏联解决民族问题的原则，就是：各民族有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所谓民族自决权），甚至可以互相分离。每一民族一定要享受这权利，但并不一定要实行分离。分离对各民族并不一定有利，但是某一民族如果已经决定如此干了，那么谁也无权禁止它。所谓民族自决权的解释便是“为了联合而分离”。一个民族只有完全有了民族自决权以后，才能在平等立场上，在国际主义旗帜之下联合起来。所以“民族自决”的原则，同中山先生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昭示完全吻合的。



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

在没有讲到本题之先，请允许我说几句题外话。不久前，很多人争论着中国经济的出路问题：重工乎？重农乎？……

主张重工的人，固然要多些，理由也比较充分一些；但是主张重农的人也还不少。主张重农的人往往捐出“我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的说话做理由。或者动不动就以我国人口 80% 是农民为借口，好像拯救这 80% 的农民除了“重农”以外就没有别条路可以走了。

其实我们的最老的祖先并不以农立国的，他们是以渔猎立“国”的。现今世界先进的工业国度也没有一个不从渔猎出身，然后又经过了长久的“以农立国”时期，再转为现今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就是把“以农立国”这句话的本身来说，也是很成问题的一句话。美国是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度，然而若以农业生产产品的绝对量而言，美国远胜于中国。前两年，我们这“以农立国”的国家反而要借了美棉美麦来救济。农产品在整个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所占地位也很高，在美国出口总额中而且还占到近半数左右（在 1925 年时，美国产品连半制食物在内占到出口总额 47.9%。）

* 原载《认识月刊》1 卷 2 号，1937，7，13。



显然，重农论者所说的“以农立国”是指人口中绝对大多数的农民以原始的落后的技术所生产的农产品占了全国生产量的主要部分。说得明白些，所谓以农立国就是指欧洲各国在中世纪时代所存在的那种经济状况；也就是我国在帝国主义未侵入以前所存在的，而且直到现今还没有完全脱离的那种落后的农业经济社会。所以在今天高唱“以农立国”无异是要拉着历史的车轮向后倒退，是抓住了我国社会经济构造中的最落后，最脆弱的一点作阿Q式的自夸。

然而，要特别声明的是反对重农主义论，并不就是抛弃全国人口中所占 80% 以上的农民，不顾他们的生活，而空谈经济发展。我所讲的正就是如何发展整个国民经济也就是如何使人口 80% 以上的农民脱离落后的经济情况，而赶上世界发展的列车。这并不是反对现在的热心的乡村运动者（他们在启发农民，教育农民以及组织农民共同负担改造中国国民经济等工作中都尽有不可磨灭的意义；）而只是指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前途，使乡村运动者不至同时代的前进背道而驰。

毫无疑义地，先进各国的发达的国民经济完全是建立在现代的工业经济上的。工业的发展决定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就是决定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所以分析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工业——的现状和前途，实际上也就足以了解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现状。

一、一般现状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工业是非常落后的。然而落后到什么程度呢？对此，还不是每个人都很清楚的。所以现在先举几个具体



的数字说明。

制造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是工业中最基本的部门。一个国度的工业是否发达，它的前途如何等等，都可以从这工业部门的状况来断定。

制造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一称重工业部门，这部门中重要的是钢、铁生产，机器制造，燃料（煤和煤油）开采等。然则中国的重工业发展现状如何呢？笼统的说，中国的重工业不仅落后而已，简直是十二分的幼稚。

下面是 1930 年世界重要各国钢铁生产额统计（引自李紫翔：“中国基本工业之概况与其前途”，《东方杂志》，30 卷 12 号：）

	生铁（单位百万吨）	钢（单位百万吨）
美	31. 60	41. 20
法	10. 00	9. 15
德	9. 50	11. 40
英	6. 25	7. 55
苏	4. 95	5. 25
日	1. 40	1. 75
印	1. 43	0. 60
中	0. 43 (1928 年)	0. 03

中国的铁的产额只有美国的 1%，日本和印度的 $1/3$ ；钢的产量只有美国的 $1/1200$ ，日本的 $1/60$ ，印度的 $1/20$ 。中国由于一般的工业不很发达，钢铁的消费本来也不很多，但是由于生产的落后，大半消费量还要靠进口外货来满足。据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1934 年第 1 回，上册 K327 页）的材料，1929 年到 1931



年三年之间，中国进口的钢铁量如下：

	1929 年	1930 年	1931 年
数 量	10119090 担	8817904 担	9384771 担
价 值	53128674 两	57092892 两	68988062 两

其次说到煤的采掘量。根据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的材料，世界各主要国的煤的采掘量和消费量如下表（见《中国经济年鉴》，第 1 篇，上册，J230 页——J232 页）（单位千吨：）

		1913 年	1928 年	1929 年	1930 年
美	产额	519060	522820	552306	482105
	消费	492784	501354	529754	462572
	{总额 每人}	5.1	5.2	4.3	4.0
德	产额	305714	316448	338614	288611
	消费	275728	291873	309596	263229
	{总额 每人}	3.7	4.8	4.8	4.1
英	产额	287511	241284	262046	247682
	消费	210744	191260	202000	192785
	{总额 每人}	4.2	4.0	4.1	4.5
法	产额	40050	51366	53736	53884
	消费	62119	68490	77305	78518
	{总额 每人}	1.6	1.8	1.9	2.1
日	产额	21315	33860	34257	31504
	消费	18021	34444	35447	32058
	{总额 每人}	0.4	0.5	0.5	0.5
中	产额	12800	25092	25437	26037
	消费	13002	23346	23224	24688
	{总额 每人}	0.03	0.054	0.054	0.054

中国的煤产额也只有欧美各主要国的产额的二三十分之一。



日本的储煤量是非常贫乏的，然而中国的煤产额还只有日本的 $2/3$ 强。若是以每一人的消费量而论，那么中国只有日本的 $1/10$ 左右；美国的 1% 。这些不仅显示出中国煤业的落后，而且显示出整个工业生产的落后（用煤少）。

煤油是比较更新式一些的燃料，而中国的煤油的生产也更落后。下面是1929年（危机前一年）中美日三国家的原油产额统计表（《中国经济年鉴》第1篇上册J234页——J235页）

美 1007323 千桶

日 5023 千桶

中 2 千桶

日本的煤油储藏量原是很贫弱的，然而中国的产额还只有日本的 $1/2500$ 还不到。至于同美国更不好比了。

一方面国内的煤油开采的工业几乎等于没有，而另一方面由于汽车，飞机和一切内燃引擎的使用普遍化，各种煤油的消费逐年增加着，因此煤油的输入便成了中国人口贸易中的重要商品之一。据《中国经济年鉴》的材料（第1编上册J234页）1931年时全国人口煤油共值97291000海关两；这真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大负担。

此外，如机器制造业，除了兵工厂以外，只有制造零件和简单机械的小工厂。电气事业对于一国工业化起有重大作用，但我国电气事业也非常落后，据《中国经济年鉴》第3编材料（L142页，）中国的发电力只有美国的 $1/48$ ，德国 $1/14$ ，日本、苏联和英国的 $1/10$ 。

中国重工业的落后情形，在上面所举的事实中，已经可以见



到一个大概情形了。不过在中国工业中，比较发达的还是轻工业；所以轻工业的情形如何，是更应该知道的。

我们且先从轻工业中的主要部门——棉纱纺织工业——谈起吧。下列统计表中可以看出中国纺织工业的现状和它在世界纺织业中所占地位：

	纱绽 (单位千绽)	织机 (单位一台)	人口 (单位千人)	每百人所 有纱绽数	每千人所 有织机数
英	42307	587964	46887	90	12.5
德	10109	222500	66616	15	3.3
法	10016	198200	41940	24	4.7
苏	9800	250000	168000	6	1.5
美	29040	613633	127521	23	4.8
日	10595	277343	68540	15	4.0
印	9686	189678	363644	3	0.5
中	4952	44000	450000	1	0.1

（引自《棉业月刊》一卷三期，1937年3月）

在工业落后的半殖民地，纺织业是新式工业的中心，是“具有相当基础的唯一的民族工业。”（《申报月刊》3卷9期，李紫翔“恐慌深化的中国棉纱业”）然而从纱绽总数计只有英国的 $1/10$ 强，日本的 $4.7/10$ ；而且只有殖民地印度的 $5/10$ ；以布机总数论只有英国的7%，日本的15%和印度的 $1/3$ ；以每千人所有织机数而论只有英国的 $1/125$ ，日本的 $1/40$ 和印度的 $1/5$ 。“具有相当基础的唯一的民族工业”的发展现状尚且如此遥远地落后在世界主要各国之后，那么整个民族工业的现状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轻工业中，还有面粉业也是具有相当基础。但是全国新式



的机器面粉厂每年只能生产 7200 万包，但是全国的销售量却有 12.2 亿包；即是说，机器面粉厂的产品只能满足全国需要的 6%。“不足之数，除由外洋输入年约一千四五百万包稍资调节外，余则殆皆仰给于旧法制造之面粉。”（以上均见《中国经济年鉴》第 1 编，下册 K39 页。）换句话说，全国的面粉消费量约有 93% 弱是靠“旧法制造的面粉”来供给的（外洋输入的面粉供给 1% 强的消费。）把机制面粉的产量同全国的总销量比较一下，就不难知道形式的面粉制造业还是如何的落后呀！

中国轻工业中，第三个重要部门便是缫丝业。全国丝厂最盛时有 350 家（根据《中国经济年鉴》第 1 回下册第 11 章缫丝业项目下所载。）以工厂数计算，多过于纺织厂一倍以上；但是以生产品总值和资本总额而言，则是缫丝业还不如纺织业的规模宏大。例如纱厂资本平均每家是 2402735 元（内华商纱厂平均是 1714976 元，日商纱厂平均是 2402735 元）（见《中国经济年鉴》，第 1 编下册 K190 页；）但是丝厂资本最多不过数十万元，普通不过数万元而已。据《中国经济年鉴》调查上海 100 家丝厂的资本有 89 家在 3 万两以下，其中 61 家在 2 万两以下。不过这里所说资本仅指流动资本而言。但是普通经营丝厂的都是只有流通资本，厂基及一切机器设备都是向人租来的。租价以丝车计，每部车租价每月 3 两 5 钱至 4 两之谱。普通每厂有车 300 部左右。故丝厂固定资本普通也不过一二十万两左右而已。较纺织厂资本相差几为 1 与 10 之比。

生丝是我国大宗出口货之一，自东北沦亡，大豆出产被敌人占有以后；生丝且已成为出口货中的最大宗了。但是正因为生丝



出产主要是向国外市场推销的；所以缫丝业的命运也完全操在外国生丝市场手中。前几年世界经济危机时，丝价大跌特跌，使各缫丝厂相继停闭。最不景气时，上海百余家丝厂，开业只有数家而已。近年世界景气稍稍恢复，因此停业丝厂也陆续复工，然而仍旧不能回到往昔全盛时代的状况。

但是我国缫丝工业到底发达到什么程度呢？它比先进国的缫丝工业又落后到什么程度呢？关于这一点，我们找不到各国的精确的生产指数可供参考。不过我们已经知道中国的生丝出口主要是运销到外国市场去的，所以中国的生丝出口量同丝业先进国——即日本——的生丝出口量的对比也可以看出中国缫丝工业的发展状况来：

中日两国生丝出口比较

	中	日
1931 年	136186 担	553600 担
1932 年	78219 担	540820 担
1933 年	77103 担	479125 担
1934 年	54544 担	502225 担
1935 年	76322 担	530060 担

(《中国经济论文集》，113 页，米楚章“中国的丝茧业”)

从上面这个统计数中可以看出，在 1931 年到 1935 年五年之间，随着世界不景气的开展，生丝的出口量，在中日双方都是减少了，不过跌落得最厉害的是中国，中国的生丝出口量在 1931 年时有日本的 24%，到 1934 年只有 16%，到 1935 只有 14%。这数字不仅表示出中国的缫丝远远地落在日本的后面，而且它的地



位还在一天又一天地低落下去。至于中国生丝远不如日本丝的价廉物美那是更不用说了。

纺织、缫丝、面粉工业可以说是中国的近代工业的三大台柱其落后情形如此；至于其它工业部门更不用说了。

二、这幼稚的工业还不全是民族资本的

从上面的简略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近代的新式工业还是非常非常的幼稚和落后；然而更可怜的是：连这一点幼稚而落后的新式工业也不完全是中国民族资本自己所有的；外资在中国工业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在中国的整个工业界，对国民经济发展前途起有最大作用的重工业是最幼稚而落后。可是就在这重工业中，外资的势力却占有重大的，甚至独占的地位。

据李紫翔先生估计，全国铁的生产 95%，煤矿的生产 65%，电力生产的 70%，煤的生产 99% 以上都已经握在帝国主义者手里（《新中华》，1 卷 20 期李紫翔：“中国基本工业与帝国主义”。）上面的数字，或者还不足以表示外资在中国重工业中的实际地位，因为有许多煤铁，或者有许多煤铁矿，或者因为资本小而受邻近外资设立的大公司所控制或者因债务关系在事实上早已受债权人的外国公司所完全支配。

纱布纺织业是中国轻工业中的第一大台柱，在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确“不能不被目为新式产业的中心”；是“具有相当基础的唯一的民族工业。”可是在这棉纱纺织工业中，外国资本——主要是日货——却支配了半个天下；而且外资支配下的半个天下大



有压倒另外半个天下的形势。下面的一张统计表显明地表示出了这一点：

		全国统计		华商		日商		英商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纱绽	1933 年	4131148	100	2742754	57.97	1103484	38.12	184908	3.91
	1934 年	4931831	100	2601291	58.78	1946532	39.41	184908	3.75
	1935 年	5022297	100	2850745	56.78	1941504	38.72	227148	4.52
	1936 年	9053317	100	2682538	53.08	2143633	42.43	227148	4.49
绵绽	1933 年	441454	100	141042	32.48	19017	44.40	2891	6.75
	1934 年	441657	100	144045	32.53	296092	66.88	2720	0.61
	1935 年	501450	100	157734	31.27	340356	67.47	6280	1.26
	1936 年	523710	100	153118	29.26	364232	69.60	6380	1.14
布机	1933 年	42234	100	21926	48.85	19017	44.40	2891	6.75
	1934 年	47024	100	21567	47.95	21606	45.91	2891	6.14
	1935 年	51009	100	24881	47.80	22127	44.47	4021	7.73
	1936 年	53221	100	23921	44.95	25279	47.50	4021	7.56
工人 人数	1933 年	232781	100	156244	67.12	63537	27.29	13000	5.59
	1934 年	223736	100	143144	63.98	67292	30.21	13000	5.81
	1935 年	207899	100	129216	62.15	68693	33.14	10.000	4.81
(公担)	纱绵 生产	3923180	100	2742234	69.90	1124839	28.51	62307	1.59
	1934 年	4092274	100	2775320	67.82	1152280	30.75	58694	1.43
	1935 年	3868237	100	2612481	67.54	1219295	3152	36461	0.94
(公担)	布 生产	1237194	100	510244	41.24	626579	50.65	100271	8.11
	1934 年	1345266	100	534131	39.70	716054	53.45	92081	6.85
	1935 年	1272059	100	364094	28.62	839175	65.97	69790	5.41

(1936 年根据朱楚辛先生材料，见《中华日报·经济情报周刊》1、9；其余各年根据《棉业月刊》1 卷 1 期)



从上面的统计表中可以看出，在中国近代工业的第一大支柱——纺织业界，外国资本（主要的就是日本资本）也是占着极重要的地位在全国纱锭总数中外资占 46.93%；在线锭总数中占 70.7%；在布机总数中占 65.05%（以上 1936 年的数字）；在工人总数中占 37.85%；在纱线总产额中占 32.46% 在布匹总产额中占 71.38%。换句话说，中国的纺织生产品差不多有半数左右的产品是外商（日商）纺织厂的出品，尤其在布匹一项中，外商纱厂差不多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71.38%）。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这就是外商的资本比中国厂要大许多。所以虽则在全国 141 家纱厂中（1936 年数字中国厂有 89 家而外商纱厂只有 52 家（日商 48 家，英商 4 家），但是以总生产量而言，外商纱厂却有胜过中国厂的形势。

（注）从上面的统计表看来，1935 年时华商纺织厂共产纱线布匹 2976575 公担，外商纺织厂 2163721 公担。以重量计，外商纺织厂还不及华商纱厂。但是其实价值较高的线和布匹绝对大多数都是外商生产的（外商占线绽的 70.74%，占布匹生产的 71.38%）。所以以价值计，外商纺织厂生产额决不会比中国厂低。

据《中国经济年鉴》的统计，中国境内的中日商所办的纱厂的大小比较如下：

	华商纱厂	日商纱厂
每厂平均资本额（元）	1714976	3463254
每厂平均工人数	2218	1793
每厂平均原动力（启罗瓦特）	1206	1484



每厂锭子数	29947	39877
每厂棉花消费额（担）	74939	70857
每厂纱产额（包）	21130	19653
每厂织机数	500	758
每厂布产额（疋）	236627	543599

(《中国经济年鉴》，第一编下册，K190)

照上表数字看来，日本厂的资本平均要比中国厂的资本大两倍有余。资本大则设备完善，技术进步；所以日本厂的工人平均数虽然比中国厂多，但是平均所用原动力以及平均锭子数和平均织机却要比中国厂多出许多。至于日本厂平均所消费的棉花数量以及平均纱产额所以比较中国要稍为少一些，则大概是由于日厂集中于布匹生产的缘故；所以日厂平均布匹产额却要比中国厂多两倍。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纺织业中的集合的趋势。据《中国经济年鉴》的材料：“全国 127 家（1930 年的数字——本文作者）纺织厂中，有 61 家集中于十四个公司之手，每个公司平均有两家或两家以上的纱厂，或集中于一处，或分散于国内各处。七家公司系华商经营，六家系日商所有，一家则系英商——其中日商纱厂的集合程度，尤在华商纱厂之上。80 家华商纱厂，仅有 25 家互相集合，而在 43 家日商纱厂中，则有 33 家互相集合。”(《中国经济年鉴》，第 1 编下册，K191 页。) 换句话说，日本的纱厂有大半是集中在少数垄断公司手中的。这种情形也同资本之雄厚一样，成了日本纱厂的重要的优越条件之一。

在轻工业的另外两个部门——缫丝业和面粉业——中，外资



的势力或者完全没有侵入，或者只有很小的势力。这原因或者是因为原料（小麦茧子）关系。而同时这两个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地位也没有纺织业那么重要。

外资占有重要地位的重要轻工业部门，除纺织而外，就要算卷烟业了。“我国每年卷烟数达 150 万箱（每箱五万枝），平均每人每年约消费 200 枝。此 150 万箱中，华商烟厂所供给者仅占 25%，洋商在华烟厂所供给者占 50%，其他 25% 则为舶来品。此种舶来品卷烟多为上等货品，故尤足增我国之漏卮，”外商烟厂资本雄厚，英美烟草公司在实际上就是中国烟草业中的霸主。以英美为首的几家外商公司的资本“仅上海一部分，已达 4216.6 万元。此仅以资本额计，若以其全部资产额计则在 4 亿元以上，至于华商烟厂，如上海号称规模较大之 60 家，法定资本总额仅 1546.1 万元，全部资产亦仅 7730 万元而已”（《中国经济年鉴》，第 1 编下册，第 K578 页——579 页）。

从以上所举事实，我们对于外资在中国现代工业中所占地位已经可以得到一个大概的印象了。总括起来说，在中国的重工业方面外资处于垄断的地位，在轻工业方面，外资也起有左右大局的作用。

三、外资工业和民族工业的不同的意义

但是说了半天，我们只不过说明了一个事实而已，这事实就是：中国的现代工业有许多是外资建立的。然则这事实代表什么意义呢？

有人觉得重要的是：在中国的国民经济中已经存在有这样的



一个现代工厂，或者这样的一个新式工业部门，至于这工厂或工业部门的老板是谁，那是无关紧要的。例如从前有人以为，在外国资本所设立的工业和民族资本所创办的工业之间，至多“仅仅存在数量的差别，而不存在质量的差别。——两者之间的排挤倾轧很类似于大企业和小企业的关系。”本文作者在《中国农村》月刊1卷12期，“财政资本的统治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那篇文章中对于这种错误的见解曾经批评过。如今再把这意见说明如下：第一，伊里奇认为，一般地说，在帝国主义时代，大小企业间的竞争已经就不是简单的“大小企业间的竞争，或技术落后的企业与技术进步的企业之间的竞争了。现在已经是垄断者窒息那些不受垄断组织的指挥的企业，窒息那些不被它的压迫和专横所屈服的企业了。”（见伊里奇著《帝国主义论》增订本，49页，新知书店总经售。）伊里奇在《帝国主义论》中且曾具体指出垄断企业窒息死那些非垄断企业的种种经济上的“恐怖手段”。然而显然地，帝国主义在殖民地所建立的企业所用以窒息殖民地民族工业的手段，除了一般垄断企业对非垄断企业所用的手段以外，更利用各种军事的、政治的特权作为武器（武力占领，政治压力，租界，不平等条约，领事裁判权等等。）。所以，我们如果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企业同中国企业的关系“很类似于大企业和小企业的关系，”那岂不是为帝国主义作辩护？

第二，我们如果承认封建残余势力和帝国主义束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二大障碍，那么一般地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现代工业的发展，也就是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的势力的发展。然而，如果发展的是外资开办的工厂，那么这当然就



不能成为反帝国主义的势力了。同时，它的反封建的意义也大为减弱。这不仅因为站在政治的利益上，帝国主义是需要同封建势力相勾结的缘故；而且因为封建关系的存在对于外资工厂的障碍是没有对于本国工业那样厉害的。例如地方割据，苛捐杂税是民族工业发展的大障碍，但外资工厂却往往可以回避掉这种障碍。在内战时，外商的轮船可以不怕扣留而成了独占的交通工业，外商的工厂打毁了可以要求赔偿，外商的生产产品可以在作战双方通行无阻。所以外国工厂对于这些封建残余之存在即使不加以积极支持，也无论如何不会积极起来反对它的。换句话说，中国的现代工业中外资势力强大在某一点上，正表示反帝反封建的势力软弱。

第三，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政策就是要把后者作为自己的食粮和原料的来源，看作是自己的工业经济的附属物。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在这原则之下喊出了“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口号，使华北成为帝国纺织业的原料供给者。所以帝国主义在中国所发展的工业主要是矿业和一部分的轻工业。而帝国主义在中国所开办的矿业其目的仅在于为本国重工业攫取原料；所以这非但不足以成为发展中国重工业的开端，而且成了这发展的障碍（原料已被夺去），换句话说，帝国主义工业之存在，往往非但不足以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工业发展地开端，往往成了这发展的障碍。

第四，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度创办工业，一方面固然投殖了好些资本到那里去，而另一方面从那里所吸收去的利润总数还要众多。所以就是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业投



资，与其说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经济的营养者，无宁说是这经济的吮血鬼。帝国主义的工业投资所赚得的利润养成了宗主国的大批食利阶级。

四、发展民族工业的障碍

我们举出几个具体的实例，借以说明帝国主义工业压迫和摧残民族工业的情况。

李紫翔先生在“中国基本工业之概况与其前途”那篇文章中，论及我国铁矿的时候要我们注意下面三点：

(一) 铁矿砂储量的 80% 以上，都握在几个中日合办的公司手中，除弓长公司尚未开采，鲁大公司陷于停顿，所谓中日合办的振兴公司和本溪湖公司实际完全是日帝国主义的垄断物；(二)无论官办，商办或官商合办的铁矿公司，现在都陷在衰落停顿之中；其中尚能继续开采的，大都借有日债，须供日本铁矿砂，如最老大的汉冶萍公司，资本额共有两千万圆；自 1903 年至 1926 年已借日债五千万日金；借款合同，非常苛刻。1913 年售铁合同规定该公司于 40 年内供给日本生铁 800 万吨，矿砂 1500 万吨。因砂价原定每吨仅日金 3 圆，亏本甚巨。即在欧战机会，铁价大涨之时，亦不能有大发展。后虽然几经交涉，每吨砂价始增为 3 圆 8 角，再增为四圆五角而也远在市价之下。矿砂的成色，规定必须含铁 65%，每增加 1%，加价 1 角；反之，每少 1%，亦减 1 角。含铁在 50% 以下者不要。因此，该矿出产最好的矿砂，必须输往日本。并且公司最高顾问，工程顾问，一律都为日本人。一切开支，不得日顾问的许可，不得支付；一切工程又须受日方工



务所的支配。二十一条中，关于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的形式虽尚未实行，然实际上汉冶萍早已是日帝国主义者的掌中物了。裕繁、宝兴、益华、振治、利民等公司，规模即狭小，亦与日有售砂合同；即硕果仅存的国人自营的湖北官矿局，产品的一部份，亦为供给日本国内钢铁厂矿砂之需要。（三）宏豫、泾铜、秣陵、龙烟、永平等公司在筹备中即已流产。如龙烟公司，规模亦甚宏大，其费于机器及厂屋者有数百万元，据谓现已根本放弃开采计划了。同时，既采各矿，除因欧战机会，稍有发展和盈余外，无不陷于难维现状，亏蚀日甚，日益直接间接隶属于日为帝国主义之下的状况之中！（见《东方杂志》，30卷，12号。）

伊里奇曾经指出“褫夺原料”是垄断企业压迫非垄断企业的最毒辣的手段之一。帝国主义对付中国民族工业当然更不会不采取这种毒辣手段，不过帝国主义除了用一般的经济的方法达到此种目的以外，更可以利用种种政治的和军事的力量。日帝国主义早在九一八以后，更把煤铁储藏最富的东北四省老不客气的占了去，而在目前华北的富藏实际上也早已成为日帝国主义的独占品了。可是帝国主义不仅掠夺重工业的原料，而且更想掠夺中国的轻工业原料。最显明的实例便是烟叶、棉花、盐。

英美烟草公司是外国资本在卷烟工业内的最大垄断者。中国的烟叶种植也就是在这公司的提倡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在烟叶原料的购买上英美烟草公司比中国卷烟公司抢了先，同时，因为英美烟草公司的资本大，在产烟叶的区域都设有自己收买烟叶的机关和烤烟叶的设备。而且，更以预借农本肥料的方法去束缚农民，使后者只好把烟叶卖给该公司。因此，中国的卷烟公司不仅



无力自己到产烟区收买烟叶，而且也无法插足去。关于这我们引证两段记载：

“洋商因资本巨大，所有烟叶市场尽受其操纵，使华商不能于价格低落时多多购备（烟叶愈陈愈佳），而在烟叶价高时，又不得不忍痛购进，以备制造之用。种种压制，遂使我华商因厂日就式微，卷烟业乃为洋商所垄断矣。”（《中国经济年鉴》第1编下册，K578页）

“年来华资烟厂直接向产烟区域收购烟叶之举，差不多已完全停止。本年除南洋，华成尚派人少量收购外。鲁豫皖的烟产差不多全归英美公司独家收买，英商颐中公司在膠济路一带，本年无敢为敌。因为能够独家垄断市场，任意杀作，所以本年烟叶价格就低廉非常，每担仅值十七八元。这种情形在河南许昌的烟叶市场上，特别显得露骨。而华资烟厂的原料需求就不得不仰人鼻息。”（1935年《中国经济情报》，生活书店发行。）

英美烟草公司对于卷烟原料的垄断在最后一、二年内是费过一番苦心的，如今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完全成功的境地在棉花方面，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开始实现它的独占计划。进行得很为热烈，成绩也很可观。最近两年来日本公私机关派往华北考察棉业的种种考察团和调查团不下数十次。除了临时的调查考察团以外，更有种种经常的研究统制机关：

“天津有华北农工研究所，事业费每年200万元，研究改良棉种，设立信用组合，贩卖组合等会社。华北棉花协会系由日本纺织业所组织，目的在统制棉产并与日本纺织业联合会、棉花联合会互相联络。东亚棉花羊毛协会系日本外务省所主动脉，目的



在开发棉产、改良羊毛事业。最近与中公司又拟联合日满棉花协会和山东棉花协会合组一东亚棉花协会。9月1日又成立中日合办的棉业公司，由兴中公司予以技术上的援助。

这一切活动都是与日本政府息息相关的。有许多简直是政府出面来经营的。例如拓务省关于棉花协会提出之华北棉花栽培之二次5年计划，由明年度（即今年）起每年补助50万元。又据8月22日同盟社消息，兴中公司与中国当局协力栽培棉花……在天津青岛设立农事试验所，在各县分设合作社，由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和拓务省出经费。……

……在8月间日本外务省东亚局长桑岛在大阪建议，主张在天津设立大规模之棉花堆栈公司，资本日金1000万元，以为统制棉花购买之中心。”（《中国农村》，2卷11期，1936年11月。）

近数年来，日本对于统制华北棉花的工作进行如此热烈，其成绩之佳是在意料中的。1936年7月中国纺织界巨子荣宗敬说过：

“日商纱厂制纱之原料不敷应用，特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扩充植棉区，以大量经费及棉种贷与当地农民，将来收获之棉花日商可得尽先收买权利……”（1936年7月6日《时事新报》。）

去年9月7日《中华日报》载道：“本年冀察等省棉花产量甚丰，惜乎遭受日商控制，以致华商无法前往购办……”

化学工业是现代工业中最新式的一种，它在国防上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上都具有重大意义。食盐是化学工业的重要原料。自从日帝国主义者在华北强占盐滩，强买卢盐的事情发生后，天津的



几家以食盐为原料的化学工厂便发生了缺乏原料的恐慌，以致被迫停工，或改造别种化学生产品。并且听说规模最大的永利化学厂且有南迁营业的消息。但是在帝国主义侵略者未曾从全中国驱逐出去前，南方也何尝是什么安全场所呢？

不自主的或是不完全自主的关税是民族工业发展的重大障碍，这是大家知道的。但是国内的税则也障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便宜了外商工厂，那恐怕是很少有人知道吧。为省事起，也引证人家的一段话来作说明：

“中国卷烟业资本家不断诉苦的是现在偏颇的统税制度。从前卷烟统税分为七级。1934年3月废除七级税改为二级税。凡每箱售价300元以上者课税160元，售价在300元以下者课80元统税。但是外商卷烟厂多制上等烟，华厂多制下级烟。上等烟每箱800—1,000元以上者，课以160元，税率不过15—20%，而下等烟每箱价格60元，课以80元税，税率则达120%。英美烟草公司不但在偏颇的税制上占到许多便宜，且因为政府预借税款，还可以得到一个八扣或七折的优待。”（1934年《中国经济年报》，1250页。）

以上卷烟业的情形，但在织纺业中的情形也复如此：

“照现行统税制度，分棉纱为二级。二十三支以下者（粗纱）为第一级。二十三支以上者（细纱）为第二级。第一级每包抽8元5角8分。二级每包抽税11元6角2分5厘。……但外商出品多在四十二支以上：华商出品多在二十三支以下。凡支数愈高，价格愈贵。支数愈低，价格愈贱。但在同一级中，须纳同样之税。所以支数愈高之纱即愈占便宜。例如第一级，一律纳8元5



角8分。而实在税率十支纱为从价5.2%；十二支为5.1%；十六支为4.8%；十七支为4.7%；二十支为4.6%；在第二级中纳十一元六角二分五厘，而实在税率32支纱之负担为从价4.94%；四十二支为4.1%；六十支为2.7%。日商多为四十二支以上细纱。华商纱厂所出者，普通多为二十支以下之粗纱。结果，实在税率平均日商仅纳从价3%左右；华商则纳5%以上，显然日商占优利地位。是以在实行之时，华商纱厂曾加反对，然终未邀政府之注意。”（郭斌佳，“申新事件与救济我国纱业之方针”，《东方杂志》32卷，7号。）

荣宗敬对往访记者说：“救济纱业，徒托空言。徵收税款，且复变本加厉。为本人计，不如将各厂一齐关闭，金钱精神，反少损失。”（同上）

然而，贪得无厌的侵略者，还不知足，还以税率太高为藉口，放纵走私运货。企图把中国民族工业的最后的洞开的门户都去除掉。企图把幼稚的中国民族工业完全窒息死。

最后，对于民族工业发展前途有重大意义的便是国内市场问题。中国的国内市场在形式上是统一了；但是在事实上变相的割据和地方上的苛捐杂税还未能完全消除。不过我们所要讲的还不是这些，而是这个国内市场的购买力问题。说到国内市场，我们就不能不联想到占人口80%的农民。因为他们是都市工业生产产品的主要购买者。然而这80%的农民，近年来经常几千万在那里啃树皮草根，连蕃芋都买不起，何论工业生产品。就是再除掉这些灾民不算以外，其余大多数的农民也在帝国主义侵略和苛重的封建剥削下，没有多少钱可以来购买工业品。



有人曾经取笑过苛重的半封建剥削这说法。他们认为苛重也只是量的问题，而不是质的问题，不能因苛重而就称之为半封建的。这样想的人们忘记了一点，如果乡村中租税利息等剥削侵压了农民的大部份劳动生产品，使农民求一温饱都不可能，那么试问那里有什么赢余（即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利润）来培植农村中的资本主义经营。另一方面全国 80% 的人口如果都处在这种境况下，那么全国市场即使统一，而它的购买力也如何有限，怎样可以做民族工业的发展基础？

五、结 论

说到这里本可以结束了。因为读过上面的文章以后，对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现状以及它的障碍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观念。结论是很明白的，不说出来，明眼读者也会理解。说了出来对于他们是多余的，对于不同意作者以上分析的，又不免害他们说一声：“总是那一套。”

但是，世界上每一问题的正确的结论固然只有一个，所以未免说来说去“总是那一套”，然而歪曲的说法似乎也并不多。所以也不免“总是那一套”。

不久前吴景超教授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检讨”，连载了好几期（231 期起）。吴先生认为中国工业不发达的原因主要的是缺乏资本，技术落后，管理不科学化等等，吴先生虽然把外货竞争也作为中国工业不发达的原因之一，但极不重视，至于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军事侵略等则大有不屑一谈的样子。总之，吴先生的见解“总是那一套。”



吴先生认为解决资本来源的途径有四：（一）由现有的工业来供给发展工业的资本；（二）取缔投机事业，使资金流入生产范围；（三）鼓励华侨投资；（四）利用外资。

吴先生引证了好几个工厂的实例，说只要经营得好，由工业本身滋生出的新资金来扩大营业是可能的。吴先生只看见常州大成纱厂和无锡的丽新纺织印染公司怎样在最近三四年内由数十万元的资本而扩大成了二三百万；但是他没有看到在整个纺织界中中国民族资本的势力是如何在一天一天的萎缩下去。吴先生只看见二个厂在四五年内发了横财，可是没有看到在同时期内“全国著名纱厂倒闭者，计上海 8 家，天津 4 家，无锡南通共 4 家，济南 1 家，青岛 1 家，汉口 1 家，一起有 19 家之多！”（郑森禹，“中国棉纺织业的危机”，《东方杂志》，33 卷 20 号）哄动全国的申新七厂拍卖事件，天津四华厂被日资强迫收买事件，在吴先生好像都没有听见。照吴先生的办法，正可以抓住了一两个事实否认了 1929 年以后的世界经济危机。

吴先生只见投机事业繁盛，和华侨不投资开发工业，不知道这正是生产事业已陷绝途，游资无处安放的反映。

吴先生以美国做实例，劝我们不要怕利用外资，他说欧战前，美国还是一个债务国，而现今已成为头等富国了。但是吴先生忘记美国早就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吴先生也忘记了，美国曾经过八年的独立战争，为的是脱离英国的羁绊；曾经过六年的南北战争，为的是解放奴隶制残余和统一国内市场。吴先生忘记了美国是这两次解放战争中的胜利者。



所以我们不以美国作例倒也罢了，如果要以美国为例，那么历史正告诉我们：中国要有自己的“独立战争”和自己的“解放战争”；而在目前，抗敌救亡的“独立战争”的要求更应高过于其它一切的要求。

中国的民族工业如果有了上面的政治上的前提，那么资本是不愁没有的，技术管理的改良更不成问题。这里俄国是更迫近的实例：帝国主义大战和国内战争时的俄国人民连肚子都吃不饱，那里有什么资本，又那里有什么外资可利用。可是政治上的障碍去除之后，俄国人民几乎赤手空拳全不依赖别国的帮助，在短短十数年间就建立了一个簇新的，工业国！

1937年7月13日



战时的农民运动^{*}

一、抗战中动员农民的特殊任务

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在自己的解放战争中，不依靠新式的军备来取得胜利，也不依靠发达的工商业和严密集中的经济政治组织来取得胜利，反之，在这些地方，与其说是我们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的优点，无宁说是我们的弱点。我们所藉以战胜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只有人民大家的一致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的决心。当然，我们不是轻视战争中的物质因素——财政和军备。不过我们是深知自己的优点和弱点的。我们要以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手中的一分一文的血汗钱积聚起来抵抗帝国主义国家的庞大集中的垄断资本，要以千百万英雄的民族战士的血和肉来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军队的飞机大炮。这跟义和团的原始暴动者想光以血肉之躯来抵御帝国主义的枪炮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我们的新式军备虽则不如敌人整齐充足，然而我们也有几十万具有现代武装的精兵；我们的工业生产虽没有敌人发达，然而也并非是一些基础也没有。我们的任务是在于怎样以最经济的办法支配我们的贫

* 单印本，生活书店出版，1937，10。



乏的财政，以最小额金钱作最大用途。我们的任务更在于怎样来把我们现有的武器尽量发挥它的威力。军器不仅是人所制造的出来的，而且是要由人来使用的。士兵没有作战意志的军队，虽有最新式武器也无从发挥其威力；但是具有牺牲决心的小队伍往往战胜了武装齐备人数众多的军队。在这里，起着决定作用的是人的因素，而不是物的因素。如今在我们的全国抗战中，最有发展途地的，而且在过去最被人忽视的也就是这个人的因素。所以，我们为了弥补自己的物质因素的弱点（经济的不发展和枪械的比较不充足），就应该尽量动员我们的人的因素；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加紧我们的国民总动员。

帝国主义在发动它的侵略战争的时候，也要实行它的国民总动员的，而且因为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是早就具备的，它对于战争是积了许多岁月的准备的。所以它的动员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倒反而比较有计划，然而就动员的形式和内容而说，跟我们的动员是完全不相同的。在帝国主义国度中所谓全民总动员，实际上说是加强统治阶级（尤其是其中的军事法西主义的上层份子）对于全国经济政治社会各机构的编制和对于全国人民的压迫；是在于怎样利用战时动员的名义来麻醉人民并剥夺人民所已经争取到的自由，消灭人民的自主的活动能力。反之，我们的动员是在于发动最广大的民众，使他们自觉地来参与抗战；尽可能解除他们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束缚，使他们的个别的利益同民族的存亡相联系起来；发扬他们的自主的活动力，使他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独立的战士。

在我们的动员中，最不能忘记全国人口中占十之七八的农民



大众。如果农民大众还没有被动员起来，那么全国动员只是一句空话而已。随着抗战之延长，农业及农民的意义也愈加变得重要。在抗战过程中，工业生产除与战争有关系的若干部门以外，大半将日趋衰退，都市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将逐渐低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年，欧洲有许多国度都恢复到了物物交换的自然经济。甚至在许多工业发展的国度，经济重心也从都市而移到了乡村。都市的居民有一部分回到了乡村中的老家，以农业劳动来维持生计。我们本来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这样的命运自然更容易到我们的头上来。我们为了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就得先来动员这个作为人力和物力的主要来源——农民。乡村工作（或农民运动）在目前应该是全国总动员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二、农民运动中政治动员的重要性

不久以前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拟了一个非常时期的乡村工作大纲草案（见附录）。在这方案中把目前的乡村工作在大体上划分为两个项目：即（1）组织训练和（2）农业生产及粮食储备。前一项（组织训练）即是农民的政治上的动员；后一项即是农民的经济上的动员。当然，前一项工作是最主要的工作，因为如果没有政治上的动员，那么经济上的动员是不可能的。

农民大众的政治动员，即组织训练工作的进行，在消极方面至少可以做到防止汉奸的活动；在积极方面可以培养农民大众抗战的自觉性和能力。把散漫的农民大众团结为铁一般的大军，协助正式军队作战，作为正式军队的最好的补充（因为农民都已经



受过相当的政治军事训练了）——这是在最短期内实现全国皆兵的最好办法。最后，农民运动的开展和农民组织的成立以及农民的积极参与抗战，可以保证抗战的彻底完成并且保证它的最后胜利。

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随着抗战的持久和都市经济的衰落，农业生产在全国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重，比较以前将要愈加增高了。换言之，越到后来，农村将愈加要成为抗战军费的来源地，农民将愈加要成为抗战军费的主要担负者。然则，政府当局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向农民取抗战所必需的军费呢？用过去军阀内战时摊派兵差的方式来取吗？这是要不得的，而且是不必要的。要不得的缘故，就因为这样就会逼着农民以对付军阀的态度来对付执行抗战的政府当局。结果，将使全国的民族抗战联合阵线陷于破裂，甚至使一部分的农民将被敌人汉奸利用了去反对抗敌阵线。不必要的缘故就是因为这笔军费不是用去进行军阀的内战，而是用以来维持抵抗日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这战争非但不与农民大众的利益相矛盾，而且是同他们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不必用强制的方式来叫农民拿出这笔军费来，而可以用说服的方式叫他们自愿地拿出来。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能忽视农民的政治动员（组织和训练）。这样，抗战军费的募集倒变成教育农民和组织农民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了。有健全的农民组织的地方，甚至可以就把军费的征募，不论经常的或临时的等工作交给农民组织自己去办。这比较由政府机关来办理有许多优点：第一，建立在民主原则上的健全的农民组织，可以免去官办的征发机关中一切上下其手通同作弊的缺点；第二，农民对当地情形比



政府官吏熟悉，他们知道每一村民的负担能力，不至发生负担不均或逃避征募的情事；第三，由农民自己来办理，可以使他们每个人都理解。他们出的金钱或物品是涓点归公扫数拿去充作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正当用途的。这样可以扫除他们的疑惧心，推动军费的征募。

以上是说的抗战时期向农民征募军费的方式。但是我们也不能不为农民的负担能力考虑一下。如果他们的能力根本不够，那么即是用了最民主最完善的方法，也没法从他们的贫困的身躯中榨出必要的军费来的。因此，我们就应该进一步来想法增进他们的生产能力。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所拟的工作大纲草案的 B 项便是专门关于提高农产品的产额和储藏的。

三、抗战中改进农业生产的必要和内容

在抗战未获最后胜利，中华民族尚未脱离它的主要敌人的羁绊之前，在妨碍中国一般国民经济发展的种种因素尚未消灭之前，农业生产的彻底改革是不可能的。然而在走向完全胜利之前，做一点局部的改革是有可能的。农民组织的存在和对农民的相当的技术训练，可以使得社会改革未完全实现之前就可以实行若干浅近的技术改革。农民的生产组织之变更，至少可以使现有的农业生产不至因战争而衰落下去，甚至还有可能相当增加农业生产。这并不是什么脱离现实的空想。譬如造成现代的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主要动力是机器，然而在资本主义工厂未产生之前，就有资本主义的手工业作坊存在。手工业作坊的技术基础仍旧是手工技术，然而因于劳动组织的改变，已经成了资本主



义工厂的雏形，使劳动生产力也比较以前增加了。同样，在目前的环境下，我们自然不能希望根本改造全国的农业技术，因而亦不能希望农业生产力有什么飞跃的进展，但是我们如果能够在局部的技术改良之外，相当调整现在的农业劳动组织，那对于农业生产力的推进一定也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我们的任务是在于怎样来改造农民的自私自利的恶习惯，打破他们各自为谋的个人行动。在目前，我们当然不能希望（而且也不应希望）在农村中推行集体农场制，因为这是需要有其它许多社会的和经济的条件为前提的。但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工作大纲中 B 项所列举的各点——如兴办水利、提倡造林、推广现存环境下可能实现的技术改良、垦殖荒地、代士兵家属及老弱残废耕种田地、在战区内以最迅速的办法结束某种农事、储藏粮食等等——是可以用农民的集体力量来执行的。这种局部的集体劳动在这非常时期也是必要的；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那么孤立无援的农民便无从抵抗战争的破坏力。但是要实行工作大纲中 B 项所规定非常时期农业生产的改革政策，必需先实行 A 项的政治总动员（即组织训练工作）。而另一方面在推行这些生产改革的时候，可以灌输农民以政治的教育，养成他们的集体生活的习惯。例如在农民为士兵家属耕种田地的时候，或是在战区内农民要以非常手段处理某种农事的时候，我们便可以把宣传日帝国主义军队惨杀平民，劫掠农家的情形告诉他们；在他们以共同力量兴办水利的时候，便可以告诉他们成立经常组织的必要等等。

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非常时期乡村工作大纲》拟好之后，有几位朋友对于列入提倡造林运动一项表示反对。他们的理



由有两点：（1）过去各地的造林运动都失败了，我们何必再来做这徒劳无功的事情；（2）在目前比造林运动更紧要的工作多得很，我们把自己的精力分散到这种不紧要的工作上去未免太不经济了。其实这两种理由都是似是而非的。处在战区的环境，眼看着繁华的市街变成了废墟残垣，美丽的田野变成了荒凉的战场，若是大谈其造林运动，似乎太优哉游哉了。然而，抗战不是一朝一夕便可分胜负的，不能以为总算账的日子已到，一切生产事业就可暂时不管，等到全国打退了敌人再说。罗店张家口等战地在幅员广大的中国还只是一小角而已。在火线附近去推广造林自然未免太“镇定”了一些。然而，如果在内地，尤其在西北边区等地，去推广造林，就并不能说是一件多余的不紧要的工作。反之，在离前线较远的地方，这些收效比较久远的建设为了维持日后的长期抗战中的农业生产，却是非常必需的。而且，在离战区较远的内地，造林等经济建设运动也是教育农民，训练农民的一种形式。在过去，造林运动是官办的，不仅与农民利益漠不相关，而且往往因造林而增加农民的负担，剥夺了农民的柴草来源。这样的造林运动得不到农民的拥护，甚至要遭受他们的反对，那是必然的。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先使农民理解了造林对于他们的利益，以他们的集体力量来推行造林运动，那么这运动之不会像过去一样徒劳无功也是不成问题的。而农民自己举办的事业的成功更可以增加农民的自信心，可以进一步使他们在日常生产事业的实践中，理解群众组织的力量。

总之，非常时期的农民组织训练工作同农业生产的调整工作是有密切的联带关系的。没有政治上的动员，没有农民的组织训



练工作，战时农业生产是难于改进的，甚至很难维持的。但是，另一方面脱离了农民的生产事业，组织训练工作也是不容易进行的。

四、怎样着手做抗战中的乡村工作

以上是关于抗战期内农民运动或乡村工作的内容问题。如今我们再来谈一谈如何着手做这工作。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乡村工作大纲草案发表之后，就有很多人来探询本会是否已经有乡村服务团的组织成立，或是来询问怎样回家乡去着手组织乡村服务团以便推进乡村工作。我告诉他们，中国农村经济会并没有成立乡村服务团的组织，而且也不希望回乡工作的人，马上到乡下去成立乡村服务团。因为中国乡村经济研究会是一部分人的团体，它不能单独的来成立这种全国性的团体。据近年来爱国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多建立许多缺乏实际基础的空头团体，非但不能帮助实际工作的进展，而且徒然产生了许多原来可以避免的磨擦和误会。

如果一位热心的乡村工作者不愿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各方面的社会关系，也不问自己的事业工作有多少实际基础，就随随便便的去成立一个乡村服务团；那是徒然为自己的反对者建立一个攻击标的。从而使不受到各方面的正面的反对，也将因此而限制了自己工作的发展。反对者的动机也有是从政治的观点出发的。乡村的豪绅统治者们由于自己的“先天的”惧怕群众运动的习惯，看到你大吹大擂地组织群众团体，发展群众运动，就害怕这运动将会动摇到他的统治权，因此他将会不问你的工作内容，用种种方



法来破坏你。但是往往也有很多人反对你做乡村运动并不是由于政治的动机，而是由于纯粹私人的利害关系（说明白些就是饭碗问题）出发的。我们知道，在内地对于几块钱一月的饭碗都是争夺得很厉害的。不论在教育界抑是党政界，往往为了争夺饭碗结成许多派别，各自把住一二个机关以位置私人。我们如果不了解地方上这些复杂情形，冒冒失失，成立乡村服务团，在自己虽是完全为了想发展救亡工作，可是在他们却不免要怀疑到你们是想在家乡抢夺饭碗。因此他们也就会勾结了那些有政治成见的豪绅地主来捣乱。我们如果在群众中有相当基础的，那么还可以用群众力量来抵抗他们。但是在开始做工作的时候，我们的群众基础一定很薄弱的，因此很容易受到这些人们的严重打击。此外，也有许多人对于我们的工作并不恶意的反对，但是因为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展开，各方面的人还没有团结起来，便拉了几个熟人成立了一个团体，于是使得许多本来可以来参加工作的人先存了一个门户之见，减低了他们的积极性，阻止了他们的创造能力。所以这种“早熟的”团体在事实上是一种变相的关门主义，它以空洞无基础的团体组织形式限制了工作的开展。

所以，我们劝热心从事乡村工作的朋友，在开始工作的时候，不要先急于建立组织的形式，而应该从你自己的周围多做切实的工作着手。如果你自己或你的朋友是一个小学老师，那么你应该先在这小学校周围的农民中着手做起；如果你还认识一位县里的中学校的校长或民众教育馆的馆长，那么你更可以推动他或是帮助他从较大的范围着手做起；如果你在当地的党政机关中有你的熟人，而他对于你还相当信任，那么你就更可以推动他或帮



助他运用他的地位来发起救亡运动。反正我们所做的是爱国救亡工作，目的是促成目前政府领导的抗敌战争的胜利。这工作是不论何种人，不论在何种机关下都可以做的，而且也都应该做的。心急着成立一个新团体来执行这工作是多余的。等到我们的努力有了结果，救亡工作在乡村中已经普遍地发动起来了，那时再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中心领导机关。这样成立的团体才是真正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团体，才能真实地推动工作的进展。所以，我们的方针应该是：不要成立空头的团体，先从自己的周围，利用现存的一切机构，多做切实工作。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这样做工作，便可以完全避免同人家冲突。社会各个阶级，由于自己的不同的经济的政治的利害关系，对于抗战的决心是不同的，对于群众运动的态度更是分歧的。何况全国各地，到处都有受敌人利用，公然或暗中来破坏爱国运动的汉奸。克服动摇和妥协，铲除明的或暗的汉奸，都需要经过剧烈的斗争。不过如今政府和人民，既然都是站在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上，在抗战第一的总原则之下为民族独立而奋斗，民众方面对政府已不采取革命的手段来推翻政府，而政府也已经开始放弃镇压民众的政策。所以民众在执行铲除汉奸和克服动摇妥协份子等工作的时候，就不应该——而且也不必要——再离开了现在的政治机构来做。

在这里，让我们顺便来谈一谈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农民生活的改善问题。在抗战第一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农民们自动放弃了对内的土地革命。为了完成联合阵线对付民族的共同的敌人起见，这是必要的。然而往往有人就把农民方面这种让步，曲解成为不



应提出任何减轻经济剥削和解除政治压迫的要求。不用说，这是很卑劣自私的一种曲解。让步应该是双方的。站在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上，相当减轻农民的经济削削和解除农民的政治压迫是必需的。在政治上处于不平等地位，在经济上受高利贷和封建地租以及各种苛捐杂税压迫下的农民。决不能把他们动员起来做一个积极的抗敌战士。提高农民的政治地位，减轻他们的租税高利贷负担，并不能视作是对内的土地革命，而只是爱国统一战线的一种必要步骤。每个乡村工作者或农民运动者，如果真的想动员广大的农民大众起来参加抗战工作，那么他必须时时刻刻不应忘记替农民争取这些要求。当然，这种争取也是不能够脱离了民族统一战线，同现在的政治机构采取了对峙的立场来进行的。

附：非常时期乡村工作大纲草案^①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拟订）

为实行全国全民总动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起见，必须动员全国三万万五千万之农民。为完成此任务，建议在中央政府以下各级政府机关下，设立乡村服务指导委员会，以指导各地乡村工作。该委员会人选由政府聘定各农业团体，乡村工作团体，及其它与农村有关之团体代表及专家组织之。乡村服务指导委员会之最下级机关为乡镇中之乡村服务团。各乡镇中之乡村服务团，领导附近各村之乡村服务工作，由当地热心人士，学校教师，乡村

^① 这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理事会所拟的草案，希望乡村工作者及农业专家加以讨论批评，以便修改后提供政府当局及各乡村团体之参考。通讯处上海蒲柏路广余里十八号本会，或南昌南黎洲路一号农村合作出版社薛暮桥转。



工作团体共同组织。应受党政机关指导。以打破政府与民众间之隔阂。乡村服务团之工作内容约分如下：

A. 组织训练

- (一) 充实原有保甲制度，防止汉奸活动；
- (二) 整理原有乡村间各种民众团体，养成农民团体生活，洗刷“中国人散漫无组织”之耻辱，增强抗敌实力；
- (三) 推广义务教育、成人教育，发展中心民众学校、民众教育馆等类组成，并改变其内容，宣传抗敌爱国思想，加紧组织民众和训练民众等工作，使其适应非常时期之需要；
- (四) 成立互助基金，举办公益事业，并救济本村伤亡士兵之家属及老弱残废；
- (五) 充实壮丁训练，灌输农民军事知识及政治知识，以提高农民抗敌之情绪及能力；
- (六) 组织乡村保卫队，维持地方治安，使正式军队及保安队等可以完全开赴前方作战；
- (七) 此种保卫团于必要时可加入前线协助军队作战，与敌军占领时可以改组为抗敌游击队；
- (八) 组织交通运输队，协助军队运输事务；
- (九) 组织响道队、谍报队；
- (十) 组织救护队、救济队，协助伤兵救护及难民救济工作；
- (十一) 于国军撤退后，从事道路破坏工作。

B. 农业生产及粮食储藏

- (一) 推广农业改良技术，惟以目前环境中易于实现者为限；
- (二) 由国家储备改良种籽，以廉价售于农民；



(三) 现在战区内，农民自备种籽已被毁坏或散失者，政府更应免费散发，以维持生产，必要时且应发售农具及牲口。

(四) 减少成熟期较长产量较少之精细作物之栽种，增加成熟期较短产量较丰杂粮栽种（尤以接近战区之地方为然）；

(五) 以集体力量代出征士兵之家属及老弱残废耕种田地，以免生产减缩；

(六) 于战事紧急时，亦可采用上述集体劳动办法，互相替换服务，使某一区域内某种农事（如收获）得于最短期内完成；

(七) 以集体力量兴办水利，推广造林运动；

(八) 以集体力量有计划地垦殖荒地，以增加农业生产；

(九) 提倡农家副业（如养猪、养鸡、养鱼）；

(十) 推广野生植物之采用（如含有滋养料之草类及蕈类）；

(十一) 粮食之储藏，除农本局及其它公私机关原已创办之大仓库外，在每一乡村中，更应按大小规模之库仓；此种小规模之仓库可以利用乡村庙宇祠堂或农家之余屋改建，较之大仓库有以下数种优点：(1) 费用小；(2) 不易成为敌军轰炸目标；(3) 敌军占领该村后，易于藏匿。



十月革命的教训^{*}

十月革命给与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教训太大了。

因为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地球六分之一的面积上建立了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那里，正在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

然而，十月革命给与我们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运动的教训更要大。

因为，十月革命发生在经济落后、农业人口占优势的俄罗斯。十月革命虽则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然而在这以前，先经过了长期的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在 1917 年十月革命以前，先有同年二月革命的胜利，和 1905 年革命的失败以及 1905 年以后的近十年的黑暗的反动时期。在 1905 年以前，更有无数次大规模的原始的农民暴动。十月革命是这些胜利和失败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直接继续。十月革命固然可以给我们许多宝贵教训，就是 1905 年革命的失败和 1917 年二月革命的胜利也有许多教训可以让我们学习的。

* 合著《中国与苏联》中的第 7 章，原载《民族解放丛书》光明书局出版，1937，11。



1917年二月革命以前的俄国还是一个半农奴制的专制国家，二月革命推翻了贵族地主领导的沙皇政府的统治，然而二月革命并没有解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任务——土地革命。但是二月革命的主要意义却不在这革命的本身，而在于它成了十月革命的序幕，在于革命运动并未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上，而急转直下地踏入了第二个阶段——社会主义革命。二月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直到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才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我们也曾经有个1911年的革命（辛亥革命）和1925年—1927年的大革命。我们也曾经推翻了满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在表面上革命是胜利了。然而我们没有能够解决我们的革命的中心任务：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和根除封建剥削的土地问题。所以在本质上，我们的革命只能比之于俄国1905年的革命，换句话说是失败了。这原因就在于我们的革命还没有达到最后的胜利，就在这阶段上中止了。

1927年的俄国二月革命为什么不曾中途夭折，而能直接“转长成”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呢！这里除了种种客观的原因以外，主要的原因就是革命性最彻底的工农大众成了革命的主力军，使得别的社会阶层的动摇或退出革命，不致于牵动到全局。所以争取工农势力的发展和他们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之取得是争取革命彻底胜利的主要保证，也是十月革命给与世界革命运动的第一个教训。

俄国本来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度，产业工人在全国人口中比较占少数，最大多数的人民是农民小资产者。这本来是俄国无产



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弱点，然而俄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因为能够运动正确的土地政策，却把这个弱点变成了革命势力的最大泉源之一。革命前，俄国的农民处在地主贵族的半农奴制的束缚下，他们需要解除这束缚，更需要耕种的土地。贵族地主当然不能成为农民的解放者，不能给他们土地，资产阶级也只能给他们一些口惠，而不能实际上满足的要求。然而无产阶级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号，给了农民们自由，更给了他们土地。这样就把千百万农民大众团结在革命的旗帜之下，增厚了革命的势力，也就是孤立了革命的敌人，而使无产阶级成了革命的领导者。这是俄国的多数党所以胜利的关键，也是少数党、社会革命党以及托洛茨基派所以失败的原因。澈底解决土地问题，是保证十月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也是十月革命给与世界革命运动的第二个教训。这教训对于我们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更有重大的意义，因为中国是更落后的国度，农业人口在这里占人口中绝对大多数，所以土地问题的解决和农民大众的动员对于民族解决运动的前途更具有决定的意义。当然，土地问题之解决方式在革命运动发展的每个具体阶段是并不完全一致的。例如，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阶段，以没收土地来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是不适用了。

俄罗斯帝国是一个包括民族最多最复杂的一个国度。在革命前的俄罗斯帝国，民族问题是它的一个弱点，然而它却成了十月革命的另一个力量的泉源，成了今日的苏联所以如此巩固的主要原因之一。俄罗斯帝国的一亿七千万人口中，大俄罗斯民族还不到七千五百万，其余一亿左右的人口全是被压迫的民族，换句话说，全是俄罗斯帝国的敌人。十月革命把这些民族解放了起来，



革命后的苏维埃政府继续尊重革命的民族政策，而且在事实上履行了这些政策，于是这一亿左右的被压迫民族（除了少数上层分子以外，便成了十月革命的拥护者，成了苏维埃政权基础之一。十月革命所标榜的和革命后苏维埃政府所遵守的民族政策的内容，简言之就是：大俄罗斯民族放弃自己在非俄罗斯民族所居住的各区域内的一切“权利”和“要求”，事实上承认这些民族有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这些民族与俄罗斯民族可以自主的订立军事经济联盟；援助落后民族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发展（没有这种援助，那么所谓“民族的平等”只是一句空话；）彻底解放各民族中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份子，把土地和政权都交给他们，同时，苏维埃政府更在事实上证明自己对于“民族自决”这一基本原则的忠实，例如承认了芬兰的独立，撤回了驻在波斯的远征军，放弃了在中国的一切帝国主义特权等。所以民族问题的彻底解决是十月革命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十月革命给与世界革命运动的第三个重要教训。十月革命的领袖列宁曾经说过“压迫其它民族的国民是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的，”在这里也可见俄国革命家对民族问题的重视程度了。中国国内的民族虽没有苏联那样多而复杂，然而民族问题却是当前抗战期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因为敌人正在利用我们国内各民族间的不大圆满的相互关系，来挑拨民族纠纷，分散我们的抗战实力。我们在今天更应重申孙中山先生的“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革命主张，并以革命精神在事实上履行这政策。

十月革命给我们的教训是太多了，我们要把这些教训都举出来，那简直是举不胜举。总之，俄国十月革命所以能够胜利，就



因为俄国的革命的阶级及其政党，尤其是它的领导者处处能够了解大众的最迫切的要求，并且能够采取适当的革命政策，来满足这些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使大众热烈地来拥护革命，而革命的政党和他的领袖才能成为千百万大众的革命领袖。

例如，十月革命中，除了民族解放和土地革命以外，民众还要一个更迫切的要求便是和平。于是争取和平或对德奥休战，便成了俄国革命者所提出的主要要求之一。在今天的中国，和平也是四亿五千万同胞的一致愿望，因为他们的和平生活是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破坏了。然而这和平却不能以对日休战来求得，反之，只能抗战才能恢复我们的和平生活。所以，在中国任何政党，任何政治家要得到全国四亿五千万人民的拥护，就应该领导他们进行彻底的抗战。

列宁是俄国革命的领袖。因为他能够了解大众的要求，而且能够提出最适当的政治口号来达到这要求。所以俄国的革命大众都拥护列宁做领袖，而列宁自己也最能信任革命大众。每到革命的危急关头，列宁便向大众说话，要求他们起来支持革命。例如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要求俄国军队的总司令向同盟国军司令提出议和，并且下令部属停止军事行动。但是总司令拒绝了这要求。于是列宁便利用无线电向国内和外国的人民和士兵直接发表了革命政府的停战宣言。这样不仅中止了前线的战争，而且推翻了俄国总司令。列宁是常常用这种战术来同他的政敌作战的。

十月革命胜利后到今天已经二十年了。革命后的苏联又经过了四年多的内战（1917年—1921年。）国内经济曾经完全被破



坏。可是内战结束后苏联劳动者即以极快的速度恢复了自己的国民经济，到了1928年就已经恢复了战前的生产力。此后，又经过了两个五年计划的努力，才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度改造成了世界第一等的工业国度。苏联在这十余年来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建设中，当然更有许多宝贵的经济可以做我们的教训。然而在这里，我们最不应该忘记的教训便是：今日苏联的胜利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以1917年的胜利的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为前提的。没有二十年前的十月革命便不能有今日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不久以前，有许多人当着日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军队占领了我国一半版图，当着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铲除封建残余的民主主义运动未达到胜利之前，（即在政治前提不存在的场合下，）奢谈国民经济建设，都是忽视了十月革命的这一重大教训。



因苏联经济建设 的成功想到我们当前的任务^{*}

自从苏联的第一届五年计划完成之后，就是苏联的仇人也不再否认它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功了。虽则国社党的报纸有时因为造谣成了习惯，偶然还要登载些乌克兰地方大荒年，饿死多少人之类的消息；然而大家知道这已经是公开的说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家是最势利不过的，要不是苏联的国力充实了，李维诺夫的说话决不会被他们重视。近年来，不仅苏联的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是增加了；而且连它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所占的比重也一天复一天地增高了。苏联的对外贸易委员部成了世界各国资本家最受欢迎的阔买主；这是最使得他们嫉视而又无可奈何的事情。

如今第二届五年计划又要完成了，气魄更伟大的第三届五年计划就快要开始实行。全世界各国人民正在准备着新的庆祝会：庆祝苏联一亿七千万劳动大众的新的胜利。

苏联是我们中国人民在争取自己的自由解放的苦斗中的最忠实可靠的友人，也是我们的先驱者。苏联的新胜利更鼓动了我们的斗争的热情，更坚定了我们的牺牲的决心。在过去，在我们中

* 原载《救亡日报》“苏联革命二十周年纪念特刊”星期日第4版，1937，11，7。



国，有许多人只知道苏联经济建设的胜利是一亿七千万人民“埋头苦干”的成绩，而不知道这更是俄国三次大革命中无数万英雄战士的鲜血培植起来的果实，他们不知道这是苏联人民推倒了皇室贵族的统治，铲除了英法资本操纵下的克伦斯基政权，驱逐了十数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的队伍之后，才能建立起来的，换句话说，苏联经济建设的成功是具有它的政治的前提的。

在过去，在我们中国也在很多人没有具备必要的政治先决条件下，想像苏联一样来建设自己的国民经济。日帝国主义的大炮惊醒了许多人的和平建设的迷梦。如今我们大多数的中国人民都已经彻底的了解到：我们要有和平的建设，至少需要先铲除阻碍中国和平建设的第一个恶魔——日帝国主义者。

所以，我们在庆祝苏联第二届五年计划成功的时候，更应该为争取对日抗战的彻底胜利而努力！



反战反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财政资本的统治感受极端动摇以后，撕破了议会制度民主政治的假面具，公开用暴力和恐怖手段来维持自己统治的一种独裁政治。它最初出现于世界大战后的意大利。但是在当时国际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的动荡没有像今天这样普遍和猛烈。当西欧各国的政治经过了一次大动摇以后，财政资本家感觉到自己的力量，还足以在议会制度的民主主义假面具下保持自己的统治。因此，法西斯运动也未曾普遍地在西欧取得胜利。但在 1933 年德国国社党取得政权以后，国际形势便起了重大变动。1929 年起的世界经济危机激烈地打击了资本主义制度，财阀的统治一天复一天的动摇起来，西欧各国的法西斯运动风起云涌，法西斯主义的政权又相继在各国取得了胜利。于是法西斯运动便成了国际政治的一个重大要素。更因为法西斯主义是不能同对外侵略政策相分离的，因此法西斯主义运动发展以后，国际间从此又多事了。“法西斯主义——这就是战争”（季米特洛夫话）。从此国际间便分成了专门挑拨战争的法西侵略阵线和利于维持现状，不愿战争的民主和平阵线。

* 本文署名叶非木，原载《译报周刊》书报介绍，1 卷 16 期，1939，1。



中国的抗战是国际整个反法西反侵略战争的一部份，这次抗战有全体反法西反侵略的民主和平国家可以作为自己的友国。这是中国民族解放史上空前未有的顺利的国际条件。我们怎样灵活地利用这一国际环境以争取最后胜利便是抗战中许多重要政治问题之一。这也就是说明了中国人民在抗战期间对国际问题的注意空前增加的原因之一。但可惜的是直到今天为止，许多人对于希特勒上台以后形成的国际间的这一种新局势，还没有透切的认识。在敌人和汉奸托派的挑拨离间之下，至今还有人不能认清中国抗战的友敌。张伯伦的妥协外交政策的每次活动就使得许多爱国志士发慌，深恐和平阵线各国将合法西侵略国来镇压中国抗战。希特勒和慕索里尼为了挽救日本军阀的末运，来离间中国的友邦，分裂中国的内部，破坏中国的抗战的时候，便有痰迷了心的人，居然甘被诱惑，主张所谓“荣誉的”和平。这些人大抵是没有认清近年来国际间两大营垒的划分，没有了解法西斯主义的普遍进攻之下所造成的新形势。

我们现在所介绍的这一本书就是说明德国国社党上台以后国际间的法西斯主义进攻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斗争的一本著作。这本书的内容包括 1935 年 8 月第三国际书记季米特洛夫在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结论，以及他在以后一个时期内陆续所发表的演词和论文。这些报告和论文中所说明的问题有三方面，第一便是法西斯主义的实质和法西斯主义的进攻所造成的新局势，第二，是反法西统一战线的内容和策略问题，第三是共产党的任务。在讲到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的时候。季米特洛夫曾简略地分析到欧美几个主义国家中统一战线的具体形势和中心问



题，曾经提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统一战线；尤其是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外更有专问的两节讲到统一战线与青年和妇女的问题。

季米特洛夫的这些演词和论文虽则是三四年以前发表的，但是对于中国的读者还是一册新鲜的读物，这不仅因为中译本的发行还是最近的事情，而且因为今天在中国抗战中所遇到的问题有许多是季米特洛夫这一小册子所解答的问题。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到今天还是世界法西斯反侵略运动的先锋队所奉为行动指针的。



接受西班牙事变的教训^{*}

最近西班牙局势的急转直下的演变，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起了很大的波动。这事变对于国际反战反法西运动的影响以及这事变给与我们的教训要比捷克事件更广大而深刻。

对于抗战不坚定的人们在这事变之后或许嘴里不说，心里却在想道：“从前大家说阿比西尼亚的抗战可以打胜法西侵略者的，可是阿比西尼亚抗战不满一年便灭亡了；大家说捷克一定会给侵略者一个打击的，可是捷克竟未抵抗便被瓜分了；后来大家又说西班牙的反法西反侵略战争是一定可以获得最后胜利的，可是西班牙苦战了三十多个月以后，终于也完了。如今我们都希望着中国的抗战，可是又有什么保证使我们不遭受阿比西尼亚、捷克和西班牙的同一命运呢？”

我们首先就应该指出：西班牙的反法西反侵略战争并没有“完”，也还不能说失败已经是决定了的事实。

现在关于西班牙在详细的尤其是正确的消息不容易透露出来。从几家外国通信社的简略而又矛盾的消息中，我们还不能断定西班牙内部的真实情况，然而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投降者所组成

* 本文署名叶非木，原载《译报周刊》1卷22期，1939.1。



的所谓“国防委员会”还下能帮助慕索里尼和弗朗哥结束西班牙的战争。他们还不能操纵全国的政局。这也是很容易想像得到的：西班牙共和国是西班牙的工农大众经过了几次流血斗争而建立起来的。当1936年弗朗哥发动的时候，所有的正规军都加入了反革命阵营。二三年来，西班牙的英勇艰苦的反法西反侵略战争，主要是临时组织起来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人民武装改编成的。然则谁会相信：在革命过程中成长起来，以工农大众为主要成份，又经过了三个多月革命战争的教育的军队，会因于上层份子的出卖投降而服服贴贴地缴出他们的武器呢？据外国通信社的报道，西班牙的共产党和其他许多主张坚持抗战的分子已经举起了投降者所抛弃的反法西反侵略的旗帜继续来领导西班牙人民的解放战争了。如果前共和政府的50万军队中能有一部份实力在他们领导之下继续作战，那么谁能肯定说西班牙的战争已经“完”了呢？我们敢断言西班牙的反法西反侵略战争决没有完，而且必然已经在新的基础上更深入一层地展开了。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否认：西班牙的反法西反侵略的解放战争已经遭受到了一个严重的打击。虽则我们知道革命的进程总是曲线形的，决不能因一时的挫折而悲观（即使这挫折很重大）。然而我们不是宿命论者，我们不能以仅仅指出乐观的前途为满足，而且更应该详细地分析遭受挫折的原因，从这挫折中去找寻教训，得出我们的实践的结论来。

谁使得西班牙的反法西反侵略的解放战争遭受这重大挫折的呢？显然这不是希特勒，不是墨索尼，也不是弗朗哥，而是加隆陀，米亚迦等投降妥协份子，是由于这些份子的动摇，是由于他



们放弃了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是由于他们破坏了人民阵线的团结，他们在战争最紧急的关头推翻了坚持战争的奈格林政府，把枪口掉转来对付自己营地中的最坚决的战友。他们用反对侵略者和卖国贼的飞机大炮来屠杀反法西反侵略的革命民众。他们想借此向敌人献媚，求得后者的宽容。他们抛弃了武器，跑在敌人的面前，哀求所谓“荣誉的”和平以及安全保证。可耻呀！这些贪生怕死懦夫们，现在他们唯一担心的只有自己的“宝贵的”生命了。但是不论荣誉的和平也好，抑是自身的安全也好，都不是放下了武器可以向敌人跪着求得的呀！我们还没有听到过跑着求老虎不要吃人的猎夫；如果天下真有这样的人，那就是加萨陀米亚迦之流了。

当然，我们相信最近英法的承认弗朗哥政府是促进加萨陀米亚迦投降屈服的一个重大原因。但别国政府的背弃西班牙共和国的人民，难道就可以成为马德里国防委员会背弃本国人民的理由吗？历史家是不会饶恕张伯伦和达拉第的，是不会饶恕他们的投降侵略者出卖弱小民族利益的所谓“绥靖政策”的，但是历史家也决不会饶恕加萨陀米亚迦等背叛自己民族的变节者。

我们说明了西班牙反法西反侵略战争遭受此次打击的原因之后，就可以知道中国非但不和阿比西尼亚捷克同一命运，而且也不和西班牙同一命运。原因就在于中国抗战的条件是和西班牙战争的条件不同的。

西班牙战争和中国抗战的基本的差异点就在于双方战争的性质。西班牙的战争在本质上，是本国的法西反动势力联合外国法西侵略者对广大的革命大众的战争，在外表上是采取内战的形



式。因此，外来的侵略者在西班牙国内找到了相当的社会基础，——这便是地主金融贵族阶级。换名话说，西班牙人民一方面要反对外来的法西侵略者，而另一方面又要反对国内的法西独裁者。而且内战的形式又容易朦胧了侵略者的本来面目，欺骗许多中小资产者，使他们不能积极地起来参与反法西反侵略的战争。至于中国的抗战，不论在本质上和形式上都是百分之百的反对外来侵略者的战争。日帝国主义对于灭亡中华民族的坚决主张，它的残暴的行动以及它的赤裸裸的侵略计划，迫着全国各阶级不得不一致联合起来支持这反侵略战争，使日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找不到弗朗哥这样较有社会基础的傀儡做它的掩护。

总括起来说，由于中西两国的战争性质的不同，使中国的反法西反侵略的民族统一阵线比了西班牙的反法西反侵略的人民阵线能有较广大的基础，而侵略者在中国都比在西班牙更显得孤立。

其次，西班牙的国际环境也和中国不同。欧洲的环境远比东亚复杂。一方面，西班牙受德意葡三国的包围，而另一方面英法等民主国在那里顾忌过多，深恐一不小心使自己便牵扯入了战争的旋涡。而弗朗哥的半独立政府的存在也多少增加了英法的幻想，——即避免与德意发生正面冲突，而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把弗朗哥拉到自己怀抱中来的幻想。至于在远东方面，侵略者早已亲自出马，英法利益早被侵夺，要避免正面接触已不可能。在力量对比方面，这里侵略者仅日本一国，而反侵略者却有中英法美苏五大国。并且英法本国离开较远，顾忌不若西欧之大。至于梁鸿志王克敏等辈的傀儡也根本上不能引起英法的幻想。因此，西



西班牙共和国的反法西反侵略战争是始终在各民主国的所谓“不干涉政策”的封锁之下的，而中国的抗战却是自始至终便得到国际上种种援助的。

最后西班牙是小国，而中国是大国。中国自己的物力人力都很富饶，足以支持一个长期抗战。中国有广大的领土，今天它所失去的领土虽然已经大过于西班牙全国，但是未失的土地却大于已失的土地，因此仍旧能够继续支持抗战。

此外中国更具有许多优良的历史条件。例如：第一，中国民族统一战线主要以国共两党为基础；但在西班牙人民阵线中，包含的政党较多。尤其是在西班牙的工农大众中，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派占极大的势力。这派势力在人民阵线结合的过程中会起了不少阻挠作用，而在今日更成了反革命的国防委员会的构成部份之一。甚至像托洛茨基主义派的势力也因于前政府的宽容姑息，始终未被肃清，使他们能在反法西战争中做着种种挑拨离间，阴谋破坏的活动。第二，全国人民都经过了长期内战和对外妥协的经验，大家深切的感觉到分裂只是为侵略者造机会，而妥协只是招致了侵略者的进一步的侮辱。这经验增强了全国人民对于坚持抗战，坚持统一阵线的信心。使得违反这一信心的动摇份子妥协主义者如汪精卫之流极容易遭受全国人民的唾弃。

上面指出的种种差异点可以保证中国抗战的前途比较西班牙的反法西反侵略战争是大可乐观的。但是这还不是说西班牙此次事变的教训对中国是不需要接受的。对中国这教训还是很宝贵的。如果中国更能接受西班牙事件的经验，作为自己的教训，那么我们可以相信中国的抗战是必胜无疑的。



西班牙战争的新事变可以给我们什么教训呢？托洛茨基主义者回答一定是说：西班牙战争的新事变是证明了人民阵线和民族阵线政策的破产，证明了无产阶级是不能与自由资产阶级建立同盟的。但是我们相信，如果西班牙的无产阶级在内战爆发时就对自由资产阶级采取不合作和攻击的态度，那么弗朗哥早在三十个月以前便在西班牙取得胜利了。过去西班牙的托派所采取的策略也正就是这种策略：他们一面假装着参与反法西战争的样子，一面却用尽种种力量去反对当时的人民阵线政府。当然，这样的政策是墨索里尼和弗朗哥所最欢迎的了。

西班牙的新事变给与中国抗战的真正的教训有下列三点：

第一，反侵略反法西的战争决不能中途妥协，妥协便是完全屈服。马德里国防委员会的妥协者想以自动停止作战来向弗朗哥求得荣誉的和平，但弗朗哥却一步紧一步的向前进攻，根本不同这些妥协者谈判什么和平，而只要求无条件的投降。真正的荣誉的和平是要在艰苦的斗争中用血肉去换来的，而不是跪着求来的。

第二，根据西班牙事变的教训，应得出与托派完全不同的结论来，即是坚持统一战线是争取胜利的唯一保证。统一战线的分裂只是招致了敌人的轻蔑和新的进攻，促成了自身的失败。但统一战线的保持却需要极大的警觉性。统一战线内部的动摇和妥协应以最大的努力去克服它，如果已经到了不可克服的时候，应毫不容情地，把这些份子清除出去，否则必然将遗害无穷。而克服动摇妥协的唯一力量便是使最大多数的人民团结在坚持抗战坚持统一的旗帜下。



第三，应有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一切国策应以民族自身利益为依据，不能被友邦所左右。外援只能作为辅助的力量，不能作为抗战的基础。今天中国所得的国际援助是一天一天的在增加扩大起来。但我们应认清这是坚持抗战的结果所获得的。而且各民族国对我的援助，也是各自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譬如是为了反对日本的独占政策，维持自己在中国的商业，加强对中国政治的影响等等，而不是为了争取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如果中国放弃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那么就是把自己的民族利益去服从于友邦自身的利益了。当友邦脱离了我们的时候，我们甚至就会失去了独立作战的能力，或者更被诱人妥协的歧途，如同今日西班牙国防委员会的政策一样。



勿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前几天本埠各报发表有苏北游击队领袖瞿慎王进二烈士被害的消息，译报“大家谈”且发表有几篇来稿报告两位烈士的身世和被害经过。使人悲痛的是这两位烈士不是死在他们的民族敌人手里的，而是死在自己人手里的。

自己人为什么要杀害瞿王二烈士呢？因为他们叛变了民族，出卖了国家，动了众怒，被人民自动处决的吗？抑是因为他们触犯了国法，被政府明正典刑的呢？都不是的。因为瞿王二烈士被害已两个多月，我没有听到关于他们叛国的事迹，也没有听说政府宣布过他们什么罪状。我们从报纸发表的消息中，只知道他们曾经抛弃了学业，离开了家庭，在沦陷区域中组织人民，领导游击队，为国家民族而奋斗。我们更知道，当这两位烈士被害后治丧的日子，启海人民拿了香烛锡箔前来奠的有两万多人，和尚尼姑且为他们义务奉经。由此可见瞿王二烈士不仅不是民族叛逆，而且是爱国志士；不仅是爱国志士，而且是深得民众拥戴的当地游击队领袖，因此他们的死，不是明正典刑的而是被暗杀的。可是为什么自己人要暗杀两位爱国的领袖呢？对于这，我们除了新

* 本文署名叶非木，原载《译报周刊》1卷23期，1939，3。



闻中所云，因遭“该地两面份子大加妒忌”外，找不出其他的理由。

关于这事件，我们希望由政府来彻查。杀害瞿王二烈士的凶手自将依照军法裁判。当此国难严重大敌当前的时候，我们决不愿意有人为了报复私仇，来增加自己队伍中的磨擦。没有天下为公的风度，没有牺牲个人的精神，瞿王二烈士决不会冒着枪林弹雨的危险深入敌人后方去做游击队工作。瞿王二烈士如果死而有灵，他们也决不愿意谁为了替他们报复私仇而放松了当前的大敌。但是我们从瞿王二烈士的被害事件中，感觉到有一个极严重的问题存在，这就是关于整顿游击队和加强政治教育的问题。

自从抗战开始由第一阶段转入第二阶段之后，蒋委员长早已喊出了游击战重于阵地战的口号。因为在这相持的第二阶段中游击战是消耗敌人，使抗战兵力转弱为强的最好策略。因此中国军事当局在最近期间曾费了极大的精力去整顿敌后的游击队。这努力已经收了相当成效，但是还没有达到意想的成功。各部队间的相互火併和对民间的搜扰行为，还没有完全根除，瞿王二烈士的被害只是许多“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事迹中的一件而已。这些现象如不完全根除，那么游击队决不能执行自己在二期抗战中的任务的。因此整顿游击队和提高游击队的政治教育应该是今天中国抗战中的重大任务之一。

怎样才能把游击队整顿好呢？这决不是政治工作的技术和方法问题，而是游击队本身对人民的态度问题。如果游击队对人民采取尊重的态度，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部队，那么游击队本身自然也能得到人民的尊重。于是军民打成一片，军队不会脱离人



民，人民也不会歧视军队，而游击队相互之间自然也不会再发生火拼的事情了。

前几天报载美联社北平电讯，有关于河北游击队的描写，其中有一段说：“鹿（钟麟）将军虽富有资产但对于八路军则敬佩无似，盖以鹿将军之军队必需下令人民之后，人民始起而响应工作，但第八路军因对于人民在某某情形之下，应作若何行动，平日已讲解明白故一至紧急关头，多能自动扶助军队去行动。”等到人民能自动扶助军队，确是游击队工作达到理想的标准了。但我们以为要做到这田地也并不难，唯一的秘诀便是尊重人民并且能扶助人民。



从李维诺夫辞职谈到苏联的外交^{*}

世界上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外长任职的年份决没有像苏联的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这么长久。他从 1925 年起便以副外交人民委员的地位代理了因病告假的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的职务。1930 年齐采林辞职以后，李维诺夫便正式担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在他领导苏联外交的 14 年以内，苏联的国防地位已经有了迅速的发展。苏联已经从资本主义各国的敌视包围的环境中，摆脱孤立的地位而取得这些国家的尊重，在国际政治上起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主要的虽则是由于苏联国势的强大，但是李维诺夫个人在外交上的努力当然也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李维诺夫的辞职，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倒是不足为奇的。于是国际间的法西斯蒂以及一切反动势力，便利用这机会对苏联造谣中伤，其中最恶毒的是说苏联将改变他的外交路线，放弃集体安全的政策，采取孤立立场，甚至转回到联络侵略国家。这种谣言的目的是企图把国际集体安全制不能建立起来的责任和英苏谈判不能圆满进行的责任归到苏联身上去。对苏联怀着恶意的宣传机关，更利用斯大林在 18 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对于所谓民主国家的妥协投降政策的

* 原载《国民公论》1 卷 12 号，1939，5，9。



指摘，拿来作为这种造谣中伤的论证。这是聪明恶毒的办法，然而不能成功的。

为要说明苏联的基本外交路线在今后有否变更的可能，先要了解苏联的基本外交路线是什么。在 1936 年苏联第八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李维诺夫曾经发表过演说。这演说的最后一段说：“苏联并没有什么理由来改变自己的政策，他的政策，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和平政策”为了和平所以主张集体安全制，反对侵略，预防战争。这是苏联的基本外交路线，也是苏联的立国基础。

因为第一，苏联是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的发展是为了增进人民的福利，不是为了利润；所以它不需要掠夺国外市场。苏联是地大物博的国度，它国内出产各种各样的原料（从寒带的到热带的），有各种各样的矿产，所以它不需要掠夺原料产地。因此，苏联不需要侵略，不需要战争。第二，苏联是工农大众的国家。而在任何战争中，直接牺牲的是工农大众（这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国度内是如此）。所以苏联的主人翁——工农大众——根本就反对战争，反对工农大众的互相残杀。（苏联本身便是在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第三，苏联没有剥削阶级，它不需要用对外战争来维持国内统治，如像一切法西斯侵略国家一样。

维持和平的基本外交路线既然是苏联的立国基础，它决不是某一个人的主张，决不会因某一负责工作人员的去留而有所变动。所以苏联的负责人士宣称：“苏联政府内部无所谓个人政策，各当局所推行之同样的政策，实即苏联政府与共产党所公有之政



策。”（莫斯科三日哈瓦斯电）。在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的，苏联政府的一切重要的措置（不仅基本国策）都由共产党领导机关讨论通过后才能实行。除托派奸细外，苏联的每一个公民都是拥护国策的。政府工作人员在执行这国策时容或在方法和步骤上有错误，但决不会同这基本国策相矛盾。

资本主义各国的新闻记者都把斯大林最近在苏联共产党十八次大会上的报告作为苏联将要变更外交路线的证明。但斯大林在他的报告中对于今后苏联的外交方针和党在外交方面的任务有明确的指示，他指出苏联的外交方针是：

“一、我们坚持和平，坚持与一切国度发生事业的联系，我们坚持着，而且将继续坚持着这样的立场，如果这些国度对于苏联也保持同样的态度，如果它们不企图破坏我们的利益。

二、对于同苏联有共同国境的一切邻邦，我们坚持和平的亲近的和善邻的关系；我们坚持着而且将继续坚持着这样的立场，如果这些国度对苏联也保持同样的态度，如果他们不企图直接地或是间接地破坏苏联国境的完整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利益。

三、我们坚持援助一切因争取祖国独立而成了侵略行为的牺牲品的民族。

四、我们不怕侵略者方面来的恐吓，而且对于企图破坏苏联国境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些战争挑衅者准备以双倍的打击回答他们的打击。”

斯大林接着又指出：

“党在外交方面的任务：

一、继续往前推行和平政策并且同一切国度增进事业联系；



二、处处当心，不要让善于利用别人的，那些战争挑衅者把我们国度拉到纠纷中去；

三、尽力巩固我们的红陆军和红海军的战斗力；

四、巩固我们同那些愿意和平的各个国度中的劳动者的国际友谊关系，巩固各民族之间的友谊。”

斯大林在这里岂不是明白的指出了：在一方面苏联仍旧坚持着一贯的和平政策，而且一切国度增进事业的联系，即是说仍旧是坚持集体安全的政策；在另一方面，仍旧继续巩固国防防备侵略者的袭击，援助一切被侵略者，即是说仍旧继续维持反侵略反法西斯的路线。从这样明确的指示中会得出苏联将放弃集体安全的政策，将与侵略国妥协等等，岂不是明白的在歪曲苏联的外交政策，故意造谣中伤吗？

关于反侵略和苏联对于反侵略战争的态度，在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另一个报告中，在苏联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曼弩依斯基的报告中，说的更详细。

“在《苏联共产党历史纲要》中，根据马克斯，列宁主义的学说，把战争分为公正的和不公正的两种：

A. 公正的战争，这便是非掠夺的自由解放的战争，它的目的或者是保护人民抵抗外来的袭击和抵抗人民之被奴役，或者是解放人民的资本主义的奴隶压迫，最后或者是解放殖民地和附属国度的帝国主义压迫；

B. 不公正的战争，这便是掠夺的战争，它的目的是掠夺和奴役其它国度和其它民族。

这指示是共产主义者在决定工人阶级和劳动者对于每一个具



体战争的态度的时候可以当作指南针用的，这便是说劳动者将要援助每一国度的人民为了他们的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强盗的公正的战争。劳动者将要援助一切足以促进世界反动势力，尤其是它的突击队——德、意、日三国——的迅速失败的战争。”

现在的法西斯侵略者在侵略其它民族的时候，往往以“民族自决”为号召，为假面目。因此，侵略者便以弱小民族的解放者自居了。曼弩依尔斯基在揭露了这种假面具之后，对于共产党人又指出了以下的任务：

“共产主义者一面撤底地为了反对资本主义各国内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拥护被压迫民族的自决，以至于分立的权利，号召被压迫民族，根据苏联各民族的史太林主义的友谊合作的伟大经验起来建立自己相互间的关系；但是在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在现今的具体的历史的环境中，更是集中主要的火力去反对法西斯蒂的伪造的‘民族自决’，因为这是对于被压迫民族的最无耻的欺骗，这是违背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最恶劣的罪恶。共产主义者把实现法西斯帝国家压迫下各民族的自决作为最首要的斗争。共产主义者要求奥国（它是在举行公民投票之前被法西斯帝国用武力侵占去的）的自由的自决，被法西斯帝德国从捷克分裂出去的苏台德区的自由的自决，要求高丽、台湾、阿比西尼亚的自由的自决，要求肃清西班牙和中国境内的帝国主义侵略者。”

曼弩依尔斯基所讲的这些话，也就是斯大林指出的苏联外交政策的四大原则之——“我们坚持援助一切因争取祖国独立而成了侵略行为的牺牲品的民族”的具体而详细的说明。曼弩依尔斯基的这个报告跟斯大林的报告同样是为十八次代表大会所



一致通过而作为苏联的基本国策的。苏联反对德、意、日三侵略国的态度如此坚决明确，而帝国主义的通讯社在李维诺夫离职之后，散布着苏联即将对各全能国妥协的消息，这不是恶意的造谣，是什么呢？

不错，在斯大林的报告中，对于各民主国家向侵略的妥协退让曾经给了非常严厉的批评。曾经指出过这些所谓民主国是以退让妥协怂恿了这些侵略国，尤其是怂恿它们向苏联作战。因此在党的任务中，斯大林指出了苏联应该“处处当心，不要让善于利用别人的那些战争挑衅者把我们国家（苏联）拉到纠纷中去。”

关于这种妥协退让政策的本质，在曼弩依尔斯基的报告中，说得更具体。他对于英国的政策曾经有过以下的分析：

“英国的反对资产阶级的计划在于牺牲东南欧的小国满足德国法西主义，把德国引到东方去反对苏联，企图用这样的反革命战争去阻挠社会主义的继续的成功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希望德国放弃对于英国殖民地的帝国主义的要求，同时英国的反动派希望用苏联的手来敲碎德帝国主义的毒牙，使德国在长期间陷于衰弱，以便保持英帝国主义在欧洲的殖民地；第二，英国反动派希望牺牲法国而去同意大利共同瓜分西班牙和地中海的势力范围，为了帝国主义的‘平衡’在欧洲同意大利订立协定，把它从对德国同盟中拆开来；第三，在远东方面英国的反对者希望瓜分中国，他们如今让日本破坏和削弱中国，同时也不阻止日本自己的军事和经济的消耗，以便将来以仲裁者资格出场，在远东建立‘慕尼黑式的议和’；第四，英国的反动势力不愿意让德意日任何一国的法西斯制度破产，反而愿意帮助这些国度挽救自身的财政



破产，其方法便是把借款供给这些国度，这样也就是把法西国家在某种限度内放在英国帝国主义的约束之下。”

这的确是对于民主国家的一种无情的揭露，然而这只是为了这些国家向侵略国作妥协投降的缘故。换句话说，在苏联认为德、意、日三国法西侵略国还是应该集中火力攻击的主要目标。所以决不能把这个作为苏联放弃集体安全的原则接近侵略国（？）的证明；相反的，这确是争取集体安全制，反对侵略国的坚决表示。

但是正像曼弩依尔斯基所说的一样，“英国反对资产阶级的这些劫掠计划是在替自己掘坟墓。它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秘密援助是在准备把英国从远东驱逐出去，它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让步，是在准备葬送英国在地中海的阵地，它供给法西斯帝侵略者的借款是增强了它们的军事力量，也即是增加了自己失败的危险。它把德意志法西斯主义的巩固准备自己的帝国的瓜分。它的攻击苏联的计划不仅准备了法西主义的瓦解，而且准备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瓦解。”在德国完全占领捷克，意国并吞阿尔巴尼亚之后，更明显地证明了上述的真理，甚至使英国保守党中的反动份子也不得不承认——至少是默认——慕尼黑协定的失败。西班牙的事件只是证明了张伯伦所干的完全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他不仅牺牲了西班牙人民断送了法兰西的利益，把它放在意大利的威协下，而且是断送了英帝国的利益，因为他把直布罗陀让侵略者包围了起来，使英帝国在地中海的利益也放进了意大利法西主义的威协之下去了。德意军事同盟的订立更是明明白白地证实了张伯伦想拆散德意轴心拉拢意大利的计划已经毫无挽救地失败了。



因此，最近英国的反动派，亦不得不在表面上把自己的政策稍稍变更一下，这至少是在对苏接近这一点上。但是这种变更并不彻底，并非是激剧的进步。张伯伦想拉拢苏联，但是英国又拒绝苏联所提议的英苏互助公约，尤其是不愿意英苏的任何合作适用于远东方面。英国只想叫苏联在西欧方面尽片面的义务，但是对于苏联并没有充分的诚意。换句话说，张伯伦并没有放弃绥靖政策的基本路线。他只是想用放弃的姿势来继续推行绥靖政策的实际。这姿势在一方面是对德国的。这意思就是告诉希特勒说：“喂！朋友！你如果再不住手，老是向着我的势力范围发展，那我就要同苏联订结同盟收拾你了；但是你如果识相点，赶快住手，或者最好是把你的侵略路线转向苏联去。我还没有给苏联任何担保，你向那方面发展我决不阻挠你的。”

另一方面这姿势是做给国内的人民看的。因为全国人民早已把张伯伦的绥靖政策看厌了，他们老早就不信任这一套了，即国会中的保守党议员都不能不向张伯伦质问道：“首相其知英国大多数人民皆主张与苏联缔结互助协定……”？（八日伦敦路透电）因为英国政界也认为英国是否将率直拒绝莫斯科之建议尚属疑问，良以首相张伯伦深悉此举……或将引起国会中保守党大多数人士之反对，其声势较之前拥护邱吉尔、艾登、古柏三氏之议员为盛。某保守党国会督率员更认为英苏谈话之失败或将招致张伯伦内阁之倾覆云。”（英联社五日伦敦电）。张伯伦看到国人的人民情绪，甚至保守党内部对于他的外交都如此不满，他自然不得不做出向苏联接近的姿势来，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了。

苏联对张伯伦外交政策的这种转变的动机以及不彻底性，当



然非常明了的，它知道如果不在这时候坚持自己的要求（订立英苏互助条约，也就是以英法苏三国为主的集体安全制的建立，因法苏间早已有互助公约存在），这种协定将会使张伯伦的妥协政策，继续苟延残喘，使世界和平受到更大的威胁。

所以苏联目前对于英国外交政策的“转变”所采取的这种冷静而坚决的态度。非但不是表示放弃集团安全的基本政策，而且是最有效的坚持。我们可以深信，苏联这种坚持是可以达到目的的。因为诚如斯大林所说的那一样，苏联的外交政策是有日益增强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势力做凭借，有苏维埃社会的道德和政治的统一做凭借，有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和国际劳动大众的援助做凭借，更有苏联的红陆海军做凭借。尤其因为现在世界已经走入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最尖锐的阶段。各国经济刚从前一次危机中喘过气来新的危机又开始了。资本主义各国间的尖锐的政治矛盾，已经在许多地方爆发成了战争。张伯伦等类的政治家虽然会经努力推行绥靖政策，即是说虽然会经努力缓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企图利用德意法西斯为首去向苏联进攻。但事实已证明这政策是失败了。正如我前面所说过的一样所有的侵略国家非但不敢同苏联挑衅，而且拼命在向其他资本主义各国的势力范围侵入。今天的苏联非但不是革命前被英法资本家牵扯着鼻子走的沙俄，而且也不是十年前的苏联了。今天的苏联不论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的任何方面，都已经充分强盛，以至于可以胜利地击退任何敌人的个别或集团的攻击。今天的形势已经不是苏维埃国家在如何提心吊胆地防备资本主义国家的袭击，而是一部份资本主义国家（非侵略国）怎样在低声下气地向苏联求援以抵抗另一部分



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国）了。但是苏联并不因此而幸灾乐祸，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苏联知道侵略国的猖獗是全人类的灾害，苏联很愿意联合一切爱好和平的资本主义国家共同消灭这大灾害。但是至少，苏联应该问一问它的合作的对手是否有铲除这灾害的诚意和决心。

很不幸的是：到如今，那些亲自受法西斯侵略国威胁的国家，还没有抵抗这些侵略国的决心，因此对苏联也还缺乏必要的诚意。它们还没有放弃给苏联水木梢的笨念头。因此，苏联就不能不郑重将事了。这所谓郑重将事并不是观望不前，而是考究怎样有效地反使这些国家对苏联放弃损人“利”己的利用观念，而且使它们诚意地坚决地同苏联合起来制裁法西斯帝侵略者——这也就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中心问题。



认明环境看清任务*

最近个把月以来，中日战局相当稳定。但是国际关系在这时期内却进入于最变幻莫测的阶段。这个国际关系演变的结局如何，毫无疑义地对于中日战事的前途将有重大的影响。所以，中日双方对于国际间的一切谈判以及任何策动都密切地注意着；虽则双方的企图和希望是完全相反背的。狡猾的侵略者已经抓住了目前的局势，开始积极活动，企图主动地来影响国际关系的演变，使它有利于自己。最近租界上的忽而紧张忽而弛松的局势，在一方面是目前国际关系的演变和日方方面积极策动所配合成的。但是在另一方面，（这是更基本的原因）日本向租界的进攻又是日军战略失败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现阶段抗战中的必然现象。如今我们先来分析最近侵略者所以要积极进攻租界的基本原因。

造成上海紧张局面的基本原因

侵略者对于租界的进攻决不是突如其来的。自从中日战争逐渐进入相持局势，即逐渐转向第二阶段以后；日本军阀也就不得不逐渐从战略的进攻而改为战略的防守，从继续向前占领新的地

* 本文署名叶非木，原载《译报周刊》2卷6期社论，1939，5。



域而逐渐改为巩固已占领的地域，日军的这种战略上的转变，是中日战争必经的阶段，这是很早便有人指出的。日军的这种新战略在华北是很早——这在占领武汉以前——便开始实行了，但在华中长江流域，却是到最近才开始的。

上海是长江流域的门户，是日本侵略华中的总根据地。所以日本要巩固华中的统治，那么就不能不巩固它在上海的地位，然而，颇使侵略者难堪的是：在上海存在有第三国统治下的租界区域，在这区域内，日本军人不能自由作为，不能随便侵占他人的财产，不能随便捕人杀人，不能禁止别人说出他们（日本军阀）所不愿听的老实话。因此，在言论绝对不自由，生命财产绝对无保障，中世纪的黑暗混乱所统治的日军占领区中，上海的租界便成了鲜明的，完全不调和的对照，成了日本军阀巩固占领区域统治的障碍。因此，侵略者要巩固占领区域的时候，他们必然要设法来改变这种状况——如果不能完全占领租界，根本消灭这块“干净土”，那么他们至少也想施以压力，加强自己对租界的统治，使租界上的一切不要同周围的情形成为太触目的对照。上海租界在战争第二阶段中的这种可能的遭遇也是早就有人指出的，但日本军人的这个企图能够实现到什么程度，这去了决定于整个中日战局的推移，决定于国际关系的演变，尤其是决定于英、美、法各国的态度。

最近的国际关系的演变，一般地说，虽则是有利于反侵略阵线的，但是张伯伦的动摇还没有终止，他还不愿与苏联缔结互助公约。他不仅没有放弃拉拢意大利的念头，而且更想敷衍远东的日本。曼澈斯特导报说张伯伦“在欧洲试行绥靖政策失败之后，犹主张在远东采取绥靖政策，”这是一点也没有冤枉他的。日本军阀看



中了这一点，便一方面故意决定暂时不跟德意订立军事同盟。这也就是对张伯伦故意卖弄风骚，暗吊膀子；意思是说，只要你的绥靖政策推行下去，那么我就保证不同德意订立军事同盟。但是在另一方面，日本军阀却就“根据敌方阵线最弱点加以攻击之理论”（曼澈斯特导报的话），向英国的利益实施袭击。这样，远东的侵略者就可以不受德意军事同盟的束缚，反而能坐享到这个军事同盟的好处，——利用自己暂时不加入的地位，迫使绥靖主义者的让步，取得租界的统治权以达到巩固占领区域统治的目的。

“药到病除”

因此，日本军队自从占领武汉以后，半年来简直毫无进展，直到最近日军在前线大有“寸步难行”的境况了，可是对各地租界，却反而节节进攻，但另一方面租界当局则“节节退让”；那种软弱无能的态度真是使人难于相信了。

我们看到，先有二三月间，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容许日方官兵和日领事馆警察会同搜查所谓“恐怖分子”；接着就有最近在日方屡次抗议之下，两租界当局限制报纸杂志的言论自由，禁载中国政治团体及政府领袖的宣言和演讲，限制租界居民悬挂中国国旗。最后，便有两租界当局会衔布告，禁止居民的政治活动，以及几家华文报纸上发表蒋委员长演词全文而被罚停刊，或受警告处分。

但是勇敢的退让，必然招致对方勇敢的侮辱。鼓浪屿日军登陆就是这种一贯的退让政策下，必然发生的结果。

日军在鼓浪屿登陆以后，便向工部局提出五项条件，要求改



组工部局。实际上就是要英、美、法各国把租界统治权完全交出。而且日方发言人公开承认。必要时，日军且将占领上海。当初，日本军阀那种气焰逼人的形态，使人疑心他们真的已经疯狂，好像是在中国战事已陷入僵局的今天，又将同时向美、英、法三国在太平洋上挑战似的。其实这不过是一种试探性质而已，是一切侵略者所惯用的流氓敲诈手段。若是被他的装腔作势的样子所吓倒，那么他便老实不客气的硬敲你一记竹杠。而且进一步的将提出新的要求。但是你若认真预备以实力对付他，他一定陪着笑脸向你打恭作揖，连说“误会”。所以美国远东舰队司令一到鼓浪屿而且向日本提了一个严重抗议之后，上陆日军便因“局势已缓和”而马上撤退了一大半。等到美、英、法三国分别派遣与留驻日军同数量的队伍上陆之后，日外务次官马上便保证日军可以逐渐撤退。

由此可见，坚决的实力的制裁，对于医治侵略者的疯狂病是具有“药到病治”的效验。

“冤有头债有主”

因此，维持租界治安的唯一途径，只有同租界居民亲密合作，给破坏租界治安的侵略者以有力的抵抗。但有绥靖主义者却不作如此看法；因为在绥靖主义者的政纲中有一条是：不让任何法西侵略国的独裁制度崩溃。所以来到十二万分不得已的时候，不给侵略者以过分的“难堪”。所以在一方面侵略者虽则曾经轰炸过英国的军舰，扫射过英国的大使，而且屡次侮辱并殴打过租界的英籍警官，破坏了英国的贸易，在各地还命令傀儡政府策动



所谓反英运动，甚至在英国人管理之下的租界上（虹口）雇佣了一群小瘪三散发反英传单；但是在另一方面绥靖主义者却仍旧继续忠实于自己的路线，即是继续向侵略者妥协，而且压制中国人的爱国行动，束缚中国人的言论。

显然，绥靖主义者的这种政策是很不聪明的，这样的“中立立场”不仅减低了租界居民对于当局的同情心。而且妨碍了抗战中的中国人民对于各民主国家的友谊的增进。然而抗战中的中国人民将是未来的独立自由的强国的真正的主人翁。所以我们相信，取得这一个有光明前途的伟大民族的同情和友谊，对于西方各民主国家实是必要的。这不仅是为了维持什么外交的礼貌，而且更是为了它们自身的利益。

但是在租界的中国居民说来，虽则对于租界当局的所谓“中立”立场未免要忿忿不平，但是当着整个民族正在为着生死存亡而斗争的时候，决不容许有所感情用事。虽则日本军阀正在各占领区域，在虹口，制造所谓反英运动，而远东绥靖主义者的政策也正在用压制中国人民爱国运动的事实帮助侵略者的反英宣传；但是真正的中国人民却不允许有这样的反英运动发生。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冤有头，债有主”，这句话对于抗战中的中华民族是很有用处的。每一个中国人应该认清谁是他们今天的主要的“冤家”和“债主”。斗争的目标决不能混乱，作战的火力决不能分散。要知道“反英运动”正是民族的主要敌人所策动的把戏，“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帝国主义）”正是民族奸细，托派匪徒的口号，——这是不能不使每个爱国人士有所警惕的。中国人民本来不会把所谓民主国家看做是自己的救主，能够挽救中华民族的灭亡



的，只有中国人自己。谁是真正的友邦，谁能够给于怎样的援助，它们的援助又能达到怎样的程度，——这是每个中国人早就应该有一个分寸的。这倒不是为了准备日后如何答谢，而是为了今天能够正确的估计自己的力量。今天各民主国家能够给于中国的帮助当然是有限的，甚至可以明白的说，它们并不是中国的最彻底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赞助者。但是它们在今天帮助中国抗战的地方，还是多过于它所给于的妨碍。所以，在今天把斗争的目标移向它们身上去，是极端不利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所以，今天苏州河以南的租界居民与租界当局间发生了任何摩擦，只有使苏州河以北的侵略者暗中高兴，只是助长了日本人策动的“反英运动”；只是为日本夺取租界的阴谋制造机会。这是希望租界上每个中国人明白了解的，但是更希望租界当局自身不要做了侵略者的工具。

还有更重大的事业要做

前面我们曾经分析过，日本对于租界的压迫是中国抗战转入第二阶段的必然结果。但是目前第二阶段还刚刚开始；也就是说，日本对于租界的真正的压迫还刚刚开始。美英法三国军队在鼓浪屿登陆还只是表示这三个国家不愿意让日本完全占领租界，不愿意让日本完全把自己从远东驱逐出去（而且在此次行动中，站在主动地位的还是美国），然而这并不是说张伯伦已经放弃了绥靖政策。相反地，我们有种种理由，可以证明张伯伦此项政策（尤其在远东）在将来还是要继续下去的。这就是说在将来，租界对日方的这种让步政策是还要继续下去的。（至于租界当局所推行的政策是对日方的让步政策这一点，那是。连租界当局自己都不否



认的。因为据美联社伦敦电讯，英国政府最近对于日本要求变更上海租界制度的复文中曾经明白指出“工部局确已向日方让步，例如增加工部局内之日方工作人员及工部局与日方商讨警务处镇压反日活动之计划等等。”因此，在将来租界的局势只有更紧张，租界的环境，只有更艰难。租界上的每一个居民应该准备在未来的更紧张更艰难的环境中继续生活并且继续工作。

租界上的居民，在不久前曾经因悬挂国旗受到了限制而表示愤慨，甚至同租界巡捕发生了冲突。愤慨是难怪的，然而与事情并没有帮助；至于同巡捕的冲突以及对租界当局的磨擦，那更只有使日本人高兴。这是前面已经说过的了。每一个中国人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千万不能做自己的民族对头人所高兴的事情。

但是更重要的是，悬挂国旗只不过是对于自己国家的一种尊重和爱护的表示而已。当着民族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人民对于国家的这种尊重和爱护的心念是可宝贵的，然而还是十分不够。国家和民族在今天要求每个国民能够更积极的有所贡献，有所效力。租界上的居民，除了悬挂国旗以外，也还有更重大的事业要做，而且可以做（当然这不是说，不要挂国旗。关于挂旗问题还是应该通过合法手续，经过外交途径继续向有关系的各国政府办理交涉）。上海人民的基本任务应该是节蓄并且扩大自己的力量，严密自己的队伍，迎接最后的胜利。在今天轻举盲动只是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浪费了自己的力量。所以，在今天，作为一个民族战士的最好的性格应该是切实的工作坚定不移的毅力，刻苦的精神和牺牲的勇气。热情只是作为一个战士的起码条件，但是感情用事也只会败坏事情。上海人是在最困难的条件下生活着，对于这些条件应该牢牢地记住。



从纶昌工潮中应得的教训^{*}

英商纶昌纺织厂的工潮已经发生半个多月了，社会对此虽然已经有相当的注意，但是还没有充分认识这事件的意义。从这事件中，不仅英美厂商和中国人民（尤其是工人大众）可以得到不少教训，就是各民主国的政治家也应该从这里得出相当的结论来。纶昌工潮的发展是张伯伦的绥靖政策碰壁的微小而具体的实证。

纶昌工潮发展成为今天的局势，是日伪方面有计划地策动的结果。这个当然已被社会公认的事实，是用不到再加以说明的了。然而不幸的是纶昌当局（甚至于一切英美——以至于中国的——厂商）在此次工潮未发生以前，对于自己今日所处的环境并未认识清楚，因此对于这样的前途事前并未预料到；而在工潮已经发生，日伪方面的活动已经表面化之后，则又只看到日伪的活动，但是不能理解到除日伪活动以外，工潮的发生还有更基本的原因存在，这就是工人的生活痛苦和恶劣待遇，因此厂方始终未能同工人推诚合作，改善工人的生活和待遇，不能以釜底抽薪的办法根绝日伪活动的基础。

* 本文署名叶非木，原载《译报周刊》2卷8期社论，1939，6。



自从中国发动抗战以来，日机的到处轰炸平民，造成了中国人民的普遍的激昂的民气。一般人民都自动拒绝购买日货以表示他们的忿恨。棉织品是广大人民最主要的最不能节省的日常必需品之一。人民既不愿购买日货，而租界上的华商纱商又是供不应求，于是退而求其次，便纷纷购买英美厂的出品了。因此在市场上早已做出了招牌的纶昌布便在租界上大出风头。最近纶昌公司的生意的发达据说是打破了历来的记录，每天盈余竟达两万元以上。这种丰厚的利润当然是日商纱厂所嫉妒的。因此他们便希望，以至于多方面设法去策动一切英美工厂，尤其是纶昌纱厂的工潮，那是必然的事情，用不到成为事实以后才恍然大悟的。但是据各方面的消息看来，日方的策动收效并不大。日本人虽然已经利用过托洛茨基派匪徒来混入工人队伍去做奸细，但是成绩显然并不可观。例如那个在此次工潮中提出许多托派口号，散发托派传单，自称工人代表，在日方掩护下企图组织为工会的杨某，据工人方面调查，其实并非纶昌工人。他在工人大众中可以说并无影响。因此日方的唯一希望便是使英美厂商自己去加强压迫工人，减低工人待遇，唆使中下级管理人——尤其是白俄——去虐待工人。意图用这种方法来鼓励工潮，待工潮发生后，他们便有机可乘，好直接来干涉了。

据说，在最近一两月以来纶昌公司所雇佣的白俄（以及少数工头）对工人的态度骤然严厉。往往故意寻殴打工人。有的时候，态度简直恶劣得不近人情。更因为此次工潮的起因也是由于白俄看门巡捕殴打女工而激起的，所以很多人便怀疑到最近一两个月以来，白俄人员的态度突如其来得不近人情的恶劣化是有人



暗中唆使的。虽则，这里没有事实的证据，但此种怀疑也不是毫无理由的。这些背叛了自己的祖国，被自己的同胞驱逐出了国境的白俄的大多数人的人格和良心，是大家知道的。我们如果更回忆到日本军部同白俄份子的传统的“友谊”，回忆到最近租界上有好几次纠纷都是起因于白俄份子的处置“失当”，那就更有理由使我们发生这种怀疑了。

纶昌当局对于工潮的起因始终是一知半解的。他们认为工潮的发生完全由于日伪策动而不了解基本的原因还是在于饥饿的工资，恶劣的待遇，和管理人的无理殴打等。

用不到统计数字的证明，每个住在上海的人都可以从日常的生活中体验到，上海的生活费是至少要比战前提高百分之五十^①但是上海各工厂工人的工资却反比战前降低了。资本家利用劳动市场上过剩的供给，以非常时期为借口把工资降到战前的水准以下。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因这一非常时期给了老板空前的利润，他们便日夜的加工赶制，拼命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时间，同时在管理方面也更严厉了。工人的负担是增加了，工作是加重了；但工资却反低落，待遇却反恶劣了。这样便形成了工人大众的普遍的不满情绪。这是最近上海一切工潮的最基本的原因。（据3月24日申报本埠新闻载，“战后之劳资纠纷，大多为减低工资、停工、减工，关闭及要求恢复工资、开除工人等。而工人要求增加工资鲜有发生。）此次纶昌罢工工人提出的要求中，关于工资

① 关于最近上海生活指数没有确切的统计。据3月24日申报所载，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所发表的本年1月份上海工人生活指数为159.22，较战前7月份的109.51涨45.48%。但最近四五个月以来，生活费的涨价更是厉害。可惜更无可靠的统计。



一项只不过是“恢复战前之工资”，（见5月24日申报消息）而且据说，工人要求并不大，如全部满足后，也不过等于停工一日的损失（据云停工一日除损失利润二万元左右外，其余利息开销等损失也有二万元左右。故约共损失四万元一日。）

综合各方面消息看来，纶昌此次工潮的直接导火线是白俄看门巡捕的殴打某一女工。另一工人顾金根因抱不平与该白俄发生冲突，致遭厂方开除，更因厂方不愿与工人所派代表谈判，于是便激起全体工人罢工。此次工潮最初完全是自发的，而且是全无组织的。工潮发生后，因厂方不能推诚合作，以致更形成僵局。于是日伪及托派便积极起活动。最初是用挑拨和诱引的方法，如组织罢工委员会，召集工友大会，伪区公署举办登记，散发“身费”津贴等。可是工人们都深明大义，对日伪托派都置之不理。据说，有一次日伪的“罢工委员会”要散发“车资”的时候，工人们都说：“我们就住在左近，不用坐车。”这使得那位负责的日人大扫其兴，把手里一把钞票往地上一掷，（因有傀儡在旁代为拾起保管，否则决不会如此摔金如土的）恨恨而去了。工人们见日伪托派如此热心援助工人，便知道罢工有被别人利用的可能，所以都不愿再扩大，而想同厂方接洽复工。日伪方面看到诱引不成，便不得不用威吓手段。先是在浦东宣布戒严，后来更派日兵伪警监视工人，不准有二三人互相商议，不准往厂里复工，更不准私自向厂方接洽。因此29日，厂方宣布开工时，竟只有四百余人到厂（主要是住在浦西的，）其余的工人都被日伪的“罢工委员会”拦阻回去了。（也有根本无法知道复工消息的。）

日本方面在此次罢工中的政策是很显然的。这是他们的一贯



的排除英美在华利益的继续，是他们在整个占领区域中所策动的反英运动的扩大而已。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托派在此次风潮中的态度。他们的活动份子杨某，冒充工人代表，在日伪保护下，积极活动。在工潮发生后不久，便以其早为日方特务机关所赏识的善于欺骗民众的高妙手段（见前数年日特务机关长松室的报告）组成了罢工委员会把托派机关刊物上的一切“高超”口号全盘提了出来。他们代工人们提出的要求，大半是只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才能实现的口号，例如：实行工人监督生产，实行六小时工作制等（这都是托派刊物斗争上经常宣传的口号。）但最使他们显露出狐狸尾巴来的是请求警察当局（当然是伪警）“保护”罢工工人的口号。显然托派很企图利用这一时机来尽量扩张自己在工人大众中的间谍网以便效忠于他们的主子。但在事实上更是使工人大众得到了认识托派丑恶面目的机会，更使他们成了爱国人民所痛恨的公敌。

至于全体工人，虽因自己的组织不健全，缺乏团结，（这是厂方要负责的。）致使此次改善自身生活的斗争，被日伪所利用去。但他们在此次工潮中表明出，他们是很能识大体的。这在他们所发表的声明书中就可以看出来：（见5月25日申报）：

“工人等在纶昌工作，历年多年。劳资之间，尚称合作。上星期六，因俄籍司阍殴打工友，并开除工友顾金根一名，工人等以顾在厂工作，素无过失，曾推代表三名，向公司要求，不但遭其拒绝，且欲将代表一律开除，致引起全体工友怠工，以促资方合作。乃连日有若干报纸，转载‘新申报’消息，谓此次工潮，系‘维新政府’及‘大民会’所煽惑，实属厚诬之甚。工人等虽



属至愚，然国家民族立场，当不致如此漠视。当此幕后人策动反英之际，挑发离间，终属一时，是非曲直，总有大白之一日。工人等惟有至诚，希望厂方立即解决，则挑拨之徒，无所使其伎俩矣。深耻外界不明真相，用特郑重声明云云”。

至于资方呢？最初是想用高压手段对付，不承认工人代表，不愿与后者谈判。在工潮发动初期，尤不觉悟，坚持开除工人。并且在报纸上更发表曲解事实的消息，以“少数无知工人受人利用”等话污蔑劳方。等到纠纷扩大，而且日伪托派已出头活动以后，厂方自知问题已严重化，所以便赶忙筹备开厂，通知工人复工，但这时候，因为大部工人的行动已失去自由，厂方复工消息的无法得到，以及日兵伪警的拦阻，致使公司方面在 29 日复工的计划也失败了。到这时，厂方方始着急起来，于是在报上登载通知，要求工人推派代表到公司去交涉。但是这时候，在日伪军警监视之下，工友要推举代表已经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了。如果当工潮发生之初，厂方能承认工人所推举的三位代表而与他们推诚交涉，那么此次工潮也不会发生，厂方既不会遭此数十万损失，工人也不会受到这十多天的饥饿了。

从此次纶昌工潮中，每一个英美或其它国籍的厂商以至于租界上的每一个中国老板，都应该深切的理解，自己是处在什么环境中。请你们不要忘记，你们所时时刻刻应该小心提防的不是为你们造产生利的工友，而是妒嫉你们的优越利润，想把你们从东亚市场连根铲除出去的侵略者。今天，你们是在他们的刺刀威协之下，如果侵略者不打倒，你们的产业就永远无保障。今天你们的出路只有同全体工友保持亲密的关系，共同来防备这些侵略者



的打劫，不要被他们挑拨离间。然而，很明显的，要同工友保持亲密的关系，就决不是放纵工头白俄们去殴打工人所可达到的。你们赚了比战前大过几倍的利润，要工人做加倍的工作，但是同时又要叫工人过加倍贫乏的生活，这从人道的观点讲也是太不公平了。改善工人待遇，承认工人的合法组织和代表，并且通过此组织和代表，改善劳资关系，加强双方团结，以防止侵略者的破坏，乃是一切中外厂家从纶昌工潮的教训中，应该得出的结论。

我们相信，除了侵略者以外，任何人对于纶昌公司要求工人推选代表去同资方谈判的布告，都会诚意欢迎的。我们希望厂方能推诚的与工人代表接洽，准许被开除工人上工，改善工人生活，尤其是承认工人经常有推派代表与厂方接洽的权利，以免再被侵略者所挑拨。

从这次工潮中，每一个爱国的工人应当认明，在今天，谁是自己国家民族以及自己阶级的真正的“冤家对头”。工人大众的生活的确是万分痛苦的，甚至是悲惨的。工人们所受的待遇是不公平的。工人有权利向资方争取比较像人的生活，争取公平的待遇。社会上一切有良心的公正人士，都将寄同情于工人大众的这种斗争。但是工人们自己在斗争的时候，千万不要弄错了今天主要的斗争目标，放松了自己的主要的“对头”，以至于被他们利用去做违背你们自身利益的事情。因此工人们在今天的最重要的任务便是加强自己的团结，建立自己的组织。要知道一切无组织的斗争必然不能得到胜利，且会被人所利用。

纶昌的工友们应迅速响应公司方面的建议，派出代表去交涉，如果由于日伪监视，和托派奸细的破坏，不能公举全厂共同



的代表，不妨按照工作部门（车间），或是工房区域，分头选出代表来。然后，这些代表再集合起来共同向公司去交涉。工人们的唯一的任务应是：一方面要求公司答应自己的合理要求，承认工人代表组织，订立集体条约；另一方面与厂方密切合作，争取开工的实现，打击日伪托派的无耻阴谋。

记得中国共产党领袖周恩来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时曾说：“我们什么都可以做，但不做日人所高兴的事”（大意如此）。工人们如果承认这话是对的，那么就应该知道，在今天延长罢工，正是日人所最高兴的事。

最后，一切民主国家的政府领袖，尤其是伦敦的张伯伦先生也应该从纶昌工潮中得到相当的结论来。要知道侵略者的最后目的是，要使你们全体从远东排挤出去。在今天，侵略者在一方面虽已深陷于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烽火中，无法自拔，但另在一方面他们已无时无刻不在利用每一机会来实现他们的计划。你们也像纶昌的老板一样，为了害怕群众，害怕打击侵略者；可是等到整个远东大势弄成今天的纶昌工潮一样的僵局，以后再来放马后炮，做贼出关门的工作，那时即使不后悔已迟，也将是事倍功半了。



关于“吴满有方向”问题的报告*

今年一月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叫“开展吴满有运动”。三月间解放报编辑部又发表了一封“关于‘吴满有的方向’问题”的信，同时中共西北局通知边区的党对编辑部的这封信要普遍的研究和讨论。从此，“吴满有的方向”问题便成了全国党内外热烈研究讨论的问题。四月八日《新路东报》（我淮南区党委的机关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叫“把‘吴满有的方向’转达下去”。在这社论中号召我们淮南地区的党“普遍组织关于‘吴满有方向’的讨论，区以上干部应该首先弄清吴满有方向”的基本精神……再配合当地当时的具体材料向党员与群众（首先是向积极份子）作报告，发动他们来讨论，然后把这种讨论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深入到各阶层去”。

为什么要如此重视《解放日报》编辑部的这封信呢？因为这封信解答了许多理论的和实际的问题，对于目前根据地的生产运动的展开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我们路西，这问题还不曾引起一般同志应有的注意，甚至有很多干部还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因此，地委会指定我向出席这次扩大会的同志做一个关于

* 本文署名：宋亮 1943。



吴满有方向问题的报告，作为同志们研究这问题的开头。希望各位同志回去后在县一级和区一级干部中把这问题好好研究一番，就把这问题作为最近的一个学习中心，自己研究清楚以后便要把这问题传达到支部里去，因为对于这问题的主要的执行者是支部，然后把这问题的内容向广大群众进行教育。

一、什么叫“吴满有的方向”。

首先要弄清楚，什么叫“吴满有的方向”。吴满有是陕甘宁边区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生长起来的一个新型的富农。他原是一个“受半封建社会的压迫，吃树皮，吃糠粃，逃到边区，参加革命斗争的难民”。后来因为得到了边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好处，再由于他的勤苦劳动，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富农，经营八十五耕地，喂四头牛，一头马，一头驴，有三个长工，两个放牲口的小孩。吴满有在经济上是“努力劳动和发展生产的模范”；在政治上是“拥护革命和公私兼顾的模范。他拥护边区政府法令和政府号召，多出公粮并认真进行优抗工作”。他弟弟是八路军的战士，他本人是一个模范抗属，而且是共产党员。因此《解放日报》认为不论在经济上或是政治上，吴满有是全边区农民的模范，“他的方向就是全边区农民的方向”，这便是“吴满有方向”或“吴满有运动”的来历。

二、无产阶级的政党提倡发展富民的政策这是不是矛盾呢？

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是反对剥削的，但是我们今天反而来发展富农，发展这种建立在剥削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的经济形态。这同我们的无产阶级的立场是不是有些矛盾呢？有人或者说，我们同剥削阶级讲讲统一战线还可以说得过去，怎么可以号召全体农



民，甚至农村中的共产党员都向富农看齐呢？

我们认为在表面上，这里多少是有些矛盾的。然而在本质上是完全不矛盾的，是同我们的阶级立场完全相符合的：并且这表面上的矛盾也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所决定的，它的根源还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本身，在于客观现实本身。我们大家都知道今天中国的革命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什么叫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呢？这就是说，这个革命的任务不是在于消灭私有制度，消灭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在于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的压迫；换句话说，这个革命的直接任务，仅是在于彻底肃清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在客观上就是替资本主义发展尽了清道夫作用，这就是中国革命的性质。我们并不因为中国革命的这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而拒绝参加，相反地我们是最积极地参加了这革命，而且领导这革命走向最彻底的胜利。同志们都知道，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在今天，那些直接障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压迫，也同样直接的压在工农大众身上；而且也是工农大众在今天所首先需要解除的压迫。不先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就无从解除资本主义的压迫，无从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既然如此，既然我们今天所干的革命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那么这革命胜利后，即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局部或是全部被推翻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应该是必然的结果，这正是表示革命的胜利，而不是革命的失败。在今天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富农经济虽则是剥削农民的，但是比封建的地主经济是一种进步，“没有这一步，就不能准备革命更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参



考《解放日报》编辑部的信)。

不要说今天革命还只在局部地区（在边区和农后根据地）得到了胜利，就是在全国范围以内取得胜利之后，由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敢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建设时期，才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而所谓新民主主义经济，在基本上仍是资本主义制度。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那个小册子中所早已指出过的。

正因为我们争取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要实现共产主义，所以我们不能不先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奋斗。当这革命在局部地方取得胜利的时候，我们要努力建设以争取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共产党员在推翻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中要做模范，在经济建设过程中（也是革命竞争）仍是要做模范。这就是说，我们的农民共产党员在农业生产上应该是肯劳动，会经营，有计划的模范，他的经济应当很繁荣；即是说，他很可能成为一个富农。否则我们将陷入自相矛盾的情况下，即是一方面承认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一个比较长的新民主主义的（即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建设时期是过渡入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须的，而另一方面我们的农民党员在这建设中不能在事实上（在经济发展上）做模范，即是不能发展他的经济，不能自己由贫农上升为中农，由中农上升为富农，这是很可笑的。

然而我们在过去却偏有这种可笑的事情发生。由于我们一部份同志不曾透彻了解今天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由于他们机械地理解了党员成份问题；因此，他们直接的束缚了我们的农民共



产党员甚至于一部份非党员的农抗积极份子的经济发展，间接的也就束缚了全体农民的经济发展。他们认为我们的农民党员或是农抗会积极份子，如果在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帮助下弄得比较富裕些，变成为富裕的中农或是富农了；那么他们的成份便变坏了，他们在政治上一定也变得不可靠了，因此便要撤换他在党内或农抗会里的工作，甚至要把他编入同情小组。这样便在党员和非党的积极份子中，造成一种印象，以为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积极性同发展自己的经济是二者不可兼得的东西。因此，使我们许多有可能在经济上发展成富农的农民党员只好在两条出路中间选择一条了：或者是保持自己在党内的政治地位，那就要限制自己的经济发展；或者是继续发展自己的经济，那就要牺牲自己的政治上的地位，甚至自动回避党，以避免受限制。这样便造成两种恶劣的结果：一方面是限制了我们的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农业生产是我们今天根据地的基础）；另一方面是在我们党内造成了一种不安，而且妨碍了农村支部的发展和巩固。

因此，很显然的，提倡吴满有式的富农经济的发展，同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同共产主义是不相矛盾的。相反，只有这样才符合于革命的利益，才符合于我们党的政策；否则，反而要使我们党的政策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将使革命的利益和我们党的利益遭受损失。

三、吴满有式的富农经济特点，它的前途和在我们敌后根据地的发展可能性。

《解放日报》编辑部的信里面指出，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存在有两种本质上不相同的富农，一种是吴满有式的新型的富农，



一种是普通的富农。吴满有式的新型的富农是从革命得到了利益才发展起来的，是新民主主义政权所培养起来的；因此，他们对于革命，对于革命的政权是拥护的。《解放日报》编辑部的信里面指出，我们自然是提倡这种新的革命的富农经济，而且希望他的数目逐渐增加，但是我们对于普通的，即是原有的富农经济“亦仍应加以帮助，并鼓励其发展，这才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关于这一点，《解放日报》的信已经说得很明白，我这里不再重复。

在我们军分区司令部直属支部讨论吴满有方向的时候，发生了另一个问题，就是这种新型的，革命的，吴满有式的富农经济的前途问题。有些同志问：我们的革命的新型的富农经济，再进一步发展下去是不是会变成了地主经济呢？有些同志认为是可能发展成为地主经济的。

但是，我认为这种估计是不合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性的。有些同志所以担心我们的“吴满有”发展下去可能会变成地主经济，是用观察半封建半殖民地农村经济发展规律的目光来观察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农村经济发展规律的。不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富农本身就是带有半封建性的：他一方面是剥削雇佣劳动的，即是说，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然而另一方面他又从事封建性的高利贷剥削和地租剥削。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当这种富农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发展的往往不是他的资本主义的一方面，而是他的封建的一方面——具体地说：他种的田（建筑在雇佣劳动的剥削之上的农业经营）往往并不会增加，但是他出租的田和放出的债却增加



了。这是半封建社会中富农经济的一般的发展规律。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因为在半封建社会里，处在最有利的地位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而是封建的剥削方式：因此，在半封建社会里，封建性质的经济压制着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使后者不能向前发展。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今天的中国社会需要一个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但是在我们的经过了土地分配，经过了彻底的反封建革命的陕甘宁边区，封建性质的剥削已经彻底被铲除。在我们的彻底实行了减租减息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封建性质的剥削也已经大受限制，使得封建性的经济不再处于优势的地位，而是相反地处于劣势的地位。大家知道，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权是奖励资本主义经济的。如果从前，因为封建的剥削（地租、高利贷剥削）比资本主义经济利益大些，所以富农便向封建性的方向发展（向收租放债的地主高利贷发展）；那末，现今，在经过土地分配或是减租减息运动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富农经济也必然因为封建性的剥削处于不利的地位，而不向这方向发展，即是继续依照资本主义的富农经营的方向发展。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事吗？（至于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内，没有农民的大批破产，因此没有大批出卖田地的现象，使得土地的大批集中成为不可能——这是形成地主经济的一个主要条件——等等理由，在此更不用说了）。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吴满有式的新型富农经济决不会向地主经济的方向发展的。然而这不能说，决不会发生下面这样的情形，就是有个别的吴满有式的富农，由于天灾人祸毁减了资本和劳动力，或是由于改行（不种田了）而把自己的田地出租。



然而，这根本上就不能作为地主剥削经济论，而且这只是一种例外的情形而已。

经过土地分配或是减租减息运动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不会促成封建性的地主经济的发展；而能够保证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经济的繁荣；这理由，在上面已经说得很明白。在这一点上，也正是中共在内战时实行过的土地分配政策以及我们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所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的革命意义所在的地方。很多人对于我们党在过去要实行没收土地，现在又一定要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理由，也就是说对于这些政策的革命意义，往往是了解不透彻的。一般的党外人士，甚至于我们党内的许多党员，总以为我们党在过去（苏维埃时代）坚决的要实行没收土地的政策，在抗战中，又坚决的主张减租减息政策，是为了动员群众起来参加革命，就是说，仅有动员上的意义。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没收土地政策在苏维埃时期和减租减息在抗战时期的革命动员作用。这作用在革命运动的发展初期，对革命运动的开展而说，有决定性的意义的，然而这两个政策的更深远的更伟大的革命的社会意义却还不在这一点上，而在于这种政策实行之后，可以使封建性的经济完全铲除（在实行没收土地政策的条件下），或是给以极大的约束，（在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条件下），使它不再危害到资本主义经济的生长发育；换句话说，这种政策的实行，迟早总要促成封建性经济的灭亡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生长，即是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使中国从半封建的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这在农村中所造成的直接结果，便是农业技术的改造，和生产的空前发展，间接地也就是准备好了转入社会主



义革命的经济条件。这才是这些政策的主要的革命的社会的意义。

吴满有式的富农经济的发展前途既然不会走向地主经济去，那么它的前途是什么呢？由于资本的缺乏和前面所说的土地集中的受限制，我们的“吴满有”也不可能发展成为美国式的农业托拉斯；这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会发展成为欧美的资本帝国主义社会是一个样的。它的唯一可能发展的前途便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集体农场；这又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最后必然要发展为社会主义是一个样的。如果我们一般地承认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很可能和平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那末我们的革命的，新型的吴满有式的富农经济更有可能和平地转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场。

这是中国与苏联的集体农场发展道路不相同的地方。但是这问题在今天，主要地，只有理论研究的意义，因此在这里不必详细加以讨论了。

在讨论中，还发生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吴满有方向在我们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具体地说在路西），是否存在的问题。由于这里没有实行土地分配政策，更由于不断的战争的破坏，富农经济的发展条件，在这里没有像在陕甘宁边区那样顺利是显然的；然而只要是已经彻底实行过减租减息的政策，那么这种发展的可能性仍然是有的。因为在我们的正确的挡荡布置和我们部队的英勇打击之下，敌寇给我们的破坏终究是暂时的，而且他们的三光政策也不能毁灭我们根据地的每一村庄和每一农家。因此在我们的比较安定的基本根据地中，农民的经济已经有显著的发展。甚



至在我们战争频繁的路西根据地，农民的生活亦已经有显著的发展（我们最近所实行的社会调查和支部调查都足以证明这点，这些调查中有一个已发表在《民主建设》创刊号中）也因为这原因，所以前引《新路东报》的社论要我们淮南地区全党迅速“把‘吴满有的方向’转达下去”，因为过去我们许多地方的下级党委和支部对这一问题的错误认识，在个别地区已经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情况。因此，把吴满有式的富农经济作为我们根据地内一切农民发展的方向，在我们路西根据地同样也是一个现实的任务。

四、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党在农村中的主要社会基础，以及对于党员成份问题的一些错误认识。

在《解放日报》编辑部的那封信里，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这便是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党在农村中的主要社会基础问题。这封信指出，“在边区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必然会影响党的社会基础也发生某些变化。如果说，在未分配土地区域，觉悟的雇农、贫农是党的主要基础，那末，在已分配土地的区域，因多数劳动的雇农贫农已升为中农，这种中农就成为党的主要基础，而一部份革命后上升起来，但仍忠实于党与革命的富农。如像吴满有，申长林等也应当看做是好的党员”。在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虽没有经过土地分配，但在减租减息之后，在新民主主义政权的保障之下，像旧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农民分化的情况，即是绝对大多数的农民破产成为贫农或雇农，极少数的人上升为富农的情况，是不会发生的了。在这里各阶层农民的基本发展趋势也还是上升的趋势，不过没有像经过土地分配的地区那样显著和迅速罢了。这也就是说，即使在这里，党的社会基础也



在逐渐向中农推移。否认这基本的趋势，那无异是否认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对于大多数农民的好处，而认为农民中大多数至今仍是贫农和雇农；或者是认为雇农和贫农由于得到革命的好处而上升为中农或是富农以后，他们必然要同革命疏远起来，不成为好的党员，因此党的主要社会基础应该永远放在那些革命以后经济始终没有上升的贫农和雇农身上（同志们还要注意；这种雇农和贫雇农的人数是在逐渐减少中，因为他们上升了）。这种见解，毫无疑问是不妥当的。

在这里，我想顺便的提一提，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社会出身，即是对于党员社会成份的见解。

首先要把阶级和个人分别清楚。社会出身或社会地位对整个阶级的政治立场是有绝对的决定意义的，但对个人却只有相对的决定意义。例如，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决定了这阶级的政治立场，我们绝对不能希望整个资产阶级会改变它的阶级立场，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但是，任何个人却很可能离开他的原来出身阶级而站到别的阶级立场上去。例如我们大家都知道，有许多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抛弃了自己出身阶级的立场而加入共产党，成为很好的党员，甚至成为他们的领袖。例如马、恩、列、斯，以及中国的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一些党的领袖都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另一方面，也有不少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却去当资产阶级的走狗，来破坏无产阶级自己的利益。例如第二国际的许多领袖便是如此。社会出身决定了整个阶级的立场——这是一般的原则；但社会出身并不能决定每个人个人的立场。在这里，往往存在有一般中的特殊。



一切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决不是以他原来出身阶级的资格来参加党的，相反，正因为他已经抛弃了他原来的阶级立场而以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资格加入党的。他既已入了党，那么一一般说，他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员。社会出身或社会成份只能作为审查和鉴定每一个个别党员的政治思想、阶级意议、组织观念等等的一种历史的参考材料（但不是唯一的材料）目的也还是便利于对党员的教育，决不能把社会成份当作为党员的一种身份的划分。辨别一个党员的好坏，是拿他今天的思想、意识、观念和工作能力等作为标准的。然而，在我们党内，却往往有把社会出身或成份看成了一种身份。凡是遇到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便认为一定是不可靠的，相反地，把无产阶级出身或贫农出身的党员便认为一定可靠的。无产阶级或贫农出身好像变成了一种金字招牌，而其它的阶级出身却变成了一种终身的罪恶。这是完全机械的和错误的见解。由于这种错误见解，在我们党的个别的下级组织就发生了许多错误的有害的办法。例如：规定富农出身，甚至中农出身的不能做支书，把富农出身的党员编入同情小组；最可笑的是有些原来雇农贫农出身的支书或支委，因为得到了三七分组的好处，经济发展了，上升为中农或富农了，可是上级领导者却不信任他了，因而把他们撤换了。

例如，在《民主建设》创刊号上发表的“关于支部工作”这个调查报告中便告诉我们有这样的材料：有一个区委同志“由于在革命过程中实地受到革命的实惠，如‘三七’分租，生活改善讨了老婆等等。这样他感觉到只有革命才是出路……”但是，……“他听说整理组织，要把阶级异己份子清洗出去，他急着：



‘我原来也是个穷光蛋’，这个革命的‘恩典’，我死也不能忘记”。

我们的贫农出身的同志因为得到了革命的实惠，上升为中农或富农了，因此对于革命的“恩典”更感觉到“死也不能忘记的”，就是说他对革命更忠实了，可是我们的负责同志却准备把他当作已份子而清洗出去了。这岂不是很可笑的吗？

我们一定要把这种对于党员成份的机械观点改正过来，否则，在党内将造成一种恐慌（如我们这位区委同志一样），在党外，影响到生产热忱的提高（因为我们党内强调成份的结果，必然将会造成一种普遍心理，以为上升为富农是不光荣的）。

（注：其实，我们支部里许多同志对于什么叫“富农”，并不一定有一个正确的概念的，很多人就把富裕的中农当作了富农。关于此问题因时间关系，不再多解释，望同志们参考《民主建议》创刊号上张文同志的“怎样划分农村各阶级”一文——此文是转载《真理》的）。

五、加强党内教育，加强党内反资本主义思想斗争。

《解放日报》编辑部的这封信又提出了加强党内教育，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问题。

我们不能否认，社会环境和经济活动对于人的思想是有很大影响的。既然我们要在社会上发展资本主义，而且我们的一部份党员要去从事资本主义经济活动；那么，如果在我们党内不预先严格加以防止，资本主义的思想就可能在我们党内滋长起来。因此，我们必须在党内加强共产主义的教育，开展反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这封信里指出：



“我们对于这一部份党员，主要在农民中这种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例如吴满有等，我们不应禁止，而且要反对党内民粹主义思想以及各种各样安于贫穷，以贫穷为光荣的思想的残余。但是同时我们必须大声来反对党内党员在政治上由无产阶级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想像得到，必定会有一部份落后的党员由于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政治上堕落腐化的。应该把这些人清洗出党，如果犯法的还要送法院，同时更应该加强党的教育工作，尽量防止这些人的发生”。

毛泽东同志早在《农村调查》那一本书的“跋”里面指出：“国营经济与合作社经济是应该发展的，但目前主要的不是国营而是民营，而是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着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半封建制度，这是目前中国最革命的政策，反对与阻碍这个方向是错误的。严肃地坚决的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纯洁性与提倡并指导社会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是我们在抗日与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历史任务。在这个时期内，一部份共产党员被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所腐化，也是不可免与不必怕的，不要把反对党内政治腐化与思想腐化的斗争，错误的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了。中国共产党是在最复杂的中国环境中工作的，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锻炼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片面的简单的看问题是无法使革命胜利的”。

“严肃地坚决的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纯洁性与提倡并指导社会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甚至自己去参加这种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这的确，是一个困难的任务。但是我们可以相信，我们的绝对大多数的党员是能够完成这双重困难任务的。问题就



在于如何事先防止，即如何在党内加强共产主义教育，展开反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使我们的党员不至于被环境所溶化。

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环境下，资本主义思想将从两个方面向我们党侵入：

第一，便是向党员私人生活侵入，引起党内享乐主义的发展。党员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不是变成了生活上堕落腐化的份子，便变成了只顾个人安居乐业，不问政治，不愿再做革命斗争的庸人俗子。党员发生了后一种的思想，即使他还是一个很好的公民，他在经济发展上有很大成就，但已经决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不能算做共产党员了。

第二，便是向党员的政治思想侵蚀，引起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党员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即使在个人私生活上仍保持着吃苦耐劳，不顾个人享受的作风，但在政治上，他将变成为主张阶级调和，放弃无产阶级立场的妥协份子。

但不论是生活上的腐化堕落份子也好，或是只图个人安居乐业，不问政治的庸人俗子也好，抑是主张无原则的调和妥协的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也好，他们的存在，对党、对革命是不利的。因此，如果这样的份子一旦在我们党内发生了，而且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那就只有坚决的把他们清洗出党。

为了防止这种思想的发生，我们必须加强党内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对于那些直接从事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人们，这种教育更加是迫切。这并不是因为党特别不信任他们，而是因为资本主义思想对他们的包围和袭击更为直接和严重，党必须特别加以照顾和帮助。



如果，我们能够用加强党内教育的办法来保证我们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而同时又能够以身作则，提倡并且领导社会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那么我们必然就能够建设好新民主主义，达到进一步转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我们必须完成这一双重任务，仅仅完成了这双重任务之中的一方面，革命还是要失败的。

不去提倡和领导社会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而想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纯洁性，那么新社会就无从建设，就无从转入革命的更高阶段去；更何况在这种情况之下，所能保持的决不是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纯洁性，而是安于贫穷，以贫穷为光荣的民粹主义思想的渣滓。在另一方面，提倡和领导了社会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而不能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那么即使社会经济是发展了，但这个〔新〕社会决不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旧民主主义社会，这是因为共产党员已做了资本主义的俘虏，已失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革命的进步的因素；更何况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社会经济本身也不会有很迅速的发展的《因为旧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不合理现象障碍着经济的发展》。

如此看来，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提倡和领导社会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不仅是不矛盾的，而且是必须联在一起以后才能完成的。这任务虽是双重的，然而是不可分离的。在这意义上说，我们的党内思想斗争应该是两条战线的斗争，我们的党内教育也应该从这两方面着眼，这便是：一方面要克服那种安于贫穷为光荣的民粹主义思想（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另一方面要克服公开的资本主义思想对我们的侵蚀（右倾



机会主义的思想)。我们在党内教育上如能完成此任务，那么我们根据地的建设和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就能有切实保证。

我关于“吴满有方向问题”的报告就此结束了。大家可以看到，《解放日报》编辑部“关于‘吴满有方向’问题”的信在理论研究上，在我们的实践上以至于在根据地的对外宣传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信，进一步的具体发挥了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里面，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早已指出的那些基本原则；区别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两种不同类型的富农以及吴满有式的新型富农的特点；确定了党在根据地内对于富农的政策，指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党在农村中的社会基础的变更，指出了党内思想教育的方针。而这一切问题的具体提出，都是证明抗日民主根据地，尤其是它的土地政策的进步性“没有这种进步，农村中吴满有式的富农经济是不可能发展的”——事实是最有力的宣传者。希望大家把《解放日报》的这封信和《新路东报》的社论作为很重要的文件去仔细研究，而且要把这种研究同我们路西根据地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



对《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一文的批判者的答复^{*}

打倒“四人帮”以后，我曾经以什么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两个题目，在北京、兰州、成都、西昌、昆明、上海等地的大学经济系、党校和干部会上作过多次报告。后来我又在 1979 年第 8 期《经济研究》发表了《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一文。

此后好几个期刊，就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即生产关系的内涵问题，展开了讨论。就我所知，截至 1980 年 9 月份为止的一年零一个月，光《经济研究》就发表了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共十七篇之多。此外，《红旗》、《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月刊》、《经济科学》、《群众论丛》等刊物也发表文章讨论了这个问题。^②

我的文章会引起如此强烈和普遍的反响是在意料中的。因为斯大林的生产关系定义自从五十年代初发表以来，近三十年间一向被国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奉为经典。大专院校的政治经济学

* 本文原载《经济研究》1982 年 8 月第 10 期。另见《孙冶方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4. 6。

② 见邢俊芳：《一年来经济学界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的讨论》，载《经济研究》1980 年第 9 期。



讲义都是按照这部经典编写的。我过去也是信奉斯大林的这个定义的。例如我在 1961 年写的《关于全民所有制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那篇文章中就说过：“所有制问题到了底以后，经营管理权问题应该代替所有制的地位而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生产关系三个方面中的第一个方面。”^① 我这个提法还是以斯大林的定义为基础的。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无疑是个重要的题目：然而体制问题同所有制问题一样，也不能在生产、交换、分配这三个方面的生产关系之外去研究。

但是我在撰写《社会主义经济论》的《导论》的时候，在反复研究了恩格斯和斯大林的不同定义后，我发现这两个定义是不能并存的。斯大林的定义不是发展了恩格斯的定义，不是从恩格斯的定义前进了，而是后退了，是不正确的。我的这个看法无疑是对旧的政治经济学观点的一个挑战。按照惯性定律，必然会引起斯大林定义的捍卫者们的猛烈反对。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对斯大林定义的批判能够站得住脚；那么按照斯大林的经典编成、现在已经沿用了近三十年的各种讲义和提纲，以至考卷答案，都得重写了。显然，这是不容易被接受的。

—

有一点情况是值得提一提的，那就是在我所知道的，同我商榷的二十余篇文章中，只有少数是为斯大林的无流通论（没有

^① 孙冶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40 页。



“交换”一项)辩护的。^① 其余都是为斯大林定义中的所有制一项作辩护的。这说明斯大林定义的无流通论的错误是太明显了。它在实践中带来的害处也太大了。因此,人们是很难为它辩护的。蒋学模、孙矩二同志在他们为斯大林定义的无流通论辩护时也只是把斯大林自己的解释,重复了一遍:说他的定义,没有恩格斯定义中的交换一项,但是已经把恩格斯所说“交换”的内容包括在内了。可是我在《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一文中所引斯大林这段原话,比蒋、孙二同志引的还全面。我在引证了斯大林自己的整段说明之后,又曾经明确指出,斯大林所说,他的定义已经把恩格斯所说交换的内容包括进去了的说法,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他所说“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只能理解为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交换,还不能理解为整个社会内部各部门之间和各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换和商品交换。而且即使如蒋、孙二位所说,斯大林定义中所说“互相交换其活动”已经把广义的交换,即流通过程都已经包括进去了,那也是重复了杜林的严重错误。恩格斯因为杜林把交换作为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附属项目,曾经狠狠地批评了杜林。恩格斯指出:“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没有交换,生产也能进行;没有生产,交换——正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产品的交换——便不能发生。这两种社会职能的每一种都处于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响之下,所以都有

^① 据我所知,为斯大林的无论通论辩护的有:孙矩:《与孙冶方同志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载《经济研究》1980年第9期;蒋学模:《也论生产关系范畴的内涵》,载《群众论丛》1980年第3期。



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的规律”。“杜林先生把生产和流通（即从总体看的交换——治方注）这两个虽然互相制约但是本质上不同的过程混为一谈，并且泰然自若地断言，排除这种混乱只能‘产生混乱’，他这样做只不过是证明，他不知道或不懂得正是流通在最近五十年来所经历的巨大发展……”^①

恩格斯的这些论点，我在《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中都已经更详细地引证过。但是我的批评者却不顾这些，仍然抱住斯大林的定义不放，而不肯宣传恩格斯的定义，把斯大林的“生产过程中人们互相交换其活动”这样一句话来代替独立的流通过程。这样，我的批评者们滑向了杜林的纲领而不自觉，而杜林的纲领就是：“交换或流通只是生产的一个项目”^②。因此，请读者原谅：我也不能不把前面已经说过的话，再唠叨一遍了。

我们对于斯大林这样的伟大人物也不能仅仅从他自己所说、所写的语言文字中去理解他；更要从他的实践中去理解他。斯大林亲自领导和管理苏联经济三十年左右。他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经济模式，而这个模式恰恰是他的无流通论的政治经济学定义的直观教材。

斯大林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卖给农民，只能卖给国营的机器拖拉机站。毛泽东同志曾经因此批评说，斯大林是不信任农民的。这个不信任就是斯大林的无流通论的根源。然而这是过渡性的，不是本质性的。至于生产资料，斯大林认为，它既然不能卖给集体农庄，更不能卖给农民个人，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6、193页。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6、193页。



那么它就不是商品，而是产品；它在国营企业之间也不实行交换，而实行自上而下的“计划分配”，即“实物配给制”。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我国实行过的“物资”（生产资料）管理制度，也是五十年代从苏联搬来的，也就是它的创始者们称之为“计划分配”的“实物配给制”。虽然这种“实物配给制”从事物本质来说，它仍然是流通，因为这是产品从生产者手中转入消费者手中去的那个过程——流通过程。客观经济过程是不容人们主观篡改的。然而这已经是一种变态的流通，因此它的创始者也不把它当作“交换”或“流通”看，而称之为“分配”，把它同客观经济过程（生产、交换、分配）的第三环节混为一谈了。

关于斯大林定义的无流通论，我就补充说这一点。下面我们就来谈斯大林定义把“所有制”独立为生产关系中的一个项目是否妥当的问题。

二

我首先要答复的是1979年第12期《红旗》发表的，首篇论文《经济理论的若干方法问题》的作者林子力同志。会使读者感到奇怪的是：林子力同志和我一样都是不同意斯大林定义中关于所有制的提法的。所不同的是：口头上我在林子力同志两年以前，作为独立的论文，我在林子力同志四个月以前就发表了这些意见。我们之间的争论应该是不大的了。然而不然。林子力同志认为他同我之间的争论象马克思所说的，是同代表私人利益的英国高教会的斗争。



那么林子力同志提出了什么不同意见呢？第一，他给斯大林定义起了一个名称叫“三分法”。这个名称非但什么也没有说明，而且反而把问题搞糊涂了。因为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两个定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生产关系所下的定义（也是马克思的定义，因为我们知道，《反杜林论》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合写的）和斯大林的定义都分成三个项目，只是三个项目内容不同而已。不错，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曾经把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流通）、消费四个项目；但是后来，不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再提“消费”这一项；至于他们后来为什么没有再提“消费”，我将在下一节再说。

第二，他说我把“所有制”解释为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归属问题，因而我就陷入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他从逻辑上怎样推理出这样的结论，从而给我扣上这两项帽子呢？我们不得不浪费些纸张笔墨把林子力同志文章大段引证如下：“是哪一种所有制，不能根据生产资料归属于谁来确定。诚然，生产资料确有一个归属于谁的问题。但如果这个谁是指甲、乙或丙，那在政治经济学看来等于什么也没说，单从甲、乙或丙上丝毫看不出他们的社会经济属性，也就是说看不出他们是地主、资本家还是小农、工匠。”“但是，‘三分法’影响至深，以至于反对‘三分法’的人也不能完全摆脱‘三分法’。不久前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主要观点是与‘三分法’相对立的。文中谈到，生产关系应当按照恩格斯的定义，由生产、交换、分配三个部分组成，在此之外不独立存在着什么所有制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但他在解释生产关系这三个组成部分时，又说这三个部分‘就是指：（一）用谁所有



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归谁占有；（二）交换的产品是谁生产的，又归谁所占有的产品；（三）被分配的产品是谁生产的又归谁所占有，从而用什么形式按什么比例来分配。’短短一段话连用了六个‘谁’，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谁’，是指的‘谁所有的生产资料’，它决定着以下的五个‘谁’。而这个‘谁’就是生产资料归属于谁。但是在未分析生产、交换和分配等所有制的各现实形态之前，这个谁是得不出来的。如果已经有了，那就只能说明这个‘谁’是现实的经济关系之外的先验的规定。因此，说来说去，还是没有最终走出‘三分法’的圈子，实质上是对恩格斯的定义用斯大林的方法来进行了解释。”^①

我在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林子力同志在上面所说，连用了六个“谁”的那“短短一段话”，是从我的《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那篇文章中摘引来的。但是林子力同志既没有提作者姓名，也没有注明出处，用意或许是由于他“存心忠厚”，避免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点名批判”。然而，我是最反对这种不点名的“批判”或“批评”或“评论”的。因为这种办法杜绝了读者进一步去研究并讨论的可能；从而无从知道所引的文字的上下文如何，更没法知道引者是否曲解以至篡改了被引者的原话（林子力同志就是用这办法曲解了我的原话。例如我说所有制问题是指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归属问题，这不用说是指归属什么阶段的问题。）但是林子力同志却把这句话说成是归属于某甲某乙的问题。这是学术讨论中最忌的方式。我希望我们的报刊，不要采取这种方式来进行学术讨论。

^① 《红旗》1979年第12期第9、10页。



现在言归正传，再来谈我连讲了六个“谁”字的那“短短一段话”是在什么场合下讲的，为什么我要那么说。

读者只要读过《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中那“短短一段话”的上下文，就会明白，我之所以讲这一段话，是为了说明：为什么恩格斯的定义只有生产、交换、分配三个项目而没有所有制这个项目。我说，这并不是说马克思恩格斯不重视所有制问题；而是因为生产、交换、分配这三个项目的说明，都离不开所有制问题。只要把生产、交换、分配这三个环节中的生产关系说明了，所有制问题也就明白了。我还引了马克思的话说：“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因此，给资产阶级所有制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重新描述一番。”^① 我说：所有制问题，即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归属问题很重要，但是你只要把生产、交换、分配说明白了，所有制问题也就说明白了。如果在生产、交换、分配这三个环节之外去研究所有制问题，那就会陷入马克思所说的法学或形而上学的幻想中去。林子力同志却把我的原话改说成：孙冶方强调所有制，可见孙冶方还要在生产关系之外去研究生产关系，那就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林子力同志把我在《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中的论点全部接过去，然后却把我所批判的观点栽在我头上，为的是最后在文章的末段得出这样的结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的研究。”

^①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4页。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林子力同志所引的上面这句话来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可惜林子力同志没有把马克思的话引证完全。紧接着这句话后面，马克思还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上面这句话的内容：“例如，英国高教会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展开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①

林子力同志文章的最后这段结论真使我摸不着头脑：我在什么地方同林子力同志个人，或者同党和人民发生了私人利益的冲突？我的那一篇文章、那一个论点反映了我“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呢？我又怎么成了“复仇女神”了呢？

我生平没有个人的冤仇。不错，在过去，我曾经挨过不公正的批斗。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一切都要记在林彪、康生、陈伯达和“四人帮”帐上。他们是以毛主席和党的名义蛊惑一些同志参加这些批斗运动的。现在大家都明白，这是上了当。因此，在“四人帮”被揪出以后，我就提出过：“运动中一切个人恩怨应该统统忘掉，忘得越彻底越好。”^②但是过去被林彪、康生、陈伯达、“四人帮”们颠倒了的理论是非，必须重新颠倒过来！为此，我在“四人帮”被揪出以后，曾经写了不少文章，坚持我至今认为正确的观点。同时也批驳了当年一些批判文章中我认为错误的观点。但是对我自己过去的错误观点（例如我曾一度否定奖金），我也做了检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下同），第12页。

② 林子力同志的文章发表在1979年12月。我直到现在，1982年8月才来答复。——这说明我是并不把这个个人恩怨记在心头的；而且要不是我要把我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导论》缴卷，要对别的同志的学术批判作答复，我还不会专门写文章来答复这篇文章呢！



观点是每个共产党员的神圣职责。康生、“四人帮”的监狱也没有能阻止我在里面写出了三万多字的、坚持我的政治经济学观点的申辩书；难道在三中全会后的坚持“双面”方针的社会主义中国，反而不能宣传我的经济学观点了！难道我对那些所谓“大批判文章”中某些还值得一驳的论点作了些恰如其份的答复，我倒有幸成了“复仇女神”了呢？

或许林子力同志会辩解说：前面关于“复仇女神”那一段话不是针对你孙冶方个人的，而是泛指学术思想斗争的尖锐性的。如果这样，那么林子力同志在这场合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的这句话也是不恰当的。因为《资本论》这部工人阶级的“圣经”是挖掘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墙脚的。因此，《资本论》所遭到的攻击是来自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人物。所以，马克思才举例说：“英国高教会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展开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显然马克思这里指的是反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我双方的阶级斗争。我请问林子力同志：我们现在国内经济学界关于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的内涵问题的争论有哪一场是反映这种敌对阶级之间的争论，而你林子力同志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别人则是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呢？

林子力同志的矛头所指不能不使人想起过去那种无限上纲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气势。而这样的“学术讨论”的文章竟发表在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12月份！

三

下面我再答复另一位批判者，1981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



学》发表的《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基础》一文作者吴宣恭同志。吴宣恭同志既不同意我的观点，也不同意林子力同志的观点。关于吴宣恭同志批评林子力同志的观点当然要由林子力同志去答复，我只答复吴宣恭同志对我个人的批判或批评。

首先我要指出，吴宣恭同志的文章采取公开点名商榷，引证对方原话也都注明出处，这是正当的学术讨论态度。对此，我表示完全拥护。

吴宣恭同志为了替斯大林的定义辩护，提出马克思著作中，“所有制这个范畴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所有制泛指或解释为生产关系的总和。“狭义的所有制则分别指生产资料所有制、流通资料所有制、劳动产品所有制和有时提到的劳动力所有制。”^①而斯大林定义中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则是指狭义的所有制，它不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是生产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作为生产关系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是可以的。

我认为这是吴宣恭同志强加于马克思的，而且也并不见得符合斯大林的原意。因为经济学所说的所有制就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资料归属于什么阶级，那么产品不用说也归属于这个阶级了（吸取经验教训我宁可多写几个字，而不再简称为“归属于谁”，以免又被曲解为归属于某甲某乙）。因为所谓独立的“流通资料”是不存在的。我们知道，马克思认为，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流通过程中的一切运输，保管储藏工作，都是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的继续，从而一切所谓“流通资料”，即火车、汽车、仓

^① 见《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第58页。



库等等都是生产资料。日常习惯中，我们也都把仓库运输工具看作是生产资料，而不称为“流通资料”。经济学中所说“流通资料”或“流通手段”仅仅是指货币。所以，斯大林定义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这句话，不用说是指全部生产资料，也包括了产品的归属在内。而且争论的焦点不在于所有制是否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而在于任何所有制形式问题，即使是吴宣恭同志的狭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如果离开了分析生产、交换、分配这些生产关系，是否能把它说清楚而不陷入法学或形而上学的幻想（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之外，谈什么流通资料和产品的所有制就是这种幻想的表现之一）。

吴宣恭同志认为我不主张把所有制形式作为生产关系定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由于我否定了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是“拒不承认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存在和重要性”^①。

我怀疑吴宣恭同志并没有读完我的文章，便急于批判我的观点并热衷于宣传他的广义所有制和狭义所有制的理论。我在写上述文章的时候，就料到有人会怀疑恩格斯的定义没有所有制一项，是不是表示马、恩不重视所有制问题。因此，我的上述文章第二节（《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为何没有“所有制形式”这一条》）一开头就说：“斯大林的定义中有‘所有制形式’这一条；但是恩格斯的定义中却没有‘所有制形式’这一条。这是不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重视‘所有制形式’的研究呢？如果有谁这样想，那么他是大错特错了。”接着我引证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和《资本论》第一卷的一个脚注，在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不

① 见《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第69页。



仅把改变所有制作为一切革命运动的“基本问题”，而且认为所有制的历史也就是社会发展的历史。正因为所有制问题是具有这种“基本性”或“基础性”的问题；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要说明“所有制问题”，必须先说明生产、交换和分配中的全部生产关系。如果生产、交换、分配的全部生产关系都说明了，那么所有制问题也就完全明白了。反之，如果离开了生产、交换、分配等生产关系想去说明所有制问题，那就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会走入法学或形而上学的幻想。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恩格斯关于生产关系的定义中，除生产、交换、分配三个项目以外，没有另外再列“所有制形式”这个项目。可是吴宣恭同志却因为恩格斯定义中没有了“所有制”这个项目，竟怀疑恩格斯定义否定了“所有制”问题的“基础性”和“重要性”。

当然，吴宣恭同志一定要叫冤屈了。“我批评的矛头是针对孙冶方的而不是针对恩格斯的呀！你怎么说我吴宣恭反批评的矛头针对恩格斯了呢？”但是我在文章中，没有标新立异提出过新的生产关系定义。我只是对斯大林的定义和恩格斯的定义作了比较和评论，认为这两个定义有原则上的差别：斯大林的定义有“所有制形式”这一项目，恩格斯的定义没有“所有制形式”这个项目；斯大林定义是错误的，恩格斯的定义是正确的。而吴宣恭同志则说，不把“所有制形式”列为生产关系定义的一个独立项目是否定了所有制问题的基础性和重要性！

问题不在于所有制问题对生产关系是不是重要，是不是具有基础性。相反，正因为所有制问题对生产关系很重要，具有基础性；所以要说明所有制问题，必须把全部生产关系，包括生产、



交换、分配这三大方面，从头至尾说一遍。想在生产、交换、分配之外，去说明所有制问题或财产问题，必然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走向蒲鲁东式的法学或形而上学的幻想。

四

最后，我要答复 1979 年第 12 期《学术月刊》登载的《关于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的几点意见》的作者：计瑗澄、徐海阔、李运福三同志。这三位同志不仅认为斯大林的定义和恩格斯的定义“不存在本质区别”，而且认为“斯大林对恩格斯定义的某些改动是必要的、正确的；斯大林的定义是前进，而不是后退”。理由就是“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是核心。关于这个问题，我在答复吴宣恭同志的时候，已经讲过，问题不在于所有制是不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或核心。相反，正因为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或核心，所以不能把所有制从形成生产关系总体的生产、交换和分配三个环节中独立出来，孤立地来分析、研究。

计、徐、李三位以“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了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以及对小私有制的改造等”为理由，坚持要“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从生产关系中突出出来。”因此，他们三位认为“突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斯大林定义，比不突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恩格斯定义高明。”但是如同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我在《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一文中，就曾经指出马克思是非常重视所有制问题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非但没有在他们的政治经济学对象，即生产关系的定义中“突出”所有制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项目，而且马克思在致安年柯夫信中，还批评蒲鲁东说：把所有制问题独立出来，不仅是方法上



的错误，而且是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①

计、徐、李三位引了马克思《资本论》下面一句话来说明“突出”所有制问题是有理由的。马克思说：“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地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②但是在我看来，计、徐、李三位引出马克思《资本论》这段话来，正好证明：你们要“突出”所有制问题，把所有制独立为一个项目是不对的。

计、徐、李三位的文章引证了不少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录。我相信三位同志是熟读了《资本论》的。请问《资本论》三卷中有哪一卷、哪一篇哪一章为了突出“所有制”，是专门论述“所有制”并以“所有制”为标题的？你们所引为根据的，马克思的上面这段话，是马克思在分析了商品、商品的两因素、劳动的两重性、价值形态或交换价值、商品拜物教、交换过程、货币或商品流通、由货币到资本的转化、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工资、资本的积累过程、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等篇章中的所有范畴概念之后，在第一卷末了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的末一节《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中，作为全卷的结论提出来的。而且不仅本章的标题，连这一章的任何一节都没有标出“所有制”这个标题呀！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的时候，是信守着当年他在批判蒲鲁东的时候所提出的原

① 参见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4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31—832页。



对《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一文的批判者的答复

· 371 ·

则：政治经济学不能从“所有制”这个范畴谈起。相反，只有把“所有制”这一范畴之外的其它范畴说清楚之后，才能把“所有制”这个范畴说清楚。

三大卷《资本论》没有一篇、一章专门谈所有制或财产问题，但是把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本质却说得清清楚楚。现在的某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多设有“所有制”专章，但是据我看，未必把社会主义的所有制问题讲清楚了。

计、徐、李三位又引马克思《论蒲鲁东》一文中以下一段话，为他们的“突出”所有制的主张辩护。马克思说：“蒲鲁东实际上所谈的是现存的现代资产阶级财产。这是什么财产？——对这一问题，只能通过批判地分析‘政治经济学’来给予答复，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财产关系的总和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包括起来，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包括起来。”^① 我认为，计、徐、李三位没有读懂马克思的这句话，而且把这句话理解颠倒了！计、徐、李三位对马克思这段话的解释是这样的：“这里有两点很明确。第一，财产关系不等于法权关系，因此，不属于意志关系总和，也就是不属于上层建筑。作为财产关系的法权表现，才包括在意志关系的总和之中；第二，财产关系不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不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它的现实形态是‘作为生产关系总和包括起来的’”^②。

奇怪的是，计、徐、李三位在自己文章中也承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过“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

① 马克思：《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2页。

② 见《学术用刊》1979年第12期第22页。



法律用语”，但是在里面的第二点又以马克思在《论蒲鲁东》一文中上面引的这句话来证明：“财产关系不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不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它的现实形态是‘作为生产关系总和包括起来的’”，意思是说，“所有制形式”或“财产形式”，应该作为生产关系的独立的组成部分之一“包括”进去的。

促使计、徐、李三位发生这样误解大概是与“包括”这个词的译文不确切大有关系。“包括”这个词在德文原文是“Umfassen”，俄译文是“Oxbatbibath”，中文译作“包括”是不准确的。这个词在这里应作“抓住”、“掌握”或“把握”。因此，马克思的这段话大致应如此译：“什么是财产？——对于这个问题，只能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的分析才能答复。政治经济学不是在财产关系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来把握，而是在财产的现实形态上，即作为生产关系来把握”。

从以上译文，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这句话丝毫也没有意思要把财产或所有制“突出”来与生产、交换、分配相关立，作为生产关系的一个独立项目的意思。

计、徐、李三位或许要说，我的译文是按我个人的主观理解来翻译的；只有现有的译文及他们三位的理解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好吧！对此，我也不作辩解。但是，我们不妨再引证马克思1846年12月28日在写给安年柯夫的信中，对蒲鲁东的另一部著作——《贫困的哲学》——的评论。因为马克思也评论到蒲鲁东在这本书中对财产（所有制）问题的见解。马克思说：“最后，所有制（财产——治方注）形成蒲鲁东先生的体系中的最后一个范畴。在现实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分工和蒲鲁东先生的所有



其它范畴是总合起来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制（财产）的社会关系；在这些关系之外，资产阶级所有制（财产）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另一时代的所有制（财产），封建主义的所有制，是在一系列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发展起来的。蒲鲁东先生把所有制（财产）规定为独立的关系，就不只是犯了方法上的错误：他清楚地表明自己没有理解把资产阶级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的联系，他不懂得一定时代中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①

我们看到马克思在前后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马克思的《论蒲鲁东》是1865年写的，致安年柯夫信是1846年写的），两次评论蒲鲁东的两本不同著作中的同一个题目（财产或所有制问题）所讲的话，在思想上是完全一致的。我对《论蒲鲁东》一文中那句话的译文是更能确切地表达马克思的一贯思想的。计、徐、李三位同志为了替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定义辩护，利用译文的不够确切，坚持要把“所有制”（或财产）形式“突出”出来与生产、交换、分配相并立，作为一个独立的项目“包括”进去，真如马克思所说，“不只是犯了方法上的错误”。

末了，计、徐、李三位列举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生产关系的不同提法，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生产关系这一概念的内容没有明确的阐述过”，因此对生产关系是否包括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提出了疑问。此外，他们根据恩格斯晚年（1894年）给大学生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一段话，认为

^①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4—325页。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恩格斯对经济关系内容的概述……失之过广”。给读者一个印象，好象马克思、恩格斯对生产关系的解说是杂乱无章的。“在恩格斯的定义中也没有直接了当的说明生产关系包括那些方面的内容”。他们三位认为“斯大林对恩格斯定义的某些改动是必要的，正确的；斯大林的定义是前进，而不是后退”。

下面我们把计、徐、李三位文章中有关部分大段引证如下，以便读者可以作出公正判断。“马克思、恩格斯都很重视生产关系，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学中还是在哲学中都大量的使用这个概念。但是，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两种情况。其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生产关系这一概念有很多不同的提法，如‘社会关系’、‘物质生活关系’、‘经济关系’、‘经济形式’、‘经济结构’、‘物质关系’、‘生产的诸关系’等。从原著的精神看，这些提法指的都是生产关系。其二，马克思、恩格斯对生产关系这一概念的内容没有明确的阐述过。《资本论》第三卷第七篇第五十一章的章目是‘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是并提的。在这一章里，有的地方说：‘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分配关系不过表示生产的一面而已’。有的地方说：‘分配关系本质上是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所以二者都具有同样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对于交换关系，马克思是这样说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上引文很难说明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内容而包含在生产关系之内的”。

“在恩格斯的定义中，也没有直接了当的说明生产关系包含那些方面的内容。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



对《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
的生产关系》一文的批判者的答复

· 375 ·

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我们认为恩格斯定义中的生产，指的是物质资料生产，与交换、分配（还有消费）一起形成物质资料生产的全过程”。

“恩格斯在他的晚年对经济关系的内容有过这样一段论述。他说：‘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说的。因此，这里面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级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和惰力才继续保持下来），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经典著作中对生产关系这一概念所作的最详尽具体的阐述。从这里可以看到：第一，经济关系内容中没有分配方式；第二，恩格斯把生产和运输的技术装备以及地理基础等也都包括在经济关系内容中，因此，恩格斯对经济关系内容的概述是否有失之过广的问题，我们认为是存在的。”

“……把斯大林对生产关系内容的概述与上面马克思、恩格斯的引文对照一下，我们可以这样说，从对生产关系内容概述的历史过程来看，斯大林的定义把生产关系的内容具体化了，也可以说是进一步深化了。就这个意义上讲，斯大林对恩格斯定义的某些改动是必要的，正确的；斯大林的定义是前进，而不是后退。”^①

现在，我们来回答计、徐、李等三同志：马克思、恩格斯在

① 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12期第21—22页。



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来论述生产关系，从而用了不同的名词来称呼生产关系，那是一点也不奇怪。但是即使是并非专政经济学的同志也会懂得经济关系、经济往来、社会关系、经济形式等等都是生产关系的同义语，不能以此来证明马恩头脑中对生产关系的内涵，是一无主见、杂乱无章的（计、徐、李三位虽然没有直接这样说，然而他们的描绘在客观上是给了读者这样的印象）。这是一。

第二，关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我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句话，不仅计、徐、李三同志提出了疑问。过去，经济学界也早有过争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是生产方式呢？还是生产关系。我个人认为这个争论是多余的：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既是生产方式又是生产关系。为要说明这个问题就要说明什么是生产方式。对于生产方式的定义，我认为斯大林在《联共党史》第四章中所下的定义是正确的：“生产方式既包括社会生产力，也包括人们的生产关系，而体现着两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① 我过去也引过毛泽东同志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说过的话：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但是要联系着上层建筑和生产力来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的这句话正是这种精神。请读者和计、徐、李三同志一起来回忆一下三卷《资本论》的内容吗！马克思在有关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在关于工资形式等章节，尤其是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

^①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2页。



况》，不是引证过不少法令条例吗？《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不是还专设有《工厂法》一节吗？《资本论》中联系着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的地方那就更多了。例如《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这两章，马克思就曾经对工场和工厂内容的生产力部局，新技术的发明对生产关系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等等作了详细描述。在有关地租的各章节（特别是有关级差地租的部分），马克思又对农业的地理环境（包括水利建设）作了详细描绘。在流通过程（《资本论》第二卷）对运输装备也有所论及。因此，我认为计、徐、李三同志因为恩格斯上述引文中涉及技术装备和地理环境就批评恩格斯对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的概述“失之过广”，未免太轻率了吧！试问计、徐、李三同志是不是认为，把《资本论》上述篇章中论及技术装备和地理环境的段落删了去会使《资本论》更“前进”更“完美”了呢？

第三，计、徐、李三位认为恩格斯在晚年给大学生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是“经典著作中对生产关系这一概念所作的最详尽具体的阐述”。但是“失之过广”。在他们三位看来，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三篇开头讲政治经济学《对象和方法》那整整一章十二页所讲的不是经济关系！三位或许认为那是讲的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那不是指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然则照三位意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而是别的什么关系了！什么关系呢？列宁说：“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地方（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① 我想计、徐、李三位不至于是这

^①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4页。



样的经济学家。那么，他们三位为什么对这一章整整十二页视而不见呢？更何况他们自己还从这一章中引证了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所下的定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而这句话正是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也就是对什么是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问题，经过详细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

再问一遍：为什么计、徐、李三位对恩格斯用了整整一章十二页篇幅阐明的政治经济学对象，即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的定义视而不见，反而用他们认为是“失之过广”的那封信中的一句话当作恩格斯对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定义“最详尽具体的阐述”呢？这是为了要贬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定义，抬高斯大林的定义，用以证明“斯大林对恩格斯的定义的某些改动是必要的，正确的，……是前进，而不是后退。”

计、徐、李三位说：“《资本论》第三卷第七篇第五十一章的章目是《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是并提的”；而上述《资本论》序言则是把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相并立的，他们以此为理由，认为“很难说明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内容而包含在生产关系之内的”。但是奇怪的是他们三位接着又从《资本论》第三卷第七篇的同一章中引证了下面这句话来证明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部分：“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分配关系不过表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这说明三位同志对于自己从《资本论》中引来的语录没有读懂！请问：既然分配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一方面，是它的表现，那么怎么能说分配关系不包含在生产关系之内呢？



现在再来考察一下这一章的标题：《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这里好象又是把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并立的，而且分配关系还放在生产关系前面。这怎么能说分配关系是包含在生产关系内的呀！请计、徐、李三位想一想，为什么《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这一章放在《资本论》第三卷倒数第二章？《资本论》第三卷是研究什么的？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各剥削阶级之间的再分配的！马克思用了近一千页篇幅详细分析了剩余价值的再分配过程之后，在最后得出结论：分配关系的性质是决定于生产关系的性质的，因此，在这里，马克思嘲笑了那些只想改变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而不想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小资产阶级幻想家！而计、徐、李三位的文章却是一个劲地想使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脱钩！

以上就是我对我的批判者（关于所有制问题）的答复。这里只涉及五位同志的三篇文章。对于其余二十篇左右的文章恕不一一答复了。因为这些文章所提出的批判意见，大体上没有超出以上三篇（严格说来只是两篇）的论点。



编辑后记

近年来，我们在对孙冶方同志的资料整理和研究过程中，陆续发现了《孙冶方全集》没有收录的孙冶方文章，包括部分译著。在孙冶方同志诞辰 100 周年之际，我们把这些文章结集成书，作为《孙冶方全集》的补遗。本书收录了孙冶方同志在各个历史时期发表的文章、译著共 24 篇，其中他在 1948 年翻译出版的《简明哲学辞典》（罗森塔尔 尤金合著）因为篇幅关系，只收录了书名。

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孙冶方同志尚有部分文章没有找到，在本书中我们列出了目录（见“附：补遗未编著作目录”），希望专家学者及各位读者一旦发现即告知我们，以使我们尽量把孙冶方同志的作品收集完整。本书的资料收集工作得到了范世涛同志的大力支持，薛培方、周宗濂、宋子伟、吕国兴、李则文等同志参加了编校工作，在此表示感谢。

编 者
2008 年 9 月

附：补遗未编著作目录

1. 关于莫斯科托派案件真相
《现世界》连载，1935 下半年。



2. 苏联的和平政策

《中国农村》2卷3期，1936，6。

3. 是否有客观的历史科学（译著）

《新世纪》创刊号，1936，9。

4. 关于国民经济建设和国家资本主义

《自学周刊》，1937年，第一卷第四期。

5. 《帝国主义论·增订本》（译著）

列宁著，上海新知书店，1937年6月25日初版，1939年3月21日再版。

6. 《中国抗战与国际关系》（译著）

列明著，黎明书局，1938年。

7. 《简明哲学辞典》（译著）

罗森塔尔、尤金著，新知书店1940年3月初版

8. 《揭发右派分子陈振汉的反动意见书企图挑拨党政领导同经济学界的关系的阴谋》

《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二辑，第390页-394页，1958年。

9. 《在建设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序

载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秘书室翻译组译斯特鲁米林《在建设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三联书店，1959年。

10. 关于访问几位苏联经济学家的汇报

汇报材料，1960，6，7。

11. 关于固定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一点看法

《文汇报》1979，4，11。



12. 法庭判决只是清算刑事责任

《光明日报》1981, 1, 9。

13. 忘记过去，就是背叛

《人民日报》1981, 7, 20。

14. 知难，行亦不易——研究工作者如何防止骄傲

1981, 8。

15. 效益与速度的统一：有计划地抓好企业技术改造

1982, 8, 15。

(仅供参考)